

博雅人文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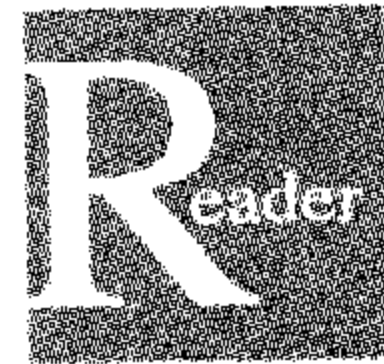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

Postmodern Historical Theories Reader

彭刚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人文读本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

Postmodern Historical Theories Read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彭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
(博雅人文读本)

ISBN 978-7-301-27333-3

I. ①后… II. ①彭… III. ①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0296 号

书 名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 HOUXIANDAI SHIXUE LILUN DUBEN
著作责任者	彭 刚 主编
责任编辑	陈 甜 李学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333-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1 印张 355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导 论	彭 刚(1)
历史学的重负	海登·怀特(18)
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	海登·怀特(42)
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	海登·怀特(60)
答亚瑟·马维克	海登·怀特(78)
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	卡洛·金兹堡(91)
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111)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六条论纲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142)
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151)
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	佩雷斯·扎格林(170)
答扎格林教授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184)
“曾经”:论历史	基思·詹金斯(208)
“宏大叙事”与历史学学科	阿兰·梅吉尔(233)
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	威廉·克罗农(264)
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性与客观性	耶尔恩·吕森(296)
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	彼得·伯克(313)
进一步阅读书目	(330)

导 论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可以区分为广义的和狭义两种。^{〔1〕} 概言之,广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所产生的冲击和效应。比如,对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自由”“进步”“阶级冲突”为主线来解释人类历史过程的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事”的拒斥,导致了历史学的“碎片化”。又比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微观权力分析,让人们更加关注权力关系在历史话语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则在不遗余力地攻击以“白的、男的、死了的”为中心的历史图式和经典谱系的同时,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改变和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视角等等。狭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则指的是植根于历史学内部、而在史学理论这一专门学科领域内产生的具有明显后现代主义取向和色彩的理论范式。可以说,以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问世为标志而正式登场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2〕},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体现于史学理论这一专门领域内的主要理论形态。本文拟就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论取向、问题意识和政治蕴涵稍作梳理和辨析。

一、理论取向:“文本化”与“历史实在”

20世纪70年代,在历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这一场学术范式的转换,通常被称为“语言学的转向”,或者是“叙事的转向”“修辞的转向”。这三种指称虽侧重点有所不同,内涵却大同小异,标示出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与此前思

〔1〕 参见彭刚:《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几点辨析》,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2〕 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已收入本读本),详尽梳理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由微而显的学术史脉络。

辨的和分析的史学理论的不同取向。如果说,思辨的路数是要以比如黑格尔那种玄思的哲学纲领,或者汤因比那种气度恢宏但更多经验成分的理论模式,来对人类总体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完整的解说的话,分析的(或者批判的)路数所关注的,不是历史过程本身,而是历史认识的特性,历史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解释的模式等问题成为其考察的焦点。叙事主义的思路,用怀特的话来说,则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的:历史学文本最彰明较著的外在特征就是,它乃是一种“言辞结构”(verbal structure)、一种“文学作品”或“文字制成品”(literary artifact)。对历史文本所具有的诸多特性的深入考察,既令叙事主义史学理论颇多创获,又让其陷入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

在我看来,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最显著的理论取向,就是以历史文本作为对历史学家全部工作进行理论反思的重心;而其最突出的理论特征,就在于它将历史学彻底地文本化了。也许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来阐述这一“文本化”的理路。

一方面,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各门学科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在研究活动中的缺席(absence)。“在谈到‘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指的只可能是‘过去’发生过的全部事件(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总和。”〔3〕历史学要研究的是过去,但这一“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不可能直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历史学之所以成其为必要,历史学之所以成其为可能,都在于“过去”的缺席。我们试图要对“过去”有所了解、有所言说,靠的是对于这一“过去”遗存于今天的若干遗迹(traces, relics)的研究。这些遗迹中,文字史料、账簿名册等固然是文本(text);宫室器皿、考古遗址等等物质性的遗存,也可以视之为广义上有待于人们去解读的文本,而且它们也只有被转化为文本的形式才能进入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流程。历史学家的工作开始于文本,他的最后产品——史学著作和论文(当然也包括如今兴盛起来的影视史学的音像产品)——也是文本。“文本性”就成了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所无法逾越的藩篱。就像人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历史学家的工作永远无法超出文本的限囿。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用于编码、交流和沟通的基本工具,乃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ordinary educated speech)。这意味着,他用来给自己的素材赋予意义,使陌生之物变得熟悉,令神秘的过去变得可以理解的唯一工具,就是隐喻性语

〔3〕 海登·怀特:《答亚瑟·马维克》,见本读本第79页。

言的种种技巧。”〔4〕历史学家没有如物理学家那样的一套专业语言,他使用的是日常的自然语言,而日常自然语言总有言不尽意、言外有意、言在此而意在彼等等不透明的特性,而不可能毫无扭曲、不加损益地将过去传达给他人。历史学家在使用此种语言形成自己的历史文本时,在传达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信息的同时,也要提供自己对于这些事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的解释。无论在主观用心和外在的文字表达中,他们如何力求客观中立,都不可避免地会或明或暗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伦理立场、政治倾向和审美偏好渗透在其中。历史学所无法离弃的文本性,就使得它在传递有关过去的信息时,必然包含了选择、建构、想象、创造的因素,从而具有了与文学作品等文本相类似的一些特征。用怀特的话来说,历史文本的特征在于,“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并且其形式与其在文学中的对应物比之在科学中的对应物,有更多的共同之处”〔5〕

然而,过去这一“历史实在”的缺席,是否就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就如同安克斯密特所说的,“我们拥有的只是文本,我们也只能在文本之间进行比较。如果我们试图寻找关于过往的最佳描述,我们只能询问我们自己,在这些文本当中,哪种文本使现有的历史证据得到了最为合理的使用。但我们根本无从通过比较所选的文本与‘过往’本身来检验我们的结论”〔6〕

国内外都有不少论者,从叙事主义者对历史学文本性的强调,而得出他们否认了过往历史的真实存在的结论。但是,否认我们能够直接接触到过往的历史实在,与否认存在着过往的历史实在,毕竟不是一回事。海登·怀特受到这样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经常引用罗兰·巴特的名言:“事实不过是语言学上的存在”。但他就此区分了“事件”和“事实”:“事件”是真实发生在过去的,是“给定的”,不是历史学家所能建构出来的;然而它一旦进入历史学家的工作程序,成为“被描述的事件”,就成了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学家的语言加工和建构了的“事实”〔7〕即便是服膺怀特的理论而立场更趋极端的詹金斯,也曾明确说过:“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后现代主义者——本内特、安克斯密特、怀特、罗蒂、德里达、甚至鲍德里亚都没有——在他们的论点中否认过去或现在的实际存在。他们无时无刻不把这一点当作是‘给定’了的东西;的的确确有一个实

〔4〕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50页。

〔5〕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40页。

〔6〕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本读本第179页。

〔7〕 海登·怀特:《答亚瑟·马维克》,见本读本第79页。

际的世界‘在那儿’，而且已经在那儿很长时间了，它有一个过去。……换言之，后现代主义者并非观念论者。……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假设不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过去，然而，却坚定地认为……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才能抵达实实在在的过去，因而它就是一种‘解读’。”〔8〕换言之，后现代史学并不否定过去的真实不妄的存在，而只是强调，由于文本性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接触知过去；而任何通过文本来对过去企图有所把握和领会的努力，就都已经注定了要包含主观的、解释的因素在内。

可是，一旦将历史学文本化，就难免会将历史实在放入括号中，存而不论。典型的情形就是，安克斯密特虽然没有否认“过去”的存在，却认为它“在认识论上而言是一个无用的概念”〔9〕倘若在理论上放弃了历史实在对历史文本的约束作用，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就丧失了根基，相对主义就成了必然的宿命。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家群体中最受诟病之处，莫过于此。一方面，如同经受了纳粹大屠杀的惨痛经历的犹太历史学家维达尔-纳奎（Vidal-Naquet）所说：“每一事物都必定会几经曲折而成为某一种话语；然而在这之外，或者说在这之前，存在着某些不可化约为话语的东西，不论好坏，我将会继续把它叫做真实。”〔10〕就如同我们不能因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就认定超出自身身体发肤所能够感受的一切之外的外在世界，纵使存在也不具备对于我们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如同我们下一节还要谈到的，历史证据固然要经由文本化的程序，才能进入历史学家的工作流程，但只要不走到否认历史证据对于建构历史图景的制约作用那样一种反常识的地步——就我所见，还很难说有哪位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走到这一步——历史实在就不可能像安克斯密特所说的那样，丧失了真实的效用。彼得·伯克说得好：“尽管‘实在’概念在哲学上引发了一些问题，但它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便未曾被中介过的实在对我们而言是无法达到的，但至少还有可能表明，某些表现比之其他的距离实在要更远。”〔11〕

〔8〕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20.

〔9〕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本读本第184页。

〔10〕 卡洛·金兹堡：《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见本读本第91页。

〔11〕 海登·怀特：《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见本读本第305页。

二、问题意识：“叙事”与“虚构”

分析路数的史学理论,在以历史解释的模式为核心论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理论传统。波普尔-亨佩尔的覆盖率模型(covering law model)认为,倘若将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纳入到某一普遍的规律之下作为其个案显现,就达成了成功的历史解释。而德雷(William Dray)等人的逻辑关联论证(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则沿袭了柯林武德的传统,将对行为人动机和选择的合乎逻辑的关联,作为历史解释的关键。^[12] 在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看来,这二者都没有能够深入了解历史学家史学实践中最紧要的因素。前者将历史解释视作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并无根本差异,后者则把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那位致力于探察“谁谋杀了约翰·道伊”的侦探,视作历史学家工作的典范。两者的共同特点是,都只注重考察历史学文本中的个别陈述或者简单的陈述系列的特性。发现和确定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关联,固然是历史学家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历史写作(在理论与实践皆然)中最本质及最有兴味的东西并不发生在单个陈述的层面,而是发生在历史学家采用何种策略(politics)来选择陈述,以摹写(individuate)他们心中‘关于过往的图景’这一层面。我们发现,正是在这里引发了最多的历史争论,并且在最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过去的观感。”^[13]

历史学是以求真为自身使命和学术戒律的,然而,历史学家的工作比之提供有关过去发生的种种事情的真实陈述,要复杂得多。海登·怀特曾经引用过列维·施特劳斯的说法: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到访者,在看到就法国革命而写作的上千部历史时,该是如何地惊诧莫名!“作者们并不总是用上同样的事件;当他们用上同样一些事件时,那些事件也被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然而,这还是与同一国家、同一时期、同一事件相关的各种变奏而已,那些事件的实在散布在一个多层结构的每一个层面之上。”^[14] 更早得多的时候,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培尔(Pierre Bayle)就曾观察到:同样的事实可以写一部赞美诗,也可以写出一部

[12] 参见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第一节的论述。

[13]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本读本第175—176页。

[14]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47页。

讽刺作品;可以写成一篇颂辞,也可以写成一篇讽辞。^[15] 史学史上,历史学家就同一论题所展开的争议,当然会涉及对史实的认定,但也许在更多也更要紧的情形中,他们的争议关涉到的问题是,哪些史实应该被纳入历史图景之中,哪些史实应该居于更关键的(或者次要的)位置,某一特定史实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应该是什么,应该以何种方式才能将某些史实合理地组合和关联起来,等等。

用安克斯密特的术语来说,历史文本中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一个是陈述(statement),一个是文本整体(text as a whole)。^[16] 传统的看法总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发现过去的事实,把它们如实客观地表达出来,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忠实记录,自然会呈现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与此相对应,分析的史学理论关注的,就是历史学家用来表达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一个个句子——亦即历史陈述——的特性。如此一来,这样的理论视野所萦心的,就是陈述是否指涉(refer to)某一个过往所发生的事态、是否与过去的某个事件相吻合(correspond to)的认识论问题了。然而,实际上历史学家所提供给我们的,是由若干陈述所组成的历史文本。而要构成一个历史文本,首先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与论题相关的对事实的可能陈述,哪些应该进入历史文本,哪些应该被放弃或排斥在外。在历史学实践中,通常的情形是,历史学家最后能够纳入自己的历史文本中的有关事实的陈述,只可能是和论题相关的他所能掌握的全部可能的事实陈述中的一部分,甚而是其中非常微小的一个部分。“我们对于历史结构和过程的说明,因而就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在我们的表述中剔除的而非纳入的是什么。因为,为着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一个事件序列的结构,历史学家要有将某些事实断然排除在外的能力,正是依靠此种能力,历史学家赋予了那些事件作为一个完备融通的情节结构所具有的象征上的重要性。”^[17] 针对同样论题的历史文本,采纳的完全可能是非常不同的事实陈述的组合。

其次,同样的事实陈述,出现在有关同一历史论题的不同历史文本中,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和不同的蕴涵。环境史名家克罗农,比照分析了有关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所发生的“尘暴”(Dust Bowl)的两部论著。其中的一部,将尘暴的发生和危机的平息,描述为在那里生活的美国人坚韧不拔、成功

[15] 彼得·伯克:《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见本读本第294页。

[16] 安克斯密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形下将其称之为“叙事实体”“历史叙事”“历史表现”等。参见拙著《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安克斯密特:从‘叙事实体’到‘历史表现’”。

[17]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48页。

应对了大自然的挑战的一阕颂歌；另一部则将危机的发生叙述成无度地索取和掠夺大自然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于是，在两部书名几乎雷同、论题完全一致、所用史料高度重合的论著中，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在两位历史学家的笔下，外在特征并无不同的南部大平原，在一个故事的开头，乃是一片荒凉贫瘠而危机四伏的荒野，经历了人们千辛万苦的不懈奋斗，最终被改造成宜居的家园；在另一个故事的开头，南部大平原虽则看似贫瘠而脆弱，却是经历了大自然上百万年的演化而形成的精巧复杂的生态系统，由于人类贪欲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只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改变，危机就不会真正消除。此种同样的证据“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叙述”〔18〕的现象，在史学实践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再就是，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不仅是发现和确立事实，而且——也许还是历史学家工作中最重要的和最具创造性的部分——还要将它们编排为有机的整体。单纯的互不关联的史料堆积在一起，不过是克罗齐所贬抑的“编年”或者王安石所嘲讽的“断烂朝报”。互不关联的孤立的事实陈述放在一起，并不会自动呈现出意义来。一系列相关的陈述构成一个可理解、有意义的历史图景，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在历史学文本中，即便表面上完全是由对事实的单个陈述所构成的历史文本，文本整体中所蕴涵的意义、价值倾向、作者立场等因素，似乎并没有出现在构成文本的任何单个陈述中，却又清晰可辨。文本的意义并非是从其组成成分就能分析出来的，用大家烂熟于耳的话来说，就历史文本的特性而论，确实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19〕

史学理论关注的是历史陈述或文本的构成部分，还是关注文本整体，其间的视野大不一样。由前者向后者转移，转而考察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所具有的特性，正是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最核心的问题意识之所在。由这样的视角出发，怀特在《元史学》中通过对 19 世纪若干历史学和历史哲学文本的分析，解析了历史文本所具有的三个不同的概念化层面（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并且进一步表明，历史学家构思历史对象的语言和思维的转义模式的不同，才是决定了历史文本不同层次内涵的深层结构。安克斯密特则通过对历

〔18〕 威廉·克罗农：《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见本读本第 269 页。

〔19〕 有关历史文本整体的意义超出单个叙事所具备的意义的总和，参见拙著《叙事的转向》第五章第四节中的例证。怀特《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的想象》一文，也分析了德国史学家 A. J. P. 泰勒的一段史学文本，来证明历史文本的一些特性，见 Hayden White, “Historicism, History, and the Figurative Imaginatio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史学家语言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就其整体而论的历史叙事的（隐喻性）意义，超出了其单个陈述的总和的（字面的）意义之时，历史叙事才成其为历史叙事”，而“历史叙事就像脚手架：在攀登上了其单个陈述的台阶之后，人们的视野之所及，远远超出台阶建基于其上的那片地域”。〔20〕叙事主义的理论创获，就在于为解决“历史学家的工作为何会比只是写下真实的陈述要复杂得多”〔21〕这样的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平台。

通过考察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怀特看到的是：“没有任何特定系列的偶然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就构成一个故事；它所能给历史学家提供的至多只是故事的元素。事件被炮制到一个故事之中，是通过压制或者贬抑其中的某些东西，而突出另一些东西，通过描画、主题重复、语调和视角的变化、交替的描述策略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我们通常指望在一部小说或者一部戏剧的情节化中找到的所有技巧。”〔22〕换言之，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之中，固然有着历史学家从史料中所“发现”的成分，却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学家所“发明”的成分。所谓“发明”，怀特在更多的时候径称为“虚构”，指的就是历史学家在凭借史料来形成历史文本、构筑历史图景时，不可避免地会将创造、想象、建构等因素以及各种与写作文学文本时相通的手法，渗透于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之中。怀特说：“叙事性描述不是仅包含事实陈述（单称存在命题[singular existential proposition]）和论证；还同样包含了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元素，正是这些元素将舍此便不过是一张事实清单的东西变成了故事。”〔23〕他所谓的“发明”或“虚构”，就是这些“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元素”。这也是怀特理论中最遭人诟病之处。〔24〕

一方面，“虚构”一词在英文中所对应的“fiction”，源于拉丁文的“fictio”。除了中文中的“无中生有”“向壁虚构”和“小说”等含义外，它还有着“想象”“创造”“建构”等含义。比如，法学术语中的“拟制”一词，就是“fiction”。怀特和别的史学理论家（包括对叙事主义有所保留甚至持反对立场的德国学者吕森和美

〔20〕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六条论纲》，见本读本第139页。

〔21〕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本读本第176页。

〔22〕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42页。

〔23〕 海登·怀特：《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见本读本第58页。

〔24〕 怀特自己也说：“事实与虚构的对立是历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且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对我、或任何斗胆认为无论多么努力地尝试去避免，历史学家的文本中仍然可能存在‘虚构’因素的人感到愤怒的一大原因。”参见海登·怀特：《答亚瑟·马维克》，本读本第80页。

国学者梅吉尔等人),主要是在后一重意义上来使用“虚构”一词的^[25](所以,也有学者径直主张在这种场合下将此词译为“拟构”)。一些论者由“虚构”一词在中文中的通常蕴涵出发,指斥怀特等人将事实与虚构混同起来,完全否定了历史学所受到的外在历史实在和历史证据的束缚,就很难说是对怀特等人的公平对待。^[26]

另一方面,怀特和安克斯密特都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历史文本中必定包含了诸多对于历史事实的陈述,这些陈述必定受到了历史证据的束缚,从而可以用“真”“假”这样的标准来对其做出评判;然而,由这样的陈述构成的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面临的却是不同的情形。怀特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讲述某组事件的某个故事与事件本身之间的关系,是否与一个事实陈述与它的所指之间的关系相同?”^[27]其言下之意,显然和安克斯密特所明确论证的一样:有关事实的陈述因为要“指涉”和“对应于”过去,所以有“真假”“对错”之分;就由诸多对于事实的陈述所构建而成的“叙事实体”或“故事”而论,却并非如此。怀特虽然并

[25] 怀特在《元史学》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就对他所使用的“fiction”一词的内涵有明确表示(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中文版序言”,第7—8页)。尽管怀特本人的思想立场和理论表述,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侧重点也有转移,但至少他在《元史学》时期的立场并不与他后来的这一表示相矛盾。吕森说:“既然解释将事实之间的历史关系带入了某种叙事形式,解释程式就与讲述一个故事的程式有了非常密切的关联。这同样由‘虚构性(fictionality)’一词来表达。历史解释意义生成的过程,是在与文学和艺术的意义生成同类的‘本质上乃是诗性行为’的这一范畴的支配下出现的。……虚构性就这样给历史知识和历史编纂中那些不具备源自史料的信息的那种纯粹事实性的成分,标示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地位。”(参见耶尔恩·吕森:《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性与客观性》,本读本第285页。)梅吉尔说:“所有历史学都拥有某种虚构性的或思辨性的维度。……这些具有文学性的试验[指史景迁、娜塔莉·戴维斯等人的作品]暗示了一种深层的、本体论上的要点:历史客体本身就是一个‘虚构性’的创造物,是历史学家和她的读者们的心灵建构的客体。这并不是宣称‘不存在那个过去’;而是,历史学家在她的作品中呈现的某个特定的历史客体是由历史学家(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建造出来的。”(参见阿兰·梅吉尔:《宏大叙事与历史学学科》,本读本第244—245页。)由此可以看出,在并不属于叙事主义阵营的史学理论家中,吕森和梅吉尔也主要是在“创造”“想象”“建构”的意义上来使用“虚构”一词的。在历史学家中,娜塔莉·戴维斯的著作《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Natalie Zemon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一书,依据16世纪法国的司法档案,考察当时的囚犯如何按照类似于“虽然罪责难逃,毕竟情有可原”的路数来陈述自己的罪行,以求得到赦免或宽待。这里的“虚构”,也绝非无中生有之意,而只是将犯罪情节按照某些社会文化习俗中的套路来编排的情形。

[26] 在欧美学者中,因为有人更多地从第一重意义上来理解“fiction”一词,这样的情形也不乏其例。

[27] 海登·怀特:《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见本读本第58页。怀特的理论创造更多倚重于文学理论,相比而言,更多地汲取当代西方语言哲学成就的安克斯密特,对这一类问题做出了更系统、更深入的探索。

不否定“事件”的真实不妄,却认定了在“事件”组合成为“故事”时,由于诗性的因素的介入和渗透,后者就并非对于历史实在的呈现。换言之,过往的历史实在中有“事件”而无“故事”或“叙事”,后者是历史学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虽则它不能脱离前者而自行成立。怀特常爱引用明克(Louis Mink)的一句话:“故事不是人们经历过来的,而是被讲述出来的(Story is not lived, but told)”。在他看来,同样的一些事实,人们完全可以将其编排为不同的故事样式,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当事关对历史记录的理解时,在历史记录本身之中找不出理由来选择某一种而非另外一种赋予其意义的方式。”^[28]安克斯密特则认定,由怀特所开启而为他所推进的这样“一场从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到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的革命”^[29],让人们认识到,历史叙事从根本上乃是一个语言制品(linguistic object),它不像陈述一样与过去相对应,其功用在于给人们提供了各种“提议(proposal)”,使得人们能够从特定的视角来看待过去。而对于历史叙事或历史表现而言,我们无法用真假对错这样的标准来对其做出简单的评判。因为,“说出过往的某些真(true)事可谓易如反掌,任何人都能做到,然而,说出过往中那些恰当的(right)事情就很困难了”。^[30]于是,历史学一贯的求真的价值诉求、追求“客观性”的“高贵的梦想”,就此被怀特或者安克斯密特这样的叙事的唯心论(narrative idealism)^[31]消解了,或者至少是被贬抑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

的确,叙事主义让我们意识到,在历史图景的建构过程中,在历史文本的形成过程中,历史学家的认知模式、价值立场和审美偏好,以及他们所可以现成利用的文化形式(如历史写作所可以采取的体裁和模式)等,发挥了何等巨大的影响。如同克罗农在考察环境史文本时所指出的:“它们的情节是一些深深根植于我们的语言中的文化建构,……历史学家没有创造它们,而且我们对它们的熟稔促使我们把讲故事的模式塑造成符合它们的样子。……它们都有隐秘的

[28] Hayden White,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75.

[29]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见本读本第125页。

[30]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本读本第176页。

[31] 相对于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叙事的唯心论”,利科(Paul Ricoeur)和卡尔(David Carr)等人的“叙事的实在论”(narrative realism)则认为,历史叙事或者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在历史实在中有其对应的基础。参见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 vol. 3, tran. Kathleen Blaml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David Carr, “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 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议程,影响着叙事包含什么和排除什么。这些议程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即使是身为作者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完全控制它们。”^[32]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会发出和克罗农一样的疑问:“自然和过去在我们讲述关于它们故事的能力面前,是否可以无休无止地听凭我们的摆布?”并且,我们大致也会得出跟克罗农一样的结论:我们要“一边承认叙事的巨大力量,一边仍然坚持过去(以及大自然)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必须多少与之相吻合的实在之物,不然它就完全不是历史了”。^[33]

叙事主义从考察历史文本的特性出发,深化了我们对于历史学家工作性质的认识。怀特说过:“历史学更像是一门技艺性(craft-like)的学科,这就意味着,它倾向于受惯例和常规(而非方法论和理论)控制,倾向于利用日常的或者自然的语言来描述它的研究对象,并且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现历史学家对这些对象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是基于对‘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和将其与‘第二手资料’协调起来的努力。”^[34]历史实在虽然无从直接碰触,它却无处不在地通过历史证据,制约着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和建构。只要还认可历史学通过长期的发展过程而积累起来的学术规则和研究程式,还承认历史学有其特殊的“技艺”,只要“真实不伪依然被历史学家普遍视作一项基本的约束法则”^[35],求真和客观,就依然是历史学所无法放弃的工作准则和价值追求。毕竟,历史学家的工作,从始至终都要受到通过历史证据而呈现出来的历史实在的束缚;历史学家针对特定的论题,在史实的选择上虽有着自由空间,却也有着不能逾越的限制^[36];历史学家针对同一论题虽能够提供诸多不同的历史图景,但历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对于其间的高下优劣却也往往能够达成共识。就此而论,虽然在经历叙事主义的冲击之后,“真理(真相)”和“客观性”等概念,在史学理论中所可能具备的内涵要比之过去更为复杂,但却不是轻易就能被取消或排斥到边缘的。^[37]

[32] 威廉·克罗农:《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见本读本第253页。

[33] 同上,第427—428页。

[34] 海登·怀特:《答亚瑟·马维克》,见本读本第82页。

[35] 佩雷斯·扎格林:《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见本读本第168页。

[36] 比如,“一部关于大平原的历史,如果一直讲述持续进步而从未提及尘暴的话,立刻就会遭到质疑,就像一部关于纳粹如何对待犹太人的历史中没有提及集中营一样。历史叙事在任何一点上都要受制于它们可以用来或者无法用来支持自己的证据。……自然和我们一同书写了故事。……[不同的人]可能会从尘暴得到截然不同的教训,但没有人能否认尘暴本身”。参见威廉·克罗农:《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本读本第271—272页。

[37] 参见拙著《叙事的转向》第五章“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三、政治蕴涵：“重负”与“解放”

历史学和史学理论从来都不乏伦理和政治上的关怀和蕴涵。中西史学传统中,一方面,都要求历史学要讲述关于过去的真相,无征不信;另一方面,历史学又要有让人们鉴往知来的政治和道德功用。在西方史学传统中,这两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吕森说:“由信守真理而得到的历史学的‘有用性’,乃是道德意义上的:*historia vitae magistra*[历史是人生的指南]。通过积累超越单个人生界域的经验,历史就教给人们生活的准则。历史表现要带来审慎(*prudential*),也即,依据从累积而来的经验得出的普遍规则来安顿实际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运用规则的能力)。历史学要能够并且致力于产生这种实用的和道德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出现,要靠人们以叙事的形式来编排有关过去的经验,而启示就包含在那种人们所总结出来的有关人类行动的规则和原理的形式中。要实现与经验的这一关联,真理诉求就是必不可少的。”^[38]不真实的历史,不能给人们提供有关过往的人类经验的真实信息,从而也就无法达成提供人生指南的道德功用。

现代史学是以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为基础的,宏大叙事的概念蕴涵了对于某种单一而融贯的历史(*a single, coherent history*)的信念。历史学家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有赖于相信这一大写的历史的存在。^[39]克罗农发现,对于讲述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所发生的尘暴的那些故事来说,“我们在这些故事里发现的上升的线索,实际上是和一个有着同样上升特点的更长的情节线索联系在一起的。不论那个更长的情节被表述为美利坚民族的缔造、西方文明的兴起,还是人类的进步,它依然把它的宏大气象引入了外部形式看起来更为有限的大平原历史中。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能被一部整整五百页都是关于风车和带刺铁丝网的发明这类主题的书所深深吸引。”^[40]人类有一个统一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在于累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相,从而有利于最终揭示出这一单一历史进程的意义。这样的信念,保证了人们对于历史学的客观性的信心,也让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和功用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保障。

[38] 耶尔恩·吕森:《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性与客观性》,见本读本第279页。

[39] 参见阿兰·梅吉尔:《“宏大叙事”与历史学学科》,已收入本读本。

[40] 威廉·克罗农:《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见本读本第258页。

如果说,19世纪以来历史学的专业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历史学家们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的话;他们在很长时期内还能确信,虽然历史学内部变得隔行如隔山,相去甚远的研究领域之间几乎难以展开任何实质性的学术交流,但自己和同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所做的一切,最终将会成为构成全部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的一个微小的部分。总有一天,百川归海,各种细部的研究汇集起来,人们终将能够获得阿克顿心目中的那种“终极的历史”(the ultimate history)。^[41]可是,后现代条件下所出现的历史学的碎片化,在很多人眼里,似乎使这些细部完全丧失了最终得以综合、从而形成人类历史更加广阔的图景的可能性。碎片化所带来的,不仅是客观性的危机,也使得历史学在实际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遭到了疑问。在“语言的指涉性、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以及意义和知识与之相关联的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存在”^[42]都被动摇之后,历史学还能做些什么?

在其进入史学理论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历史学的重负》中,怀特所着重发挥的,可以说就是对于当今时代史学何为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他的行文中不难分辨出尼采和存在主义的浓厚气息。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学家的重任就是在某个基础之上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尊严,……也就是说,改造历史研究,使历史学家积极加入到把现在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运动中”^[43]。怀特像尼采一样认定,“不加限定并被推向极端的历史感会根除未来”,倘若历史被认为是给定的、一成不变的,它就成为了人们在当下做出行动和选择时的沉重的负担。就仿佛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因为过多地沉溺于思考而丧失了决断和行动能力,怀特笔下承载了历史重负的人,也会由此而无力做出改变现状的选择。好在,丧失了作为单一进程的历史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反而给人们摆脱历史的重负赢得了契机。人们面对的过往和历史不过是一片混沌,意义和模式只能是人们施加在这一片混沌之上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怀特自《元史学》以来的思路,不过是要表明,人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编排和把握同一个历史片段。通常的看法是,现在和未来是开放的,我们可以做出自由的选择,而过去已然是无可改变的了。怀特所论证的则是,我们不仅拥有面对现在和未来时的自由,在面对过去时,我们也有着同样的自由,可以选择了解和把握过去的方

[41] 参见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42] 在扎格林看来,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要攻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要义。佩雷斯·扎格林:《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见本读本第161页。

[43] 海登·怀特:《历史学的重负》,见本读本第30页。

式。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发挥怀特的话说,人们是通过选择过去来选择他们的现在的(Men choose who they are by choosing who they were)。^[44]可以说,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重负(在此词作为“使命”的意义上),就是使得历史不再成为人们的重负(在此词作为“负担”“压力”的意义上)。

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来说,确定性的丧失,带来的是自由和解放的契机,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那就是,“超验的能指的缺失将意义的赋予扩展到了无限”。^[45]叙事主义所释放出来的历史解释的不确定性,在这一点上与宽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息息相通。然而,在怀特这里,人们面对过去的束缚时所拥有的自由,似乎还不是漫无限制的。一方面,他不断地下类似的断言:“没有什么历史事件本然地就是悲剧性的;……在历史中从某一个视角看来是悲剧的东西,从别的视角来看则是喜剧性的,就如如在社会中从一个阶级的立场看来或许是悲剧性的东西,就像马克思所力图揭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样,在另一个阶级看来不过是闹剧。……同一个故事序列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喜剧或悲剧故事的成分,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对于情节结构的选择,那在他看来能够最恰当地将那类事件纳入序列以将其构成为一个融通的故事。”^[46]另一方面,在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样的历史对象时,怀特又不得不表示,“就以喜剧的或者田园牧歌的模式来将第三帝国的事件情节化的情形而论,我们会有充分的理由去诉诸事实,以把它从对第三帝国的相互矛盾的叙事的清单上划去”。^[47]在怀特的理论框架中,历史学家受到深层次的语言和思维模式的四种转义模式的驱使,可以经由不同的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这三者又各自都有四种主要形态)的组合,来把握过去历史的某一片段。但是,一则,可供历史学家使用的现有文化习俗所能提供的各种概念化模式及其组合,毕竟是有限而非无穷的^[48];再就是,既然说“大多数历史序列都可以用许多不

[44] Hans Kellner, "A Bedrock of Order, Hayden White's Linguistic Humanism",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p. 197.

[45] 转引自 Keith Jenkins, "'Once upon a time': On History", *At the Limits of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216.

[46]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42—43页。

[47] 海登·怀特:《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见本读本第60页。

[48] 怀特在《元史学》中提供的可供历史学家概念化的模式不过数种,就被一些人指责为语言学决定论,他对此的回答是: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他们自身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中,而是在某种被给定的条件下开始他们的创造活动的。历史话语的创造也是如此。参见 Hayden White,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Chartier's Questions",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27(1995)。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给定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缺失。

同的方式加以情节化”〔49〕,实际上就等于说,并非所有历史序列都是同质的,都能够被纳入所有可能的情节化方式中。这样的情形,在我看来,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即便如怀特这样把对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的考察,都纳入文本和语言的藩篱之内,也无法摆脱历史实在对于历史学家构想过去的方式的束缚能力和强制作用。倘若说历史学的价值,在于揭示历史意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表明自由选择的存在和作用;那么,怀特所应允给我们的面对历史的自由,还是一种受到历史实在束缚的自由,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自由。

然而,在立场更加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比如詹金斯那里,历史学家面对过去,却似乎只有自由而没有了束缚。詹金斯由怀特式的立场——“历史作品使用的是形式与体裁被严格规定的语言,并且永远是由一连串修辞工具与文体象征所构成的”——出发,得出的却是比之怀特走得更远的结论:“它们确保历史作品永远是被剪裁、被形塑、被整理、被定制好的类型,并成功地适合所有的形状、所有的尺码与所有的需求;历史学家们近似于神秘地永远能从他们对‘过去’的造访中带回他们想要的历史”〔50〕;于是,“过去可被认为是处于一片混沌之中,谁都能将它带走——马克思主义者、托利党人、经验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现象主义者——谁都能拥有它”。〔51〕詹金斯本人虽然明确地为诸多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并未否定历史实在的存在而辩白过,然而,历史实在的概念对于他来说,却似乎完全成了多余的累赘。扎格林评论说,“后现代主义及解构理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试图通过将各色思想化约为写作的共同状态,以取消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52〕。倘若说,扎格林的指责对怀特和安克斯密特而言,还有失公平和准确的话,放在詹金斯的身上倒是恰如其分。

后现代主义思潮体现在历史学领域,如同在任何其他领域一样,也会出现相对温和与更加激进的不同版本。如彼得·伯克所言,“[后现代主义]大部分的挑战存在着若干温和的与极端的不同版本(从‘历史学家比过去所常常认为的要更接近于小说家’到‘历史就是虚构’等等),温和的版本显然要有说服力得多。认为历史学家不能讲述全部的真相是一回事,贬斥他们只讲述真相的理想又是另外一回事;将实在放入括弧是一回事,否认实在又是另外一回事。宣称

〔49〕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84—85页。

〔50〕 基恩·詹金斯:《“曾经”:论历史》,见本读本第196页。

〔51〕 同上,第205页。

〔52〕 佩雷斯·扎格林:《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见本读本第167页。

历史学家创造了封建制度是一回事,说他们编造出了征服者威廉又是另外一回事”〔53〕詹金斯那样的论点,近乎于“关于过去,关于历史,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那经常被人指责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其实,这不过是后现代史学中偏向极端的一脉。这种失却了任何根基、空空荡荡无所依归的状态是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否存在和值得追求,又如何还能被严肃地视作詹金斯所极力倡言的“解放事业”的鹄的,都难免让人心生疑窦。

对自身理论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关联,怀特有过这样的夫子自道:“在我看来,相对主义是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在道德上的对应物;而且,我将相对主义理解为社会宽容的基础,而不是一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许可证。”〔54〕怀特给自己的理论倾向贴上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标签,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林恩·亨特的判断:“对历史学家而言,后现代主义一般来说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学家不能洞穿语言给历史事实蒙上的面纱,换言之,历史学家仅能书写文学文本,而非真相。”〔55〕然而,这样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就真的能够给社会宽容、给怀特所企望的将人们从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理想,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吗?金兹堡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从逻辑上说,因为绝对的怀疑论将会与它自身相矛盾,如果它没有扩展到同样将宽容作为一条范导性原则包括进来。另外,当道德上和理论上的差异不是最终与‘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不会有任何可被施以宽容之物存在了。”〔56〕在将怀特的理论取向或明或暗地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时,金兹堡也许过于深文周纳。但是,他所提出的疑问——丧失了“求真”的诉求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是否真的可以给自由和宽容带来它所允诺的广阔空间——却是后者所无法回避而又难以在自身的理论框架中解决的问题。

* * *

这一“读本”,是在我近年来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开设的“史学理论著

〔53〕 彼得·伯克:《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见本读本第304页。

〔54〕 Hayden White,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 note 12, p. 225. 他在入道之初曾极力将自身与相对主义划清界线(如在《历史的重负》一文中),但大概是因为其理论立场的相对主义色彩实在无法消除,后来他就转而划定自己的相对主义在伦理和认知上的边界。

〔55〕 转引自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按,在我看来,此种语境下的“文学文本”中的“文学的(literary)”这一形容词,如同怀特所谓的历史文本之作为“文学文本”一样,还需要从“文字性的”这一层面来理解。

〔56〕 卡洛·金兹堡:《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见本读本第100页。

作选读与研究”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积累完成的。各篇译文,除蒙董立河兄和陈新兄两位同道好友的慷慨允准,采纳了他们现成的两篇译文之外,其余的译文均出自我和几位研究生同学之手。由同学完成的译文,其中一部分经他们反复互校,尔后我校订了所有译文,而我本人的译文也经陈栋和张云波的校改而有所改善,但其中的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每篇译文的作者和观点简介也都出自不同译者之手,定稿时我稍有润饰。书末所附的推荐书目,为求实用,数量不多,但囿于自身眼界,也必有欠缺。种种不如人意之处,还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教。于我而言,在师友之间的刘北成教授和李剑鸣教授,对这一工作勉励有加。岳秀坤和陈甜一如既往的热情相助,让我铭感在心。谨在此向以上师友和同学一并致谢。

彭 刚

2016年2月8日

海登·怀特 著

董立河 译

历史学的重负

《历史学的重负》是海登·怀特1966年应《历史与理论》杂志之约撰写的一篇有关历史学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的文章，其内容来自于他在卫斯理大学的一篇演讲稿。海登·怀特后来将该文拓展为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这便是标志着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元史学》（1973年）。怀特后来还把此文列为论文集《话语的转义》（1978年）的首篇。在另一部论文集《形式的内容》（1987年）中，怀特开始背离前期形式主义的思想路径，追随福柯和巴尔特等人走向了更为极端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但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阐发的尼采式历史观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历史学的重负》可以说是海登·怀特的首要论文，是其主要史学思想的滥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为整个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设定了基调。另外，这篇没有任何注释的论文也是怀特著述中少有的晓畅易懂的文章之一。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领军人物。原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思想史教授，退休后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顾问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1978年）、《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1987年）和《比喻实在论：对模仿效果的研究》（1999年）。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发现,采用一种费边策略来应付知识界相关领域的批评很有效用。这个策略是这样的:当历史学家受到社会科学家的批评,说他的方法软弱、他的组织性隐喻生硬或者他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前提含混的时候,他就回应说,历史学从未获得纯科学的地位,它依赖分析的方法,也同样依赖直觉的方法,因此,历史判断不应该根据那些仅仅适用于数学和实验性学科的批评标准来加以评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历史学是一门艺术。但是,当他受到文学艺术家的指责,说他没有探索到人类意识的更神秘层次,不愿意运用当今的文学再现模式时,历史学家就会退回来,说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准科学,历史数据不可以受艺术的“自由”操纵,而且,他的叙事形式也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历史材料本身的性质所要求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策略成功化解了人们对历史学的批评,并使得历史学家占据了一个处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从认识论上来说是中立的中间立场。因此,历史学家有时认为,只有在历史学中,艺术和科学才得以在和谐的综合中相遇。根据这一观点,历史学家不仅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进行调和,而且还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把通常总是彼此分离的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费边策略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它原先在各种知识学科中为历史学家赢得的那种地位已被置于危险的境地。在当代历史学家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一种日益强烈的怀疑,怀疑这一策略阻碍了人们对20世纪文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之重要进展的认真思考。在非历史学家中,人们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历史学家远非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是艺术与科学之间理想的仲裁者,而是二者无可挽回的敌人。简言之,到处都存在着对历史学家的怨恨或不满,他一方面要求得到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特权,另一方面又拒不服从当前在艺术和科学中通行的批评标准,这使得他声名狼藉。

对于这种不满存在两个普遍的原因。一个与历史专业自身的性质有关。历史学或许是最保守的学科。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大多数历史学家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幼稚。起初,这种幼稚是出于好的目的:它保护历史学家免于接受哲学中好战的唯心主义和科学中同样好战的实证主义这两种一元论解释系

统。但是这种对一元论解释系统的怀疑已成为历史学家中一种有条件的回应,它导致了整个专业上上下下对几乎任何一种批判性自我分析的抵制。此外,由于历史学已变得愈来愈职业化和专业化,普通历史学家一味忙于探寻那些无从捉摸的文献资料,以便在一个狭窄领域里确立权威地位,因此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使自己了解艺术和科学这类更遥远领域的最新发展。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到,自称为艺术和科学之仲裁者的他们所预设的这两门学科之间的根本分离,也许不再合理了。

我们再来看当前对历史学抱有敌意的第二个普遍原因。19世纪许多历史学家自信和自豪地占据的那个位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所谓中立的中间立场如今已经土崩瓦解了,因为人们已经发现,艺术陈述和科学陈述都具有共同的结构主义性质。传统历史学家假定,艺术和科学实质上是理解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当代思想家大都不赞同这一假定。现在看来似乎很明朗的是,19世纪关于艺术和科学迥异的观点源于浪漫主义艺术家对科学的畏惧和实证主义科学家对艺术的无知所共同造成的那种误解。毋庸置疑,无论是浪漫主义艺术家对实证主义科学的畏惧,还是实证主义科学家对浪漫主义艺术的蔑视,在他们所出生的那个知识氛围中都是合理的。但是,现代批评——主要是心理学家在研究人类综合能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的结果——对艺术家表达有关世界的看法以及科学家形成有关世界的假设的运作过程有了更清楚的了解。随着这一成果的含义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就再也没有必要在艺术和科学之间设立一个调解者了;至少,历史学家特别适合于充当中介者的角色这一点已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

因此,这一代历史学家必须准备面对这种可能性,即,他们的职业在19世纪知识分子中所享有的那份声望是可决定的文化力量的结果。他们必须准备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也就是说,如同当前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历史是一种历史偶然,是一种特殊历史境遇的产物,而且,随着产生那种境遇的各种误解的消逝,历史自身可能会失去其作为自治和自证的思想方式的地位。需要这一代历史学家去完成的最困难的任务极有可能在于:揭示历史学科的历史条件性,负责消解历史学在诸学科中的自治权利,帮助把历史学同化到一种更高级的知识探究中去,由于这种探究是以认识到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为基础,因此严格说来,它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

二

20 世纪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产生的争论引起了每一个具有哲学自觉性的实践者的注意,回顾这场争论的主要线索已没有什么必要。这是一场并不新鲜的争执,它可以一直追溯到 19 世纪早期。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去回顾,那就是,那场争论取得了一项在 19 世纪不可能取得的解决方案,而且,根据人们目前的理解,那场争论超越了任何一种纯粹方法讨论的局限。

首先,在 19 世纪,科学尚未在各门学术学科中取得像今天这样的霸权地位。当代的科学哲学家对科学解释的性质更为明确了,科学家自身也已成功地把握了物质世界,而这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还只是他们的梦想。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像已故的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同科学思想相媲美”这样的话,已经被人们当作简单的事实予以接受;这句话不会被当作诸学科争霸的一种夸夸其谈而被驳斥掉,尽管在 19 世纪极有可能会这样。今天,正如卡西尔接下来所说的那样,科学被认为是“我们所有人类活动的顶点和完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章,是人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我们可以针对科学的结果或者它的第一原则进行争论,但是它的一般功能是不容置疑的。正是科学向我们保证了一个共同的世界”。

科学在我们时代所取得的这些非凡胜利不仅激励社会进程的研究者去努力构建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而且也加剧了他们对历史学的敌意。许多社会科学的实践者目前有关历史学的思想有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它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传统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既是有可能致命的文化疾病的一种征候,也是它的一种病因。因此,负责任的社会科学家对历史学的批评具有一种道德之维。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消灭传统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建构真正社会科学的一个必要阶段,而且是他们最终提出的社会疾病疗法的一个实质性内容,他们希望这一疗法能够引领病态社会重返启蒙和进步之路。

在贬低传统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方面,当代社会科学家得到了哲学家目前有关历史研究的性质和历史解释的认识论地位问题的争论的支持。对这场争论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欧陆思想家,但自 1942 年以来,这一争论也在英语世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卡尔·亨普尔于这一年发表了《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

我们不能说参与这场争论的思想家们就历史解释的性质达成了任何的一致意见,但必须承认的是,迄今为止,这场争论所导致的唯一后果是,它在与卡西尔持相同观点的人们中间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和不安。卡西尔承认物理科学在诸学术学科中的霸权地位,但也同时重视历史研究。相当一批哲学家似乎已经断定,历史学要么是科学的第三级形式,它与社会科学相关,如同自然历史曾一度与物理科学相关一样,要么是艺术的第二级形式,其认识论价值是靠不住的,其审美价值也是不确定的。这些哲学家似乎已经认定,如果说存在某种科学等级的话,那么,历史学就处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林耐的生物学之间的某个位置,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引起奇异世界观和低级神话收集者的某些兴趣,但对于建立卡西尔所说的“共同的世界”没有多少贡献,而科学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得到日常经验的证实。

三

20世纪大量文学作品也表现出了一种对历史意识的敌意,这种敌意甚至比我们时代的科学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更为明显。考虑到这一点,以上所说的历史学被从一级科学中排除出去的现象也就不那么令人气馁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它从根本上认为,如果作家要严肃认真地考察现代艺术所特意揭示的那些人类经验层次的话,他就必须剔除历史意识。这种看法极其普遍,如此一来,历史学家要求成为艺术家的主张如果看起来不是非常可笑的话,也显得十分可怜。

现代作家对历史学的敌意最清楚地体现在,他们把历史学家看作是小说和戏剧中感受力被抑制的极端例证的代表。这样的作家包括纪德、易卜生、马尔罗、阿尔道斯·赫胥黎、赫曼·布洛赫、温德海姆·刘易斯、托马斯·曼、让-保罗·萨特、加缪、皮兰德娄、金斯莱·埃米斯、安格斯·威尔逊、伊里亚斯·卡奈蒂和爱德华·阿尔比,这还只是列举了主要的或当前流行的作家。还有一些作家,他们认为所有重要的人类经验都具有本质上的同时代性,从而含蓄地谴责历史意识,如果把这些作家也包括进去,上面的名单还要延长不少。弗吉尼亚·伍尔芙、普鲁斯特、罗伯特·穆西尔、伊塔娄·斯维沃、戈特弗里德·本恩、恩斯特·荣格尔、瓦莱里、叶芝、卡夫卡和D. H. 劳伦斯都反映了乔伊斯笔下的史蒂芬·戴德路斯所表达的一个流行观念,即,历史是一个“梦魇”,如果人性要得

到服务和拯救的话,西方人就必须从这个梦魇中醒来。

的确,在许多现代小说和戏剧中,科学家似乎比历史学家更为经常地被当作艺术家的相反类型。但是,作家通常会对科学家人物流露出一些情感,甚至会自愿给予某种谅解,而历史学家人物却不会这样幸运。科学家在作品中最常见的形象是,他出于对其他事情的积极承诺而背叛了灵魂,比如,浮士德出于控制世界的欲望,或者出于探索纯粹物质过程奥秘的需要,相比之下,历史学家通常被描写成内部的敌人,他摆出一副尊重灵魂的虔诚姿态,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破坏灵魂对创造性个体的要求。简言之,现代作家对历史学家的责难也是一种道德的责难,但科学家只是谴责他在方法或智力上的失败,而艺术家则是指责他在感受力和意志上的缺失。

谴责的具体内容以及实施谴责的策略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尼采设定了其基本样式以来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在《悲剧的诞生》(1872)中,尼采把艺术置于所有形式的抽象才智之上,如同人类的生之于死。他把历史学看作是对人类阿波罗能力的多种败坏形式中的一种,尤其谴责它帮助破坏了个体或团体自我的神话基础。两年后,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1874)中,尼采又强化了艺术想象和历史想象之间相对立的观念。他声称,在“历史的闺房”中“阉人”兴盛的地方,艺术必然灭亡。他说,“不加限制并被推向极端的历史感会根除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剥夺了现存事物赖以生存的唯一氛围。”

尼采痛恨历史甚于憎恨宗教。历史在人们身上助长了一种令人虚弱的窥淫癖,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后来者,世界上所有值得做的事情已被前人做过了,因此,也就没有多少冲动去从事一些英雄壮举,以便赋予这个荒谬的世界一种特别人性的、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意义。历史感是那种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能力亦即记忆的产物,也是人类良心的源泉。尼采得出结论说,基于记忆的虚伪道德在人们身上诱发了一些恶习,如果人类生命不想在对这些恶习的无意义的培育中死去的话,就必须把历史“作为一种昂贵而又多余的理解方面的奢侈品”来加以“切齿地‘痛恨’”。

无论下一代人从尼采那里吸取了其他什么好的或坏的东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一致继承了尼采对19世纪晚期学院派历史学家所实践的那种历史学的深深敌意。但致使历史学在世纪末艺术家中威信扫地的不仅仅是尼采一个人,在诸如乔治·艾略特、易卜生和纪德等气质和目的迥异的作家那里,我们都能发现对历史或多或少明显的谴责。

在与《悲剧的诞生》同年发表的《米德尔马契》中,艾略特通过对多西娅·布鲁克与卡索本先生之间邂逅的描写,从而对古物研究的危险进行了英国式的抨击。布鲁克小姐是维多利亚时期一位收入稳定的处女,很希望在一生中做一件超越自我的事情。她遇到了比自己年长 25 岁的卡索本先生,在后者身上,她看到了“一位活着的波舒哀,他的工作就是将完备的知识和忠实的虔诚调和起来”。尽管他们之间年龄悬殊,布鲁克小姐还是决定嫁给卡索本,倾其一生来帮助完成他所提出的对世界宗教体系的历史研究。但是,在罗马度蜜月期间,她的幻想破灭了。在那里,卡索本显露出了他的无能。他不能对其周围城市古迹中鲜活的过去做出反应,也无力将他当下的智力劳动完成。作者这样描述卡索本:“由于面前点着蜡烛,他忘记了窗户的缺失,因为在手稿中刻薄地评论其他人对太阳诸神的看法,他已经对太阳光无动于衷了。”最后,多西娅放弃了她对学者卡索本的责任,嫁给了年轻的艺术师拉迪斯劳,从而摆脱了历史的噩梦。乔治·艾略特并不关心这件事,但是他思想的要旨是明确的:艺术洞见与历史学识之间是相对立的,它们所分别激起的对生活的反应在性质上是相互排斥的。

在下一个十年中写作的易卜生对于一种重视过去甚于现在的文化的局限性更为关注并且更为清楚。海达·加布勒与多西娅·布鲁克承受着同样的重负:过去的梦魇,历史的放纵——夹杂在或反映在一种对未来的普遍恐惧中。度完蜜月刚一回家,海达和她的丈夫乔治·特斯曼就受到特斯曼姑妈的欢迎,姑妈暗示他们的蜜月旅行一定很愉快。对此,乔治回应说:“唔,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研究之旅。我必须在一大堆旧档案中苦苦搜寻——还要没完没了地读书,姑妈。”

当然,特斯曼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位年轻的卡索本先生,当时正在对中世纪时期布拉班特的国内工业进行权威性研究。这一工作耗费了他那绝非充溢的人类情感。他就这样整天疲于奔命。实际上,可以说,海达的焦躁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他对过去国内工业研究的痴迷,而他本来可以多研究一些国内工业的现状。终于,有一次海达尖叫道:“你尝试一下就行了。早晨,中午,晚上,全都是文明史,其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海达产生复杂的不满情绪,不能在纯粹性欲这样有限的范围内找原因。她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整个压抑网络的牺牲品。特斯曼用过去来逃避当下问题仅仅代表了 this 压抑网络的一个方面。尽管如此,海达对她丈夫与日俱增的蔑视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历史的那份苦行僧式的执着。历史,这个已死的和垂

死的人们的领域,反映和增强了海达对未知未来的恐惧,而她腹内的胎儿就是那个未来的象征。

特斯曼的情敌是艾勒特·罗夫伯格,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但其风格是宏阔的和黑格尔式的。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他的书“似乎用一种粗线条来勾勒文明的进展”,这在海达的心中激起了希望:他的思想或许能够使她从特斯曼破碎的想象所限定的狭小世界中解脱出来。易卜生是想让我们把罗夫伯格看作一个富有才华和潜在创造力的人。他正在创作的那部有关文明的著作将要破坏而不是维持传统道德,它要讲述的是一个更高尚的真理,而不是那种舒适的半真理,虽然后者奠定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以及他早年声望的基础。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海达开始憎恨他。她得到了他的手稿,毁掉了它,从而导致了罗夫伯格的自杀。毁掉手稿,这一方面是海达对罗夫伯格的一种个人报复行为,因为罗夫伯格与海达的情敌埃尔夫斯泰德夫人关系暧昧;但另一方面,它也象征着对那种“文明”的拒斥,特斯曼和罗夫伯格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稀里糊涂地成为了这种文明的献身者。最后,由于受到另一个传统守护者布拉克法官的威逼,海达也自杀了。在最后一场戏中,悲剧的幸存者特斯曼和埃尔夫斯泰德夫人表示将倾其一生致力于罗夫伯格遗稿的编辑工作,从而暗示着他们两个谁都没有从他们双双见证的这场悲剧中吸取任何东西。当特斯曼说“整理别人的文稿就是我的工作”这句话时,就等于说出了他自己的墓志铭。易卜生想让我们把这句话看作是对这个学者的评论,如同布拉克法官就海达的自杀所作的庸俗评论:“人们不做这种事。”

在纪德的《无耻之徒》(1902)中,对历史意识的憎恶甚至更为明显,艺术家对生动现在的反应与历史学家对僵死过去的崇拜之间的对立更为分明。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米歇尔,他所患的疾病集易卜生的《海达·加布勒》中所有人物的病症于一身。米歇尔既是一个庸人,也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但作为哲学家的角色是在他痛苦地扮演了庸人和历史学家的角色之后取得的。这纯粹是一个临时性角色,因为这个角色使他认识到:历史,与文明自身一样,必须被超越,如果我们要服务于生活的需要的话。

米歇尔的肺结核不过是一种对生命普遍恐惧的表现,从心理学上来说,它是对无生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偏执的关注。因此,在身体的疾病开始恢复之后,米歇尔发现自己已经对过去没有任何兴趣了。他说:

当……我想再次开始我的工作并投身于对过去的详细研究中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东西即便没有被破坏,起码也改变了我对它的兴致……这就是我目前的感觉。对我来说,过去的历史是静止的,像彼斯科拉小院里夜晚的阴影那样可怕地固定着——死一般的静止。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乐于享受这种固定,它能使我的心灵精确地工作。在我看来,所有历史事实仿佛是博物馆里的样本,或更像是标本室里的植物,永久地干瘪了,所以很容易忘记它们也曾经葱郁多汁,在阳光下鲜活亮丽……在生命的尽头我逃避废墟……在生命的尽头我鄙视那些我曾引以为豪的学识……若说我是一个专家,我却似乎毫无意义;若说我是一个人,我真的了解自己吗?

因此,当他返回巴黎,就晚期拉丁文化发表演讲的时候,米歇尔就将他的现在意识与那种令人虚弱的过去感对立起来:

在我看来,艺术文化像分泌液一样从整个民族中涌出,起初是充盈的象征,健康充溢的象征,但后来开始僵化,变硬,阻止心灵与自然的完美接触,在生命持续的外表下掩藏着生命的萎缩,变成了一个空壳,扭曲的心灵在其中凋萎,衰竭,终于死去。最后,把我的思想推向逻辑结论:文化是生命的产儿,也是生命的终结者。

然而,即使这种用过去毁灭过去的罗夫伯格式的策略也很快对米歇尔失去了吸引力。于是,他放弃了学术生涯,试图与他心中那些曾被历史遮蔽、被文化削弱过的神秘力量达成神交。该书这样一个有问题的结局意味着,纪德想让我们把米歇尔看作一个因早期痴迷于历史文化研究而导致的永久残废,也是尼采下面这句格言的活证据:历史驱逐本能,把人变成“阴影和抽象物”。

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中,这种对历史意识和历史学家的敌意在西欧各国的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到处弥漫着一种日益强烈的怀疑,即,欧洲在它过去的废墟中狂热地翻来找出,这与其说表达了一种对现在的牢固控制感,还不如说表达了一种对未来的无意识恐惧,未来太可怕了,人们不敢去思考。甚至在19世纪结束之前,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就已经预见到了欧洲文化的死亡并做出了回应:摒弃学院派所实践的那种历史学,坦率地声明历史学有必要转变成艺术,但拒绝公开签名来为他的这种另类学说辩护。叔本华曾

经教导他,不仅传统的历史探究是无聊的,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也是愚蠢的。另一个伟大的叔本华式作家托马斯·曼在其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中,把这种即将到来的堕落感归因于一种先进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超级意识。哈诺·布登勃洛克的审美感受力既是其资产阶级家庭史的精产物,也是它瓦解的征兆。同时,诸如柏格森和克拉格斯这类哲学家认为,历史时间本身这个概念是疾病的根源,因为它将人们束缚在陈旧的制度、观念和价值上。

比较之下,社会科学家对历史学的敌意不那么明显。比如社会学家,他们继续探索某种方法,以便把历史学和科学结合在一些新学科亦即所谓的“精神科学”中,这些精神科学所依照的纲领是由威廉·狄尔泰制定而后由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和法国的埃米尔·涂尔干具体实施的。另一方面,像威廉·文德尔班这样的新康德主义者试图把历史学和科学区分开来,将历史学标明为一种艺术,它即便不能提供社会变化的规律,却也能够对人类经验的总体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洞见。克罗齐进一步认为,历史是一种艺术形式,但同时也是一门主学科,它是一种足以满足当代西方人需要的社会智慧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历史学在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中残存的一点声望,因为战争似乎证实了尼采在两代人之前曾坚持过的那种观点。人们通常假定,历史能够提供某种生活的训练,也是“通过例证进行的哲学教诲”,但令人失望的是,它几乎没怎么让人们为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也没有教导人们在战争期间应该怎么做,而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历史学家似乎也不能够超脱狭隘的党派忠诚,也不能够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理解战争。他们即便没有单纯地重复政府当时有关敌人犯罪意图的口号,也往往会老调重弹,他们会说:没有人真正想要战争;但战争“还是发生了”。

当然,情况可能完全是这样的;但这看起来与其说是一种解释,还不如说是一种认可,认可没有任何的解释是可能的,起码对历史学来说是这样。对于其他学科是否也可以这么说,这并不重要。如果我们也把经典历史学考虑在内的话,那么,战前的历史研究已经成为了当时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历史学成为那些不再相信人类有能力理解其处境的人们的主要攻击对象,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保罗·瓦莱里把这种新的反历史主义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写道:

历史学是从知识的相互作用中发展出来的最危险的产物……历史学试图说明一切事物的合理性。但它恰恰什么也教导不了,因为它包含一切事物,为一切事物提供例证……上一次战争使那种深谋远虑的自负遭受到

了最致命的打击。但这不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缺乏,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战争中更加严重的精神伤害,过去和未来都不能够为当下特别的人类行动提供方向。如同德国诗人戈特弗里德·本诗中所吟:“明智之士不知/何谓变化发展/子孙后代/远在其外。”从这种极其非历史的世界观中,他得出了必然的伦理结论: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积极活跃的人来说,向他的同胞传授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或许更具革命性,也更值得:你就是你,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你的生活。有钱的人,长命百岁;有权的人,永远正确;有势的人,确立正义。这就是历史!**这个历史!** 面前就是现在;攫取它,吃掉它,然后死去。

在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直接提出了新与旧的关系问题,M. O. 格申森在写给历史学家 V. I. 伊万诺夫的信中表达了一个愿望,他希望时代的暴力会在“赤裸裸的人类和赤裸裸的大地”之间带来一种崭新的和更富创造力的相互关系。他写道:“对我来说,沐浴在遗忘河里,忘记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将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简言之,他希望摆脱历史的重负。

这种反历史主义态度构成了纳粹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基础,而存在主义则是30年代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笔遗产。斯宾格勒从很多方面说都是纳粹主义的先驱,而马尔罗则是法国存在主义公认的创始人。他们两个都教导说,历史只有在它破坏而不是建立对过去的责任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甚至那位坦诚的人道主义者奥尔特加·加西特,也在1923年撰文表达了与他们两个人同样的信念,即,过去只不过是一种重负。在《现代主题》(1923)中,奥尔加特写道:“我们的制度,像我们的剧院一样,是时代错误。我们既没有勇气毅然决然地终止那些伤害生命力的过去知识的扩张,也没有任何办法适应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题献给受纳粹压迫的受害者的一部作品中,他坦言,历史给予他的唯一教训是,“人类是一种具有无限可塑性的实体,可以将它随心所欲地造成任何形状,正因为它什么也不是,除了仅仅是你‘随便’利用的纯粹潜力”。希特勒的“虚无主义革命”的基础正是这种已知的过去和经历的现在之间毫不相关的感觉。希特勒曾在一个场合对劳施宁说:“在19世纪是真实的东西,在20世纪就不再是真实的了。”无论纳粹知识分子(比如海德格尔和荣格尔)还是作为纳粹敌人的法国存在主义者(比如加缪和萨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与希特勒的看法一致。对于这两派的人来说,问题不是如何去研究过去,而是

应不应该研究过去。

莫索尔是加缪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1942)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无辜的”杀人犯。他杀害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这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举动,与他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其他无谓的行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正是“在历史方面”博学的公诉人向陪审团表明,如何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构成莫索尔生存的原子事件连接在一起,从而使他成为一种“罪行”“负责”,并说明他何以被定为杀人犯。莫索尔的生活被作者再现为一系列完全随意的事件,但它却被一些人编入一个自觉意图的模式中,这些人“了解”私人感受和公共姿态所应当具有的“意义”。正是这种将一种似是而非的“意义”之网罩在过去上面的能力,根据加缪的说法,使得社会在莫索尔的“罪行”与对他作为杀人犯的“判决”之间做出了区分。加缪否认在各种不同的杀人行为之间存在真正的区别。只是那种由社会意识所维持的虚伪才使得社会把莫索尔的行为称为“谋杀”,而将自己对莫索尔的判决称为“正义”。

在《叛逆者》(1951)中,加缪又返回这个主题,认为当今时代的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源自一种虚无主义态度,而这种虚无主义态度又可以在西方人偏执狂般地理解历史的欲望中找到其根源。他写道:“纯粹的历史思想是虚无主义的,它全身心地接受历史的罪恶”,并把世界交付给赤裸裸的武力。接下来,他又呼应被他刚刚谴责过的尼采的观点,将艺术置于历史学之上,认为只有艺术才能够把人类与已经被人类完全疏远了的自然重新结合在一起。因为加缪在历史问题上的这一根本态度,诗人勒内·夏尔为他撰写了这样一句墓志铭:“执着于收获,漠然于历史,乃吾弓之两端。”

法国存在主义的两位领军人物加缪和萨特,无论他们在其他问题上存在什么分歧,都对历史意识持一种鄙视的态度。萨特的第一部小说《恶心》(1938)中的主人公罗昆丁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如他自己所说,他“写了许多文章”,但都不需要什么“天分”。罗昆丁试图写一部书,描写一位被称作罗勒本侯爵的18世纪的外交官。但是他被文献淹没了;文献真是“太多”了。此外,这些文献也缺乏完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这倒不是说这些文献彼此矛盾,罗昆丁只是说“它们似乎不是有关同一些人的”。然而,罗昆丁在其日记中写道:“其他历史学家都是根据这些同样的信息资源工作的。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答案当然在于,罗昆丁本人内心具有一种完全“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欠缺感。罗昆丁将自己的身体视为“没有人性的自然”,把自己的精神生活看作一种幻觉:“在你活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发生。场景变换,人来人往,仅此而已。没

有什么开头。一天,又一天,一种冗长单调的叠加,没有节奏,也没有道理。”罗昆丁缺乏任何的中心意识,以便在此基础上去整理过去或者现在的世界。“我不具备生存的权利”,罗昆丁写道,“我偶然来到世上,像一块石头、一棵植物、一个细菌一样地生存着。我生命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去寻求那无足轻重的快乐。有时,它会发出模糊的信号,但其他时候,我听到的只是无害的嗡嗡声”。他的朋友,那位自修者,在罗昆丁面前树立起一个美国乐观主义者的形象,他简单地相信学识能够带来救助。他还像一个守旧的人道主义者那样相信,“生活具有某种意义,如果我们选择赋予它这种意义的话”。然而,罗昆丁之所以患病,恰恰就是因为他无法相信这类愚蠢的口号。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是无缘无故地诞生,在虚弱状态下苟延残喘,最后意外地死去”。萨特只需再加上戈特弗里德·本所说的“这个历史!”这句话,就会更明确地传达出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1943)中的那种反历史主义思想倾向,这部哲学著作的创作是与小说《恶心》的写作同时进行的。如果评论家们牢记这两部著作,他们本可以对萨特的《词语》(1964)作出更好的批评。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会因萨特含混不清的“忏悔”而懊恼了。他们也就懂得了萨特的这一信念,即,唯一重要的历史是个人记住的东西,而个人只会记住那些他愿意记住的东西。萨特反对那种有关无意识的精神分析学说,坚持认为过去就是我们决定从中记住的东西;除了我们对它的有意记忆,过去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存在形式。我们选择未来,也以同样的方式选择过去。因此,像我们多种多样的各自的过去一样,历史的过去往最好处说是一种神话,它说明我们对某种特殊将来所下的赌注是正当的,往最坏处说是一种谎言,回过头来把我们通过选择而已经事实上成为的东西合理化。

我可以继续列举现代作品中反对历史的这类例子。但是,如果我到现在还没有表明我的观点,那么,我或许根本就无法成功地表明了。我的观点是:现代艺术家没有充分思考过去人们常说的历史想象。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历史想象”这个词不仅包含术语上的矛盾,而且为当前人们现实地解决最紧迫的精神问题造成了障碍。许多现代艺术家对待历史的态度非常类似于 N. O. 布朗的态度,布朗把历史视为一种“固恋”,“它使精神病患者疏远现在,并将他限定在对未来之过去的无意识追寻中”。对他们来说,正如对布朗来说,历史不仅是过去以过时的制度、观念和价值的形式强加给现在的一种沉重负担,而且也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赋予这些过时的形式以华而不实的权威。简言之,对于艺术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历史学家似乎是一种疾病的携带者,这种

疾病既是 19 世纪文明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它的一种报应。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现代虚构作品试图将西方人从历史意识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原因。它告诉我们,只有把人类智力从历史感中解放出来,人们才能够创造性地面对现在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重视艺术观点、不视其为纯粹游戏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显然是意味深长的:他必须扪心自问,如何能加入这场解放运动,他的加入是否会导致历史自身的毁灭。

历史学家不能忽视来自整个知识群体的批评,也不能因为得到文化外行人的青睐就心安理得了。如果一门学术性学科仅仅诉诸于普通人的尊重,那么,任何一种活动都有存在的理由,无论这种活动对文明是有益还是有害。那样的话,即使最陈腐的新闻学也有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再进一步举新闻学为例子,新闻学越是陈腐,它就越有机会得到普通人的青睐。任何一门学术性学科,当它失去了神秘性而开始探讨那些仅仅让普通大众兴奋的东西时,这不仅远不能让人舒服,而且或许还真有理由让人担忧了。历史学家自称属于知识分子群体,而不与一般文化大众为伍。仅此而言,历史学家对前者的义务超过了对后者的义务。因此,如果艺术家和科学家——根据他们作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能力而不是作为内战图书俱乐部成员的能力——发现历史学家所探讨的那些事实价值不高而且还可能是有害的,那么,历史学家就该问问自己,这类指责是否具有某种现实的根据。

历史学家也不能争辩说,艺术家和科学家关于应该如何研究过去的观点与自己无关。毕竟,历史学家已经习惯认为,历史研究既不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论,也不需要一种特别的智力资质。对于大部分历史研究工作而言,所谓历史学家的“培训”也就是包括学习几种语言,熟悉档案馆工作,完成一些固定的练习以便熟悉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和刊物。至于其他必要条件,顶多还包括有关人类事务的一般经验,一些边缘领域的阅历,自律能力和健康的体魄,仅此而已。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掌握这些要求。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只有专业历史学家才有资格去说明人们可能就历史记录所提出的问题呢?又怎么能说只有他们才能够确定对所提问题是否给出了充分的回答呢?对于整个知识群体来说,以下这一点已不再是什么自明的真理了:对过去的无利害研究——如常言所说的“为其自身”的研究——或者能使我们的人性高贵,或者能照亮我们的人性。事实上,艺术界和科学界似乎已经达成了与此正好相反的共识。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学家的重任就是在某个基础之上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尊严,使之与整个知识群体的目标和目的相一致,也就是说,改造历史

研究,使历史学家积极加入到把现在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运动中去。

五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历史学家必须承认当前对历史的反叛具有合理性。当代西方人有很好的理由说自己被一些独特的问题所困扰,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在提供给他们历史记录对于寻求这些问题的适当解决几乎无济于事。对于任何一个敏感地认识到我们的现在根本不同于全部过去情形的人来说,对过去的“为其自身目的”的研究看起来只能是一种无谓的蓄意阻挠,即有意阻止人们去接近全然陌生和神秘的当下世界。在这个我们每天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人,要么看起来是一个崇古主义者,从当下的问题遁入纯粹的个人过去,要么看起来是一个文化上的嗜尸成癖者,在已死的和垂死的事物身上发现一种在活着的事物身上永远也无法发现的价值。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去研究的价值,不是为过去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提供观察现在的视角,以便帮助解决我们自己时代所特有的问题。

既然历史学家声称没有自己特有的认识方式,那么,这就意味着当代历史学家愿意同**现代科学**和**现代艺术**为理解意识和社会进程而提出的分析和再现技巧达成妥协。简言之,历史学家只有根据**自己时代的艺术和科学**的要求而就其所选择的研究材料提出问题并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他才能在当前的文化对话中获得发言权。历史学家常常向往19世纪早期,将其视为历史学的经典时代,这不仅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历史学表现为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而且还因为在历史、艺术、科学和哲学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工作关系和互动关系。浪漫主义艺术家进入历史去寻找写作主题,他们借助“历史意识”去说明自己有理由追求文化的再生,有理由使过去成为同时代人的活的现在。某些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生物学——利用了一些此前只有历史学才普遍使用的思想和观念。历史的范畴在后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在后来的左派和右派的黑格尔主义哲学中成为组织性范畴。在一个反思了那个时代所有思想和表达领域中的成就的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感的极端重要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学家作为那个时代艺术和科学之间调和者的作用也似乎是很明显的。

然而,更准确地说,19世纪早期是艺术、科学、哲学和历史携手共同理解法国大革命经验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成就不在于那种“历史感”,而在于所有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自发地跨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并自觉地运用启发性隐喻去组织现实,无论他们来自哪一个特殊学科或持什么样的世界观。米什莱和托克维尔这样的知识分子被标示为历史学家,所根据的仅仅是他们的题材而非方法。仅就其方法而言,他们同样可以很容易地被标示为科学家、艺术家或哲学家。类似的标示方式也适用于兰克和尼布尔这样的“历史学家”,司汤达和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黑格尔和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以及海涅和拉马丁这样的“诗人”。

但在19世纪的某个时期,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不是因为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再对历史问题感兴趣了,而是因为,在艺术、科学和哲学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上,很多历史学家仍然固守着19世纪早期的某些看法。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家的确继续把他们的著作视为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但他们是视之为浪漫主义艺术和实证主义科学的结合。总而言之,到19世纪中叶,历史学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已经陷入了有关艺术和科学性质的观念窠臼中。但是,为了理解历史进程本身所提供的那个变化着的内部和外部的感知世界,艺术家和科学家已经开始逐渐抛弃这些观念窠臼了。与19世纪早期的艺术家不同,现代艺术家不屑与现代历史学家为伍,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无道理地将历史学家看作是一种老式艺术观念的守护者。

事实上,许多当代历史学家在谈到历史的“艺术”的时候,进入他们脑海中的似乎是这样一种艺术观念,即,仅仅把19世纪的小说看作一种艺术范式。当他们说自己是艺术家的时候,他们的意思似乎是,他们是司各特或萨克雷那样的艺术家。他们当然不打算把自己混同于行动派画家、动力雕塑家、存在主义小说家、意象派诗人或新派电影摄影师。虽然他们的墙上和书柜里经常展示着一些现代非客观艺术家的作品,但是他们似乎一如既往地认为,艺术的主要(即便不是唯一)目的就是讲故事。因此,比如,H.斯图尔特·休斯最近在论历史学与科学和艺术之间关系的一部著作中就认为:“历史学家最精湛的技术手法在于把社会和心理分析的新方法与他们传统的讲故事功能结合在一起。”艺术家的目的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加以实现,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讲故事仅仅是他们今天所拥有的众多可能性再现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越来越不重要的一种,法国的新小说就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

类似的批评也可以用来针对那些自诩为科学家的历史学家。当历史学家

说自己是科学家的时候,他们似乎借用的是这样一种科学观念,它完全适合于赫伯特·斯宾塞生活和工作过的那个世界,而与爱因斯坦以来发展了的自然科学和韦伯以来演进了的社会科学没有多少关系。此外,当休斯谈到“社会和心理分析的新方法”时,他似乎指的是那些由韦伯和弗洛伊德提供的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家看来,这些方法至多是他们学科的原始根基而非成熟果实。

总之,当历史学家声称历史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时,他们大体的意思是,它是19世纪晚期的社会科学和19世纪中期的艺术的结合体。也就是说,他们似乎追求的仅仅是一种古旧的分析和表达方式的综合。如果是这样的话,艺术家和科学家就有理由批评历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研究过去,而是因为他们用低劣的科学和低劣的艺术研究过去。

这些有关科学和艺术的古旧观念的“低劣”首先表现在那些过时的、用于描述其特点的客观性观念上。许多历史学家继续把他们的“事实”看作是“给定的”,并且,与大部分科学家不同,他们拒绝承认这一点,即,这些事实与其说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由研究者根据其眼前的现象所提的那些问题构建出来的。正是这种客观性观念限制了历史学家,使得他们不加批判地运用编年史的叙事框架。当历史学家试图以其所谓的“艺术的”方式把他们有关“事实”的“发现”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都一律避开了那些由乔伊斯、叶芝和易卜生贡献给现代文化的文学再现手法。20世纪一直没有人(除了小说家和诗人自己)在历史编纂方面进行超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重大尝试,尽管现时代的历史学家标榜自己具有“艺术才能”。历史学家似乎相信,历史叙述之唯一可能的形式是到19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英国小说中所采用的那种形式。其结果是,历史编纂“艺术”自身逐渐过时。

尽管布克哈特持一种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态度(或者也许就是因为这种悲观主义),但他却乐于尝试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艺术手法。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可以看作是在印象派历史编纂方面的一次演练,他以其自身的方式从根本上背离了19世纪传统的历史编纂,如同印象派画家或诗人波德莱尔对他们各自传统的背离。初学历史的人——还有相当一些专业人士——都觉得布克哈特不好理解,因为他打破了这样一个教条,即,历史叙述必须是“讲故事”,起码按照通常的编年史顺序。为了说明布克哈特著作的这种奇异性,从事历史写作的现代历史学家将他归入那种探讨理想类型的初期社会科学家,并因此预示了韦伯的工作。这一概括是正确的,但这仅限于布克哈特和韦伯两个人

或多或少地对科学持一种特别的审美观念这一点上。与艺术领域的同时代人一样,布克哈特从不同的点切入历史记录,并指出观察历史的不同视角,对历史记录进行删除、省略或扭曲,全依其艺术目的的要求而定。他的意图并不是描述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全部真实情况,而是有关它的一种真实情况,正如塞尚不想描绘一处风景的全部真实情况一样。他已放弃了通过讲述故事来描述过去真实情况的梦想,因为他早已不再相信历史具有内在的意义或价值。布克哈特所认可的唯一“真理”是他从叔本华那里学来的那种思想,即,每一种赋予世界以形式的努力,每一种人类的断言,都注定要以悲剧而告终,而就个别断言成功地在世界混沌之上强加了某个短暂的形式而言,它获得了自己的价值。

因此,在布克哈特的著作中,“个人主义”这个概念主要是被用作一个聚焦性隐喻,正因为它过滤掉了某些信息而提高了对其他信息的认识,布克哈特才得以特别清晰地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考虑到通常的编年史框架可能会阻碍他对其问题采取一种特殊的视角,布克哈特便抛弃了它。一旦从“讲故事”技巧的局限中摆脱出来,他就不必再像传统历史学家那样被迫去构建某种由主人公、反面角色和合唱队组成的“情节”。由于他有勇气去运用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建构出来的隐喻,布克哈特才能够在15世纪的生活中看到前人从未那么清晰地看到的东西。即使那些发现他的事实有误的传统历史学家也将他的著作奉为经典。然而,大部分人无法看到的一点是,在称赞布克哈特的时候,这些传统历史学家经常谴责自己对科学和艺术观念的苛刻承诺,而布克哈特本人则早已超越了这些观念。

当今许多历史学家都对社会科学在技术和方法上的最新进展显示出了兴趣。一些人正试图利用经济计量学、博弈论、冲突解决理论、角色分析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理论,因为他们感到这些理论可以用来实现其传统的历史编纂目的。但是,试图以某种重要方式利用现代艺术技巧的历史学家却没有几个。诺曼·O. 布朗便是这极少数历史学家中的一个。

在《生死对立》中,布朗提供了一种历史编纂的反小说,即反历史。那些不畏烦难注意到这部书的历史学家通常把他当作一个弗洛伊德的信徒而不予理会。但是布朗的真正意义在于,他自愿贯彻一条由尼采提出而后被克拉格斯、海德格尔以及当代以存在主义为导向的现象学派发扬的研究路线。对于历史(无论是作为存在方式,还是作为认识方式)的合法性,布朗一开始并没有作任何的假定。他运用历史材料,但他运用这些材料的方式恰恰与人们运用当代经

验的方式相同。他把所有现在和过去的意识数据都还原到同一个本体层面上,然后,通过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并置、纠缠、还原和扭曲,迫使读者重新清楚地看到那些经过持久的联想他已经浑然不知的材料,或者那些他为了顺应社会规则而压抑了的材料。简言之,布朗在他的历史作品中取得了“流行”艺术家所追求的那种效果,或者约翰·凯奇在他的一个“即兴”作品中所达到的那种效果。

我们研究过去的方法中有什么本质的东西使得我们把布朗看作一个不值得考虑的严肃历史学家吗?当然,如果我们固守着历史学家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的神话的话,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在布朗的著作中,我们不得不首先面对的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为其作品所选择的风格问题,接下来才是他的历史是否构成了对过去的“充分”描述的问题。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标准,一方面据此来判断“记叙”在什么时候算是充分地表达了“事实”,另一方面据此来判定历史学家所选择的“风格”是否适合于“记叙”。但是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标准呢?那些相信历史是一种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体的历史学家还应该进一步关注以上等式的“内部”问题,也就是说,在历史学家借以工作的文学遗产所提供的众多艺术风格中何以选择一种风格的问题。因为把**艺术家和讲故事者**当作同义词来使用已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如果我们要质疑历史学家使用19世纪社会科学观念的权利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准备质疑他使用19世纪艺术观的权利。

六

人们感觉到,历史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的观念不过进一步暗示了历史学家对科学和艺术的老式看法。近30年以来,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陈述和艺术陈述之间的相似性,科学哲学家和美学家从没放弃过努力。诸如卡尔·波普尔对科学解释的逻辑的探究以及概率论对有关科学规律性质的思考的影响,削弱了那种关于科学命题绝对性的幼稚的实证主义观点。实证主义者原先对科学陈述和形而上学陈述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当代英美哲学家对这种划分进行了调整,从而摘除了实证主义者加在形而上学陈述之上的“无意义”的污名。在如此产生的“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的背景下,人们对于艺术陈述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此也更有可能会解决在历史解释中科学成分和艺术成分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老问题。

现在似乎可以说,我们不需要把一种解释单方面地归于原原本本的真实(literally truthful)的范畴或者完全虚构的范畴,但可以仅仅根据那些支配其表达顺序的隐喻的丰富性来对这种解释加以判断。这样看来,历史记叙的支配性隐喻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启发性规则,它自觉地从证据中消除某些数据。因此,根据这种观念从事工作的历史学家,如同现代艺术家和科学家,试图从某个视角来看待世界,这个视角并不妄称穷尽了对整个现象界中所有数据的描述或分析,而仅仅宣称自己不过是用以揭示该领域中某些方面的许多方式中的一种。就像贡布里希在其《艺术与错觉》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期望康斯坦布尔和塞尚在某处特定风景中寻找同一样东西,而且,当我们面对他们各自对某处风景的视角性再现时,我们也不希望逼迫自己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也不想确定哪一种再现方式“更正确”。这种态度并没有导致相对主义,而不过是使人们认识到:被艺术家选择来再现内部或外部经验的那种风格,它一方面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标准,用以判断某个特定的再现何时具有内在的一贯性,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转换系统,使得观察者把影像与在特殊的客观化层面上再现出来的物体联系起来。因此,风格起到一种贡布里希所说的“符号系统”的作用,成为一种临时的协议或礼节。当我们观看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或者,就此而言,一位科学家的作品——时,我们并不追问在同一个普遍的现象界中他是否看到了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而是要追问他是否在其对该现象的再现中引入了任何一种在能够理解所使用的符号系统的人看来是虚假的信息。

如果以上这种再现观念所倡导的方法和风格上的大同主义被应用到历史写作上,那么,历史学家就被迫不再像一个著名历史学家几年前所说的那样,试图“以正确的态度,从真实的视角”去描写“生活的某个特殊部分”,而且不得不承认,对所研究的客体没有什么唯一正确的观点,而是有许多正确的观点,每一种都要求有自己的再现风格。我们将因此而严肃地对待一些思想家所提供的创造性曲解,这些思想家看待过去的态度与我们一样严肃认真,只是他们的情感和智力取向与我们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该再幼稚地期待有关过去某个特定时期或复杂事件的陈述“符合”某些先在的“原始事实”。我们应该认识到,构成事实本身的东西,就是历史学家已经试图像艺术家那样,通过选择他借以组织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隐喻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仅仅要求历史学家巧妙地运用他的支配性隐喻:他既不要使它们负载过多的数据,也要力争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们;他要尊重他所决定的话语方式中隐含的逻辑;当他的隐喻开始表明自身不能够容纳某些数据时,他应该抛弃这个隐喻,去寻求另外

一个更丰富、更具包容性的隐喻——如同科学家抛弃一个已经变得毫无用处的假设一样。

这样一种历史探究和再现的观念将使得在历史学中运用当代科学和艺术的洞见成为可能,而且还不会导致极端的相对主义,也不会导致历史学被同化为宣传或者致命的一元论,迄今为止,这种一元论一直都是由于人们将历史学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努力而导致的结果。它将允许诸如精神分析学、控制论和博弈论等理论的介入,而历史学家也不必一定要把从这些理论中借用的隐喻看作是所分析的数据中固有的,但是,当他根据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全面客观性的要求进行工作的时候,他则不得不这样做。而且,它将允许历史学家考虑使用印象主义的、表现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甚或行动主义的再现模式,以便把那些他虽揭示出来但常常不将其当作证据来加以认真思考的数据的意义戏剧化。假如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家积极主动地参与我们时代的一般知识和艺术生活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在此用这种胆怯的和矛盾的方式去为历史学的价值作辩护了。历史学在方法上的不确定性为创造性地评论过去和现在提供了机会,这是其他学科望尘莫及的。假如历史学家抓住了这次机会,他们或许可以及时地说服其他知识和表达领域的同行们,让他们相信尼采的以下主张是虚假的,即历史“是一种昂贵而又多余的理解方面的奢侈品”。

但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仅仅是为了开发人类游戏的能力或者精神在形象中嬉戏的能力吗?对于一个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人来说,还有更低劣的活动,但是仅仅要求我们锻炼形象创造能力并不必然导致如下结论,即我们应该在历史过去的平台上锻炼这些能力。在这里,我们应该记住从叔本华到萨特的那一脉思想观点,在他们看来,历史记录永远不会成为重要的审美经验或者科学经验的演练场。这一思想传统认为,文献记录最初会鼓励推测性想象的发挥,因为它是不完整的,但后来又会阻碍这种想象力的发挥,因为它要求历史学家仅限于思考它所提供的那几个事实。因此,对于叔本华和萨特来说,艺术家还算听话,他们真的没有理睬历史记录,仅仅局限于思考那个在日常经验中向他呈现的现象界。这样,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就是值得的,即我们为什么应该研究过去?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过去能起到什么作用?换一种说法:在现在性的条件下,一切事物都是现成的,因而我们可以直接审视它们,既然如此,我们研究事物为什么还要根据过去性的角度而不是根据现在性的角度呢?

在我看来,对这一问题最具启发性的回答是由活跃在历史学的黄金时代(亦即1800—1850年的那一时期)的那些思想家们提供的。这一时期的思想家

们认识到,与那个时代的艺术和科学不同,历史的作用就是向人类自身的意识提供一种特别的时间维度。在这一时期之前和之后,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们往往把人类现象还原为被具体化了的自然或精神过程(比如,在唯心主义、自然主义、生机论等等理论中)的表现形式,而1800—1850年间历史思想的最优秀代表们都把历史想象看作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最初是来自于人类要将混沌的现象界包裹在稳定的形象中的冲动,亦即一种审美冲动,但后来由于悲剧性地重新肯定了变化和过程的基本事实,这种能力又摈弃了自身,从而为赞美人类为其自身命运负责的行为提供了根据。

实在论历史主义的倡导者们——比如,黑格尔、巴尔扎克和托克维尔,他们分别是哲学、小说和历史编纂学的代表——都一致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与其说是让人们记起对过去的义务,还不如说是强加给他们一种意识,即考虑如何运用过去来实现一种伦理上负责任的、从现在向未来的转变。这三个人都认为,历史能够教育人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当下世界曾经作为一种未知的和令人恐惧的未来存在于前人的心灵中,但是,由于特殊的人类决定,这种未来已经被转化成了当下,亦即那个历史学家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熟悉的世界。在他们三个人的眼中,历史具有一种人类个体愿望之荒谬性的悲剧感,同时也具有一种这类愿望的必然感,如果要把人类的残余物从对时间运动的潜在地具有破坏性的意识中拯救出来的话。因此,对这三个人来说,历史与其说是一种目的本身,还不如说是一种为了更完整的理解和为了接受个人塑造未来共同人性的责任而做的准备。比如,黑格尔写道,在历史反思中,绝对精神“被吞没在其自身自我意识的黑夜中;然而,它那消失了的的存在却保存于其中;这个被取代了的的存在——即先前的状态,从知识的子宫中获得了新生——是存在的一个新阶段,一个新世界,是绝对精神的新体现或者新模式”。巴尔扎克把自己的《人间喜剧》说成是一部“人类精神史”,使得小说在司各特所成就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因为他的“体系”将整体的各个零碎部分连缀在一起,组成了一部“完整的历史,其中的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而这每一篇小说都堪称某个时期的一幅图画”,因而从整体上促成了对现时代独特性的更具现实性的意识。最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试图“弄清楚[现在的社会制度]与前此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哪些异同之处;然后确定那场剧变之后人们获得了什么”。他接下来指出:“当我发现我们先辈身上的任何一种美德——健康的独立精神,高尚的雄心壮志,对自己的信任,对事业的忠诚——都曾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而现如今却几乎丧失殆尽的时候,我也听任它自生自灭。同样,当我发现一种恶行的踪迹在

破坏了旧秩序之后仍然影响着国民时,我就予以强调;因为只有根据恶行先前造成的邪恶,我们才能判断它们仍有可能造成的伤害。”简言之,在这三个人看来,历史学家的重任就是一种使人们摆脱历史重负的道德责任。他们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并非在于规定一种时时处处都有效的特殊伦理制度,而在于激发人们认识到,他们当下的状况从来都部分地是特定人群选择的结果,因而可以在同一程度上被进一步的人类行为所改变。历史因此会让人们去感受每一个既得现时中的**动态**因素,教导人们去领悟变化的必然性,从而无怨无悔地帮助现在释放到过去。只有历史学家在其亲身体验的现在中看不到这些动态的因素,并开始把所有重大的变化都归于一个神话的过去——从而暗中为**现状**辩护的时候,尼采这样的批评家才有理由谴责他们是当下琐事(无论是什么样的琐事)的奴仆。

当今历史学家有机会利用生机勃勃的科学和同样生机勃勃的艺术所提供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现在的科学和艺术都已超越了过去那些有关世界的僵化观念,这些观念曾要求对一个假定为静止的实在进行一丝不苟的模仿。这两门学科都已经揭示出它们用以理解动态世界的那些隐喻建构在本质上的**暂时性**。他们因此而暗地里肯定了加缪所得出的结论:“原来的问题在于,弄明白生活是否必须具有有一种生存的意义。相反,现在的问题显然在于,如果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它反而更值得去度过。”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略加修改:如果生活的意义不止一种而是多种的话,它反而更值得去度过。

自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历史愈益成为那些“明智”之士的避难所,他们特别擅长于在复杂之中寻求简单、在陌生之中寻找熟悉。这在此前的时代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当前这一代人需要点什么的话,这便是要积极勇敢地面对当代生活中那些动态的和分裂的力量。历史学家在现在的世界和前此的世界之间构建一种徒有其表的连续性是无济于事的。相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能够使我们了解非连续性的历史学;因为非连续性、断裂和混沌乃是我们的宿命。如果,如尼采所说,“我们拥抱艺术是为了不致死于真实”,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说,我们拥抱真理是为了逃避一个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我們欲望的创造物。历史可以提供一种基础,我们可以在此之上去寻求加缪为我们这个时代迷茫的人性所要求的那种“不可能的透明”。只有一种质朴的历史意识才能真正回应这个分秒更新的世界的挑战,因为只有历史才能在所是与应是之间达成和解,并取得一种真正人性化的效果。但是,历史只有对自己从中产生并不断返回的那个更一般的思想和行为世界保持敏感,它才能有助于

经验的人性化。只要它拒绝利用现代艺术和现代科学所提供的视角,历史就仍然是盲目的——依然是一个“暗淡的记忆阴影与当下生命和自由进行徒劳斗争”的世界上的公民。

【本文原载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5, no. 2, 1966; 后收入其文集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海登·怀特 著

彭 刚 译

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

海登·怀特最重要的著作是《元史学：19世纪的历史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此文视作该书中基本论点的更为凝练而清晰的表述。“文学作品”(literary artifact)也可以理解为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字制品”。怀特开宗明义地所要表达的中心论点就是：历史文本就是“言辞的虚构(verbal fictions)，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并且其形式与其在文学中的对应物比之在科学中的对应物，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其要义在于，历史文本中固然有来自史料的、被“发现”的成分，然而，人们在史料基础上的选择、建构、情节编排、想象、赋予意义等“发明”的成分，却也是历史文本中不可或缺的。就此而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并无根本分别。

一个学术领域对自身进行清点的方法之一,就是考察其历史。然而,要获得对于一门学科的客观的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倘若历史学家本人置身其中,他很可能就会是它的一个或另一个派别的信徒,从而发生偏见;而倘若他没有置身其中,就又不大可能具有必需的专业知识,来在这一领域发展中区分要紧的和无关紧要的事件。有人会认为,这些困难不会在历史领域本身当中出现,然而,它们确实出现了,并且不止是出于前面所提到的原因。为着撰写任何一门特定的学科或者甚至是一门科学的历史,人们必须做好准备,提出关于它的问题,那是在它的实践中不见得一定会提出来的那种问题。人们一定要走到支撑着某一类特定研究的预设的后面或底下,提出在其实实践中可以规避的问题,好来断定为什么人们构想了这类研究,用来解决那些它试图解决的问题。这正是元史学孜孜以求的东西。它给自身提出了如同这样的问题:某种特定的历史意识的结构是什么?与可以用来阐明历史学家通常所处理的那些材料的其他各种解释相比较,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处于何种地位?历史表现有哪些可能的形式,它们的根基又是什么?历史表述对于一般而言的实在和具体而论的人文学科的确实可靠的知识做出了贡献,它具有什么样的权威性?

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当中,致力于界定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的哲学家们,以及关切于评估他们的学科在描画过去和判定那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联的历史学家们,颇为干练地处理了许多这样的问题。然而,有一个问题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都没有郑重看待,而文学理论家们只是一带而过了的。这一问题涉及历史叙事的地位——纯粹将其视作一个言辞制品,旨在成其为过去已久的结构和过程的一种模式,并且因而就不受实验的或者观察的掌控。这不是说,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没有能够注意到历史表现的那种本质上是暂时的和偶然的性质,以及它们在新的证据或者对于问题的更加成熟的概念化的烛照之下,要接受无穷无尽的修正。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他持之以恒地提醒他的读者们,他对于在总是残缺不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的事件、人物和行迹的描述纯然是暂时性的。这也不是说,文学理论家们从来没有研究过历史叙事的结构。但是,总体而言,人们不大情愿将历史叙事视作它们最彰明较著地就是的那种东西:言辞的虚构(verbal fictions),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并且其形式与其在文学中的对应物比之在科学中的对应物,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很显然,此种对于神话(mythic)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混合,会冒犯某些历史学家,惹恼某些文学理论家,他们对文学的看法预先设定了历史与虚构或者事实

与奇思异想之间的极端对立。就像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所评论的,“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乃是神话的反面,而要告诉历史学家,给他的著作赋予了形态的乃是神话,这在他听来几近侮辱”。然而,弗莱本人也认为:“当一个历史学家的图式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融通一贯,它在形态上就成其为神话的,并且因而在其结构上也接近了诗性。”他甚至谈到了不同种类的历史神话:浪漫的神话“基于对于上帝之城或者无阶级社会的寻求或朝圣”;喜剧性的“神话通过进化或革命而达致进步”;悲剧性的神话事关“衰落和覆亡,就像吉本和斯宾格勒的著作”;而反讽的“神话则有关重复再现或者事出有因的灾难”。然而,弗莱似乎相信,这些神话只在诸如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斯宾格勒、汤因比和萨特这些可以称之为“诗性谬误”(poetic fallacy)的牺牲品身上才发生作用——这些历史学家对于人类思想“建构性”功能的痴迷,败坏了他们去“发现”材料的责任心。他说:“以归纳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收集事实,并且力图避免任何予人启迪的模式,除了那些他看到的或者诚心诚意地认定他在事实本身当中看到的模式之外。”他不像诗人那样“从”一个“统一的形式”开始工作,而是“走向”它;并且由此,历史学家就像任何话语文字的作者一样,要从“他所说东西的真实性,或者他对于他的外模式的言辞再造的恰当性”出发来做出评判,而无论那一外在模式是过去人们的行动,还是历史学家自身对于这些行动的思想。

作为对于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就激励着历史写作的理想的陈述,弗莱说得很对,然而,那种理想预设了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对立,而那种对立很成问题,经不起推敲。它对于弗莱来说很合用,因为这使得他能够将此种特定的“虚构”置于“神话”与“历史”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空间之中。正如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一书的读者所会记得的,弗莱将虚构看作部分地是由对于原型的神话结构的升华而形成的。这些结构被误放到言辞制品的内里,成其为它们潜在的内涵。所有虚构的根本意义,它们的主要内容,在弗莱看来,都在于肇源于古典作品和犹太教—基督教宗教文学的“早于体裁的情节结构”(pre-generic plot-structures)或 *mythoi*[神话]之中。从这种理论出发,一旦我们辨识出某一特定故事作为其体现的那种原型神话或者先于体裁的情节结构,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一故事会照那个样子“起承转合”。当我们辨识出一个故事的主题(弗莱对于 *dianoia* 一词的译法)时,我们就明白了它的“要点”,那使得它成其为一个“传说或示例性的寓言”。弗莱认为,“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既有虚构的一面,又有其主题性的一面”,然而,一旦我们从“虚构的投射”走向对于主题的外在表达,写作往往就处在“直接说话,或者直接的话语写作而不再是文学”的层面了。并且,就像我们

所看到的,弗莱的观点是,历史(或者至少是“正儿八经的历史”)属于“话语写作”的范畴,因此,当虚构性的因素——或者神话性的情节结构——明显地出现在那里面的时候,它就全然不再是历史了,而成为一种混杂的体裁,一种并不神圣的尽管并非不自然的历史与诗之间的联合的产物。

可是,我认为,历史是通过它们成功地从纯然的编年之中炮制出故事,而获得其一部分的解释效能的;而反过来,故事是经由一种我在别的地方称之为“情节化”的运作过程而由编年炮制出来的。我所谓的“情节化”,指的不过就是将在编年中所包含的事实进行编码,使其成为特定种类的情节结构的成分,这恰恰是以弗莱所提出的一般而论的“虚构”的那种方式来进行的。

已故的柯林武德认定,历史学家终归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并且他还提出,历史的敏感性就体现在从一堆“事实”——它们在未经处理的时候毫无意义——中创作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在他们给零星片段而总是不完备的历史记录赋予意义之时,历史学家就得运用柯林武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constructive imagination),它告诉历史学家——就像告诉一个称职的侦探一样——在现有的证据和它能够对其提出恰当问题的意识所展示的形式特征之下,“情况一定是”什么样子。此种建构性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与康德所说的先天想象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的——它告诉我们,即便我们无法同时看到桌面的两面,我们也可以确信,倘若它有一个面的话,它就有两个面,因为一面的概念本身就至少包含了另一面。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在处理他们的证据时,秉有对于不同性质的人类处境所可以采取的各种可能形式的感觉。他将此种感觉称为对于证据中所包含的“故事”的或者隐藏在“表面”故事之后的被埋葬了的“真实”故事的嗅觉。他的结论是,历史学家们在成功地发现了隐匿在历史证据之中的故事或者故事群之时,就给历史证据提供了合理的解说。

柯林武德没有能够看到的是,没有任何特定系列的偶然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就构成一个故事;它所能给历史学家提供的至多只是故事的元素。事件被炮制到一个故事之中,是通过压制或者贬抑其中的某些东西,而突出另一些东西,通过描画、主题重复、语调和视角的变化、交替的描述策略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我们通常指望在一部小说或者一部戏剧的情节化中找到的所有技巧。比如说,没有什么历史事件本然地就是悲剧性的;只有从某个特定的视角或者从一个结构化了的事件序列的语境——它在其中是一个享有特殊地位的要素——之中,才能被视作这样。因为,在历史中从某一个视角看来是悲剧的东西,从别的视角来看则是喜剧性的,就正如在社会中从一个阶级的立场看来

或许是悲剧性的东西——就像马克思所力图揭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样,在另一个阶级看来不过是闹剧。在将历史事件看作一个故事的潜在要素之时,它们是价值中立的。它们是否最终在一个悲剧、喜剧、传奇或者讽刺性——用弗莱的范畴来说——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取决于历史学家决定了要按某种而不是另一种情节结构或者主题的要求来勾画它们。同一个故事序列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喜剧或悲剧故事的成分,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对于情节结构的选择,那在他看来能够最恰当地将那类事件纳入序列以将其构成为一个融通的故事。

这就表明,历史学家在思考历史记录时,引入了对于事件的勾画的类型的概念,那使得他的作品的读者能够辨识出故事来。他当然也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我不认为有人会接受将肯尼迪总统的人生情节化为一出喜剧,然而,应该将其情节化为传奇、悲剧还是讽刺剧,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要紧的是,大多数历史序列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加以情节化,这就给那些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意义。例如,米什莱在他关于法国革命的巨著中描绘为一出浪漫的超越的戏剧的,却被他的同代人托克维尔情节化为讽刺性的悲剧。不能说两人中的哪一个就对于在记录中所包含的“事实”具有更多的知识;他们不过是对于最适合于他们所了解的事实的故事种类有着不同的观念罢了。也不应该说,他们讲述了有关革命的不同的故事,因为他们发现了不同种类的事实,一边是政治性的,另一边是社会性的。他们找出不同种类的事实,是因为他们要讲述的是不同种类的故事。然而,这些可供选择的、且不说是相互排斥的对于本质上是同一系列的事件的表现,对于它们各自的读者来说,何以仿佛是同等地合理的呢?这不过是因为历史学家与其读者共有着关于革命可以如何被情节化的某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而已,那是对于总体而论超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审美的或者神话的要求的回应。

柯林武德曾经评论说,对于对我们的文化中被视作“悲剧性”的那类处境并不熟悉的任何人来说,你永远也无法向他将一出悲剧说个明白。任何人,只要是教过或者学过通常冠名为“西方文明”或者“西方文学经典导论”这类无所不包的课程,就都知道柯林武德想说的究竟是什么。除非你对于悲剧、喜剧、传奇或者讽刺性的处境在文体上的特征有所了解,否则,你就无法在某个文学文本中碰到它们时将它们辨识成这个样子。然而,历史处境并没有像文学文本所做的那样,在自身之中纳入某种内在固有的意义。历史处境并非内在地就是悲剧、喜剧或传奇性的。它们或许全都内在地就是讽刺性的,然而却不能以那种方式将

其情节化。要将一出悲剧转化成一出喜剧,历史学家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移动他的视角或者改变他的视野。不管怎么说,我们将处境视作悲剧或者喜剧性的,不过是由于这些概念乃是我们宽泛而言的文化遗产和具体而言的文学遗产的一部分而已。如何勾勒某一个特定的历史处境,端赖于历史学家的匠心独运,以将某一特定的情节结构与他想要赋予某种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序列相匹配。这本质上是文学性的、也即制造虚构的行为。而且这样来称呼它,也绝不是要将它从提供某种知识的历史叙事的位置上挪开。因为不仅像是弗莱和别的原型批评家所指出的,可以将事件系列构成为特定种类故事的先于文体的情节结构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而且,以这样的情节结构将事件进行编码,乃是一个文化将个人的和公共的这两种过去赋予意义的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给事件系列赋予意义。一种方式是将事件纳入因果规律之下,因果规律主宰着它们的联结,以勾画出这些事件在被视作机械力量的“结果”时似乎所具有的特定的轮廓。这就是科学说明的方式。我们给事件系列赋予意义的另一种方式初看起来有点稀奇古怪甚至有些神秘,那就是以文化所提供的范畴如形而上学概念、宗教信仰或者故事形式等等来对系列进行编码。这样进行编码的效果,就是将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一般说来,这就是历史学的方式,其“素材”仅仅因为在时间上远离我们、又源出于与我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而言就总是陌生的,且不说是异乎寻常的。

历史学家与他的读者共有着重要的人类处境所一定要采纳的一般形式概念,通过他参与到创造意义的具体进程之中,那一进程将他确认为某一个而非另一个文化传承的一员。在研究某一特定的事件复合体的过程之中,他开始察觉到这些事件所可以勾勒出来的可能的故事形式。在他对于这一事件系列如何具有了在他看来内在于其中的形态的叙事性表述之中,他就将自己的描述情节化为某一特定种类的故事了。读者在追索历史学家对于那些事件的表述的过程当中,逐步地认识到,他所阅读的故事是此种而非彼种:传奇、悲剧、喜剧、讽刺剧、史诗剧,或者无论别的什么。而且当他观察到他所阅读的故事所从属的种类或类型,他就体验到了故事中的事件在他这儿得到了解释的效果。在这个时候,他不光是成功地跟踪了故事,他还把握了其要点,理解了它。事件原来的陌生、神秘或者异乎寻常都消失无踪了,它们具有了熟悉的风貌,不是在它们的种种细节方面,而是在它们作为一种为人所熟悉的外观的要素而发挥的功能上。它们因为从属于情节结构的范畴——在此种范畴之中,它们被编码成某种特定的故事——之下而变得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它们变得为人们所熟悉,不仅

因为读者对于事件具有了更多的**信息**,而且还因为[历史学家]向他展示了,素材如何与某种可以领会的完备过程的图式、某种他所熟稔的作为其文化传承的一部分的情节结构相吻合。

这与心理治疗中所发生的或者人们认为那当中会发生的情形颇为相似。病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系列被推断为他的病因,它们出现在神经性综合征之中,变得不再熟悉,让人感觉陌生、神秘、有威慑感,并具有了他既无法接受又无法有效抵御的意义。问题并不在于病人不知道那些事件是什么,不知道那些事实;因为倘若他在某种意义上不知道那些事实的话,他就无法辨识出它们,并且一旦它们在他的意识中出现就将其压制下去。相反,他太了解它们了。事实上,他对它们所知甚深,他持续不断地与它们生活在一起,并且是出之于这样一种方式,以至于除非透过这一事件系列给他对于世界的看法所涂抹上的色彩,他就无法看到任何别的事实。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我们可以说,病人将这些事件过度地情节化了,他给它们赋予了如此厚实的意义,以至于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不过是出于想象的,它们在本该早就成为“过去的历史”的很长时间之后,还持续地塑造了他的思想和他对于世界的反应。医生的问题,不是要在病人面前搭建起有关这个问题的“**真确事实**”、与困扰着他的“**幻想**”相对立的“**真相**”,也不是要给他上一堂短短的精神分析理论课程,通过将他的病症归类为某种“**情节**”的表现,来向他启蒙他的病症的真实特性。这是分析师在将病人的情况讲给第三方,尤其是另一位分析师听时或许会做的事情。然而,精神分析理论认识到,病人会用他抵制创伤记忆的痕迹以他无法释怀的形式侵入其意识的同样方式,来抵制这两样策略。问题在于要让病人对他整个的生活历史“重新情节化”,以改变那些事件对于他来说所具有的**意义**及它们在构成其生活的全部事件序列结构中所具有的**重要性**。照这样看来,治疗过程就是尝试着将那些由于起了太大的决定性作用已经变得不再熟悉、变成了病人生活史的异己之物的事件,重新变得熟稔起来。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些事件因为从它们占据了显要位置的情节结构中被移走,安放到另一个情节结构之中——在那里面它们只有着从属性的或者再寻常不过的作用,就像是与所有别的人都同样具有的某种生活当中的元素一样——从而就不再成其为创伤了。

我并不想在精神治疗和历史学之间强行来作一个类比;我用这一个例子,只是为了表明历史叙事当中的虚构成分的一个特点。历史学家们企图让我们重新熟悉那些或者是因为偶然、忽略,或者是因为压制而被忘却了的那些事件。再就是,史学大家们总是在研究他们的文化的历史中那样一些事件,它们就其

性质而言乃是“创伤性”的,其意义或者暧昧难明,或者因其对于现实生活依然具有的重要性而过于独断;诸如革命、内战这样的事件,诸如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样的大规模的进程,或者在某个社会中已经丧失其原先功能、但却依然在当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制度。历史学家在考察这些结构获得其形态和发生演化的情形时,就让它们再度变得熟悉了,这不仅是因为提供了有关它们的更多的信息,还因为表明了其发展如何与我们寻常用来给自己的生活历史赋予意义的某一种故事类型相吻合。

倘若这里面对于历史叙事的解释效能的说明有其可取之处的话,它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有关历史叙事的**模仿性**(mimetic)层面的重要之处。人们总是认为——就如弗莱所说的——一部历史乃是有关历史学家心灵之外的一个事件系列的言辞模型。然而,要是把历史看作类似于飞机模型或者轮船模型,或者地图和照片那样的模型,那就大谬不然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原型并运用必要的转换规则,来验证后一类模型是否准确恰当,来考察模型在哪些方面确实成功地再现了原型的某些层面。然而,历史的结构和过程与这些原型并不一样;我们无法走到它们面前来考察它们,看看历史学家是否在其叙事中恰当地重建了它们。而且即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想要这么去做;因为毕竟正是原型体现在档案材料中的陌生性,首先激励着历史学家努力去给它创造出一个模型。倘若历史学家仅仅为我们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就会是处在与这病人相同的情形:他的分析师只告诉他,基于对他父母、兄弟姐妹、儿时伙伴的访谈,病人早年生活的“**真确事实**”是什么。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向我们作出了对于任何问题的**解说**。

这就让我想到,历史叙事不仅是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种隐喻性陈述,它指示了这些事件和过程与我们寻常用来赋予我们生活事件以文化所裁可的意义的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性关系。纯然从形式上来看,历史叙事不光是对于它所报道的事件的**再造**(reproduction),而且也是一个**符号复合体**(complex of symbols),它给我们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找到这些事件结构的**图式**(icon)指出了方向。

当然,我在这里用上了皮尔士在他的语言哲学中在记号(sign)、符号(symbol)和图式(icon)之间所做出的分别。我认为,这些分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所有人们想当然地视为对于世界的现实主义表现中的虚构性的东西,以及在所有显然是虚构性的表现中的现实性的东西。简而言之,它们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历史表现是对于**什么东西的表现**?在我看来,对于历史,我们必须说的

是弗莱似乎认为对于诗或者历史哲学才真切的东西,也即,作为一个记号体系的历史叙事同时指向两个方向:指向在叙事中所描述的事件,以及,指向历史学家选择了作为事件结构图式的故事类型或者主题情节(mythos)。叙事本身并非图式;它所做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描述历史记录中的事件,以告知读者,要把什么东西当作事件的图式,以使得它们对他而言变得“熟悉”。历史叙事就这样斡旋于两者之间,一边是其中所报道的事件,另一边是寻常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用来赋予陌生的事件和情景以意义的先于体裁的情节结构。

对于历史叙事虚构性质的蕴涵的回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历史”概念在界定别的话语类型时所具有的效用。“历史”因其缺乏概念上的明晰性,并且无法产生各门科学作为其特征所致力于产生的那种普遍规律,就与“科学”对立起来。与此相似的是,“历史”因其对于“实在”之物而非“可能”之物的关切,就与“文学”对立起来,而“可能”之物是被当作“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的。这样一来,在一个致力于判断小说中何者为“现实”、何者为“想象”的绵长而显赫的批评传统中,历史就成其为表现的“现实主义”一极的一个原型了。我在此时想到的是弗莱、奥尔巴赫、布思和柯洛格等人。当文学理论家们谈论一部文学作品的“语境”时,假定这一语境——“历史背景”——有着一种作品本身所永远也无法具有的具体性,它永远也无法切近这一语境,这对于他们而言再寻常不过;就仿佛要体察从一千份历史档案中拼合起来的过去世界的实在,比之要探究呈现给研究它的批评家的单单一部文学作品的内蕴深度,要更加容易。然而,人们所认为的历史背景所具有的那种具体性和切近性,文学学者所研究的文本的这些语境,本身就是研究了那些语境的历史学家的虚构能力的产物。历史档案比之文学批评家所研究的那些文本并不就更加透明。那些档案所勾画出来的世界也并不就更加让人容易接近。一个并不比另一个就更加是“给定的”。究其实而论,历史档案所勾勒出来的世界的不透明性,是随着历史叙事的生产而加剧的。每一部新的历史著作都不过是增加了可能文本的数目而已,倘若要忠实地描绘出对于某一特定历史背景的一幅完整而准确的画面,这些文本就需要加以解释。要加以分析的过去与分析档案而产生出来的历史著作之间的关系颇为悖谬;对于过去我们知道得越多,要对其作出概括就越困难。

然而,倘若说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的增长使得对其作出概括变得更加困难的话,那也会让我们就那种知识传递给我们的各种形式进行概括变得更加容易。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可以不断增加,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却并非如此。并且,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也并非是以我们与自然科学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那种革

命性的突破来取得进步的。历史学就像文学一样,是以生产经典来取得进步的,那种经典的特性是其不像各门科学中的主要概念图式一样可以被证伪或否定。而正是它们此种不可被证伪的特性,确证了史学经典根本上的文学特性。在一部历史学巨著中有着某种无法加以否定的东西,而此种无法否定的因素就是其形式,那一作为其虚构的形式。

人们常常会忘记,或者在记起来之后也会否认的是,没有任何由历史记录所见证的事件系列,构成其为一个一目了然地就是完成了的或者完备的故事。无论是构成了个人生活的还是某种体制、某个国家或者整个民族的生活的事件,都是如此。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故事中,即便我们向后回溯时将自己的生活置于故事的形式之中,以给其赋予意义。对于各个民族和各个完整的文化而言也是同样的情形。在一篇论及历史编纂的“神话”性质的文章中,列维-施特劳斯评论说,一个来自别的星球的到访者在看到就法国革命而写作的上千部历史时,该会是如何惊诧。因为在那些著作中,“作者们并不总是用上同样的事件;当他们用上同样一些事件时,那些事件也被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然而,这还是与同一国家、同一时期、同一事件相关的各种变奏而已,那些事件的实在散布在一个多层结构的每一个层面之上”。接着,他提出,用来评估历史记述正当性的标准,不应取决于它们的各种成分,也即,它们那些被认为是事实性的内容。相反,他指出,“一旦被孤立出来,每一个成分都会表明自身是人们所无法把握的。然而,它们当中的某些之所以获得一致性,靠的是这一事实:它们可以被整合到一个体系之中,其中的各项东西在与系列的全盘融贯性相对照时,或多或少是可信的”。然而,他所谓的“系列的融贯性”不可能是编年系列——根据其最初发生的时间顺序而加以编排的“事实”序列——的融贯性。因为,历史学家赖以从中炮制出他那关于“真正发生了什么”的故事的事件“编年”,事先就已然被编码了。有“热”的编年,也有“冷”的编年,其中出现或多或少的日期,需要被纳入有关发生了什么的一个完整的编年之中。再就是,日期本身在来到我们这里时,已经分门别类为各种日期,那些门类构成为历史学领域内各个被认定的范围,那些范围又呈现为历史学家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倘若他是想要给出一个完整而又在文化上负责任的关于过去的记述的话。

这一切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就表明了,当人们以故事的形式就历史记录中不同领域做出一个完备的记述时,历史学家仿佛是在记录中所发现的“所谓的历史连续性”,“就不过是借假冒的框架(fraudulent outlines)而得到的”,而那一框架乃是历史学家强加于记录之上的。在他看来,这些“假冒的框架”是“抽

象”的产物,是摆脱“无限回溯的威胁”的一种手段,那种威胁永远都暗藏在每一个复杂的历史“事实”系列的内里。列维-施特劳斯认定,只有作出了“放弃”一个或多个事实领域——它们自身是可以用来纳入我们的记述之中的——的决定,我们才可以建构起一个有关过去的完备通融的故事。我们对于历史结构和过程的说明,因而就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在我们的表述中剔除而非纳入的是什么。因为,为着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一个事件序列的结构,历史学家要有将某些事实断然排除在外的能力,正是依靠此种能力,历史学家赋予了那些事件作为一个完备融通的情节结构所具有的象征上的重要性。历史学家们或许不大喜欢将他们的工作看作是将事实转化为虚构;然而这是他们工作所取得的效果之一。在对特定序列的事件系列提出可供选择的情节结构之时,历史学家就给历史事件提供了他们所属文化的文学艺术所可以给予他们的所有可能的意义。在地道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之间所发生的真正的争议与这一点相关:后者坚持认为事件可以而且只能够以一种故事形式来加以情节化。历史写作的繁荣昌盛,基于发掘出可以用来给事件系列赋予不同意义的全部可能的情节结构。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判定了过去与包含在其最为纯粹的文学艺术形式中的各种意义制造策略有多么吻合,我们对于那一过去的理解也就在同等程度上取得了进展。

以这种方式来考察历史叙事,就可以让我们对于自20世纪初以来的历史思想中的危机得出某些洞识。我们设想一下,历史学家的问题是要给某个假定的事件系列赋予意义,采取的办法是将它们安排到一个序列之中,那同时既是编年性质的又是有着句法结构的,就像从一个句子到一部小说的任何话语那样被纳入结构之中。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对于构成为系列的事件的编年式编排的要求,必定与前面所提到的句法策略的要求处于紧张关系之中,无论是将后者视作逻辑的(三段论)还是叙事的(情节结构)策略。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事件系列

$$a, b, c, d, e, \dots, n \quad (1)$$

这是按照编年来排序的,但却需要将其作为情节或论证的要素来加以描述和刻画,以赋予其意义。这个序列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情节化,并且因此获得不同的意义,而与此同时又丝毫没有危及编年式编排的要求。我们可以简洁地将某些情节化方式表述如下:

$$A, b, c, d, e, \dots, n \quad (2)$$

a, B, c, d, e, ..., n (3)

a, b, C, d, e, ..., n (4)

a, b, c, D, e, ..., n (5)

如此等等。

大写字母表示某个事件或事件系列获得了有利的地位,它们被赋予了解释能力,或者是作为解释整个序列结构的原因,或者是作为序列——它被视为某一特定种类的故事——的情节结构的象征。我们可以说,任何给原初事件(a)派定了在随之而来的整个事件序列结构中以关键要素的地位(A)的历史,都是“决定论”的。卢梭在其《第二篇论文》^[1]中、马克思在其《宣言》中,以及弗洛伊德在其《图腾与禁忌》中对“社会”的历史的情节化,都可以归入此列。相应地,任何给序列中最后的——不管是真正的或者不过是思辨地设定的——事件(e)赋予充分的解释效力(E)的历史,就属于所有那些末世论或者启示论的历史的类型。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各种版本的约希姆式的(Joachite)千年盛世降临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总体而言所有的唯心主义历史,都属于此列。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可以有各种形式的历史学,它们付诸显然是“虚构”的情节结构(传奇、喜剧、悲剧和讽刺剧),以此给序列赋予清晰可见的形式和可以想见的“意义”。

倘若序列只不过是按照事件原先发生的顺序来加以记录的,假定将事件按其时间序列安排,这本身就提供了对于它们为何在某时某地发生的一种解释,我们所得到的就是纯粹形式的编年。就单纯时间和空间范畴构成为提供资讯的解释原则而论,这是一种“素朴”的编年形式。与素朴的编年形式相对立,作为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推想其“感伤的”对应物,反讽地否认历史序列具有任何更加宏大的意义,或者描述了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情节结构,或者确实可以被设想为一个具有可以辨识出来的开端、中段和结尾的故事。我们可以将这类历史记述视作意图成为其虚假的或者过度情节化的对应物(上面的第2、3、4和5项)的解毒剂,并且将其表呈为对于纯然编年的反讽式的回归,构成为任何在认知上负责任的历史所唯一可能具有的意义。我们可以将此种历史表达为这个样子:

“a, b, c, d, e ..., n” (6)

[1] 即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译注

引号表示对于事件的有意识的解释：它们并不具有序列性之外的其他意义。

此种图式当然是高度抽象的，并且没有能够合理对待它意在区分的各种类型之间可能的混合以及各种类型的变体。但我认为，它有助于我们考虑事件如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情节化，而与此同时并不妨碍到事件的编年顺序的要求（不管它们是被如何构想的），以便产生出对于系列的可替代的，相互排斥而又同等合理的解释。在《元史学》中，我试图阐明这些混合和变体如何出现在19世纪史学大师的写作中；而且，在那本书中，我提出，经典的历史记述总是代表了种种努力，既要恰当地将历史序列情节化，又要不动声色地与其他合理的情节化相调谐。正是在两种或者更多种情节化之间所存在着的这种辩证的张力，彰显了任何具有经典地位的历史学家身上所秉有的批判的自觉。

因而，历史学就不仅关系到事件，而且关系到那些事件可以被表明呈现出来的可能的关系系列。这些关系系列并非内在于事件本身之中；它们只存在于对其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的内心之中。在这里，它们作为历史学家本人所属文化的神话、寓言、民间传说、科学知识、宗教和文学艺术里的概念化了的关系模式而现身。然而，更加要紧的是，我认为，它们内在于历史学家必定要用来描述事件的语言本身之中，那是先于对于事件的科学分析或者虚构的情节化的。因为，如果说历史学家的目标是要让陌生的东西变得为我们所熟悉的话，他就必须使用隐喻的而非专业性的语言。专业语言只对于那些在训练过程中了解了其用法的人，并且只有在学科参与者一致以一套统一的术语来描述的事件系列中，才是熟悉的。历史学并不具有这样得到普遍接受的专业术语，并且实际上对于何种事件构成为其特殊主题并不能达成一致。历史学家用于编码、交流和沟通的基本工具，乃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ordinary educated speech）。这意味着，他用来给自己的素材赋予意义、使陌生之物变得熟悉、令神秘的过去变得可以理解的唯一的工具，就是**隐喻性**语言的种种技巧。一切历史叙事预先就都假设了对于它们所想要表现和解释的事件的隐喻性描绘。而这就意味着被纯粹看作言辞制品的历史叙事，可以用它们所置身其间的隐喻性话语的模式来加以勾勒。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很可能就是历史学家决定了要用来给某个历史事件赋予意义的那种情节化，是在他创作一个叙事之先，就被他用来描述其记述中各种要素的主导性的语言的隐喻模式所支配着。有一次，在一个文学史的讨论会上，我听到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说，他并不确定自己知道文学史家们想要做的是些什么，然而，他知道的是，写作一部历史，就是要将一个事

件置入某个语境,将其作为部分而与某种可以设想到的整体联系起来。他接着又说,就他所知,要将部分与整体联系起来,只有两种办法,转喻(metonymy)和提喻(synecdoche)。在致力于研究维柯思想一段时间之后,我很能接纳这种看法,因为它与维柯的这一观点相吻合:一切“诗性的智慧”的“逻辑”都包含在语言本身在其四种主要的隐喻性表达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中所提供的各种关系里面。我自身的感觉——而且我发现这种感觉在黑格尔对于非科学话语性质的反思中得到了证实——是,在诸如历史学这样尚未在学科发展上做到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建构出一套形式化的术语体系来描述其对象的任何一个学术领域中,决定研究素材的基本形式的乃是隐喻性话语的类型。这就意味着,那看来内在于研究领域对象之中的**关系形态**,实际上正是由研究者在他在那里所发现的**对象进行辨识和描述的行动之中强加于那一领域的**。其中的蕴涵就是,历史学家是通过他们用来对其进行**描述**的语言本身来将他们的主题建构成为叙事表现的可能对象的。而且,倘若情形就是如此,那就意味着,我们对于同一事件系列所拥有的不同历史解释,比如米什莱、托克维尔、泰纳和别的人所解释的法国革命,不过就是这些历史学家在写作他们关于它的叙事之先,用来**预构(pre-figure)**那一事件系列的语言程式的投射而已。这只是一个假设,然而看来这样的情形乃是可能的:历史学家认定他是在事件本身之中“发现”了他的叙事形式,而不是像诗人那样将形式强加在它们之上,此种信念是缺乏语言自觉所导致的结果,他没有弄明白,对于事件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已然构成对于它们性质的解释。照这样看来,米什莱和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记述之间的差异,不单单在于这一事实:前者以传奇的形态而后者以悲剧的形态来构成其故事情节;差异还在于比喻学上的模式——分别是隐喻和转喻,那是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用来把握出现在档案之中的事实的。

我无法展开来论证这一假说的合理性,那是我《元史学》一书的基本原理。但是,我希望这篇文章可以表明研究诸如历史学这样的话语散文形式的一个取径,这一取径像修辞学研究一样古老,也像现代语言学一样新颖。此种研究可以沿着罗曼·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在一篇名为《语言学与诗学》的论文中所奠定的方向进行。在那篇文章中,他认为,浪漫主义诗歌与19世纪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散文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本质上是隐喻性的,而后者本质上是转喻性的。我觉得对于诗与散文之间差别的这种概括过于狭隘,因为它预先就假定,诸如小说这样复杂的宏大结构的叙事,不过就是所有言辞行动的“选择”(也即音位差异的)轴的投影而已。诗歌,而且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就被雅可

布森描述为语言的“组合”(也即语素的)轴的投影。这样一种两分的理论,推动着分析家们走向诗与散文之间的二元对立,那就好像将转喻的诗和隐喻的散文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了。然而,雅可布森理论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表明了,诗与散文两者的各种形式——它们全都在一般而言的叙事之中并且因此也在历史编纂中有其对应物——的特性可以由其主导性的比喻来加以说明,那些比喻是语言本身提供的,并成其为任何希望以语言来表呈这些关系的人们认为现存的所有有意义的关系的范式。

叙事,或者说跨越某个时间系列而作为散文话语呈现出来的诸事件的语段分布,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展示它们之提炼成为某种可为人理解的形式,表现的是话语的“内转”,它企图向读者表明在纯然表面上的无形式的背后,存在着真正的事物形式。历史学和小说中的叙事风格,就被当作从对某种原初事态的表呈到对某种后续事态的表呈的运动形态。一个叙事的首要的意义就在于,将原先按某种转义模式进行编码的(真实的或想象的)事件系列解体,并以另一种转义(tropological)模式将此系列逐步重构。由此来看,叙事就是一个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在其中,由于出之以一种有别于以习俗、权威或传统来编码的隐喻模式,原来的观察被澄清了。而叙事的解释效力就取决于原有编码与后来编码之间的对比。

比如说,让我们假定有一个奇异的经验系列来到我们面前,也就是说,它是未经分类也无法加以分类的。我们的问题就是,辨识出将无形式的全体中可以分辨出来的各种成分连结起来以成其为某种整体的那些关系形态。倘若我们强调的是各成分之间的相似性,我们就是以隐喻的模式在工作;倘若我们强调的是其间的差异,我们就是以转喻的模式在工作。当然,为了让任何系列的经验能够具有意义,我们必须明确地既辨识出构成为一个事物的各个部分,又弄清楚各个部分所共有的那些使得它们可以被视作一个整体的层面。这就意味着,对于人和东西的全部原本的描绘,都必须将隐喻和转喻都派上用场,以便将其“固定”为我们可以有意义地用话语来加以表达的东西。

就历史编纂的情形而论,论者给法国革命赋予意义的努力极具启发性。柏克通过以反讽的模式将其同代人的奇异经验重新编码,从而将革命的各种事件解码了;米什莱以提喻的模式将这些事件重新编码;托克维尔以转喻的模式来重新编码。就他们每个人而言,从编码到再编码的运动都是以叙事的方式来加以描述的,也就是说,它是在一条时间线上展开,使得对于这些构成为“革命”的事件的解释,成为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讽刺剧、传奇和悲剧的一出戏剧。叙事

的读者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追踪这出戏剧,将其体验为这些事件所构成的真实性质的逐步展示。此种展示与其说是对人们所观察到的东西的重构,不如说是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某一个事件生发的场域。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原本以某种方式编码的事件系列,被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解码或重新编码了。事件本身并没有实实在在地从一种记述变化为另一种。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记述中,人们加以分析的素材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它们之间关系的形态,尽管这些形态或许在读者看来是基于有关社会、政治和历史的**不同理论**的,它们反过来最终在将整个系列的事件作为代表了完全不同性质的整体而进行的**隐喻性描述**中,又有其根源。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要把彼此相对立的对于同一系列历史现象作出的不同解释作出判断,看哪一个是最好的或者最有说服力的时候,我们就常常陷入暧昧难解的困局。这不是说,我们无法在好的与糟的历史编纂中作出分别,因为我们总是可以回到诸如对于证据准则的责任、叙事细节的相对充实性、逻辑上的一致性等等标准来对这个问题作出评判。然而,可以说的是,要对比如说法国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的好的和糟的解释之间作出分别的努力,在涉及由有着同等学识和思想深度的历史学家所提出来的可供选择的**各种解释**的时候,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容易。毕竟,许多史学经典并不会因为或者是某些新史料的发现——那会导致对整个记述之中某些要素的具体解释产生疑问,或者是新的分析方法的产生——那使得我们可以处理此前的史学家们未曾考虑到的问题,而被否定或作废。正是因为史学巨著,诸如吉本、米什莱、修昔底德、蒙森、兰克、布克哈特、班克罗夫特等人的著作,不会确定无疑地被否定,我们就必须考察他们著作中具体的文学性的层面,将其视作他们的史学技巧中**关键性的**而非仅仅是次要的因素。

传统上,在讨论诸如历史编纂这样的叙事形式时,人们在诗性话语和散文话语之间作出了分别,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对这样的分别进行修正势在必行;我们必须认识到,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诗与历史之间作出的分别,对这二者而言,蒙蔽了的东西和澄清了的东西一样地多。如果所有诗中都有着某种历史的成分的话,那么世间所有的历史记述中也都有着某种诗的成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们对于历史世界的记述中,为着对我们叙事表现的对象进行**描绘**,以及为着建构起有关这些对象在时间中的变迁的叙事性记述而采用的策略,我们要依赖于**隐喻性语言**的技巧,这大概是自然科学中所没有的情形。而这又是因为,历史学并没有什么它自身所独有的可以进行掌控的主题;它永远是作为一场竞争中的一个部分而写出来的,那就是有关过去**可以是什么样子**而提出的各种相

互颞颥的诗性隐喻之间的竞争。

在对虚构和历史之间作出的比较陈旧的分辩中,虚构被视作是对于想象之物的表现,而历史是对于实在之物的表现;这种看法必须被这样的认识所取代:我们唯有通过将实在之物与**想象之物**进行对照或比附,才能认识前者。如此看来,各种历史叙事就是各个复杂的结构,在其中,经验世界被想象成至少存在于两种模式之下,一种是被编码成为“实在”的,另一种则在叙事过程中被“展现”为是虚幻的。当然,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样的看法乃是一种虚构:他建构为某个发展过程的开端、中段、结尾的各种事态全都是“事实”或“真确”的,他不过是将其从开始到尾声的各个阶段的变化中“发生了什么”记录下来。然而,事态的开端和结束这两者都必定是诗性的建构,并且既然如此,就依赖于用来给它们赋予融贯性的隐喻性语言的形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叙事不是简单的对于从一个事态到另一个事态的变化中“发生了什么”进行的记载,而是对事件系列以这样一种方式逐步重描(redescription):开始时就将以某种言辞模式编码的结构拆除,以在结束时表明以另一种模式对其重新编码的合理性。一切叙事的“中段”就都是如此构成的。

这一切只是一个粗略的梗概,而我知道,坚持认为一切历史叙事中都有其虚构性成分,必定会让某些历史学家恼火,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根本不同于小说家,因为他们要与之打交道的是“实在”的事件,而小说家对付的是“想象”的事件。然而,叙事的形式和解释效力都并非来自于人们认为它能够容纳的不同内容。究其实而论,历史——在时间中演进的实在之域——是以诗人或小说家试图赋予其意义的方式来产生意义的,那就是,让原本看起来疑惑难解而神秘莫测的东西带上因其熟悉而为人们所可以认识到的形式。世界是被视作实在的还是不过是想象出来的,这一点无关紧要;让它产生意义的方式并无二致。

同样地,断言我们是通过给实在世界强加上形式上的融贯性——那是我们习惯于与小说作家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绝没有让我们指派给历史学的知识的地位发生动摇。那一地位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会动摇:如果我们相信,文学并不能教给我们关于实在的任何东西,而不过是想象的产物,它与此世无关,而只关系到别的某个与人无关的世界。在我看来,我们将伟大的小说视作对于我们与其作者一同生活在其中的某个世界的澄明,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将历史的“虚构化”体验为一种“解释”。在这两者之中,我们都看到了意识在其想要适意地安居其中的世界进行建构和殖民的各种形式。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倘若历史学家认识到他们叙事中的虚构性成分,这并不意味着将历史学贬低到意识形态或者宣传品的地位。实际上,这种认识可以成为历史学家变成意识形态成见的俘虏这一倾向的潜在的解毒剂,他们不会这样来看待那种成见,而是将其标榜为对于“事情本来面目”的“正确”看法。将历史学带到距离其文学敏感性的根源更近的地方,我们就能够辨识出我们自己话语中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因为它乃是虚构性的成分。我们总是能够看到那些对于特定事件系列的解释令我们无法赞同的历史学家的虚构性成分;然而我们却很少能察觉自身文字中的那一成分。因此,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历史记述中都看到文学的或者虚构的成分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历史学的教益提升到比之它目前所具有的更高的自觉层面。

有哪位老师不曾为了他无法就历史写作给学生提供指导而发出过悲叹?又有哪位历史学研究生不曾在领会和模仿他的导师似在颂扬而其精髓又无法勾勒出来的样板时心存绝望?倘若我们认识到,在一切历史叙事中都有着虚构性的成分,我们就会在有关语言和叙事本身的理论中找到依据,来更加精妙地阐述历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不仅仅是告诉学生们,去“找出事实”,将它们写下来,告诉人们“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我看来,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今天处于一种很糟糕的状态,因为它没有能够看到自身在文学想象中的源泉。为着看上去是科学的和客观的,它压制和否定了自身最伟大的力量和复兴的源泉。通过将历史学再度带回到与其文学根基的亲密关联之中,我们不仅应该让自己对纯然的意识形态偏见保持警惕;我们还应该获得那样一种史学“理论”,没有了这种理论,历史学根本就无法成其为一门“学科”。

【本文原载 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Clio* 3, no. 3, 1974; 后收入其文集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海登·怀特 著

陈 栋 译

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场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它挑战了对人性本身的认识。围绕如何能够恰当地表现大屠杀这一问题，历史学界产生了许多争论。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大屠杀从本质上便不可用语言来表现。而怀特认为，历史学家至今难以恰当地表现这一事件，是由于受到传统表现模式的限制。自19世纪以来，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古典现实主义已无力表现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的经验。但怀特提出，我们仍有可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大屠杀以及其他骇人听闻的现代性灾难。只是，这种表现必然要使用到一种现代主义的风格。我们在许多现代作家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风格，它本身便是在现代社会中应运而生的。

我被要求来谈论“历史的情节化与关于‘真’的问题”。我猜之所以要求我来处理这个论题,是因为我被认为持有对历史知识的相对主义观点。实际上,我确实认为在所有对历史现象的表现中都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相对性。语言被用于描述作为解释和理解的可能对象的过往的事件(events),并因而建构了这些事件。表现的相对性是由这种语言所带来的。当一种专业语言被如此使用的时候(像是在社会科学中),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科学解释公开声称,它只关注事件的那些可以被描述它们的语言学程式(linguistic protocols)表示的方面——例如定量的,因而还有可度量的方面。在传统的对历史现象的叙事性描述中,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首先,叙事被看作是历史事实的中性“容器”,一种天然适合于直接表现历史事实的话语模式;其次,叙事史通常都使用所谓自然的或日常的语言(而非专业语言)来描述它们的主题并讲述故事;第三,历史事件被认为是由一组真实的(real)或者人们亲历的(lived)故事所组成,或者说是表现为这些故事,人们只需从证据中发现或者抽取这些故事,并展现在读者面前,个中真义(truth)^[1]便会得到直接的和直观的认可。

这种关于历史故事的讲述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在我看来显然过于天真,或者至少也有所误解。故事正像事实陈述(factual statements)那样是语言学实体,并且从属于话语之列。

由历史的情节化和我们会议的主题——“探询表现的界限: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引起的问题是:我们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讲述的、有关这些现象的故事存在着任何界限吗?我们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用任何模式(modes)、符号(symbols)、情节类型(plot types)和文体(genres)——它们是由我们的文化提供给我们的,使我们能够理解过去发生的此类极端事件——来对这些事件进行情节化吗?或者,纳粹主义和“最终解决”这样的事件属于如此特殊的这样一类事件,即便法国革命、美国内战、俄国革命或者中国的“大跃进”也与之不同,这些特殊的事件必须被视作仅仅呈现为一个故事,只能以一种方式被情节化,并且仅仅表示了一种意义?一句话,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所具有的特性,是否给我们关于它们所能讲的真话设定了绝对的界限?它们的特性给小说(fiction)或者诗歌的作者运用它们的方式设定了界限吗?

[1] 海登·怀特在 reality 与 truth 这两个词之间做出了区分。他将前者理解为不含价值、自身无意义之物,类似于他所坚持的“历史的无意义性”;而将后者理解为或多或少具有独断性的解释(包括历史学家对“客观真实”的坚持,同样还包括各种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解释)故在译文中依上下文将前者译为“真实”“现实”或“实在”,而后者译为“真”或“真义”等——译注

我们是否可以轻而易举地以任何方式来对它们进行情节化,换句话说,它们是否就像其他的历史事件那样,我们可以无限地阐释、而不可能最终决定它们的特定意义?

在关于本次会议的举办缘由的备忘录中,弗里德兰(Friedlander)区分了两类问题,它们可能会由对历史的情节化和关于“真”的问题的考虑引起:由“关于纳粹时期和最终解决,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叙事”这一事实引起的认识论问题,以及由“基于过去[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情节化模式的对纳粹主义的表现”的出现而引起的伦理问题(粗体是我加上的)。显而易见,若是把相互矛盾的叙事当作对已被建立为事实的事件的描述来考虑,则可以基于它们对事实记录的忠实性、它们的包容性(comprehensiveness)以及它们包含的随便哪个论证的融贯性来对这些叙事进行评价、批判和划分等级。但叙事性描述不是仅包含事实陈述(单称存在命题[singular existential proposition])和论证;还同样包含了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元素,正是这些元素将舍此便不过是一张事实清单的东西变成了故事。^[2]在这些元素中,我们认为正是那些类型化的故事模式(generic story patterns)提供了故事的情节。因此,一个叙事描述可能将一组事件表现为具有史诗性或悲剧性故事的形式与意义,而另一个叙事描述则可能将同样的一组事件——以同样的可信性并且丝毫不违背事实记录——表现为闹剧。^[3]

在此,相互矛盾的叙事之间的冲突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相关的事实,不如说是可以由情节化赋予那些事实的各种不同的故事意义。这就引起了可以用来赋予事件以不同意义的各种情节类型——如悲剧的、史诗性的、喜剧的、浪漫剧的、田园牧歌式的、闹剧的,等等——与事件本身的关系的问题。讲述某组事件的某个故事与事件本身之间的关系,是否与一个事实陈述与它的所指之间的关系相同?我们能否说一组实在的事件在本质上就是悲剧的、喜剧的或者史诗性的,从而对这些事件的表现,作为一个悲剧的、喜剧的或史诗性的故事,能够从它在事实上的准确性出发来评价?还是说,它仅仅与我们看待

[2] 显而易见,历史学话语同样包含这样的解释,它们以或多或少更加可形式化(formalizable)的论证的形式出现。我并不是在处理以形式论证的形式进行的解释与我所谓的由对事件的叙事化制造的解释效力(explanation-effects)之间的关系。论证与叙事表现的适当结合正是对实在的特定历史表现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但在历史中,论证与叙事化之间关系的确切本质是不清楚的。

[3] 在此我想到的马克思对1848—1851年间发生在法国的事件所编排的闹剧版,它与分别由雨果和蒲鲁东对同样一组事件提出的悲剧和喜剧的版本形成了公开竞争。

事件的视角有关？

当然，大多数叙事史的理论家采取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情节化所制造的与其说是另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和综合性的事实陈述，不如说是一个对事实的阐释（interpretation）。但是当事关由情节化模式——被用于表现事实，展示不同种类的故事的形式与意义——制造的阐释时，区分事实陈述（被认为是对象语言 [object-language] 的产物）与对它们的阐释（被认为是一种或更多种元语言 [meta-languages] 的产物）对我们毫无帮助。假设相互矛盾的叙事是事实被一个历史学家阐释为悲剧，而被另一个阐释为闹剧的结果，这对我们也毫无帮助。^[4] 在传统历史学话语中情形尤其是这样——在那里面，事实总是优先于任何对它们的阐释的。

因此，传统的历史学话语假定，在对事实的阐释与关于事实的故事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真实的故事（real story）（与假想的故事 [imaginary story] 相对）和真的故事（true story）（与假的故事 [false story] 相对）这两个概念的流行显示了这一差异。通常的看法是，阐释是对事实的评论；同时，叙事史中讲述的故事被认为不是内含于事件本身（据此有了“真实的故事”的概念），便是内含于事实之中，而事实得自对有关那些事件的证据的批判性研究（由此产生了“真的故事”的概念）。

对于相互矛盾的叙事的问题，以及对像纳粹时代这样的时期和像“最终解决”这样的事件的不可接受的情节化模式的问题，这样的考虑提供了某些洞见。只有当我们确信事件本身具有一种“故事性的”形式和一种“情节性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自信地假设，相关的事实对能够被以适当的方式（在诚实和恰当这双重意义上）讲述的、关于它们的故事的种类设置了界限。我们或许会进而将有着欢快腔调与诙谐观点的喜剧的或者田园牧歌式的故事，从相互矛盾的叙事之列排除，因为对纳粹时期的事实来说——或者至少对那些要紧的事实来说——它明显是虚假的。但只有当（1）它被当作对事件的如实的（literal）^[5]（而非比喻的 [figurative]）表现，以及（2）用于将事实转化为一种特定故事的情

[4] 除非我们准备接受这样的观念，即，给定的事实组可以被无限、多样地阐释，以及历史学话语的目的是增加我们对任何给定的事件组的阐释的数量，而非努力去制造一个“最好的”阐释。见保罗·韦恩（Paul Veyne）、麦卡拉夫（C. Behan McCullagh）、彼得·芒茨（Peter Munz）以及安克斯密特的著作。

[5] literal 在原文中的含义是“如字面意义的、不添加任何修辞的”；将之译为“如实的”，并不意味着下文中与其相对的 figurative 一词的含义是“虚假的”。——译注

节类型被当作内含于事实之中(而非被施加于其上),我们才能将它从相互矛盾的叙事之列排除。因为,一个历史故事若不被当作对真实事件的如实表现,我们就不能从它就相关事实来说是真还是不真的角度出发来批判它。倘若将其视为对真实事件的比喻性表现,则它是否为真的问题就得依照统辖了我们评判虚构性作品(fictions)是否为真的原则来确定了。而且,如果不假设人们选择用来将事实转变为某一特定类型的故事的情节类型乃是内含于事实本身的,我们就没有基础来比较这个特定的描述与有着其他情节类型的其他叙事描述,来评判它们对于表现——那与其说是对事实的表现,不如说是对事实意味着什么的表现——的相对的恰当性。

这是因为,相互矛盾的叙事之间的差异,就是支配着它们的情节化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因为叙事总是被情节化的,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正因为叙事是以不同的方式被情节化的,所以在各种情节类型之间就可以做出区分。就以喜剧的或者田园牧歌的模式来将第三帝国的事件情节化的情形而论,我们会有充分的理由去诉诸事实,以把它从对第三帝国的相互矛盾的叙事的清单上划去。但是,如果一个这样的故事是以明显反讽的方式现身的,而且旨在对于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以喜剧或者田园牧歌的方式将这些事实情节化的做法做出评判,那又如何呢?以不忠于事实为由将这种叙事开除出局,无疑是文不对题。因为,即便它并未积极地忠于事实,至少也消极地忠于事实——在它对以喜剧或田园牧歌的模式来情节化的有关第三帝国的叙事的嘲弄之中。

另一方面,我们或许会希望以弗里德兰的方式,将这样一种反讽的情节化视为是不可接受的。弗里德兰指控那些历史、小说和电影,它们看似是在忠实地描绘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生活中最可怖的事实,然而实际上却是在这样的伪装之下美化了整个场景,并将其内容转变为恋物癖迷恋的对象和施虐受虐狂幻想的素材。^[6]正像弗里德兰指出的那样,这样一些对发生在第三帝国的现象的美化的表现,在以前往往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它们的事实性内容是否准确或者诚实,因为它们冒犯了人们的道德感和审美趣味。在过去约二十年间,这样一些表现已变得越来越普遍,并因而明显更加为人们所接受了,这表示被社会认可的道德与趣味的标准发生了深刻改变。但是,对于我们指望能够借以判定某个对于第三帝国和“最终解决”的叙事性记述不可接受(即便其涉及事

[6] Saul Friedlander, *Reflets du Nazisme*, Paris: Editions de Seuil, 1982, pp. 76 ff.

实的内容既准确又丰富)的根据来说,这种环境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此,问题似乎在于,要区别一组特定的事实性内容与一种特定形式的叙事,以及应用一种规则,它规定了严肃的主题——像是大规模杀戮或种族灭绝——要配之以诸如史诗或悲剧那样的高贵的文体才能有恰当的表现。这是由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的《老鼠:一个幸存者的故事》(*Maus: A Survivor's Tale*)所引起的那种问题。^[7]《老鼠》以(黑白)漫画书的形式和一种苦涩的讽刺模式来表现大屠杀事件,在其中德国人被描绘成猫,犹太人是老鼠,而波兰人是猪。斯皮格曼的漫画书外在的内容是这样一个故事:艺术家努力从他父亲那里获取自己的双亲在大屠杀事件中的经验。因此,书中讲述的大屠杀的故事,是由一个关于这个故事如何被讲述的故事构造的。但起到构造作用的故事与被构造的故事,由于它们采用寓言手法将事情比作一个猫、鼠、猪的游戏,其中每一个人——迫害者、受害者与旁观者在大屠杀的故事中,以及斯皮格曼和他的父亲在他们的故事中——都以看起来更像是动物而非人类的形式出现,因此,这些故事外在的内容作为事实,可以说都是打了折扣的。《老鼠》展现了对大屠杀的一种极其反讽、极其令人迷惑的观点,但就我所知,它同时也是对大屠杀最触动人心的叙事描述之一,其中的一个缘故,就是它将发现和讲述哪怕是全部真相中的一小部分时所遭遇的困难,也当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正如那些它试图去发掘其意义的事件也是故事的一部分一样。

诚然,《老鼠》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但它是对过去的真实事件的表现,或者至少是对被表现为确实发生过的事件的表现。《老鼠》中不存在任何弗里德兰在他对近来许多电影和小说处理纳粹时期和“最终解决”的手法的评价中所抱怨的那种审美化。同时,这本漫画是运用风格化、比喻和隐喻的杰作。它将大屠杀事件纳入了漫画的表现惯例之中。并且,在这种“低贱”的类型与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件的荒谬混合之中,《老鼠》成功地引出了所有关于总体而论的表现的界限的关键性问题。

《老鼠》着实远比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布(Andreas Hillgruber)的《两种毁灭:德意志帝国的垮台与欧洲犹太人的末路》(*Zweierlei Untergang: Die Zerschlag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das Ende des europäischen Judentums*)一书更具有自

[7] Art Spiegelman, *Maus: A Survivor's Tal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我批判意识。^[8] 在这篇长文中,希尔格鲁布提出,尽管第三帝国缺乏能使其崩毁、被称为悲剧的高贵目的,但国防军于1944—1945年间在东线进行的防御战,却能够在不违反任何事实的情况下被恰当地情节化为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希尔格鲁布的目的明显是想挽救德国历史上的纳粹时期的一个部分的道德尊严,他的做法是将其整体分割为两个独立的故事——“德意志帝国的垮台(*Zerschlagung*)”与“欧洲犹太人的末路”——并且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情节化,一个作为悲剧,另一个作为不可理解之谜。^[9]

希尔格鲁布的批评者们立刻就指出(1)即便仅仅是以叙事的模式来进行描述,便已是将任何对事件的分析都置于了对它们的审美化之下;(2)国防军的“英勇”行动,使得倘若军队早些投降便会幸免于难的众多犹太人的毁灭成为可能,只有无视这一点,才能给这些事件贴上道德上高贵的悲剧的标签;以及(3)试图通过将“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历史与“最终解决”分离开来,以使其变得高贵,这种努力不但违反了道德,在科学上也同样站不住脚。^[10] 然而,希尔格鲁布将东线防御战的故事情节化的提议,并没有违背任何要写出专业上受人敬重的叙事史所需要服从的常规。他不过是提议将关注点收缩到历史连续体的某个特殊片段,将占据那一场景的各色人等和各种动力作为戏剧性冲突中的角色来描写,并在情节化这场戏剧时采纳了常规的悲剧体裁。

希尔格鲁布对1944—1945年冬季东线的历史进行情节化的提议表明,某种特定的情节类型(悲剧)如何可以同时既决定了哪些事件能够被纳入可以就它

[8] Andreas Hillgruber, *Zweierlei Untergang: Die Zerschlag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das Ende des europäischen Judentums*, Berlin: Siedler, 1986, p. 64.

[9] 因此,希尔格鲁布写道:“这些是深入到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个人心理学的维度,并且提出了在其他意识形态符号标记下,在真实的或臆测的极端情况和态势下可能的重现问题。这超越了交给历史学家的对百万人受害的记忆保持警醒的那一任务。因为此处触及当前和未来的一个中心问题,超越了历史学家们的任务(范畴)。对任何人来说,希特勒都是一个基本的挑战。”(“Das sind Dimensionen, die ins Anthropologische, ins Sozialpsychologische und ins Individualpsychologische gehen und die Frage einer Möglichen Wiederholung unter anderem ideologischen Vorzeichen in tatsächlich oder vermeintlich wiederum extremen situationen und Konstellationen aufwerfen. Das geht über jenes Wachhalten der Erinnerung an der Millionen der Opfer hinaus, das dem Historiker aufgegeben ist. Denn hier wird ein zentrales Problem der Gegenwart und der Zukunft berührt und die Aufgabe des Historikers transzendiert. Hitler geht es um eine fundamentale Herausforderung an jedermann.” [ibid., pp. 98-99]) (此段译文承蒙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张俊峰、博士张一楠的热心帮助。——译注)

[10] 大多数相关的文献可见“*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n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unich: Piper, 1989。又见“Special Issue on the *Historikerstreit*”, *New German Critique*, no. 44 (Spring/Summer 1988)。

们讲述的任何故事之中,又提供了一个分派角色的模式,让由此构成的场景中的各种人物和动力来扮演。^[11] 然而,希尔格鲁布的提议同时显示了,选择某一种情节化的模式,如何正当化了对置身于某一特定历史场景中的某些种类的事件、人物、行动、动力和受害者的无视。在悲剧中,没有任何低贱或者不高贵的生命形式的容身之所;在悲剧中,即便反派也是高贵的,或者不如说,恶行也能被展示为具有其高贵的化身。据说,当被问到他的《中世纪的衰落》一书为何未涉及圣女贞德的时候,赫伊津哈(Huizinga)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不想让我的故事里有一个女英雄。”希尔格鲁布将国防军在东线进行的防御战情节化为一出悲剧的提议表明,他希望他所讲述的关于这场防御战的故事中有一个英雄,他希望这个故事是英雄主义的,并且由此从德国历史上的纳粹时期中至少挽救出一点残余。

希尔格鲁布可能并未考虑到,他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分割为两个故事的做法——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帝国的垮台,另一个故事则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末路”(Ende)——设置了构成一个语义域的对立结构,在这个语义域中,给一个故事的情节类型命名,就决定了包含另一个故事的情节类型的名称在其中的语义场。希尔格鲁布没有为那个或许会给“欧洲犹太人的末路”这一故事提供意义的情节类型命名。但是,如果悲剧的情节类型被用于讲述国防军于1944—1945年间进行的东线防御战的故事,则可以推出,讲述“欧洲犹太人的末路”这个故事时使用的必然是某个其他的情节类型。

在放弃为那种我们应该去讲述的、有关希特勒帝国中的犹太人的故事命名的冲动时,希尔格鲁布接近了某些学者和作家的立场,他们将大屠杀看作是实质上不可用语言来表现的。这一观点最极端的形式是这样一句老生常谈:这个事件(或者奥斯维辛,或者“最终解决”,等等)有着那样一种特性,使之逃脱了任何用于描述它的语言或任何用于表现它的媒介(medium)的把握。由此,有了例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著名论断:“奥斯维辛的世界位于言说之外,

[11] 情节类型是巴赫金(Bakhtin)称之为“时空体”(chronotope)的构造中的决定性要素。“时空体”是自然界的—一个社会地构成的领域,它定义了所有想象的——以及所有现实的——虚构作品中可能出现的事件、行动、行动者、作用力、社会角色等等的界限。占主导地位的情节类型决定了可被感知的事物的层级、它们关系的模式、它们的发展周期、它们能够揭示的可能的意义。每一类型化的情节类型都预设了一种时空体,每一种时空体都设定了关于发生在它的界限内的事件能够被讲述的故事种类的一定数目。

正如它位于理性之外那样。”^[12]或者爱丽丝与 A. R. 艾克哈特(Alice and A. R. Eckhardt)的问题:“要怎样才能言说那不可言说之物呢?当然,我们应该去言说它,但我们怎能做到?”^[13]贝瑞尔·朗(Berel Lang)认为,必须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样的表述,把它们看作是表明了书写大屠杀的困难,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大屠杀的表现必须以满怀敬重的沉默——这应当是我们在面对大屠杀时的第一反应——为标准来评判(第160页)。

无论如何,朗自己反对任何将种族灭绝用做虚构的或者诗性的写作主题的行为。在他看来,只有记述种族灭绝的事实的最如实的编年才勉强能够通过“本真性与真理性”——对这一事件的文学的和科学的描述都必须依据它们来评判——的考验。被记述的只能是事实,因为否则人们便会堕入比喻性的言说与风格化(审美主义)之中。只有记述事实的编年才能得到许可,因为舍此人们便会自陷于情节化的叙事化与相对化的危险之中。

对种族灭绝的任何“文学”表现的界限,以及它与间断的(sparse)或者说去叙事化的(denarrativized)历史记述相比在道德上处于劣势——朗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值得仔细考虑,因为它以最极端的形式提出了对大屠杀的表现的界限问题。朗的分析依赖于如实的(literal)言说与比喻的(figurative)言说之间的截然对立,文学语言与比喻语言的等同,一种关于对真实事件的比喻性描述所产生的特殊效果的特定观点,以及一种关于道德上的极端事件——大屠杀被认为是这种极端事件的一个罕有的(如果不说是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例——的概念。朗认为,种族灭绝是一个真实事件,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但除此之外,它同样是一个“如实的事件”,换句话说,其特性使得它可以作为只能允许我们以如实的方式来谈论它的那种事件的范式。

朗坚持认为,比喻语言不只是背离或者偏移了表达的如实性,同时也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它假装在谈论的事态上转移开来。他声称,任何比喻性表达都在对它所指的客体的表现之上增添了某些东西。首先,它加上了它自身(例如它使用的特定比喻)以及它所预设的决定(例如选择使用这一个比喻而非另一个)。比喻产生了风格化,将注意力引向作者和他或她的创造性才华。其次,比

[12] George Steiner,引自 Berel Lang, *Act and Idea in the Nazi Genoci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 151。下文中引自该书之处以圆括号中的页码来表示。

[13] Alice and A. R. Eckhardt, “Studying the Holocaust’s Impact Today: Some Dilemmas of Language and Method”, in *Echoes from the Holocaust: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a Dark Time*, ed. Alan Rosenberg and Gerald E. Myer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39.

喻产生了一个看待言论(utterance)之所指的视角,但是在勾勒一个特定视角的同时,它不可避免地封闭了其他视角。因此,它贬抑或者掩蔽了事件的某些方面(第143页)。第三,那种将舍此便仅仅是记述真实事件的编年史的东西转变为故事的比喻,同时也把那些事件中包含的人物行动者和动力人格化(人性化)了——通过把它们变成那种具有意图、感觉和思想的主体,读者能够以对待虚构故事中的角色同样的方式,对这些主体产生认同和移情——并且通过把它们表现为我们在文学的和神话的体裁中看到的那种人物、动力、事件等等的例证,从而将它们普遍化了。

按照这种观点,任何种族灭绝的文学表现的不适当性都源于由使用比喻语言引起的对相关事实的扭曲。针对任何对构成了种族灭绝的事件的纯然文学性的表现,朗树立了这样的理想,认为对相关事实的如实表现才揭示了它们的真正本质。值得从朗的书中引用一段颇长的文字,在其中,他将比喻的言说与如实的言说对立起来,类似于在虚假的话语与真实的话语之间的对立。

如果……种族灭绝的行动指向的是那些不是**作为**个体而引发了这一行动的个人;如果由种族灭绝所代表的恶在原则上、在把一个群体概念化并决定将其抹杀的行为之中,都同样反映出了一种蓄意为恶的意图,则比喻性话语在表现种族灭绝时的内在界限便展现在我们眼前。在已被给定的描述的基础上,想象的表现甚至会把非个人的、集体性的事件人格化;它会把在发生时是特殊的、偶然的事件去历史化和普遍化。

在此明显有着不可避免的失谐。对于一个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把非个人的特征与对有关道德边界的观念的挑战结合起来的主题,将该主题人格化的企图——或者,就此事而言,只是把人格**加诸**其上——显得既没有根据又自相矛盾:说它没有根据,是因为它将本质上是集体性的主题个人化了;说它矛盾,是因为它在主题自身拒绝界限时对它设置了界限。给主题附加人格的努力因而**歪曲**了主题并因此——当受到歪曲的方面是实质性的方面的时候——**减损**了它。在坚持存在可供替换的比喻性视角的可能性的时候,作者进而便坚持认为,表现的过程以及他自己的人格是表现的一部分——这是对它的实质性内核的(对于像纳粹的种族灭绝这样一个主题来说)进一步消减;此外,“个人的”视角至多也不过是无关紧要。看来对于某些主题,它们的重要性或许过于宽泛或者过于深重,以至于不能贸然尝试用一种个人的观点去表现,[这种重要性或许]比可能性的概念所能够支撑的在道德上更具说服力——而且也更加实际(actual)。在这种压力之

下,关于启迪(illumination)的预设——那是写作(任何写作)的行为往往不言而喻地就会认可的——就开始失去它的力量(第144—145页)。

但是朗尤其反对文学写作和那种希求达到文学写作的地位的历史写作,因为在其中作者的角色将自身插入了被表现的事物与对该事物的表现之间。作者的角色必须将自身作为比喻行为的施行者插入话语之中,否则话语的主体(subject)就仍然是未人格化的。因为文学写作是在这样的错觉之下展开的,即个人只有通过比喻才能被人格化,“这样的含义便不可避免”,朗说,“一个主题……可以用许多种不同的方式予以表现,并且可以被表现为没有任何必然的根基,或许甚至没有一个实际的根基。对可供选择的[比喻的]可能性的坚持暗含了对界限的否认:没有任何可能性被排除在外”,既不排除将一个真实的人塑造为想象中的人物或者不存在的人(nonperson)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将一个真实的事件塑造为并未发生之事(nonevent)的可能性(第146页)。

正是诸如此类的考虑使朗得出这样的看法:“纳粹种族灭绝的事件”是内在地“反表现的”。他的意思显然并不是说它们不能够被表现,而是说它们是那种只能以陈列事实的和如实的方式来谈论的事件的典型例证。的确,在构成了种族灭绝的那些发生过的事情(occurrences)中,被消解掉的正是事件与事实之间的区分(第146—147页)。因此,朗写道,“如果在可供选择的表达方式(formulations)——颠覆或者拒绝必然总会是其中一种——的可能性之外,还存在着那样一个‘如实的’事实,它就在这里,在纳粹种族灭绝的行为之中;如果事实所扮演的角色的道德蕴涵需要证据,我们也必然要在这里,同样是在纳粹种族灭绝的现象之中,找到这个证据”(第157—158页)。在朗看来,正是该事件高于一切的实际性与如实性批准了历史学家致力于以一种清除掉所有隐喻、转义和比喻的语言“直接地……无间隔地以及原封不动地”来表现真实事件。确实,正是这个事件的如实性指示了“历史学话语”和“想象的表现及其比喻性空间”之间的差异。“尽管它可能被看作是超出了[历史与虚构的区分],纳粹种族灭绝的事实仍然是一个关键点,将历史学话语与想象的表现分离开来。或许这种分离并非独一无二,但它与任何事实可能被要求做到的或者能够做到的一样确定无疑”(第158—159页)。

我在朗的论点逗留许久,是因为我认为它将我们引至了当前许多讨论的关键。这些讨论是关于对大屠杀进行表现的可能性,以及它的不同表现方式的相对价值。朗的反对意见——他反对将这个事件用于仅仅是为了文学表达的场所——是指向小说和诗歌的,但这种反对意见能轻易地被扩展到将那种讲求

文字表达的历史学包括进来,这种历史学具有丰富的文学性以及被读书俱乐部认为是“美文”的特征。然而在暗地里,这种反对必须被扩展到将所有种类的叙事史——也就是说,任何将大屠杀表现为一个故事的企图——都同样包括进来。这是因为,如果每一个故事都不得不说是具有一个情节,如果每一种情节化都是一种比喻,则可以推出,每一种对大屠杀的叙事描述,无论其情节化模式如何,都注定要受到谴责,其理由与所有对大屠杀所做的纯然文学性的表现必须受到谴责相同。

诚然,朗认为,尽管历史表现或许会“使用叙事的和比喻的手法”,但它并不“必然要依赖这些手法”。确实,在他看来,历史学话语是建立在“与其对象处于直接的关联——倘若不是在原则上,也在实际上是毫无阻隔和原封不动的——之中的表现的可能性之上的”(第156页)。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们能够或者应该试着去成为天真的实在论者(realist)或仅仅是追寻信息之人。事情比这要更加复杂。因为朗指出,任何书写大屠杀的人所需要的是一种态度、一个位置,或一种姿态,它既非主观也非客观,既不是有着一套方法论和理论的社会科学家的那种,也不是意图表达个人反应的诗人的那种。^[14] 确实,在《行动与观念》(*Act and Idea*)的导言中,朗援用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不及物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的概念,作为那种能够恰当地讨论由对大屠杀的反思引起的哲学与理论问题的话语的一个典范。与那种旨在让人“透过纸面来读……好让读者看到舍此他们就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或者根本无法看到之物”的写作不同,不及物写作“否认存在于作者、文本、被书写之物、最终还有读者之间的距离”。在不及物写作之中,

作者写作不是为了提供接近某种独立于作者和读者之物的途径,而是为了“书写他自身”。……在[对写作的]传统描述之中,作者被视为首先以已具有期待的、模式化的眼光看到一个对象,并且在看到它之后,在他自己的写作中对其进行表现。对于书写自己的作者来说,写作本身成为了一种

[14] 关于对年轻作家的一些明晰的评论,见艾迪斯·米尔顿(Edith Milton),“The Dangers of Memory”,*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8 Jan. 1990, p. 27。这些作家虽然缺乏对大屠杀的直接经验,却仍然试图将它个人化。这是一篇对由 David Rosenberg 所编的 *Testimony: Contemporary Writers Make the Holocaust Personal* (New York: Times Book, 1990) 的书评。米尔顿评论了“存在于任何一本愿意在宁静中回忆种族灭绝的选集的核心之中的明显悖论”。接着,她仅仅赞扬了那些文章,它们“绝非假装把握了大屠杀……而是强调了它们的作者的必要的疏离。确实……因为主观性与旁敲侧击是仅有的可能路径”,选集中最好的文章是那些“选择了主观的和间接的立场的”文章。Milton, “Dangers of Memory”, p. 27。

洞察和理解的手段,不是映照出某些独立之物的镜子,而是行动与担当——去实行或者去创造,而非反映或描绘(第 xii 页)。

朗明确建议将不及物的写作(与言说)作为适合于犹太人个体的方式,就像在逾越节时讲述出埃及记的故事那样,“应该像他或她曾亲身经历过的那样”,并且在以一种为犹太人所独具的方式来践行的自我认同当中,“来讲述关于种族灭绝的故事”(第 xiii 页)。但更进一步的建议是,不及物写作的成果,也就是说,一种“否认存在于作者、文本、被书写之物、最终还有读者之间的距离”的话语,或许能够成为所有对大屠杀的历史性的或虚构的表现的典范。不及物写作的概念能够以何种方式解决由对大屠杀的表现引起的问题,我正是想要以对此的考虑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要指出,贝瑞尔·朗援用了不及物写作的概念,却没有提到巴特自己用这个概念来表征现代主义写作与古典现实主义写作的主流风格之间的不同。在一篇题为《写作:一个不及物的动词?》(“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的文章中,巴特声称要追问,写作这个动词是否已成为了一个不及物的动词,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又是何时变成这样的。这一问题是在讨论语态(*diathesis/voice*)的上下文当中提出的,为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行动者可以被表现为与行动所具有的不同关系之上。他指出,尽管现代印欧语提供了两种表达这种关系的可能,即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其他语言却还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性,例如古希腊语的中间语态(*middle voice*)。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中,动词的主语被设定为是外在于行动的,不是行动者便是承受者(*patient*);而在中间语态中,主语被设定为内在于行动。^[15]他进而总结道,在文学上的现代主义中,写作这个动词既不意味着主动关系也不意味着被动关系,而是意味着一种中间关系。

因此在**写作**这个词的中间语态之中,存在于书写者与语言之间的距离被渐渐消解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像浪漫主义作品那样的主体性作品是主动的,因为在它们之中,行动者不是处于书写的过程之内而是**先于**(*anteri-*

[15] 例如,像在保证或立誓那样的述行性行为(*performative action*)中那样。在这样的行为中,行动者似乎是自己去行动,使用中间语态可以避免主语的概念被一分为二,也就是说,分为一个执行誓言的行动者与一个接受誓言的承受者。因此,雅典希腊语使用主动语态(*logou poiein*)来表达立下一个誓言的行为,却不使用被动语态,而是中间语态(*logou poiesthai*)来表达立下一个誓言的行为。巴特给出了一个例子,*thuein*["为他人做出牺牲"(主动)]与*thuesthai*["为自己做出牺牲"(中间)]之间的对比。Roland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8.

or)这一过程:在此,写作者不是为他自己写作,而仿佛是以代理人的身份,为了一个外在而又先在的人(即便二者都使用同一个名字)而写作;而在写作这个中间语态的现代动词中,主语被构建为与写作直接同时,受到写作的作用与影响:这是普鲁斯特式叙事者的典范,他仅仅通过写作而存在,尽管提及了一段虚拟的记忆(pseudo-memory)。〔16〕

这当然只是将现代主义写作与19世纪现实主义写作区分开来的许多差别之一。但是这种差别指示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方式,来想象、描述以及概念化存在于行动者和行动、主语和宾语、陈述和它的所指之间,在如实的和比喻的言说的层面之间,诚然因而还有在事实的和虚构的话语之间的关系。根据巴特的描述,现代主义所预见的东西不过是一种经验,它位于我们在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中都不得不划分出的那些对立概念(在行动者与承受者、主观性与客观性、如实性与比喻性、事实与虚构、历史与神话等等之间)所能够表达的经验之外(或在它之前)。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对立概念不能被用来表现某些真实存在的关系,它仅仅意味着,在某些对世界的经验之中,那些被两极对立的术语所指示的实体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互相对立的。

德里达对他所使用的延异(*différance*)这个概念的解释很好地表达了我想说的东西,这个概念同样运用了中间语态的理念来表达它意图传达之物。

不能简单地把延异看作是主动的(它的主动性仅在于它是一项主观的作为);不如说它是表示了中间语态,它先于被动与主动之间的对立而存在,并且设置了这一对立……我们将会看到,为何由“延异”指示之物既不是简单地主动又不是简单地被动。它宣告了,或者不如说是令人忆起了某些类似于中间语态的东西。它谈论一项不是运作的运作(operation),这种运作不能被看作是由主体施加于客体之上的一种激情或一项行动,不能被看作是从一个行动者或一个承受者那里、或是从这些名目之一的基础或观点上出发。哲学或许始于对表达了某种不及物性的中间语态的分配,将其分配为主动的和被动的语态,而哲学自身便由这一压制所构建。〔17〕

我引用德里达的话,是因为他表现了现代主义对哲学规划的看法,这种看

〔16〕 Roland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9.

〔17〕 Jacques Derrida, "Difference", in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trans. David B. Allison,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30.

法建立在对这二者之间的差异的体认之上：特定的现代主义对世界的经验（或者它是对一个特定的现代世界的经验？），以及人们从前人那里传承下来的现实主义文化氛围内所盛行的表现、知识和意义的概念。我这样做是为了提出，那种在对大屠杀的表现的讨论中遇到的反常、谜题和死胡同，是对一种话语的看法的结果，这种话语过多地依赖一种不能恰当地表现像大屠杀这样其自身本质上是现代主义的事件的现实主义。^[18] 文化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与我们的讨论相关，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对19世纪的写作者们——包括历史学家与小说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现实的极大努力的反动（如果不说是拒斥的话），在他们那里，现实被理解为意味着“历史”，而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则意味着不只是把过去，并且也把现在当作“历史”来对待。因此，例如在《模仿》（*Mimesis*）——一部研究西方文化中现实主义表现的观念史中，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将“现代现实主义的基础”归为以下几点：“一方面是对日常现实的严肃对待，将更加广大、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提升为问题性—存在性的（problematic-existential）表现的主体；另一方面，是将随机的人与事件嵌入当代史这一变动不居的背景的总体过程之中——我们相信，这二者就是现代现实主义的基础。”^[19]

这样看来，现代主义版的现实主义可被看作是由对历史、对作为历史的现实与对历史意识本身的激烈拒斥所构成。但奥尔巴赫意在同时展示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因此，在对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的选段的著名解释之中，奥尔巴赫指出了该段落所代表的那种现代主义的“与众不同的风格特征”：

1. “作为客观事实的叙述者的作者的消失；几乎所有被陈述的事物都通过**书中人物**的意识的反思而出现”；

[18] 见扫罗·弗里德兰为杰拉尔德·弗莱明（Gerald Fleming）的《希特勒与最终解决》（*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所作的导言：“在一个限定了的层面，对纳粹政策的分析，一个对多种群体之间的争论的答案看似是可能的。然而，在总体性阐释（interpretation）的层面上，现实的困难仍然存在。那些没有被意识形态的或概念的眼罩蒙蔽的历史学家会轻易看出，正是第三帝国的纳粹反闪主义政策与反犹主义政策给予了纳粹主义它独有的特点。由于这一事实，对纳粹主义的本质的探究具有了一个新的向度，这个向度使它具有不可分类性（unclassifiable）……[但是]如果人们承认犹太问题处在中心地位，是整个体系的本质（essence），则许多[对最终解决的研究]会失去它们的融贯性，而历史学遭遇了一个违抗正常的阐释范畴的谜……我们详尽地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事件的顺序与它们可能的互相影响，但这个现象的深层的动力学逃离了我们的把握。”（粗体是引者标出的）

[19]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491.

2. 任何“外在于小说的视角——从这种视角看来,小说中的人和事件是被观察到的——都被消解”;

3. 在叙述者对那些看似是以一种客观方式被描述的事件的阐释中,“怀疑与质疑的声音”占据了主要地位;

4. 为了“掩盖和抹杀客观现实为作者所全盘知晓的印象……”这一“审美目的”,而运用像是“自由书写(*erlebte Rede*)、意识流、内部独白(*monologue interieur*)”这样的手法;

5. 使用新技巧来表现对时间和时间性的体验,例如,使用“偶然的场合”(chance occasion)来放松仍与“特定的思考主体”无关的“意识过程”;抹除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之间的区分;不是将事件表现为“连续的故事片段”,而是将它们表现为随机发生之事。^[20]

对巴特和德里达或许会称之为“中间语态”(middle voicedness)的风格的那些特征,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佳描述之一。奥尔巴赫对文学现代主义的描述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历史,而是说,我们对历史和现实主义的看法都已改变。现代主义依旧关切着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现实,并且它仍然把现实与历史看作是同一的。但现代主义面临的历史不再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所设想的那种历史了。这是因为作为那种历史的主题的社会秩序已然经历了急剧的转变——这种变化使得西方社会在20世纪所采取的极权主义形式成为现实。

如此看来,文化现代主义必须被看作既是对这种新的实际情况的反思,又是对它的回应。相应地,可以承认在文学上的现代主义与社会中的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形式与内容上的密切关系——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形式的社会极权主义在文化上的表达。^[21] 的确,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看待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的方式: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是表现这样一种历史现实的努力的产物,这种历史现实不能以更早的、古典的现实主义的模式来恰当地表现,因为这些模式可以说是建立在对历史的不同经验之上的,或者不如说,是建立在对不同的历史的经验之上。

[20]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534-539.

[21] 这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持的观点,在 *Fables of Aggression: Wyndham Lewis, the Modernist as Fasci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中,他最明白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这是对现代主义的左派阐释中的常态。

毫无疑问,现代主义是内在于古典现实主义的——就像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内在于19世纪民族国家的结构与实践,以及内在于社会生产关系(前者是它在政治上的表达)中那样。然而,这样看来,现代主义与其说是对现实主义规划的拒斥和对历史的否认,不如说是对一种新形式的历史现实的预期,这种现实被包含在它的所谓不可想象、不可思议以及不可言说的向度之中:希特勒主义、“最终解决”、总体战、核污染、大规模饥荒和生态自杀这样的现象;一种深感我们的科学无力解释这种现象、更不要说控制或遏制它们的感受;以及人们日益清晰地意识到,我们传统的表现模式甚至没有能力对它们进行恰当的描述。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代主义的表现模式或许会使我们有可能去表现大屠杀的现实与关于大屠杀的经验的现实,而任何别的现实主义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确实,我们可以接受朗的提议,即表现大屠杀和对它的经验的最佳方式很可能是一种不及物的写作,对于19世纪历史学家和作家们所抱持的那种现实主义,它一无所求。但我们或许会想,通过不及物的写作,我们必定是在向往着某种与中间语态所表达的那种事件的关系相似的东西。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大屠杀的努力,而是说,为了将我们这个世纪所独有的那些经验——旧有的表现模式已被证明无法恰当地来表现它们——纳入考虑,我们必须修正我们对现实主义表现的看法。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大屠杀(Holocaust)、“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浩劫(Shoah)、劫难(Churban),或者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比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事件更加无法表现。只是对它的表现,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小说中,都需要一种风格,一种现代主义的风格。这种风格是为表现社会现代主义使之成为可能的那种经验而被发展起来的。在许多现代主义作家那里都能见到这种风格,而在他们之中,普利莫·莱维堪为样板。

在《元素周期表》(*Il Sistema periodico*)中,莱维是如此开始一个名为“碳”的章节的:

此刻,读者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篇化学论文:我并没有那样宏大的野心——“*ma voix est faible, et même un peu profane*”(我的声音是微弱的,甚至有几分世俗)。它也不是一部自传,除非是从片面的、象征性的限定上来说,每一部作品、事实上每一件出自人手之物都是自传性的;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历史。

它是——或者希望成为——一部微观史,一部关于某个行当和它的失

败、胜利与悲哀的历史,就像在感到他的事业的尾声将近、而艺术不再遥远之时,每一个人都会讲述的那种故事。

莱维继而讲述了一个特别的碳原子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成为了一个寓言(他称:“这个故事尽管全然独出胸臆”,“却仍然是真的”)。“我只再讲一个故事”,他说,“最为隐秘的故事,我将以这样一个人的谦卑与自抑的方式来讲述它:此人从一开始便明白,这个题目无望完成,使用的手法软弱无力,以及这门用词语表呈事实的行当从它的本质上来说就注定失败”。莱维所讲的故事是关于被他喝下的一杯牛奶中的一个碳原子如何进入他自己的一个脑细胞之中——“我,这个正在写作的人的大脑,这个细胞,以及细胞之中的这个原子,是它在掌控着我的写作,在一场还从未被人付诸笔端的巨型的微游戏之中。”他接着这样来描写这场游戏:“在这一刹那,正是从这团迷宫般纠缠着的是与否之中生发之物,令我的手在纸上移过一段特定的轨迹,在它上面画下这些由符号构成的涡纹:一次双向的电光石火,向上与向下,在两个能级之间,指引了我的这只手在这张纸上写下这个句号,就在这里,就是这一个。”〔22〕

【本文于1990年3月提交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会议之时,收入会议论文集《探询表现的界限: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edited by Saul Friedland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时,均名为“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在收入怀特本人的论文集*Figural Realism*(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时改为现名。】

〔22〕 Primo Levi, *The Periodic Table*, trans. Raymond Rosenthal,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4, pp. 332-333.

海登·怀特 著

彭 刚 译

答亚瑟·马维克

在本文中,怀特一方面批驳了马维克教授对他本人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进行的攻击;另一方面,他也借此机会再一次清楚、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理论立场。怀特自辩道,他从未否认历史事件的实存性,而仅仅是宣称,由历史学家们所建构的“事实”是变动不居的、语言学上的存在。他认为,只有以被书写下来的形式,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才能够被交流和接受。意在描述史实的语言实质上是建构了其本身,并限定了人们分析它们的方式。因此,重要的是历史学家的语言如何将他们的研究对象转变为历史话语的这个过程,对历史写作史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从语言学和话语的层面来分析历史学家们所书写之物(即历史文本)。

我已阅读过马维克教授演讲的好几个版本,该演讲最初是以《元史学是胡扯——历史学才是根本》这个题目发表的。^[1]我猜想,我之所以被邀请来对他在公开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所做的演讲发表评论,是因为我写过一本名为《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书,而马维克教授显然认为它主张了历史研究的“形而上学”路径。^[2]他似乎是想挑起一场争论,在其中他代表了真实的、地道的、或者(在他的词汇表里是一回事)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而我将作为“元史学”的一名捍卫者登场亮相。在对他的演讲的评论中,我指出“元史学”这个术语可被用来描述对这样一些预设的探究:这些预设对于使人笃信一种训练有素的历史思维模式——包括对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是科学的历史研究,一方面是其余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不错,甚至还有哲学、文学理论和语言学)——来说不可或缺。我不知道是不是演讲后的讨论使马维克教授将他的演讲修改成了如今的形式。现在他

[1] 怀特在此指的是马维克于1993年秋在其任教的公开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据马维克本人在2001年出版的《新历史的本质》(*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一书的序言中说,演讲的次日举办了邀请怀特、柳德米拉·约旦诺娃(Ludmilla Jordanova)、约翰·托什(John Tosh)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元史学家们”(metahistorians)出席的研讨班。马维克的演讲经整理后以《通往历史研究的两种路径:形而上学的(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和历史学的》为题发表(“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Including ‘Postmodernism’] 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1, Jan. 1995, pp. 5-35)。怀特的这篇回应文章即在《当代史》接下来的一期上发表——译注

[2] “元史学”(metahistory)这个术语被R. G. 柯林武德用来指哲学家们曾称之为“实质性的历史哲学”(material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东西。这也就是指像黑格尔、马克思和斯宾格勒的研究工作那样,声称是要揭示世界历史的意图、目的、计划或模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预言未来的哲学。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使用这个术语(他认为是F. T. 安德希尔[F. T. Underhill]在描述汤因比的研究工作时杜撰了这个词)来指这样一种文类,它将神话的一宇宙论的思考与历史素材融合在一起,制造出正像人们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看到的准“诗性”的结构。传统上“元史学”这个术语是在一种批判的意义上被使用的,而马维克教授非常合理地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替代了他在他的就职演讲中嘲弄的那种“元史学”。在我对他的演讲的评论中,我指出我的《元史学》一书是对19世纪现象的研究,不是对历史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宣扬。诚然,我主张每一种历史研究都预设了一系列的形而上学假设(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保证了对于独具“历史性”的存在模式的实在性的信念,以及对于研究独具历史性(与比如说是自然性相反)的各种事件的特定历史“方法”的权威性的信念;我主张,这对那些所谓的专业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而言,就像对那些将历史进程的最基础的根基作为他们据称的研究对象的历史哲学家的研究工作而言,都同样真实。换句话说,我主张每一种“历史学”都预设了一种“元史学”,就像每一种物理学都预设了一种形而上学一样。当然,这冒犯了许多历史学家,特别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相信人们能够在不预设任何具有理论或形而上学性质的东西的情况下寻找关于任何东西的“事实”。我的立场似乎是要摧毁历史哲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区分。自从19世纪初历史学专业化以来,历史学对其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的要求便依赖于这一区分。

把他的怒火从“元史学”转向了“形而上学”，并将“后现代主义”（用来囊括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文化唯物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和像我这样的元史学家）与19世纪历史研究的“形而上学路径”的当代形式等同起来。看来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尼采主义的化身；他确乎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一种懦弱的批判行为以及“对严肃的历史研究的威胁”。

马维克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如此怪异，如此不明就里（尽管大堆的脚注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建立他的权威），以至于尝试按照这一概念来讨论他所期望提出的论题将会徒劳无功。一句话足矣：至少按利奥塔的说法，后现代主义被精确定义为这样一种立场，它拒绝所有声称是建立在对于历史的总体意义或形而上学的洞见之上的“宏大叙事”（*grands récits*）。〔3〕诚然，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者们倾向于用更加敬重的态度，来对待以马维克为代表的那种历史思维。在像是建筑学和宽泛而言的艺术这样的领域中，后现代主义倾向于对一切关于本质的概念心存怀疑，对马维克声称历史知识所具有的那种权威抱有警惕，并倾向于把“过去”看作某种堆放着可被征用并派作艺术家可能想要的任何——不论是严肃的还是轻浮的——用场的物品的仓库。但我以为这种对过去的借用一直以来都是艺术的特征。就我的理解，后现代主义仅仅是以与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几乎同样的方式，对“过去”作为社会智慧和道德规矩的源泉的地位提出质疑，然而带着某种程度上更加反讽的态度，以及戏仿过去的——甚至是那些属于现代主义本身的——主题和技巧的倾向。

我原以为，被马维克拿来与后结构主义一起一股脑地当作后现代主义的又一组成部分的结构主义〔4〕，本来更适于被看作一个现代主义的现象。列维-斯特劳斯对传统史学自认为是一门科学的主张不屑一顾；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不过是对过去的一种低水准的、常识性的研究，它是前科学的，因为它的方法仍然是非结构主义的。列维-斯特劳斯确实在《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一书中将某种“历史”概念贬至了一个西方世界的“神话”的地位；但结果表明，这里所说的“历史”不过是指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La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提出的“宏大叙事”，而列维-斯特劳斯拒斥它的理由恰与马维克拒斥历史的“形而上学路径”相同。

〔3〕 Lyotard, *Le Postmoderne expliqué aux enfants*, Paris, 1988, pp. 39ff.

〔4〕 马维克的原文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者’嫡传的‘后现代主义者’”（“The ‘post-modernists,’ the direct heirs of the ‘structuralists’ of the 1960s...”），见“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p. 6。——译注

马维克同样反对那些被他称作“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人。因为正如这个头衔所意味着的那样,他们进行历史研究的路径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他认为近年来的历史“事件”(对此他必定指的是柏林墙倒塌、苏联的崩溃与东欧集团的解体)无疑已令马克思主义思想声名扫地了。但是接下来,他的文章以否认“事件”具有这种作为证据的具体性和地位而告终。至于德里达的“解构”,马维克似乎认为它是一个语言学帝国主义的标签,其实就是一种神秘主义,并且为一种纯粹是“修辞的”(对此他的意思好像是指纯粹诡辩的和论争的)书写历史的方式提供了授权。以这种方式,一个人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无视证据,且不必遵守任何逻辑规则或论证的传统惯例。

然而,可以看出,他自己对那些他所谓解构主义者的讨论,完全按照同一种“修辞”技巧来进行,也就是说,谩骂与诽谤、模糊论题、将辩论纳入陈词滥调,而这正是他归罪于他的假想敌的。而且,马维克违背了他自己时常重申的关键性原则之一:在研究“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确,研究解构主义的原始资料不是理应包括解构主义者的作品吗?但马维克将他讨厌的所有人都归入同一类,他不是分析他们的论证,而是要么指责他们心智不全,要么对他们加以道德责难。

尽管不清楚马维克反对所谓的新历史主义者究竟是为了什么,但他的怒火可能是由这一事实所引发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研究文学的学者,却提供了一种文学文本如何与它们的历史情境相联系的观点,因而被视为是在专业历史学家的领地内越权行事。马维克似乎对“专业历史学”,更确切地说,是对“专业历史学家”,并且根本上是对广义上的“专业精神”深信不疑。确实,马维克所坚持的一项清楚明晰、毫不含糊的价值就是这一概念,即当下的专业历史学终于掌握了研究历史的恰好合适的方法。^[5]说来奇怪,这是对他自己的学科的一种非历史的、事实上是“辉格派的”看法,这种看法似乎否认了早先的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是怎么一回事具有任何真正的观念。他批评了许多对历史学家们的“话语”(一个被他当作行话而反对的术语)进行分析的研究者,因为他们似乎是将他们有关历史学的概念建立在了19世纪的模式之上,或是通过诉诸历史写作本身的历史,而对历史写作一概而论。这个反对意见可谓离奇,因为它是如此之非历史。难道他能把他自己的学科排除在对其历史的研究之外吗?他

[5] 马维克写道:“历史学这一学科仅仅是在19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才取得了它专业的、学术的现代形式。”

难道认为,对于历史学能够提出的唯一合法的问题,就只能是在其演进的某个特定时刻的行业公会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吗?他是否认为只有专业的历史学家才有权研究过去,或者说只有他们才能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叩问历史记录?

所有这些在后现代主义的名目之下召出的妖魔鬼怪,都被马维克视为威胁了专业历史学所要求的那种权力——它不仅要求权威地掌握判断什么应该被算作历史学以及什么是研究它的适当方式的权力,而且要求权威地掌握用于对它做任何描述的语言的权力。对他来说,“形而上学的路径”允许任何人过去,以及对过去被认为所是之物与现在被认为所是之物之间的关系持有任何种类的任何观点。^[6]但在马维克看来,对于能够如何看待历史存在着限制,因而对于能够如何谈论历史也存在着限制;尽管这明显是一个“元史学的”论断,我对此完全同意。然而我们在这些限制自身的本性上面产生了分歧。马维克要对能够如何谈论历史所施加的限制不是认识上的,而是制度性的;它们被惯例所规定,被“专业”的权威所确认。

但是,马维克对历史编纂学正统的“制度性”观点包含了一个有趣的要点,在我看来,它具有潜在的激进性,显得与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很不一致。因为在他的话语展开的过程中,马维克实际上捍卫了一种关于历史学家所生产的知识的性质的观点,即认为它是纯粹约定论(conventionalist)的。当马维克想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与科学家的工作之间做类比时,这种看法就再明白不过地表现在了他的文章里。但是潜藏在这一类比之下的思想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只要关注一下他文章的脉络,便会开始发现,马维克与之缠斗的妖魔正是他责之于后现代主义者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史观。用以表述这一类比的句子杂乱无章到了无法转述的地步,因此在指出我认为其中包含的激进(如果不说是令人迷惑的话)观点之前,请允许我完整地引用它——我把自己的修订放在了方括号里,希望能使文意清晰一些。马维克写道:

自然科学是通过实验、观察等手段对自然界进行的系统性研究以及从这些研究中产生的知识体系,因而自然科学就是[原文如此!]自然界的不同方面,即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等,如它们借由科学家的工作而为人所知的那样(我们别无了解它们的途径);[像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是通过系统地分析第一手资料对人类过去进行的研究,因此,从这项研究中产生

[6] 参见 Gertrude Himmelfarb, "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 Flight from Fact",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6, October 1992, 12ff.

的知识体系,就是借由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为人所知的人类过去。(粗体为马维克原文所有)

这段话看上去是在坚称:(1)“自然科学”以及由它们所生产的“知识体系”是“自然界的不同方面”;(2)自然界的不同方面是“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等”;(3)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等是“它们借由科学家的工作而为人所知的那样……”我以为这就意味着“自然界”只不过是那些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人们(在他们的工作的基础上,并且仅仅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而论)认为它所是的那样。换句话说,马维克仿佛认为,并没有先于从“自然科学”的工作中产生的那些“知识体系”而存在的“自然界”这样一种东西。

单就这段话在谈论一个复杂的、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即常用词“自然”之所指)时所流露的信心而论,就很有意思。不过较之探讨马维克的自然哲学,我更乐意强调他对“自然界”——作为我们必须称之为“历史世界”的东西的类似物(analogon)——这个建构主义的概念的使用。因为他似乎相信,正像自然界是科学家认为其所是的东西那样,历史也是“藉由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为人所知的”人类过去。这是一个非常“后现代主义”的说法,而马维克似乎是被他想令历史思想与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摆脱干系的渴望推到了如此境地。他写道,正是那些“形而上学家们”坚持认为:

“历史”……只不过是物质的进程,通过它,过去本身成为现在,并且实际上,还成为未来。这一进程在一系列阶段(或者时代,或者时期)中展开,按着某些意义的模式,包括了权力运作中的冲突或调和。

马维克不相信过去的物质性;在他看来,过去并不先于历史学家对文献或一手材料的研究而存在;因此,它(过去)似乎是历史学家自己的一种建构。换句话说,马维克似乎赞同那些按照他的说法是否认了历史的“实在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仅仅是在关于构建对过去的适当描述的基础和适当方式的看法上,才与他们有所不同。

从马维克指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的方式上可以看出,马维克的观点是我们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会称之为“建构主义”的那种观点。例如,我被批评为假设“存在于此的‘事件’已经以编年的形式出现了”(第19页),而实情乃是,按马维克的说法,必须在研究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事件”才被转化为“事实”。事实并不先于历史学家对事件的研究而存在。因此,他说:“什么是‘事实’,什么(至少暂时)不是,这必须由史料来确定……”(第21页)他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至

于对“事实”这个概念的有用性提出怀疑。例如,他问道:“但是,什么是‘事实’呢?”然后像是回答般地继续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桩事实。文艺复兴则不那么肯定是:两者都包含了几乎无限多的,大小和重要性各异的次要事实。实际上,历史学家们在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分析和比较时所寻找的,当然是伟大的和渺小的事件,以及它们的日期与编年;但历史学家们寻找的同样还有这些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与其他“事实”[原文如此!]之间的相互联系……物质条件及其中的变化、思想状态;制度、动机、心态、价值观的运作;意图与成就之间的平衡;以及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所有其他重要的(和困难的)东西。

我发现这段话很难理解。但很明显,马维克认为历史知识依赖于对下列关系的领会:(1)“事实”与“事件”之间的关系,(2)“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最后还有(3)“相互联系”与“其他‘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7〕。

当然,“事实”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包含着“事件”(在此需要考虑的是所发生之事是“真实”还是“想象”)与“对事件的陈述”(在此需要考虑的是言说是“真”还是“假”)两重意义。〔8〕在别处我曾因赞同巴尔特的论断“Le fait n'a jamais qu'une existence linguistique”[事实不过是语言学上的存在]而受到批评。这句话被认为是在表示,“事件”仅仅是语言学上的现象,事件不具有实在性,因此不存在,并且可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像是历史事件这样的东西。

这样一种观点(如果真有人这么认为的话)显然是荒谬的。在谈到“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指的只可能是“过去”发生过的全部事件(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总和。事件必须被视为是给定的;它们当然不是被历史学家们建构出来的。“事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是被建构的:在证实了事件发生的文献之中,由对事件或文献发表评论的相关各方,以及由旨在给出对过去**真实**发生之事的**真**描述、并将其与仅仅**看似**可能发生的事情区别开来的历史学家们所建构。“事实”才是不定之物,才是修正和进一步解释的对

〔7〕 马维克的原文似乎说的是“事件”与其他“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B]ut also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events], and between them and other ‘facts’...”),见“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p. 21。——译注

〔8〕 这种模糊性取决于拉丁语中“factum”一词的双重含义(动词*facere*过去时态的名词形式,*facere*意为“to do”或“to make”),它一方面具有“行为”(deed)或“行动”(action)的含义,另一方面又具有“被制造或完成之物”(that which had been made or done)的含义。

象；在理由充分时，甚至可以将它作为假象而抛弃。因此，我将巴尔特的论断“事实不过是语言学上的存在”，解释为是在主张“事实”——与事件不同——是语言学实体；借此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正如哲学家亚瑟·丹图（Arthur Danto）所说，“事实”是“被描述的事件”。

这便是为何我要强调，用于描述历史上所发生之事的场域（field）的语言实质上是构建了这个场域本身，并且限定了可被用于分析发生在这一场域内的事件的方法的种类。此外，对任何一组给定的事件进行最初描述时都要用到不同的语言程式（linguistic protocols），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历史学家们为何对看似同样的历史现象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不是语言学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这也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对历史事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免受责难。最后，它也不意味着“绝对的相对主义”，这个术语通常都被当作好像是虚无主义的同义词那样来使用。我所理解的历史相对主义仅仅与这样一个观念相关，即至少在历史研究之中，对过去的某个特定片段的某个特定表现的真值（truth-value）与权威性，必须根据该表现与它被制造之时的文化情境和社会状况的关系，并联系这一研究所由之出发的视角来考量。这并不是说在特定的历史学家群体中，就“事件”的某个特定片段而论，不可能对“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达成一个实质性的一致，尤其是在他们的各种研究都是从同一个总体视角出发、或者有着同样的意识形态预设的情况下。但是同时，这也使我们能够解释这一事实，即对于任何对一个特定的社会有着特殊意义的事件，历史学上的共识都很难达到，它永远都有被从另一个视角出发进行修正的可能性，并且从不会永世长存。对事实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总是有可能进行商讨和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这不是因为事件随时间改变了，而是因为我们使之概念化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而且，如果对事件来说是这样，对事实来说就更是如此。我们所改变的不仅是有关特定之事的事实是什么的观念，而且还改变了关于事实会是什么、事实如何被建构以及可以应用何种标准来判定某一特定系列的事实对于它们所想要描述的事件的恰当性的看法。

事实与虚构（fiction）的对立是历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且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对我、或任何斗胆认为无论多么努力地尝试去避免，历史学家的文本中仍然可能存在“虚构”因素的人感到愤怒的一大原因。就我自己而言，我为此受过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早先的研究中我试图表明以何种方式，任何文本——无论是以散文而非诗歌的形式写就的文本，还是意在按照字面意义理解而非比喻地理解的文本，但特别是那些以叙述的模式来进行表达的文本——

在它们并未由人们所认定的与事实相符过渡至全然的虚构性时,仍然包含着不可化约的虚构因素。我努力避免这样的观点,即历史学家们处理的是纯粹的事实,并且无论他们的作品中包含怎样的“文学”因素,那也是出之藻饰、美文,或者雅致风格的形式。在我看来,历史写作要比历史学家的“风格”这样的传统观念所表示的更加具有创造性,如果人们按它明显所是的那样来对待历史学家的文本,即把它当作修辞性文章,就不仅能看到历史学家们实际上是在写作中并且通过写作,建构了他们的话语的主题,而且,最终他们实际上所写的,与其说是关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所发现的东西的报道,不如说是他们对于他们最初产生兴趣的对象如何得以构成的想象。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在《元史学》中谈论了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并设想了一种“历史的诗学”,作为彼时流行的各种历史“理论”的替代物。

我继而相信,在对那些像是由各门现代人文学科所生产的话语进行分析的时候,有必要步现代主义作家,如福楼拜、普鲁斯特、伍尔夫、乔伊斯、庞德等人的后尘,在一方面是“虚构”,另一方面,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文学”(literature)之间做出区分。“文学”这一术语(直至18世纪晚期才在现代欧洲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用于描述一类与“论述”和“虚构”都不相同的作品)在伟大的现代主义者那里,指的是类似巴尔特、福柯和德里达开始称之为“不及物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的东西。这样的写作所预设的写作主体与写成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与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小说家(以及大多数19世纪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都大不相同。现代主义者与那些认同他们的人并不是首先设想出作者,然后是某类特定的写作的所指,最终是写作的过程,在其中以写就的文本的形式所“表达”的,不是作者的主体性就是所指的本质。他们设想的是这样一种写作:作者存在于他或她所实践的写作之中,为这种写作而存在,且藉由它而存在。这一同一化过程重制了(而非简单地反映了)话语的所指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篇幅让我对此进行更详尽的讨论^[9]。但我认为,正是这同一化的过程刻画了某类现代历史学家与那样一些历史对象——它们似乎拒绝被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前现代手法来恰当地表现——之间的关系。

我所想到的特别是那些在民族、社会阶层、种族群体、机构与个人的经历中被体验为“创伤”的事件,它们的本质与个人的群体认同有着特殊的关联:大屠

[9] 见我的论文《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收入本读本),以及《以中性语态写作》(“Writing in the Middle Voice”, *Stanford Literary Review*, 9, 2 [Fall 1992], pp. 179-187)。

杀、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奴隶制、种族灭绝、大规模饥荒、技术导致的疾病以及生物圈污染。这样的事件及其发生的情境考验的不只是历史学家们的解释能力,还有他们描述和表现的能力。这里的问题不光是讲述有关过去的真相(truth),甚至不是从某一特殊视角看到的真相,或者是确保某人所讲的事实诚实无欺。这更是一个既要**想象**人们由之出发而启动自己对过去的探究的真实世界、又要**想象**构成了人们关切对象的那个世界的问题。

因此,马维克可以不搬出历史学家忠于真理那样的一些陈词滥调,以及从“外部”看待历史学家的工作的人“完全误解了历史学家做事的方法”那样的流言,而代之以盘查这些陈词滥调和流言,并且自问,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构想出一种满足我们受众需求的历史研究法。在此,一部真正的历史写作史——而非另一种歌功颂德的当下专业实践的谱系学——或许会揭示出,从希罗多德之前到我们自己的时代,不仅在欧洲国家,同样也在世界其他部分,历史想象曾经是多么丰富,以及历史写作的历史展现了多少足以让我们开眼的想象过去的模式。这样一种历史将必须始自对历史学家实际所写之物的思考,要研究这种历史也必须持有一种对写作本身的看法,这种看法将比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简单二分法所能提供的更加丰富。无论如何,为了将这种历史建立在马维克所称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必须认识到对于历史写作的历史来说,第一手资料就是历史学家们实际创作的作品,而非关于保持客观的美好意图的声明,或者对于他们潜心写作之前如何埋首于档案的报道。

马维克斥责我和其他人没有考虑到“专业历史学家……如何从事他们的工作”。他认为像我这样的“形而上学家”“明显从没读过这样的描述”,因此“全然误解了历史学家们从事他们工作的方式”。我们的原则性错误是忽视了历史探究的研究性的一面,将历史学作品当作好像不过是一种**诗性的创造物**、一种仅由想象制造的产品来对待。因此,马维克批判安东尼·伊斯特霍普(Anthony Easthope)把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一篇文章当作修辞学作品、“文本”“自成一体的诗或小故事”来对待,并且忽视了“繁重、有时是枯燥的严肃研究所花费的工夫”。这便是为何在马维克看来,像伊斯特霍普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没能认识到事实与虚构,从而没能认识到历史学与诗学之间的差别。所有这一切都是被马维克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转向”的结果。为否认达到真实的可能性,它把一切都化为了“话语”。但这一“转向”却没有能够将其内涵“转”回自身,“并且将同样的批判付诸[它们]自身的基本假设”。所有这一切之中包含的任性妄为不仅仅是认识上的,马维克宣称,它同样是道德上和政治

上的。事实上,马维克像是在所有这一切背后发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至少是“唯物主义”的“阴谋”。如果马维克不是如此肯定近来的“事件”已彻底令他所憎恶的马克思主义声名扫地的话,这是会令他感到警惕的。

但比起记录马维克的妄想狂,我更有兴趣来说一说,在我看来由于哪些缘故,他有着足够的理由来对他所要捍卫的这一行当的未来忧心忡忡。首先,正像甚至是马维克也承认的那样,历史研究不是与物理学、化学、遗传学相同的科学——我的意思是,一种运用专业语言、由实验方法控制的假说—演绎论证,以及被该学科的参与者们相对充分地推崇与认可的实验流程的科学。历史学更像是一门技艺性的学科,这就意味着,它倾向于受惯例和常规(而非方法论和理论)控制,倾向于利用日常的或者自然的语言来描述它的研究对象,并且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现历史学家对这些对象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是基于对“一手资料”的“研究”和将其与“二手资料”协调起来的努力。

在我看来,马维克坚持历史探究中的研究阶段(the research phase)与写作阶段(the writing-up phase)之间的连续性,这当然是正确的。历史学家话语的造就,并不是在研究完成后再将他或她关于某个问题的想法完备地阐述出来,而是一个对其发现加以表述和重新表述,或者对发现加以订正的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从他或她构思某个主题那一刻开始,到手稿的最后一个句点被写下的那一刻告终。但正是以被书写下来的形式,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才能像马维克所说的那样,“介入”(intervention)与他或她的同行进行的、关于整个历史领域的某个特定片段或区域的讨论。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任何想要将历史研究这一专业、学科或实践的历史概念化的人,都必须以历史学家们关于他们的研究对象实际所写的东西为起点,而不是以他们对自己在工作的“研究阶段”都做了什么的说法为起点。因为正像马维克所坚持的那样,历史就是“我们在历史学家的作品中看到的对于过去的知识,[它]不是直接地被理解的”。然而,如果照他所说(我对此表示赞同),“历史”是历史学家们从一手材料中包含的信息或证据中建构出来的东西,搞清楚历史学家的语言以何种方式将研究“对象”(object)转变为特定的历史话语的“主体”就非常重要了。这意味着任何对它的形式或内容的探讨都必须始自从语言学的和话语的层面来对它进行描述。

这不是“语言学决定论”,也不意味着历史学家比别人更多地是“被语言言说的”。这只是说,任何历史学家对其主题的描述都受到语言、文体、模式(例如叙事)、论证以及一大堆其他文化和社会情境考虑的惯例的限制。这也并不是

说,因为语言被用来建构作为特定历史研究的对象的事件或者实体,对于接下来就这个事件或者实体所能说些什么,就漫无限制。这也并不是说不存在像历史“事件”这样一回事,不是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不可能做出区分,或者一切东西都是“意识形态”,或者除此之外,“随便怎样都行”,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客观的”。它确切的意思是,被当作一个事件、一个事实、对一个历史现象的恰当表现或解释的东西,必须被判定为是“相对于”它得到表述时的时间、地点和文化状况的。

一些人试图不再将历史叙述视为对于一门有关过去的科学的贡献,与之相比,马维克应当觉得这种观念更加合意。归根结底,他有关历史研究的观念完全是约定论的,它以这样一种概念为特征,即无论这个行当在其历史中的某个特定时刻把什么当作是好的历史,那便是历史研究应当作为理想来推崇的。当然,作为艺术的历史学的概念必定与这样一个行当格格不入,后者把自己的命运与更具阳刚气息的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理念捆绑在一起。但这个问题并非男性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对立,而更是具有批判性自我意识抑或成缺乏这种意识的问题。

在历史学家对他们的专业的看法中,系统地注入了对于理论以及自从黑格尔以来哲学家们对于他们所生产的知识的性质提出来的问题的敌意或者至少是无视。这种无视以一种陈词滥调的形式出现,即,如果历史学家们花时间去考虑关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他们将不可能从事审查证据的工作,而仅仅是审查证据便足以确保他们对他们的主题所写下的东西具有权威性。另一种陈词滥调同样使历史学家们免于考虑那些会让人烦心的问题。它认定,只有“实践的”,或者换个说法,“实际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才有资格谈论历史学家怎样以及为了什么目的来做他们所做的工作。例如,马维克就径直认定,因为我曾经写文章探讨过作为话语的历史写作,我便必定是作为文学批评家接受训练的。实际上,我接受的是中世纪史学家的训练,我之所以转向历史写作史的问题,仅仅是因为我对隐藏在19世纪的虚构——在那个时代,历史学转变为了一门科学——之下的意识形态感兴趣。但是无论如何,即便我仅仅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将置身于19世纪现实主义表现传统中的历史写作作为我关切的对象呢?马维克认定只有历史学家才知道历史学家实际上在做什么,这与现代科学家拒绝被社会学家、民族志学者、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研究相似。实际上,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这一事实与其他“科学家”区分开来:通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青睐以叙述的模式来表现他们所发现之物。但是他们

不理解他们的偏好的重要性,其实他们是不理解,为了明确他们的学科在各门人文科学中的特殊性,这种表现模式是必不可少的。

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仅仅是没有能力去分析他们作品中的话语的维度,他们还积极地压制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维度的观念。在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中,谈到“历史学方法”(尽管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未经理论阐发的概念)的有很多,却甚至根本没有谈到如何来写一部史学作品,无论是叙事的还是论证的。这也就是说,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家尚未将他们自己话语的形式以一种可以传授的方式——而非只靠着试错法——来理论化。那种试错法是让学生上交他们的论文,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命令他们重做,直到他们弄对为止——这就意味着以一种历史学教师个人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做。我觉得这么说也并非言过其实:这同样是历史学刊物和学术出版社的审稿人所采取的方式。

【本文原载 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2, Apr. 1995。】

卡洛·金兹堡 著

陈 栋 译

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

海登·怀特的理论自面世以来，在被赞誉为“划时代的转向”的同时亦经受了許多尖锐的批评。金兹堡在1984年发表的《证据与可能性：为〈马丁·盖尔归来〉所作的后记》一文中，已经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怀特的《元史学》。本文更是将矛头指向了后者的《历史解释的政治》，及其“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意涵”。金兹堡认为，怀特在该文中宣扬了一种将历史解释的真实性与它在政治上的有效性联系起来观点，这种论点与其说接近于怀特一贯坚持的宽容，不如说与法西斯主义哲学家金蒂利更为相近。这便揭示出在怀特所提倡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与他所希望的宽容之间存在的道德困境。相应地，金兹堡希望将历史真实的概念重新建立在其与证据的联系之上，尽管这种联系向来是纷繁复杂、问题重重。

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意大利历史学家，曾执教于博洛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现为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名誉教授。他以《奶酪与虫子：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书被视为微观史学派的领军人。金兹堡在对具体案例做出细致入微的分析的同时，亦兼具宽广的视野与关怀，后期作品更是着重于对史学方法的探究。其主要著作还有《夜间的战斗》《木头眼睛》《线索与踪迹》等。

献给普利莫·莱维

1348年5月16日,一个位于普罗旺斯地区的小村庄拉布姆(La Baumé)的犹太人社群被灭绝了。这一事件不过是以仅仅一个月前黑死病的初次爆发为开端,始于法国南部的一长串暴行中的一环。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是向水井、泉水、河流中投毒,从而传播了这场瘟疫。针对犹太人的敌意于圣周期间在土伦(Toulon)首次化为了具体行动。犹太人聚居区遭到攻击,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杀害。接下来的一周里,在其他普罗旺斯城市,如里埃(Riez)、迪涅(Digne)、马诺斯克(Manosque)和佛考奎尔(Forcalquier)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在拉布姆,只有一人幸存——此人应简王后(Queen Jeanne)^[1]之召,于十天前启程前往了阿维尼翁(Avignon)。在书写在一卷《摩西五经》(如今收藏在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博物馆[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in Vienna])上的寥寥几行文字内,他留下了对该事件的惨痛回忆。约瑟夫·沙茨米勒(Joseph Shatzmiller)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对写在《摩西五经》上的这些文字做出了新的解读,并将其与一份摘自一本财政登记簿的文件结合起来,成功确定了这个幸存者的名字:达亚斯·奎诺尼(Dayas Quinoni)。1349年,奎诺尼已定居在了艾克斯(Aix),他的摩西五经是在此地得到的。我们不知道,那场屠杀过后,他是否还曾返回过拉布姆。^[2]

让我们暂时转向一个尽管有所不同、却并非毫无关联的事件。对犹太人传播了1348年的瘟疫的这条指控紧随着一个上一代人建立的模式。在1321年的圣周期间,一则突如其来的流言传遍了法国以及一些邻近地区(瑞士西部、西班牙北部)。按照不同的说法,麻风病人,或者被犹太人影响的麻风病人,或者受到被突尼斯和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国王煽动的犹太人怂恿的麻风病人,策划了一桩毒害基督徒的阴谋。人们显然拿穆斯林国王毫无办法;但在两年之内,麻风病人和犹太人成为了一系列既由暴民、也由教权和政权所实施的暴力行为的目标。我已撰文另述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并尝试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3] 在此

[1] 勃艮第的简(Joan of Burgundy, 法文写作 Jeanne de Bourgogne, 1293. 6. 24—1348. 9. 12), 又名“跛足的简”(Joan the lame) 在她的丈夫腓力六世外出征战时,她常常代其执政。——译注

[2] J. Schatzmiller, "Les Juifs de Provence pendant la Peste Noire",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133 (1974), pp. 457-480, 469-472.

[3] *Storia notturna. Una decifrazione del sabba*, Turin: Einaudi, 1989, chap. 1; *Ecstasies: 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 trans. Raymond Rosenthal, New York: Pantheon, 1991, chap. 1.

我只想分析一部拉丁文编年史中的一个段落。这部编年史写于14世纪早期，作者是所谓的南吉的威廉的继承者(continuator of William of Nangis)，一个和他的前人一样生活在圣德尼(Saint-Denis)修道院的姓名不详的修士。

在人们发现所谓的阴谋之后，许多犹太人(其中大部分是在法国南部)被杀害了。据这位编年史家说，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Vitry-le-Francois)附近，约四十名犹太人被囚禁在一座塔中。为避免死于基督徒之手，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最终决定自裁。这项处决行动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和一个年轻人来执行。然后，长者要求那个年轻人杀死他。年轻人不情愿地照办了，但之后却没有自杀，而是从死人的衣袋里搜取了金银。然后他试着用一根床单系成的绳索从塔中逃脱。但绳子不够长。这个年轻人摔落在地，跌断了腿，后来便被处死了。^[4]

这个事件并非难以置信。然而，它与弗拉维乌斯·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的《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中的两个段落非常相似。第一个段落(3:8)讲的是四十个人藏身于加利利(Galilea)的约塔帕塔(Jotapata)附近的一个岩洞，之后全部自杀，只有两人除外：约瑟夫自己和他的一个士兵同袍，此人接受了约瑟夫的请求，没有杀他。第二个段落描述了著名的马萨达(Masada)之围，逃到要塞中的犹太人垂死反抗，随后集体自杀，此处同样有两个幸存者，两人都是妇女(7:8-9)。^[5] 我们该如何解释约瑟夫的文本与之前提及的、由南吉的威廉的继承者所撰写的编年史中的段落的相似？我们应该假定这是由于存在着相同的事实，还是因为某一历史编纂学传统主题的出现(在较晚近的版本中还包含了对另一个传统主题——犹太人的贪婪——的影射)？

已有人谨慎地提出过这种假说，认为约瑟夫对发生在马萨达的事件的重构是一个历史编纂学的传统主题。^[6]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的作品，无论是希腊文版还是在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指导下编定的著名的拉丁文版，在中世纪都流传广泛，特别是在法国北部和佛兰德斯(如果我们能够就许多现存的手稿

[4] Martin Bouquet,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 24 vols, Paris: Aux dépens des libraires associés, 1840, 20: 629-630.

[5] 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trans. G. A. William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5. 维达尔-纳奎对这两个段落之间的相似之处做了细致的分析，参见 P. Vidal-Naquet, "Flavius Josèphe et Masada", in *Les Juifs, la mémoire, le présent*, Paris: Maspéro, 1981, pp. 43 ff.

[6] Vidal-Naquet, "Flavius Josèphe", pp. 53 ff.

来得出判断的话)。^[7] 尽管我们知道,弗拉维乌斯·约瑟夫的作品在1050年是柯尔比(Corbie)^[8]修道院四旬斋期间的指定读物,但他的作品并未被包括在一份14世纪圣德尼修道院的修士必读书目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南吉的威廉的继承者就是这些修士当中的一员。^[9] 此外,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证明圣德尼修道院的图书馆收藏过约瑟夫的《犹太战争》的抄本。^[10] 但这位无名的编年史家能够轻而易举地查阅到这些抄本:位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收藏了许多《犹太战争》的抄本,其中一本便来自圣-日耳曼-德-普莱修道院(Saint-Germain-des-Prés)^[11]的图书馆(一份12世纪的抄本)。^[12] 我们可以认定,南吉的威廉的继承者应该熟知弗拉维乌斯·约瑟夫的《犹太战争》(或是它的一个名为“Hegesippus”的4世纪改编本)。^[13] 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维特里-勒-弗朗索瓦附近的集体自杀从未发生。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做更多工作,尽管要得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或许并不可能。

大量线索将这些发生在遥远的、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的事件,与本文副标题所表达的主题联系起来。当皮埃尔·维达尔-纳奎(Pierre Vidal-Naquet)^[14]决定在同一本书(《犹太人:记忆与当下》[*Les juifs, la mémoire, et le présent*, Paris, 1981])中重新发表《弗拉维乌斯·约瑟夫与马萨达》(“Flavius Josephus and

[7] 见 *The Latin Josephus*, ed. F. Blatt, Aarhus: Universitetsforlaget, 1958, I, pp. 15-16. 又见 Guy N. Deutsch, *Iconographie et illustration de Flavius Josèphe au temps de Jean Fouquet*, Leiden: Brill, 1986, p. xi (map).

[8] 与圣德尼修道院同位于巴黎的另一所著名修道院。——译注

[9] P. Schmitz, “Les lectures de table à l’abbaye de Saint-Denis à la fin du Moyen Age”, *Revue Bénédictine*, 42 (1930), 163-167; André Wilmart, “Le couvent et la bibliothèque de Cluny vers le milieu de XIe siècle”, *Revue Mabillon*, 11 (1921), pp. 89-124, esp. 93, 113.

[10] D. Nebbiai-Dalla Guarda, *La bibliothèque de l’abbaye de Saint-Denis en France du IX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Editions du CNRS, 1985), 关于一份 Reichenau 送至圣德尼修道院的请求,为了取得一本约瑟夫的 *Antiquitates Judaicae* (p. 61; see also *ibid.*, p. 294)。

[11] 柯尔比修道院藏书中出现的不知名的编年史,曾被错误地归在早期教会编年史家 Saint Hegesippus(约110—约180)名下。它可能是约瑟夫的作品的一个改编于4世纪的拉丁文版本。——译注

[12] B. N. Lat. 12511; cf. *The Latin Josephus*, p. 50.

[13] *Hegesippi qui dicuntur historiarum libri V*, ed. Vincentius Ussani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vol. 66) (Vindobonae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932, 1960), preface by K. Mras (关于马萨达之围,见5: 52-53, 407-417)。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十二份“Hegesippus”的手抄本,成书于10世纪与15世纪之间;见 Deutsch, *Iconographie*, p. 15。

[14] 皮埃尔·维达尔-纳奎(1930—2006),法国犹太裔历史学家。他的父母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年十四岁的他躲藏在祖母家中才逃过一劫。——译注

Masada”)和《纸糊的艾希曼》(“A Paper Eichmann”)这两篇文章时,他痛切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后一篇文章对所谓的修正主义学派进行了详尽的讨论,该学派声称,纳粹的灭绝营从未存在。^[15]在我看来,内容上的相似性——中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20世纪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不如由这两个事件引出的理论问题的相似性重要。请容我试着解释原因。

约瑟夫的作品中,描述发生在约塔帕塔和马萨达的事件的两个段落的相似之处,除了集体自杀之外,还有两人幸存:第一例中是约瑟夫和他的士兵同袍,第二例中是两个妇女。^[16]要对事件的发生提供证人,逻辑上要求至少有一人幸存,但为何是两个?我认为,在法庭上拒绝接受孤证,这项由犹太与拉丁法学传统共同分享的广为人知的惯例,解释了选择两个证人的缘由。^[17]身为一个成为罗马公民的犹太人,弗拉维乌斯·约瑟夫当然熟知这两种传统。稍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拒绝孤证变为了一条正式的法律,该法律随后被纳入查士丁尼法典。^[18]在中世纪,*testis unus, testis nullus*(一个证人便是没有证人)——化用自对《申命记》19:15中所说的 *Non stabit testis unus contra aliquem*(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的暗引——成为了一条在审判记录和法律文书中或明或暗地一再出现的准则。^[19]

让我们姑且试着想象一下,若是这样一个标准被应用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那又将如何。1348年5月发生在拉布姆的事件、1321年夏的某个时候发生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附近的事件,以及公元67年7月发生在约塔帕塔附近的岩洞的事件,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知识在每一例中都是基于单独一个、或多或少是直接的证人。更确切地说,他们分别是在现藏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博物馆的《摩西五经》的书卷上写下字句的人(被认定为达亚斯·奎诺尼),南吉的威廉的

[15] 见英译本 Pierre Vidal-Naquet, “A Paper Eichmann?” *Democracy*, April 1981, pp. 67-95。注意标题末尾的问号,这在原来的法文版中是没有的。

[16] 维达尔-纳奎提到玛丽亚·达拉基(Maria Daraki)的解释(*Les Juifs*, p. 59, n. 48),她提出前一例中的相似情形应归因于那个指责了约瑟夫和他的同伴的妇女。在我看来这种解释的说服力较弱。

[17] Hendrik Van Vliet, *No Single Testimony*. *Studia Theologica Rheno-Traiectina* 4, Utrecht: Rijkuniversiteit, 1958. 维达尔-纳奎从普遍的(或者说是逻辑的)观点出发强调了多于一个证人的优越性,见 *Les Juifs*, p. 51。

[18] Van Vliet, *No Single Testimony*, p. 11.

[19] 例如,见 Anne Libois, “À propos des modes de preuves et plus spécialement de la preuve par témoins dans la juridiction de Léau au X^e siècle”, in *Hommage au professeur Paul Bonenfant (1899-1965)*, Brussels: Universa, 1965, pp. 532-546; 539-542。

继承者,以及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没有哪个通情达理的历史学家会将这种证据视为本质上不可接受而予以舍弃。根据通常的历史学实践,每一份文献的价值都必须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检验——也就是说,通过建立一个至少包含两份文献的序列。但是让我们姑且假定,南吉的威廉的继承者对维特里-勒-弗朗索瓦附近的集体自杀的描述,仅仅是约瑟夫的《犹太战争》的反响。即便所谓的集体自杀的事实性最终灰飞烟灭,这段描述本身仍将给我们提供关于14世纪早期约瑟夫的作品在巴黎大区(Île-de-France)的接受情况(这同样是一桩“事实”,除了对死板的实证主义者来说)的一份宝贵证据。

看起来,法学和历史学有着不同的规则和认识论基础,这些规则和基础并不总是保持一致。因此,法学原则不能被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历史研究中去。^[20] 这样的结论看似会与像弗朗索瓦·布杜瓦(François Baudouin)这样的16世纪学者所强调的二者之密切相近发生抵触。这位法律史学家庄严地宣称,“历史研究必须被建立在坚实的法学基础之上,而法理学必须与历史相结合”^[21] 从与古典研究相关的另一个视角,耶稣会士亨利·格瑞菲(Henri Griffet)在他的*Traité des différentes sortes de preuves qui servent à établir la vérité de l'histoire*(《论可能由之获取历史真实的多类证据》,1769)中将历史学家比作一个在法庭上检验不同证人的可靠性的法官。^[22]

这样一种类比在今天毫无疑问已经过时。许多历史学家可能会对至关重要的*preuves*,即格瑞菲的标题中的“证据”一词产生某种窘迫之情。但近来的一些讨论表明,证据、真实,以及历史之间的联系是不能被轻易舍弃的。

我已提到过《纸糊的艾希曼》,一篇皮埃尔·维达尔-纳奎写来驳斥由罗伯特·弗利松(Robert Faurisson)等人提出的臭名昭著的论点的文章;那些人宣称,

[20] 关于这个题目,可见 Paul Peeters 的相当粗略的评论《历史批评中的法律格言》(“Les aphorismes du droit dans la critique historique”,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Bulletin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32, 1946, p. 82 ff. 见 pp. 95-96, 关于 *testis unus, testis nullus* 的部分)。

[21] François Baudouin, *De institutione historiae universae et ejus cum jurisprudentia conjunctione, prolegomenon libri II*, 引自 Donald R. Kell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16。(这整本书都很重要。)

[22] 我使用的是第二版(Liège, 1770 edition) 在《历史学家与历史证据》(*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New York: Scribner's, 1926)一书中,阿兰·约翰逊(Allen Johnson)敏锐地强调了这篇短文的重要性。我引用的是1934年的纽约版,第114页。约翰逊将它封为“自 Mabillon 的 *De re diplomatica* 之后最重要的方法论著作”。又见 A.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Rome: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79, p. 81。

纳粹的灭绝营根本就不存在。〔23〕 这篇文章已在一本小书《记忆的杀手》(*Les assassins de la mémoire*)中再版,维达尔-纳奎将此书献给了他在1944年死于奥斯维辛的母亲。我们很容易想象促使维达尔-纳奎投入一场包含大量细节的讨论——除其他东西以外,还包括对有关毒气室的证据(证人、技术上的可能性,等等)的严谨分析——的道德和政治动机。维达尔-纳奎在一封写给卢斯·吉拉(Luce Giard)的信中清楚阐明了另一些更为理论化的意图。这封信于几年前在一本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纪念文集中发表。维达尔-纳奎写道,塞尔托出版于1975年的论文集《历史的写作》(*L'écriture de l'histoire*)是一本重要著作,有助于消解历史学家引以为自傲的单纯无瑕。“从那之后,我们已逐渐意识到历史学家是在写作;意识到他是在制造空间与时间,其自身本质上却被置于一个特殊的空间与时间之中。”维达尔-纳奎接着说,但我们不应舍弃像一个世纪之前兰克所吁求的,那种意味着“如其所是”的旧有的“真实”(reality)概念。

当弗利松事件开始的时候(不幸它仍在继续),我对所有这一切都很关注。自然,弗利松的态度与塞尔托截然相反。前者是个顽钝的唯物主义者,以最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的名义将他处理的一切事物——痛苦、死亡、制造死亡的工具——转化为某种不真实之物。塞尔托被这种不合情理的愚蠢深深触动了,并且就此写了一封信给我……我认识到,有一场关于毒气室的讨论正在进行,而每一事物都必定会几经曲折而成为某一话语(*mon sentiment était qu'il y avait un discours sur les chambres à gaz, que tout devait passer par le dire*);然而在这之外,或者说在这之前,存在着某些不可化约为话语的东西,不论好坏,我将会继续把它叫做真实。没有这个真实,我们如何能够分辨虚构与历史?〔24〕

在美国,这个关于虚构与历史之间的区分的问题似乎常常是源于海登·怀

〔23〕 见 R. Faurisson, *Mémoire en défense. Contre ceux qui m'accusent de falsifier l'histoire. La question des chambres à gaz*, preface by Noam Chomsky, Paris: La Vieille Taupe, 1980。

〔24〕 Michel de Certeau, ed. Luce Giard, Paris: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1987, pp. 71-72. 从维达尔-纳奎那里我们得知,是双方参与对弗朗索瓦·哈托格(François Hartog)的文章的公开讨论引起了这次通信。哈托格的文章稍后以《希罗多德之镜》为题出版(*Le miroir d'Hérodote*, Paris: Gallimard, 1980)。对哈托格这篇文章的某些含义的探讨,见我为娜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意大利文版所撰写的后记(*Prove e possibilità*, in *Il ritorno di Martin Guerre*, Turin: Einaudi, 1984, pp. 143-145)

特的研究工作,或者至少与之有联系。很明显,这两位作者的历史学实践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在怀特的《元史学》(*Metahistory*, 1973)和塞尔托的《历史的写作》(包含了一些早先出版过的文章)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点。为充分理解海登·怀特的贡献,似乎必须首先简单勾勒出他的思想传记的大致轮廓。^[25]

1959年,在把卡洛·安东尼(Carlo Antoni)(克罗齐最密切的追随者之一)的著作《从历史主义到社会学》(*Dallo storicismo alla sociologia*)的英译本引介给美国读者时,海登·怀特将克罗齐青年时代的文章《涵盖在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La storia ridotta sotto il concetto generale dell’arte”,英译“History subsumed under a general concept of the arts”)称为一项“革命性的”贡献。^[26]这篇文章发表于1893年,当时作者27岁。克罗齐自己已在他的思想自传(《自我评论》[*Contributo alla critica di me stesso*],英译“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Myself”)中强调过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后来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同样强调了这一点。^[27]《元史学》中关于克罗齐的一章包含了对《涵盖在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的详细讨论^[28],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时隔16年,怀特对这篇文章的赞赏已经大为冷淡了。他声称,他依然同意克罗齐文章中某些关键性的论点,例如在历史研究(被看作是纯粹预备性的行为)和真正的历史(被等同于叙事史)之间做出的截然两分。但接着他便如此总结道:

很难不去将克罗齐在历史感受力中的“革命”看作是一次倒退,因为它的后果是令历史学同参与建构一门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努力断绝关系——那时这种努力才刚刚开始在社会学上有一些进展。但是对历史学家关于他们工作中艺术性的那一面的想法来说,它的含义甚至更加有害。因为,尽管克罗齐正确地将艺术理解为一条认识世界的途径,而非仅

[25] 下文所做的探讨基于海登·怀特已出版的作品。他在UCLA的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已收入本读本)显示了一种不那么严格(但相当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

[26] Carlo Antoni, *From Historicism to Sociology*, trans. Hayden Whit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with a preface by White, “On History and Historicism” (pp. xxv-xxvi). 参校 Bruce Mazlish 的书评, 见 *History and Theory* 1 (1960), pp. 219-227。

[27] Benedetto Croce, *Contributo alla critica di me stesso*, Bari: Laterza, 1926, pp. 32-33;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91ff. (rev. ed., 1993).

[28] Hayden V.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81-288; Benedetto Croce, *Primi saggi*, Bari: Laterza, 1927, pp. 3-41.

仅是对它的物质性(physical)反应或直接经验,他将艺术作为对现实的如实(literal)表现的看法却卓有成效地将作为艺术家的历史学家从最晚近的(并且日趋居于主导地位的)在表现意识的不同层面上所取得的进步中孤立出来,这一进步是由遍布全欧的象征主义者和后印象主义者们所促成的。〔29〕

这段话业已指明了海登·怀特日后工作中的一些要素。自从写作《元史学》以来,他对于建设“一门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少,而对于历史学家“工作中艺术性的那一面”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多——一个与克罗齐反对实证主义的长期斗争相距不远的转变,那场斗争所引起的东西便包括克罗齐对社会科学的轻蔑。但是在《元史学》中,克罗齐已不再具有他在怀特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一度拥有过的那种决定性影响。毫无疑问,怀特对克罗齐的评价依然很高。他仍将克罗齐称为“这个世纪所有历史哲学家中最天才的历史学家”,甚至在全书的最后一页,他还盛赞了克罗齐所谓的“反讽”态度。〔30〕但以上所引的整体性评价表明他对克罗齐的理论立场存在着重大异议。

正如我们所见,怀特对克罗齐思想的不满集中在他的“将艺术作为对现实的如实表现的看法”——换句话说,是集中在他的“实在论的”(realism)态度上。〔31〕该术语在这个语境下有着认知的、并非纯然是美学的意味,当被用来描述一位像克罗齐这样的新唯心主义哲学家时,听上去可能有点矛盾。但是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相当独特:“批判实证主义”(critical positivism)这样一个被他最高明的批评者之一贴上的标签似乎更加贴切。〔32〕唯心主义一度在克罗齐思想中有明显的体现,这必须追溯到乔瓦尼·金蒂利(Giovanni Gentile)对他施加的强烈影响,他与金蒂利之间紧密的思想纽带维系了二十年。〔33〕在他为自己的《作为纯粹概念的科学的逻辑学》(“Logica come scienza del concetto puro”,英译本为“Logic as the science of pure concept”,1909)增加的一条注释中,克罗齐对他自

〔29〕 White, *Metahistory*, p. 385. (本段译文参考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译注)

〔30〕 White, *Metahistory*, pp. 378, 434.

〔31〕 Ibid., p. 407.

〔32〕 Eugenio Colomi, *L'estetica di Benedetto Croce: Studio critico*, Milan: La Cultura, 1932.

〔33〕 克罗齐与金蒂利的通信从这个角度看来非常具有启发性:见 Benedetto Croce, *Lettere a Giovanni Gentile, 1896-1924*, ed. Alda Croce, introd. by Gennaro Sasso, Milan: Mondadori, 1981。

己思想的发展进行了回顾性重构:始于《涵盖在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直到最近他在乔瓦尼·金蒂利的影响下(“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研究工作从他的帮助和启发中获益良多”)认识到的历史学与哲学的同一性。^[34]然而,一些年后,这种同一性当中的内在歧异性(总的来说,还有在克罗齐与金蒂利的理论之间所谓的共同点中存在的内在歧异性)便充分显露出来了。^[35]通过将哲学解释为“历史学的方法论”,克罗齐似乎是将前者消解在了后者之中。金蒂利则反其道而行。“不包含事实的观念是空洞的”,1936年,他在他的《征服历史中的时间》(*Il superamento del tempo nella storia*,英译为“The overcoming of time in history”)中写道,“不是历史学的哲学是最徒劳的抽象。但事实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客观时刻的生命,舍此之外便不存在任何真正有建设性的思想。”他强调,历史事实(*res gestae*)“绝不能是历史学(*historia rerum gestarum*)的前提条件”。金蒂利强烈反对“历史的形而上学理论(或历史主义),它直接基于历史写作以历史事实为前提的观念,这个观念与其他的形而上学观念同样荒谬,并且孕育了更糟糕的后果;因为没有哪个敌人像已经设法潜入你的房子并藏在那里的敌人那么危险”。^[36]

通过将并未直言其名的“历史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历史主义等同起来,金蒂利回应了克罗齐新近发表的一篇反法西斯主义的论战文章《反历史主义》(“An-

[34] 见 Benedetto Croce, *Logica come scienza del concetto puro*, Bari: Laterza, 1971, pp. 193-195。又见 Giovanni Gentile, *Frammenti di critica letteraria*, Lanciano: Carabba, 1921, pp. 379ff. (对克罗齐的 *Il concetto della storia nelle sue relazioni col concetto dell'arte* [1897] 的评论)。在对克罗齐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的 1897—1900 年间,金蒂利对克罗齐的影响可从以下材料来判断:金蒂利的 *Lettere a Benedetto Croce*, ed. Simona Giannantoni (Florence: Sansoni, 1972), vol. 1., 又见 Giuseppe Galasso 为克罗齐所作的附录, *Teoria 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Milan: Adelphi, 1989), pp. 409ff。

[35] 在此我进一步发挥了 Piero Gobetti 的许多机智的评论(见“Cattaneo” in Gobetti's *Scritti storici, letterari e filosofici* [Turin: Einaudi, 1969], p. 199 [初版于 *L'Ordine nuovo*, 1922])。

[36] Giovanni Gentile, “The Transcending of Time in History”, in Raymond Klibansky and H. J. Paton, eds., *Philosophy and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Ernst Cassir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p. 91-105; 95, 100. 三十年前,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在一封给克罗齐的信中以令人惊异的相似用语描述了克罗齐与金蒂利之间的关系,见 A. Labriola, *Lettere a Benedetto Croce, 1885-1904* (Naples: Nella sede dell'Istituto, 1975), p. 376 (2 January 1904): “我不明白为什么金蒂利——他以僧侣的风格猛烈抨击这个堕落的世界——没有致力于这桩善行(因为他的家中有着魔鬼),使得尤其是你皈依。”关于金蒂利对克罗齐的影射,见下一条注释。

tisticismo”)。〔37〕金蒂利的文章的理论核心重新回到了他的《作为纯粹行动的精神的普遍理论》(*Teoria generale dello spirito come atto puro* [1918])，那是对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Teoria 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1915])一书的回应。〔38〕但到了1924年，这两位老友之间的哲学争论本身已转化为苦涩的政治敌对与私仇。

这一明显的离题是为了澄清以下几点：

(1) 只有考虑到他职业生涯早期阶段所受意大利哲学新唯心主义的影响，才能理解海登·怀特的思想发展。〔39〕

(2) 怀特在他出版于1978年的论文集《话语的转义》(*Tropics of Discourse*)中所提出的“转义的”路径仍旧显示出克罗齐思想的影响。1972年，怀特谈论克罗齐时说：

从他对历史知识的认识论基础的研究转向这样一种立场，在其中寻求

〔37〕 G. Gentile, “Il superamento del tempo nella storia”, in *Memorie italiane e problemi della filosofia e della vita*, Rome, 1936, p. 308: “La metafisica storica (o storicismo)…”; 该文曾出现在 *Rendiconti della R.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classe di scienze morali*, ser. 6, vol. 11 (1935): 752-769. 括号中的话(“或历史主义”)未见于数月前出版的英文版(“The Transcending of Time in History”)(编辑的序言所署的日期是“1936年2月”)。此处缺少的语句可能是在克罗齐的文章“Antistoricismo”(1930年在牛津的讲演,但后来才在 *Ultimi saggi*, Bari: Laterza, 1935, pp. 246-258 发表)出版之后才加上的。金蒂利于1935年11月17日在 Accademia dei Lincei(1603年建立于罗马,1870年代成为意大利国家学院。——译注)发表了讲演,在1936年4月2日给出了修订过的校样。克罗齐对收在《哲学与历史》(*Philosophy and History*)中的文章的反应,见《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La storia come pensiero e come azione* [1938], Bari: Laterza, 1943, pp. 319-327,这一部分在斯普里吉[Sylvia Sprigge]翻译的英文版《作为自由的故事的历史》[*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New York: Norton, 1941]中缺失了);在第322页我们发现提及金蒂利的带有敌意的句子(“一种乌七八糟的神秘化倾向……”[“a murky tendency to mystification…”])。又见同书中关于“作为从历史中的解放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 as Liberation from History…”)的部分(“History”, pp. 43-45; *La storia*, pp. 30-32: “我们是过去的产物,并且浸淫在过去之中而生存,过去从四面八方挤压着我们……”[“We are products of the past and live immersed in the past, which all around presses upon us…”])。金蒂利的唯心主义要远为激进并自我一致,他声称过去(同样还有时间)是纯粹抽象的概念,在实在的精神生活之中被征服(“The Transcending of Time”, pp. 95-97)。Cesare Garboli, *Scritti servili* 一书注意到了此文的重要性(Turin: Einaudi, 1989), p. 205

〔38〕 见 G. Gentile, *Teoria generale dello spirito come atto puro* (1916), 2nd rev. and enlarged ed., Pisa: Mariotti, 1918, pp. 50-52; *The Theory of the Mind as Pure Act*, London: Macmillan, 1922。

〔39〕 我并非是要提出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单线式的因果联系。毫无疑问,怀特对意大利新唯心主义的反应披着十足的美国色彩。但即便是佩里·安德森在他于UCLA的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p. 65)的结尾所暗指的怀特的实用主义,无疑也是被可从克罗齐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作为纯粹概念的科学的逻辑学》)中辨识出来的实用主义趋势(以 Giovanni Vailati 为中介)所加强。

将历史学置于艺术的普遍概念之下。反之,他的艺术理论被构造为一门“表现和一般语言学的科学”(他的《美学》[*Aesthetics*]的副标题)。在他对所有理解现实的可能模式的语言基础的分析之中,他距离领会到一般解释在实质上乃是转义的这一点最为接近。他没能建立这一触手可及的观念,最可能的原因是受到了他自己对所有人文科学体系的那种“反讽的”怀疑的阻碍。^[40]

这一路数始于克罗齐,但继而去往了一个全然相异的方向。当我们读到“转义是这样一个过程,所有话语由此建构了(黑体为原文所有)它假装只是在如实描述并客观分析的对象”(《话语的转义》[1978]导言中的一段话)的时候^[41],我们辨认出了前述对克罗齐的“实在论”的批判。

(3)毫无疑问,与米歇尔·福柯的作品的接触,强化了怀特的这一主观主义的立场。但意味深长的是,怀特试图通过乔万巴蒂斯塔·维柯——意大利哲学新唯心主义的所谓创始人,来对福柯进行“解码”。^[42]事实上,怀特关于话语创造了它自己的对象的论断,似乎是在老调重弹(尽管有一处重要不同,详下):克罗齐对于表现和一般语言学的强调,与金蒂利那种意味着历史学(*historia rerum gestarum*)创造了它自己的对象——历史事实(*res gestae*)——的极端主观主义的结合。“Le fait n'a jamais qu'une existence linguistique”(“事实不过是一个语言学上的存在”):这句怀特在《形式之内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 1987)中用作题记的巴特的话,可归因于我刚才谈到的这种对克罗齐和金蒂利的想象中的结合。甚至怀特在1980年代早期对巴特的阅读(《话语的转义》中还几乎未提及他)^[43],也不过是强化了一个既存的范式。

对怀特思想发展的这一重构中,有一个因素是成问题的,那就是金蒂利所扮演的角色。至少就我所知,怀特从未研究过他的作品,甚至从未提到过他(有一次重要的例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但作为一个通过安东尼而接触到意大利新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学者,我们尽可以假定怀特熟悉金蒂利的学

[40] 见 H. White, “Interpretation in History” (1972-1973), in *Tropic of Discour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75.

[41] *Ibid.*, p. 2.

[42] “Foucault Decoded” (1973), in *ibid.*, p. 254.

[43] 巴尔特只在人名索引中出现了一次;但是在第24页注释2中,提到了巴尔特与其他一些在修辞学领域做研究工作的学者,如 Kenneth Burke, Gérard Genette, Umberto Eco 和 Tzvetan Todorov.

说。(另一方面,必须排除巴尔特对金蒂利的学说具有直接知识的可能性。巴尔特在塞尔托的学说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解释——但仅仅是部分地——后者与海登·怀特之间不完全的趋同。)

金蒂利毕生与法西斯主义联系紧密,直至他死于非命,这已经多少(至少在意大利以外)让他哲学生涯的最初阶段有些晦暗不清了。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信奉是直接阅读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著作的结果(*La filosofia di Marx*, 1899)。^[44]在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的分析中,金蒂利通过维柯的著名论断 *verum ipsum factum* (真理本身是被制造的)——或者不如说是通过对它的唯心主义解释——来解释马克思的实践。实践因而被视为一个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概念,因为正是精神(先验的主体)创造了实在。^[45]就连金蒂利更晚期的论断——历史学创造历史,也不过是这项原理的推论。这种将马克思表述为一个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的做法对意大利的思想和政治生活产生了久远影响。诚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他的《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里使用像是“实践哲学”这样的表述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是在试图避过法西斯审查制度。但他也是在重复金蒂利第二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的标题(“*La filosofia della praxis*”),同样,更要紧的是,他还重复了金蒂利对“实践”的强调,而这一概念削弱了——几乎到了要将其抹杀的地步——作为马克思思想关键要素的唯物主义。已有人发现,葛兰西早年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还含有其他重复金蒂利对马克思的解释的因素。^[46]有人甚至认为,《狱中札记》中那个广为人知的、认为金蒂利的哲学比克罗齐的哲学更接近未来主义(Futurism)的段落,意味着对金蒂利的正面评价:难道葛兰西不是在1921年将未来主义视作一场能够回应对“艺术、哲学、行为、语言的新形式”的需要的革命运动吗?^[47]克罗齐也从一个自由—保守派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视

[44] G. Gentile, “La filosofia della praxis”, in *La filosofia di Marx; Studi critici*, Pisa: Spoerri, 1899, pp. 51-157; 这本书题献给克罗齐。今见 Eugenio Garin 在他所出版的金蒂利的 *Scritti filosofici*, 2 vols. (Milan: Garzanti, 1991) 中所写的内容详尽的导言。

[45] Gentile, “La filosofia della praxis”, pp. 62-63.

[46] 关于第一个论点,见 Giancarlo Bergami, *Il giovane Gramsci e il marxismo*, Milan: Feltrinelli, 1977; 关于第二个论点,见 Augusto Del Noce, *Il suicidio della rivoluzione*, Milan: Rusconi, 1978, pp. 121-198 (“Gentile e Gramsci”)。

[47] 见 Salvatore Natoli, *Giovanni Gentile filosofo europeo*,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1989, pp. 94ff. (多少有些肤浅); a propos A.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ed. Valentino Gerratana, Turin: Einaudi, 1975, 3:2038. 关于葛兰西对未来主义的观点,见 *Socialismo e fascismo: L'Ordine Nuovo*, 1919-1922, Turin: Einaudi, 1966, pp. 20-22。

角,隐隐约约地提到了存在于金蒂利的哲学和未来主义之间的类似的紧密关系,不过他是把二者都当作了“反历史主义”的反面教材。^[48]

按照从左翼视角对金蒂利的作品(或至少是他的一部分作品)进行的解读,自从《历史学的重负》以来便能在海登·怀特的作品中察觉到的、那种准金蒂利主义的味道便显得不那么自相矛盾了。^[49] 该文是他于1966年以现代主义的调子发出的对一种新历史学的呼吁。人们很容易理解这一对自由主义正统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攻击所产生的影响(同样还有它内在的缺陷)。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主观主义(甚至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带有确切无疑的激进色彩。但如果把渴望(desire)当作一个左翼的口号,则真实(reality)(包括对“真正的事实”的强调)看起来毫无疑问是属于右翼的。这样一种简单化的(更不用说是自我拆台的)观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取代了——就当下背离真实的态度当然不会只限于某些左翼派别而言。想要解释甚至是存在于学术界之外的、当今人们对于怀疑主义意识形态的超乎寻常的渴求,就得将这一事实纳入考虑。同时,海登·怀特宣称,他“反对各种革命,无论是从社会等级中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50] 在一条脚注中他解释说,这一论点源自以下事实:“不少理论家都把我经常被控持有的相对主义观点理解为是意味着一种虚无主义,而这种虚无主义招致了某种尤其不负责任的革命行动主义。在我看来,相对主义是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在道德上的对等物;而且,我将相对主义理解为社会宽容的基础,而不是一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许可证。”^[51]

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宽容:怀特的思想的这一自我展示,乍看起来与金蒂利的理论观点之间的距离似乎是远得不能再远了。金蒂利对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攻击^[52] 不含任何怀疑主义的意味,因为他的哲学立场意味着一个超验的精神,而非经验主体的多样性。^[53] 他从来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极力宣扬一种宗教式的担当(commitment),在理论和政治问题上都绝不妥协。^[54] 而

[48] B. Croce, "Antistoricismo", in *Ultimi saggi*, pp. 246-258.

[49] White, *Tropics*, pp. 27-80.

[50] *Idem*,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3.

[51] *Ibid.*, p. 227n12.

[52] 本文于1992年发表的旧版,此处还有一句从金蒂利文中摘录的引文:“历史科学以‘事实’、那实实在在而坚硬的实在而自矜,将其与缺乏客观有效性的纯粹观念或理论对立起来;这样的历史科学是生活在童稚的幻觉世界中。”——译注

[53] Gentile, "The Transcending of Time", p. 99.

[54] 例如见 G. Gentile, "Caratteri religiosi della presente lotta politica", in *Che cosa è il fascismo: Discorsi e polemiche*, Florence: Vallecchi, 1924 (actually 1925), pp. 143-151.

且他当然从未从理论上阐述过宽容，就像他对法西斯主义——包括黑衫党（*squadristo*），它最为暴力的一面——的支持所显示的那样。^[55] 将惩罚队的棍棒描述为一种可与布道相比拟的“道德力量”，这一臭名昭著的说法——金蒂利在1924年选战中的一次讲演时所说的话^[56]——与他严格的一元论相一致：在一个由精神创造的现实之中，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区分。

这些理论分歧并非无关紧要。任何假设金蒂利的路径与怀特的路径在思想上相近的论点都必须将这些重大差异纳入考虑。因此我们或许会感到奇怪，怀特是出于什么理由而在他的文章《历史解释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中强调，他自己的历史观和“那种惯常是与法西斯政权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历史观”有一些共同之处，而同时他又将法西斯政权的“社会和政治政策”斥为“不可否认是可憎的”。

这一清晰可见的矛盾将我们引向了怀特的路径中所暗含的道德困境。“我们必须防止”，他说，“会使我们仅仅因为这样一种历史观曾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便对其不屑一顾的感情用事。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当事关对历史记录的理解时，在历史记录本身之中找不到理由来选择某一种而非

[55] 例如见题名为“La violenza fascista”的部分，in *Che cosa è il fascismo*（一篇于1925年3月8日在佛罗伦萨发表的演讲），pp. 29-32。

[56] “国家和个人……是同一的；统治的艺术就是令这二者和谐并且等同的艺术，所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与最大限度的公共秩序是相合的……因为最大限度的自由总是与最大限度的国家公共力量相合。哪种力量？那些不欢迎这种力量的观念的人热衷于在这个领域内作出区分；无论如何，这种力量的观念对于国家必不可少，因此对于自由也一样。他们把道德力量与物质力量区分开来：把由自由投票表决并且自由地被接受的法律的力量，与严酷地抵触公民意志的暴力的力量区分开来。多么率直的划分，如果它是真诚地做出的！每一种力量都是道德力量，因为它总是意志的表达；不论怎样使用一项主张——布道还是胁迫——它的功效只能是最终取得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支持以及说服他同意的能力。”（引自 G. Gentile, *Making the Fascist State*, trans. H. W. Schnei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 347）这篇于1924年3月31日在帕勒莫做出的演讲首次发表在 *La nuova politica liberale* 2（1924年4月2日）这样的刊物上。当它于一年之后再版时，经历了 Matteotti 危机及其暴力的结局（Giacomo Matteotti [1885. 5. 22—1924. 6. 10]，意大利社会主义政治家。1924年5月30日，他在议会公开指责法西斯党在选举中使用暴力来获得选票的行为。十一天后他被法西斯主义者绑架并且杀害。——译注），已得到“棍棒哲学家”这样一个头衔的金蒂利插入了一条窘迫而又傲慢的注释。在这条注释中，他澄清道，他意图在其中辨认出道德重要性的力量只有一种，就是属于国家的力量，对它来说，法西斯主义特攻队的棍棒是危急时刻的必要工具；见金蒂利，*Che cosa è il fascismo*, pp. 50-51。金蒂利的论证并非特别具有原创性；例如见 B. Mussolini, “Forza e consenso”, *Gerarchia* (1923) (in *Opera omnia*, ed. Edoardo and Duilio Susmel, Florence: La Fenice, 1956, 19:195-196)。

另外一种赋予其意义的方式”。^[57] 没有理由？事实上，在讨论弗利松对灭绝犹太人的事件的解释的时候，怀特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一个标准，我们必须依据它来评判相互矛盾的历史解释的可信性。让我们看一看他的论证。

怀特的上述论断是基于(1)克罗齐在《涵盖在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中主张的“‘实证的’历史研究”与“真正的历史”——即叙事——之间的区分(更恰当地说,是截然两分);(2)对这一区分的怀疑主义解释,在许多方面与金蒂利超验的主观主义相近。在怀特对维达尔-纳奎驳斥弗利松的文章——前者在“实证历史学的领域内”驳斥了弗利松在灭绝犹太人一事上的“谎言”——的回应之中,能够同时发现这两种元素。弗利松的主张“在道德上是冒犯性的,思想上也混乱不堪”;但“谎言”这一概念,鉴于它涉及像“真实”和“证据”这样的概念,显然是一个使怀特困窘的缘由,就像这个异常别扭的句子所显示的:“对于档案材料不像大屠杀那样丰富的历史事件来说,在谎言与解释中的错误或者失误之间做出区分可能更加困难。”其实,即便是在大屠杀的例子,怀特也无法接受维达尔-纳奎的结论,即认为“在一个会‘深刻地改变大屠杀的真实性’的解释与并非如此的解释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以色列的解释将事件中的‘真实性’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然而,修正主义者的解释通过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描述它,使之成为了与受害者们所知的大屠杀不同的东西,从而把它的真实性给抹去了。”^[58]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大屠杀的解释,怀特说,不是非真(*contre-vérité*, 就像维达尔-纳奎所认为的那样)而是真(*truth*):“它作为历史解释之为真,恰恰在于它在正当化以色列当前各种政治政策时的有效性,从那些政策制定者的立场看来,这对犹太民族的安全、特别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同样地,“巴勒斯坦民族要对以色列的政策作出政治上有效的回应,就要创造出同样有效的意识形态,要有对于他们历史的一种能够赋予其迄今为止所阙如的某种意义的解释,才能让这种意识形态完备起来。”^[59]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如果弗利松的叙述在任何时候能被证明是有效的,它将被怀特认为同样是真的。

这一结论是宽容态度的结果吗?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怀特坚持他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能够为宽容提供认识论的和道德的基础。^[60] 但这个主张在

[57]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1982),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p. 74-75.

[58] *Ibid.*, p. 77. 法文版未作粗体。

[59] *Ibid.*, p. 80. 此处的粗体是我加上的。

[60] *Ibid.*, p. 227n12.

历史上和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说,因为宽容的理论化是经由那些有着顽强的思想和道德信念的人们之手(伏尔泰的名言“我将为保卫我的对手的言论自由而战”,就是一个典型)。从逻辑上说,因为绝对的怀疑论将会与它自身相矛盾,如果它没有扩展到同样将宽容作为一条范导性原则包括进来。另外,当道德上和理论上的差异不是最终与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不会有任何可被施以宽容之物存在了。^[61]事实上,怀特把‘真’与有效性联系在一起的观点,难免令我们想起的东西不是宽容,而是它的反面——金蒂利将棍棒褒扬为一种道德力量的言论。在同一篇文章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怀特请求我们在排除了“感情用事”的情况下去考虑他所暗中褒扬的历史观与“法西斯政权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他将这种联系称作是“惯常”的。但在这种语境下提及金蒂利的名字(与海德格尔的名字一起)似乎却并非纯属惯常。^[62]

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我们所谈论的这种怀疑主义态度,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了。这一广泛的扩散仅部分地与它们所谓的新奇性有关。对皮埃尔·维达尔-纳奎来说,这样的话不过是一句颂词:“从那(例如1975年米歇尔·德·塞尔托的《历史的书写》问世)之后,我们已逐渐意识到历史学家是在写作;意识到他是在制造空间与时间,其自身本质上却被置于一个特殊的空间与时间之中。”因为维达尔-纳奎非常清楚地知道,相同的观点(有时引向了怀疑主义的结论),举例来说,已在卡尔(E. H. Carr)出版于1961年的一部并不是特别大胆的方法论著作《什么是历史?》中被有力地强调了,同样也被克罗齐在更早之前强调过了。

从历史的视角去审视这些问题,我们会更好地把握它们的理论蕴涵。我会建议以里纳托·塞拉(Renato Serra)的一篇短文作为起点。这篇文章写于1912年,却迟至1927年才发表,在作者已于1915年英年早逝之后。文章的标题《开往利比亚的士兵团体》(“Partenza di un gruppo di soldati per la Libia”,英译“The departure of a group of soldiers for Libya”)^[63]只给出了一个非常含糊的内容大意。它的开篇是一段描述,以令人想起同时期翁贝托·波齐奥尼(Umberto Boccioni)的未来派绘画的大胆的实验风格,描写了一座火车站,里面满是整装待发

[61] 我应该感谢 Stefano Levi Della Torre, 他为这里的最后一点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想法

[62]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p. 74.

[63] 见 R. Serra, *Scritti letterari, morali e politici*, ed. Mario Isnenghi (Turin: Einaudi, 1974), pp. 278-288. Cesare Garboli (*Falbalas*, Milan: Garzanti, 1990, p. 150) 已对塞拉的文章做了类似的解释。

的士兵和汹涌的人潮。^[64] 这时插入了一系列反社会主义的评论,接着是对历史和历史写作的反思,而它又突然引向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充满了尼采式回响的段落。这篇未完成的短文当然值得我们对其做更长、更深入的分析。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人的复杂人格:除了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意大利批评家之外,他还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哲学意趣的博学者。在与克罗齐的通信中(他与克罗齐私交甚笃,但并不是后者的追随者),他解释了我们在此谈论的篇章的缘起。^[65] 它们是由克罗齐的一篇文章《历史、编年史与伪历史》(“*Storia, cronaca e false storie*”, 1912)引出的,该文后来以修订过的形式收入了后者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Teoria 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克罗齐提到过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强调的,在一个实际事件(如一场战争)与片断的、歪曲的回忆(历史描述便根据于此)之间的断裂。托尔斯泰的观点是广为人知的:只有收集每一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战争的个人(甚至是最卑微的士兵)的记忆,才能克服这一断裂。克罗齐把这种见解以及其中似乎包含的不可知论视为荒谬的而加以拒绝。“在每一时刻,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全部历史”;因此,我们所不知道的历史便等同于“物自体的永恒幽灵”。^[66] 在写给克罗齐的信中,塞拉反讽地自命为“物自体的奴隶”,说他感觉与托尔斯泰更加亲近;然而,他补充道:“我的困难是——或者至少看上去如此——复杂得多的。”^[67] 我们不能不同意他的看法。“有那么一些幼稚的人,他们真诚地相信文献能够表现真实……好像文献能够表达什么与其本身不同的东西……一份文献是一个事实。战争是另一个事实(无数的其他事实)。这二者不能成为一体……做出行动的人是一个事实。讲述故事的人是另一个事实……每一份见证都仅仅是对它本身的见证;是对它当下的时刻、对它自身的起源、对它自身的意图的见证,而再不是对其他任何东西的见证了。”^[68]

这不是由一个纯理论家做出的反思。塞拉是一个相当博学广识的人。他犀利的批判并没有人为地将历史叙述与它们所赖以构建的材料对立起来。塞拉充分意识到了,任何文献,无论有多么直接,它们与真实之间的关系都始终问

[64] 例如,见著名的(但不是唯一的例子) *Triptych (Those who depart, etc.)*, 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65] 见 R. Serra, *Epistolario*, ed. Luigi Ambrosini, Giuseppe De Robertis, and Alfredo Grilli (Florence: Le Monnier, 1953), pp. 454ff.

[66] B. Croce, *Teoria 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Bari: Laterza, 1927), pp. 44-45.

[67] Serra, *Epistolario*, p. 459 (1912年11月11日)。

[68] Serra, *Scritti letterari*, p. 286.

题重重。但真实(“物自体”)是存在的。^[69]

塞拉明确地拒绝简单的实证主义态度。但他的思想同样有助于我们拒绝一种结合了实证主义(换句话说,基于对文献的字面解读的“实证的历史研究”)与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基于比喻的、不可比较且无法反驳的解释的“历史叙事”)的观点。^[70]事实上,本文之前所探讨过的那些以孤证为基础的叙事,可被看作是驳斥了这种截然两分的实验性案例:对可获得的证据的不同解读直接影响到了作为结果的叙事。可以假定在普遍层面上存在一种相似的,尽管通常并不如此显明的关系。因此,一种对历史叙事的漫无节制的怀疑主义态度是没有根基的。

关于奥斯维辛,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写道:

假设有一场地震,不仅摧毁了生命、建筑、物品,还摧毁了用于直接或者间接地测量地震强度的仪器。不可能对它进行定量测量这一事实,并不会阻止极其强大的地震力的观念在幸存者的精神中形成,却反而会激起这种观念……与奥斯维辛相关,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了(它只能够是一个象征而非一桩事实),那就是事实、承载了**此处**和**此刻**的踪迹的见证、表明了对事实的感受(或多种感受)的文献,还有名字,最终是多种多样的语词(这些语词的结合制造了真实)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尽可能彻底地毁灭了。难道这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去考虑不仅仅是损害,而且还有错误?不仅仅是真实,而且还有元真实(meta-reality),即对真实的摧毁?……它的名字(奥斯维辛)标志了历史学知识目睹其能力受到质疑的界限。^[71]

最后这句话说得对吗?对此我并不全然确定。记忆与对记忆的摧毁是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元素。“把我们的故事讲给‘其余的人’,以令‘其余的人’参与其中的需要”,普利莫·莱维(Primo Levi)^[72]写道:“在我们被从集中营解放之前和以后,这种需要令我们感受到一种直接而激烈的冲动,到了与我们其他的

[69] Serra, *Scritti letterari*, p. 287.

[70] 见以上所引的海登·怀特的段落(注54),“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80。同样还有“Historical Emplotment”, in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71] J. F. Lyotard, *The Différend: Phrases in Dispute*, trans. G. Van Den Abbeel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p. 55-57.

[72] 普利莫·莱维(1919—1987),意大利犹太裔化学家、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译注

基本需求不相上下的地步。”〔73〕就像埃米尔·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已然指出的那样,拉丁语里意为“证人”的词中,有一个是 *superstes*——幸存者。〔74〕

原作者附记:本文较早的版本曾在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于1990年3月25—29日举办的会议“对犹太人的灭绝与表现的界限”上提交。见扫罗·弗里德兰编《探询表现的界限: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edited by Saul Friedland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此文于1992年发表在《探询表现的界限》一书中时,名为“Just One Witness”,与英文版同时发表的意大利文版为“Unus testis. Lo sterminio degli ebrei e il principio di realtà,” *Quanderni storici*, 80 (1992), pp. 529-548。金兹堡在《线索与踪迹》(*Threads and Traces: True, False, Fi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一书中重刊了此文,并加上了原意大利文版的副标题,题为《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Just One Witness: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and the Principle of Reality”)。两版的文字有细微出入。本篇根据《线索与踪迹》的新版译出。】

〔73〕 P. Levi, *Survival in Auschwitz*, trans. Stuart Woolf,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pp. 5-6.

〔74〕 E. Benveniste, *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Society*, London: Faber, 1973 [1969], pp. 522ff. (对 *testis* 和 *superstes* 之区别的讨论在第 526 页)。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著

彭 刚 译

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

在本文中,安克斯密特将分析的历史哲学概括为两种进路:亨佩尔式的覆盖率模型和柯林武德—德雷式的逻辑关联论证。他在分别指出这两种进路各自的以及共同的缺陷之后,将它们归为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并进一步指出,只有以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取代认识论的历史哲学,才能摆脱在他看来英美历史哲学所陷入的困境。叙事主义到了海登·怀特,才迎来了它成果丰硕的第三阶段,而对历史学家语言的重新认识,将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开辟超越怀特的新的前景。此文既是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自二战以来的学术史脉络的一份颇为个性化的梳理,又展现了作者自身的理论抱负。

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荣休教授。他是继海登·怀特之后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理论家,研究方向还涉及美学和政治哲学等领域,主要著作有《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历史表现》《崇高的历史经验》等。

我这篇论文的主旨是,当代英语历史哲学面临着一个困境,并且历史哲学的将来取决于最终人们所做出的抉择。我刻意避开了**危机**一词而使用**困境**一词,因为在这一困境中,两种可以作为选项的立场并不如同**危机**一词所暗示的那样,共有着同一个过去。毋宁说,各自有着自身思想先辈的历史哲学的两种不同形式,彼此正相反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因此,抉择将会是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之间、而不是在我们一直追随着走到如今的同一条道路的两个分岔之间做出。

这一困境的两个方面,可以用诸多不同方式来描述。人们可以简单地将它说成是新的历史哲学与传统的历史哲学、解释的(interpretative)历史哲学与旨在描述的(descriptivist)历史哲学、综合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语言学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或者,就像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1]那样,说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标签都各有其利弊,它们全都把握了部分的实情。然而,由于将会随着我的论证而逐步变得清晰的理由,我更青睐**叙事主义的(narrativist)历史哲学与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这样的说法。

认识论的历史哲学一直关注的是历史描述和历史说明的真理性和有效性的标准问题,它致力于解答这样的认识论问题: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历史学家有关过去的陈述(无论是单称的还是全称的)是真的。另一方面,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则集中考察历史学家用来拓展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的语言工具的性质。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关心的是历史陈述与它们所关涉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则倾向于止步在历史语言的领地之内。这一事态不应该被解释为仿佛认识论的历史哲学是“实在论的(realist)”而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则是“唯心论的(idealist)”;实际上,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界定历史学家的语言与其所关涉的东西之间的分别,那是被实在论和唯心论这一对反题所预先设定了的。这就可以表明这两个传统实际上相隔有多远,以及为何它们无法相互还原。最后,我得立即补充说,很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历史编纂并不具有讲故事的特性;**叙事主义**一词所可能会引发的、与讲故事联系在一起的一切联想,因此都应该被排除在外。**叙事主义**更应该与(历史)解释(interpretation)联系在一起。

[1] H. Kellner, "Allegories of Narrative Will: Post-Structuralism and Recent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Narrativity", in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Madison, 1989.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将描述认识论传统;在第二部分,描述叙事主义传统;在最后一个部分,我希望回答这一问题:倘若叙事主义的路数较之其年头更长的对手更为可取的话,哪些论题能够产出富有成效的研究。

一、认识论的历史哲学

认识论的历史哲学有四个来源。它来自:(1)对于德国历史主义(historism)的拒斥;(2)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摒弃;(3)试图基于覆盖律模型(covering-law model, CLM)的前提,提出让人满意的对于历史说明(explanation)的重构;以及(4)柯林武德式的解释学的不同形式。传统英语历史哲学的这四大支柱的认识论特性,是所有人都一目了然的。历史主义和思辨体系遭到摒弃,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未能满足历史知识的认识论标准。另一方面,覆盖律模型和柯林武德式的解释学则试图发现这些认识论标准的性质。在这一部分,我接下来将会一一讨论认识论传统中的这四个成分,通过评估其优劣之处来让这幅图景更加完备。

除却布莱德雷(F. H. Bradley)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1874)^[2]之外,我们今天所说的英语历史哲学可以说是以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的《历史知识问题》(*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1938)为开端的。在这方面,曼德尔鲍姆甚至抢在了柯林武德的前面,尽管后者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这个领域的确做了大量工作。曼德尔鲍姆第一本书的重要性往往被人忽视了。看起来,曼德尔鲍姆在那里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给认识论传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曼德尔鲍姆写作他的书的时候,德国历史主义陷入了所谓的“历史主义的危机”^[3]。在他闻名遐迩但却常常遭受误解的名言——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对过去下判断或者为着将来的运用而予人教益,而仅仅是表明过去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中,兰克劝诫历史学家们只能从过去自身的视角来考虑过去。从兰克的训诫中错误地推论出了

[2] See W. H. Walsh, "Bradley and Critical History", in A. Manser and G. Stock, eds., *The Philosophy of F. H. Bradley*, Oxford, 1984.

[3] 曼德尔鲍姆将西美尔、李凯尔特、舍勒和特洛尔奇反抗相对主义的努力说成是“一系列的败仗”; M. Mandelbaum,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 1938, p. 174。德国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完备论述,见 K. Heussi, *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 Tübingen, 1932。

一种将(受到时间局限的)伦理规范的普泛性与其(独立于时间之外的)适用性混合在一起的伦理上的相对主义。因此,当曼德尔鲍姆发现德国历史主义置身于它自身所招致的瓦解状态时,他所描绘出来的关于它的那幅图景没有让英语哲学家们对历史主义产生多少好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主义就被等同于对于伦理相对主义的一种贫乏而暧昧的回应。

最终的结果就是,英语历史哲学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有关历史写作的深入而透彻的思考隔绝开来。由于历史主义不仅是自上个世纪(译按:指19世纪)初以来全部历史编纂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源头,而且还因为它具有对于历史学实践的意识(而那是英语历史哲学中异常欠缺的),这一点就更加让人惋惜了。由于在希特勒时期之后德国思想迷失了方向,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除了诸如吕森(J. Rüsen)、尼帕迪(T. Nipperdey)或者吕贝(H. Lübke)等少许例外〔4〕——很少会想到要为历史主义作一番现代而自信的辩护。伊格尔斯(Georg Iggers)旁征博引而博学多识的著作,阐发了这样一种共识:历史主义是历史哲学中一个让人遗憾的阶段,幸运的是这个阶段已然属于它总是以这种错误而危险的方式来研究的那同一个过去了。〔5〕

英语历史哲学家们几乎是轻蔑地就将德国历史主义一笔勾销了,他们甚至于都没有花点功夫,来在历史主义(historism)与波普尔所说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6〕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要不然他们对于精微的术语差别本来是极为敏感的。关于波普尔对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拒斥,有一个颇为奇怪的故事。他心目中想的显然是沃尔什几年之后所界定的**思辨的历史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ies of history)〔7〕。波普尔所批评的主要是某些思辨的历史哲学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过去推断出将来的那种预言未来的抱负。既然历史学家们往往是对过去而非将来发生兴趣,波普尔的批评,就未能成功地将思辨哲学呈现为历史学家们所合法地想要去做的事情的一种不合法的形式。不仅历史主义者号称可以用高明的办法来解释过去的断言,在波普尔的攻击之下几乎毫发未伤,而且威尔金斯(B. T. Wilkins)在其对于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4〕 J. Rüsen, *Für eine erneuerte Historik Zur 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tuttgart-Bad Canstatt, 1976; T. Nipperdey, "Historismus und Historismuskeitik heute", in Nipperdey, *Die Funktion der Geschichte in unserer Zeit*, Stuttgart, 1975, 82-95; H. Lübke, *Geschichtsbegriff und Geschichtsinteresse*, Basel/Stuttgart, 1977.

〔5〕 G.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1968), Middletown, 1984.

〔6〕 参见 K.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1957 的导言。

〔7〕 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51), London, 1967, p. 16.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最后一章的详尽分析中,甚至于还表明波普尔实际上相信,思辨体系在历史编纂中起着“探照灯理论”的作用,并且因而对于所有历史解释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8〕这种看法在费恩(H. Fain)和芒兹(P. Munz)那里又得到了机敏而睿智的阐发。

攻击思辨体系的另一种策略,是指控它们是形而上学的。有人认为,思辨体系无法像检验“通常的”对于过去的历史解释那样来加以检验。马克思关于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就如同“所有历史都是阶级合作的历史”这一和它同样形而上学的反题一样无法证实。不过,人们可以同意沃尔什的看法,那就是思辨体系和“通常的”历史编纂都力图弄清楚过去的某一部分的“本质”,并且因此就无法依据将对于知识的形而上学论断和可证实的知识区分开来的标准来彼此分别。〔9〕尽管哲学家们试图拒斥思辨体系,他们仍旧没有找到决定性的论据来反对它们。

因而,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未能对思辨体系提出有效的质疑,就成了认识论历史哲学最初的一个裂缝。早在1972年——当覆盖律模型仍然在英语历史哲学中称雄之时——费恩就巧妙地攻击了支撑着赞同覆盖律模型的大多数观点的那种休谟式的因果观念。〔10〕他指出,与休谟的因果理论相反,在历史编纂中,在所谓的原因与其所谓的结果之间的关联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历史学对于什么可以算作原因,除了纯粹形式性的条件之外,还有实质性的要求。有些满足了覆盖律模型的东西往往并不被历史学家们视作可以接受的原因。在费恩看来,各种思辨体系澄清了这些实质性的要求。它们在历史过去当中辨识出来了具备同样本体论性质的诸多层面的历史事件和现象,而具备相同的本体论性质,就使得各种事件可以发生因果方面的关联。然而,从费恩的著作里面不大能够看明白,思辨体系在我们穿越过去的旅程中所提供的指引,究竟应该看作是对于休谟式因果模型的补充物还是替代品。在一本可读性很强的著作中,芒兹提出了与费恩非常类似的看法,尽管他相当明确地试图调和思辨哲学与覆盖律模型。〔11〕这场论战的最终结果是,我们以看待婚外性关系的方式来对待思辨体系:很多人在做这件事,那在人们看来既出乎自然又激动人心,然而它却与常规不相吻合。

〔8〕 B. T. Wilkins, *Has History Any Meaning?* Hassocks, 1978.

〔9〕 参见 W. H. Walsh, *Metaphysics*, London, 1963, pp. 172ff.

〔10〕 H. Fai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History*, Princeton, 1970.

〔11〕 P. Munz, *The Shapes of Time*, Middletown, 1977.

但这并非问题的核心所在。认识论历史哲学中所发生的论战,唱主角的总是覆盖律模型的支持者和柯林武德所留下的遗产的维护者之间的争议。我的分析将会逐步表明,与表面看起来的相反,这两造之间的共同之处比之将它们分裂开来的东西要更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论战的起源及其合理性依据,都是外在于历史哲学这一领域本身的。倘若我们想象一张各个学科的名单,按照它们与实证主义的科学模型(我这里是在一种宽泛的、非专业的意义上使用**实证主义**一词的)相吻合的程度来排列,这一点就会看得很清楚了。在名单的顶端,我们会看到(理论)物理学,然后是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社会科学(经济学打头),接着——最后在名单的末尾——就到了历史学。覆盖律模型的支持者与柯林武德派的论战的总体背景,终归是这一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当人们顺着这份名单看的时候,是否有那么一个点,在那里事情真的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换句话说,并非历史编纂本身,而是科学统一性的论旨,才是这场论战的真实问题。毫不奇怪,那些接受了这一论旨的实证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们,在历史学中看到了对于他们的创造性的巨大挑战。他们相信,如果甚至于历史编纂的科学性(通过阐明对于历史编纂有效的这样那样的覆盖律模型的变体)都能够得到证实的话,实证主义者关于所有科学的和理性的探究的统一性的论断就可以被坐实。因此,为数甚众的哲学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历史学感兴趣,不是为着历史学本身,而更其是因为它置身于某一特殊边缘地位的特性),都咬住了历史说明的这一问题,力图将其纳入覆盖律模型的框框。

奇怪的是,即便是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角度出发,这场论战的战场的选择,也令论战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只具有不过是边缘性的意义。科学哲学家们,不管是新实证主义者,还是波普尔或库恩的信徒,或者人们所能想到的什么其他哲学标号的拥护者,都从来没有对说明本身发生兴趣,而是关注着理论和概念的形成。可是,在围绕着覆盖律模型展开的论战当中,极少有人会问:是否与覆盖律模型相吻合这一点,就足以将历史学提升到一门科学的地位;也没有人问:从历史编纂中是否不可能同样得出某种类似于理论和概念形成的东西。后一个问题的提出,本可以将历史哲学中叙事主义传统的诞生提前大约二十年。覆盖律模型的拥护者与柯林武德派之间的论争,很自然地集中在覆盖律的存在这一并不十分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上,这一点确定无疑地妨碍了叙事主义路数的更为及时的“进发”。

不过,覆盖律模型所引发的争论显然没有取得定论,这就让历史哲学家们意识到了历史编纂诸多未曾被人注目过的特性,仅仅因为这一点,这场争论就

还是物有所值的。甚至于还有一些积极的结果。在论战展开之时——这必定并非巧合——历史学家们和历史哲学家们^[12]都倡言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交融。诸如约恩特(C. B. Joynt)和瑞歇尔(N. Rescher)^[13]的那种应该将历史学视为一种应用科学,而历史学家更其是社会科学规律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观点,将覆盖律模型放在了介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有利地位。康拉德(A. H. Conrad)和梅耶(J. R. Meyer)1957年关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关系的著名论文^[14],被公认为开启了新经济史,是覆盖律模型在现实历史学实践中结出硕果的醒目例证。经济史中的反事实分析和模型建构显然都是以某种形式的覆盖律模型为预设的。^[15]

在认识论传统的内部,覆盖律模型从“内”“外”两面都受到了攻击。覆盖律模型的捍卫者们自己很快就认识到,在实际的历史学实践中很少有什么能够与覆盖律模型的要求相吻合。而且,要提出既有效又有意思的历史规律,已被证明难乎其难。为应对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原本是规则—演绎性的(nomothetic-deductive)覆盖律模型的诸多统计—归纳性的(statistical-inductive)变种。然而,即便如此,困难依旧存在。斯科利文(M. Scriven)和莫顿·怀特(Morton White)提出,将覆盖律的作用还原到仅仅是对历史学家选择某一特定事件作为原因的证明,而不是作为某个演绎性论断的普遍前提,这可以说是覆盖律模型及其后来的各种变种,在反驳将它们说成是空洞的图式而不切实用的指控的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策略。^[16]

然而,绝大多数对于覆盖律模型的反对意见,来自柯林武德英年早逝大约二十年后才赢得的那些信徒们。因此,在谈到这一传统时,我会使用奥拉夫森

[12] 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 D. S. Landes and C. Tilly, *History as Social Science*, London, 1973;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成了德国历史哲学中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

[13] C. B. Joynt and N. Rescher, "The Problem of Uniqueness i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1 (1960): 158; and in G. H. Nadel, ed.,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1965, p. 7. 当然,覆盖律模型的经典之作是 C. G. Hempel,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 in Histo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39 (1942)。对于覆盖律模型的统计学变种的阐述,参见 C.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1968, pp. 380ff.

[14] A. H. Conrad and J. R. Meyer, "Economic Theory, 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A. J. Conrad and J. R. Meyer eds.,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Chicago, 1964, pp. 3-30.

[15] P. D. McClelland, *Causal Explanation and Model Building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thaca, 1975; M. G. Murphey, *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 Past*, Indianapolis, 1973.

[16] M. Scriven, "Truisms as the Grounds for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in P. Gardiner, ed., *Theories of History*, New York, 1959; M. Whit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 1965, chap. 3.

(F. Olafson)所提出的分析的解释学(analytical hermeneutics)一词。有必要在此就这个术语稍作说明。将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或德里达(以及在他之外)的某种德国(或大陆)的解释学传统,与自柯林武德以来的英语解释学区分开来,是有益的。^[17]前者以对于文本(尤其是《圣经》文本、法律文本或文学文本)的解释为其范式,后者则以对于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说明为其范式。必须强调,这两种解释学的目标大相径庭:德国解释学倾向于将过去(也即文本)视为某种给定之物,就像是要求我们后退一步,以便找出其意义;英语解释学则正好走的是相反的方向,鼓励我们去努力发现新的历史素材(也即人类行动背后的意图)。德国解释学希望我们选择一个外在于或高于过去本身的有利位置;英语解释学则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穿透到过去之中。就其特征而论,德国解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18])对于所谓的 *mens auctoris*[作者心思]漠不关心,而“分析的”解释学”则在重建它之外别无其他目标。德国解释学与(下个部分要涉及的)叙事主义传统都同样对于过去采取一种综合的方法;英语解释学则一望而知乃是分析的——这个事实可以说明奥拉夫森所选择的术语的合理性。德国的或者大陆的解释学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并且经由文学批评找到了进入英语历史哲学内部的叙事主义传统的路径。

分析的解釋學的认识论性质极为显著。就像是达森(Van der Dussen)在其学位论文和梅兰德(J. W. Meiland)在其令人钦佩的小册子中^[19]所表明的,柯林武德的重演论原本是对历史知识何以可能这一认识论问题的回答(简略地说,他的答复可以概括为:历史知识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通过重演历史当事人的思想,这些思想就被带到了现在并且因此就可以在此时此地得以探究)。德雷的行动合理性说明(action rationale explanation)也是如此,因为这一模型是要澄清,要满足何种认识论标准,我们才能够说,“有关 x 为何做了 a 这件事,我已经有了说明”。

尽管分析的解釋學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经历了一个困难的时期,六十年代多纳甘(A. Donagan)、敏克(L. O. Mink)和鲁宾洛夫(L. Rubinoff)所撰写的有关

[17] 我在拙著 *Denken over geschiedenis; Een overzicht van moderne geschiedfilosofische denkbeelden* (Groningen, 1984) 中阐述了这一分别。

[18] 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 G. Barden and J. Cumming, New York, 1986.

[19] J. W. Meiland, *Scepticism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 1965, chap. 3; W. J. 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The Hague, 1981, pp. 157ff.

柯林武德的一系列专著^[20],很快就打破了覆盖律模型与分析的解释学之间的平衡,而使天平向后者倾斜。随着时间的流逝,分析的解释学经历了诸多转变。柯林武德还相当僵硬的重演论被德雷的合理性说明所取代,后者反过来又被接下来将要讨论的意图说明(intentional explanation)和所谓的“逻辑关联论证”(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 LCA)加以提炼。对历史学家所重建的实践推论的分析日益精微复杂。不过,如今绝大多数历史哲学家都一致认为,进一步提炼实践推论图式的工作必定会服从于回报递减的规律。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某些历史哲学家近来又被柯林武德未及完善的问答逻辑(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21]所吸引——这种显然是语境论的史学理论与他早期的重演论的命题主义(propositionalism)是不可调和的。^[22]

覆盖律模型的支持者与分析的解释学一派之间的论争,受阻于在分辨什么是争议中的要害问题时所碰到的未曾预料到的困难。斯卡吉斯塔德(P. Skagestad)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在一部杰出的著作^[23]中,他成功地将这场争论(以波普尔和柯林武德作为对立的主角)转换成了一个本体论问题。倘若波普尔的第三个世界(包含历史当事人的思想在内)应该被分解为一个客体的层面和一个元层面,覆盖律模型就更为可取;倘若不是这样,分析的解释学就更应该受到青睐。斯卡吉斯塔德从罗素的描述理论出发,倾向于后一个选项。^[24]然而,争端通常没有被如此清晰地表达出来。解释学一派争辩说,他们并没有运用规律(因为他们的说明完全基于对某一事实、也即置身于某一历史处境下“我”会做些什么的确认),而覆盖律模型的支持者们则回应说,这样的说明总是以某一覆盖律(也即所有理性的人都会做我相信我自己在如此这般的情境下会做的事情)为前提的。如此一来,这场论战很容易就蜕化成了(用赖辛巴哈[H. Reichenbach]的术语来说)在证成语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和发现语境(con-

[20] A. Donagan, *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Oxford, 1962; L. O. Mink,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Bloomington, 1969; L. Rubinoff, *Collingwood and the Reform of Metaphysics: 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Toronto, 1970.

[21]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1939], Oxford, 1970, chap. 5.

[22] 参见拙文“De Angelsaksische hermeneutiek en de geschiedbeoefening”, in T. de Boer, ed., *De filosofie van de mens-en cultuurwetenschappen*, Meppel, 1989.

[23] P. Skagestad, *Making Sense of History: The Philosophies of Popper and Collingwood*, Oslo, 1975.

[24] 我在论文(“Een nieuwe synthese?”, *Theoretische geschiedenis*, 6 [1979]: 58-91)中对斯卡吉斯塔德的论点提出了保留意见。

text of discovery) 之间何者优先的毫无结果的争议。^[25]

德雷影响深远的第一部著作^[26]令人信服地表明,要想清晰地说出在覆盖律模型和分析的解释学之间的分歧的性质,乃是如何的困难。若干评论者都注意到,德雷对于覆盖律模型的批评以及对于他自己的行动合理性说明的辩护,构成他的论证中完全不同的支脉。似乎德雷要想能够有效地对覆盖律模型提出批评,就得先将自己变成这一模型半心半意的拥护者。在德雷后来的一篇论文中,这一分别甚至更加凸显出来了。^[27]事态发展的最后结果,当然就是覆盖律模型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它的支持者们可以判定,与对手的战斗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并且只要这一模型自身的支持者们相互之间的分歧还不至于危及它本身,所有的批评实际上终究就都会是对于这一模型的修炼而非拒斥。

在论战的后一阶段,逻辑关联论证给分析的解释学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论证,以证明其相对于覆盖律模型的独立性。依循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所提出来的若干观点(诸如他所说的“人的身体是其灵魂的绝佳图像”^[28]),逻辑关联论证以逻辑关系取代了动机与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简简单单的一招,就将覆盖律模型连同其因果性的(而非逻辑的)覆盖律逐出了人类行动说明的领地。为着证明逻辑关联论证,多纳甘写道,倘若一个当事人有着意图 I 并且知道行动 a 可以实现 I,而行动 a 又还没有遂行,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位当事人从来就没有严肃地把 I 当作自己的意图。换句话说,采取相关的行动乃是“具有某一意图”的意涵的一个部分。从对逻辑关联论证的多纳甘版本的这一显然并非完美无瑕的运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逻辑关联论证在其最初的表述中,似乎差不多是通过一个“魔术”般的行止,而将意图与行动连在了一起。^[29]逻辑关联论证后来的捍卫者们试图对此进行修补。冯·赖特(G. H. von Wright)就认为,这一形式的实践推理[(1) A 想要产生 p;(2) A 认为除非他做 a,否则就无法产生 p;(3) 因此 A 决意去做 a]^[30]中前件与后果之间的关系是分析的,因为

[25] R. H. Weingartner, "The Quarrel about Historical Explanation", in R. H. Nash, ed., *Ideas of History*, vol. 2, New York, 1969.

[26] W. H. Dray,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Oxford, 1957.

[27] W. H. Dray,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Actions Reconsidered", in P. Gardiner,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1974.

[28] 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1953], Oxford, 1974, p. 178e.

[29] T. Kuipers, "The Logic of Intentional Explanation", in J. Hintikka and F. Vandamme, eds., *The Logic of Discourse and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Dordrecht, 1986.

[30] G. H. Von Wright,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London, 1971, p. 96.

不可能在不证实前件的情况下去证实后果,反之亦然。冯·赖特的论证的弱点,在马丁(Rex Martin)的《历史说明》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剖析。^[31] 马丁的著作在阐发分析的解释学内在的种种可能性方面无人能及,却迄今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32] 马丁的论旨是,逻辑关联论证不是逻辑规则而是范导性(regulative)规则,就像每一事件都有其原因的规则一样。此类规则的功能是使得某一类研究在认识论上成为可能。

然而,人们也会怀疑这一切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差别。无论人类行动是通过覆盖律,还是藉由所有理性的人都倾向于理性地行动这一作为范导性规则或者普遍规则的逻辑关联论证得到说明,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一个**普遍的规则**。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于逻辑关联论证或者别的东西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覆盖律模型的偏离太过挂怀。逻辑关联论证将维特根斯坦和赖尔对于因果性的“机器中的幽灵”的指责与历史说明调和起来,这当然很好,然而,那对于覆盖律模型和分析的解释学的支持者之间原有的分歧却难得扯上什么干系。

此外,甚至还可以将分析的解释学这些后来的阶段,视作对于覆盖律模型的公开或隐蔽的调情。柯林武德与亨佩尔之间那道原有的鸿沟,比之后来在冯·赖特或马丁和斯科利文之间的,或者比如说墨菲和覆盖律模型其他更晚近的捍卫者之间的鸿沟,要深广得多。这场论战在目前的事态,应该看作是走向覆盖律模型与分析的解释学两者的合流或综合,而不是后者战胜了前者。比如说,在冯·赖特所阐述的逻辑关联论证中,将两者隔离开来的墙,就如同那种认为人类行动的意向性描述无法还原成对其因果性的或物理主义的描述的可疑说法一样,变得脆弱不堪。当冯·赖特讨论某人敲响门铃这样一个事件时,对此事件的意向性描述中那种被认为是“不可还原的”意向主义成分显得如此勉强和惹人争议,人们会觉得即便是那堵墙也已经坍塌了。

马丁的著作是覆盖律模型与分析的解释学合流的一个甚至更加有说服力的例证。他将实践推理的前件分解为诸多单独的前提,粗略地说就是:(1)当事人发现自己置身于处境S,在此处境中他想带来某种改变;(2)对于那一目的有着某些可替代的选项;(3)在当事人看来实现意图I乃是最佳选择;(4)当事人相信做a可以实现I;以及(5)当事人没有相互冲突的意图而且有能力

[31] R. Mart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 Ithaca, 1977, pp. 174-175.

[32] 瑞安(A. Ryan)在 *History and Theory* (19[1980]: 93-100)上发表的评论有失公允。

实施 a。^[33]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与早先对于实践推理的界定相反,马丁借着前提(1)(2)和(3),能够说明为何 S 在当事人心中引发了意图 I。由此他就避免了在意图与行动之间的恶性循环,那在从前所有的界定中,将求诸意图的努力贬抑到这样一种角色,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机器中的轮子,它只被驱动而本身不驱动任何东西。其次,这一对于实践推理图式的阐发,使得马丁能够为覆盖律模型要求新的角色和地位;因为将前件中的前提关联起来就成了覆盖律的任务。以征服高卢之后的恺撒为例。我们可以设想一条普遍规律:当将军们在面临类似情境——也即当他们面对某个邻国的入侵——时会考虑改变他们的不妙处境的若干选项(如此就将前提[1]和[2]联系起来);另一条规律是说,将军们通常会断定必须制止这样的侵略(将[2]和[3]联系起来);还有一条规律是说,将军们通常会断定,入侵邻国会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将[3]和[4]联系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一来,覆盖律模型就不知不觉地被分析的解释学所吸纳了。

我们可以确认,覆盖律模型的支持者与分析的解释学派之间的论战,一直更多地是在走向综合,而不是将分歧固化。就目前来看,这两个路数之间更其是“和平共存”而非兵戈相向。因此,在当下这一阶段的历史哲学的争论中,更让人关注的是覆盖律模型与分析的解释学之间的相似之处而非它们之间的分歧。以下五点总结了这些相似之处。它们一起体现了认识论历史哲学最一般性的预设。

首先,覆盖律模型和分析的解释学这二者对于实际的史学编纂实践中的问题都相对不敏感。除却新经济史之外,历史学家没有多少理由来对覆盖律(或其运用)发生兴趣,而分析的解释学所研究的对于单个历史当事人行动的说明,不过是历史学家任务中一个可以忽略的部分——当然也不是最饶有兴味的部分。实际上,覆盖律模型和分析的解释学两者的拥护者,都是以外在于历史编纂学本身的视角来审视历史编纂学的。覆盖律模型的理论读起来就像是有关应用逻辑学或科学的讲演稿,而分析的解释学则像是一部行动哲学著作中的一章。

其次,二者都首要地(如果不是毫不他顾的话)关注历史说明。在两者的眼里,历史学家的领地,就仿佛一张上面散落着无数个小点的白纸,历史学家进行说明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点尽其所能地连结起来。然而,历史学家的任

[33] Martin, *Explanation*, pp. 78-79.

务本质上乃是解释性的——也即要在那些点中发现某种模式——这一点如今就无人问津了。正是由于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关切要将历史学家的语言与过去本身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它就永远无法舒展自己的羽翼,成其为一种有关历史解释的哲学。

随之而来的就是,覆盖律模型与分析的解释学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历史研究的细节而非整体之上。历史学家要确立并说明个别的事实,并且因而被看作本质上就是柯林武德所说的某一类侦探。^[34]或许柯林武德作为考古学家的经历(他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之关注于人们缘何在过去做某事、制作某物、思考某个东西这一问题。毫无疑问,他的重演理论非常适合于这一问题:该如何去研究从遥远的过去流传下来而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物品。

然而,任何人即便只对历史编纂有着粗浅的了解,也会认识到对于单个历史事实的说明和描述,只构成成为历史学家所做工作的一个极其微小的部分。我们崇敬像是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赫伊津哈、梅尼克和布罗代尔这样的伟大史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事态描述和说明的精确,而是因为他们为过去的很大部分提供了全景式的解释。无论人们要以何种方式来超越覆盖律模型和分析的解释学的局限,认识论历史哲学的界域都必定显得过于狭隘,而无法对这些有关过去的叙事性解释做出解说。

第三,认识论传统在其两种体现形式中,都表明了其历史感的阙如,这对于一种历史哲学来说,实在令人诧异。它似乎或明或暗地接纳了休谟的名言:“在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人类的活动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齐一性,人性在其各种原则和运作中保持不变。”^[35]这样一种对于历史变化的不敏感,在覆盖律模型中体现为它所运用的覆盖律的普遍性,而分析的解释学中则必须预先假设,在历史学家的思想与他所研究的历史当事人的思想和行动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

第四,在其各种形态——要么是覆盖律模型,要么是柯林武德式解释学——中,认识论的历史哲学都未能成功地如愿弥平历史学家语言与历史实在之间的鸿沟。覆盖律模型在这方面铩羽而归,是因为出于各种各样的缘故,*explanans* [说明项]与*explanandum* [被说明项]从未能够完好地相互匹配。丹图

[34]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1946], Oxford, 1970, pp. 266ff.

[35] D. Hume, *Enquires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Oxford, 1972, p. 83.

的确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来缩小那两者之间的裂痕。他指出,我们总是在对于事件的特定描述之下来说明它们,并且因此历史学家最激动人心的使命之一,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描述过去,使得我们可以将这些描述纳入我们所掌控的覆盖律的运作机制之中。但是,即便是丹图也得承认,无论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在具备其全部复杂性的过去与说明性语言之间,依旧永远会有相当大的距离。^[36]

对于分析的解释学,也可以提出类似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更有意思。有人指责分析的解释学无法阐明不能还原为单个当事人(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意图的过去的那些方面。以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为例。没有人意图变得更穷,因而无法以相关投机者的意图来说明这场崩溃。分析的解释学的绝大多数支持者颇为坦然地接受了他们理论的这一严重的局限性。^[37]有人批评说在事关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意料之外的结果(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intentional human action)时,分析的解释学就百无一用了;冯·赖特试图反驳这一批评,因此成了一个例外。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为例。在冯·赖特看来,塞尔维亚、奥地利、德国和俄国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对前一个步骤的反应,并且可以通过意向性说明、通过将此前每一步骤所引发的外交局势纳入考虑而得到阐明。如此一来,有意图的行动的意料之外的结果的论旨,就没有了任何实质意义。^[38]对冯·赖特的论证可以作如下反驳。将相关各国政府直到战争爆发为止前后相继的实际考虑列为 $P_1 \dots P_n$ 。那么,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呢?历史学家很少会选择 P_n 作为最可能的选项;他们更其会说, $P_1 \dots P_n$ 这个系列中的每个步骤都对战争的爆发起过作用,并且因此就都是部分的原因。结果就是,比如说, P_1 也是部分的原因,即便这一实际考虑并没有引发战争的意图在内。表陈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意料之外的结果的语言,因此似乎就是历史学家语言不可或缺的部分。

有必要强调:就其论证表明唯有人而不是什么超人的力量创造了历史这一点而论,冯·赖特是正确的;但他就此推论说,历史学家的说明能力只限于诉诸有意图的人类行动,在这一点上他犯了错误。历史学的语言能够让历史学家从一个不同于历史当事人自身的视角来看待过去,而纯然和仅仅是因为这一视角

[36] A.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8, pp. 220ff.

[37] Dray, *Laws*, p. 119; Martin, *Explanation*, p. 15.

[38] Von Wright, *Explanation*, pp. 139ff.

上的变化,就会导出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一论题。这一论题因而就并非是一项本体论的论断(过去既包含有意图的行动,又包含它们的意料之外的结果),而是关涉到相对于历史当事人有意图的动的历史学家语言的自律性(autonomy)。一旦承认历史学家不会受限于当事人的视角,有关意料之外的结果的语言就会得到运用。^[39]换句话说,分析的解释学受惑于在历史学家语言(意向性说明)与看似真实的过去(历史当事人的实际考量)两者之间完全匹配的认识论迷梦,那一梦境看似如此真实,让历史哲学家们完全无视历史写作的实际状况。可是,历史往往是用在实际过去本身当中没有可展现的对应物的东西来阐明或解释的。于是,不管是覆盖律模型还是分析的解释学,都未能成功地完成将语言与世界、词与物绑定在一起的认识论目标。覆盖律模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历史实在已被证明太过复杂,而分析的解释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无法解说历史学家语言的复杂性。分析的解释学的失败显然比之覆盖律模型更为惨重。后者至少还可以转型成为将来历史研究的一个纲领,而分析的解释学则失败在它未能说明历史学家们几个世纪来所一直在做的事情。

第五,覆盖律模型和分析的解释学两者本身都具有认识论的性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随处可见的假设,这一假设似乎彰明较著而又平淡无奇,几乎没有引起过注意。按照这一假设,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也应该清楚地区分以下三个层面:(1)过去本身;(2)我们用来言说过去的历史学语言;(3)对于历史学家如何得出他们的结论以及这些结论如何可以得到严格论证的哲学反思。借用罗蒂的比喻,历史学语言乃是过去之镜,历史哲学家根本性的认识论任务,就是分析这面镜子如何成功地给我们展现了过去。

这个图式确实一直暴露出某些缺失。比如,让人烦恼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问题似乎就模糊了第(2)和第(3)两个层面的区分。再就是,历史学家有时会关心连续性、非连续性、秩序或混沌这样的术语,而这些术语本身显然属于第(2)层面;可是,人们也许会怀疑,它们究竟不过是用来编排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的概念工具,还是它们也指涉了实际过去的某些方面。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表明,在头两个层面之间划出的分界线,并不像认识论历史哲学一直以来所乐于相信的那样清晰明白。然而,这些问题(如果还有人认识到了的话)却没有引起注意,就像库恩所说的反常(anomalies)那样,“等待着具有更加完善的工具的下

[39] 见拙文“Th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一代人”。〔40〕 要到海登·怀特的《元史学》问世,这些“反常”才会呈现出崭新的意义。

二、叙事主义历史哲学

确定海登·怀特在英语历史哲学演进过程中的地位之前,有必要先往回走一步,将历史哲学与其他哲学领域中的发展做一比较。

科学哲学具有一个与我刚才所提纲挈领地为历史哲学所描述的非常相似的正统。科学哲学家们也相信,在物质实在本身、科学和科学哲学之间可以作出严格的区分,以至于一个层面上的东西绝不会也出现在另外两个层面中的某一个之上。在科学哲学中发生的事情——要感谢奎因、塞尔、戴维森、库恩以及首先是罗蒂的努力——使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分野变得模糊了,而一道强劲的“历史之风”开始吹过这个认识论图式中的道道裂缝。一个旧有的正统的确定性尚未被新的所取代时——这似乎就是目前的局面——这正是人们所能想见的情形。就此而论,我们目前的困局给斯特鲁弗(Nancy Struever)饶有兴味的论点——只有在绝对的确定性(不管是哲学的、神学的还是科学的)声名扫地之时,历史和历史感才能繁荣滋长〔41〕——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历史学以其对于“中间物和相对物”(intermediate and relative)〔42〕的关切,一直就是绝对真理以及号称证实了这些真理的正规图式的大敌。

对科学哲学正统的攻击,始于奎因对于分析的/综合的这一区分的拒斥。对奎因的论证的简短说明(不管人们可能对他的论证如何熟悉),对于我们这里的论述而言必不可少。奎因看到,对于界定分析性(analyticity)或同义性(synonymy)而言有着三种可能的非循环的方式(1)同义性本身;(2)术语的可互换性,分析性关系由此就可得以断定(具有同样的外延);(3)基于语义学规则。〔43〕奎因的论证大致是说,这三种界定以各自的方式都只不过记录了两个词语被认

〔40〕 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1970, p. 84.

〔41〕 N. S. Struever, *The Language of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Princeton, 1970. 相似的看法可见 V. Kahn, *Rhetoric, Prudence and Skep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 Ithaca and London, 1985。

〔42〕 Struever, *Language*, p. 6.

〔43〕 W. V. O. 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1953], Cambridge (MA), 1971, pp. 24ff.

为同义这一事实,而没有解说或证明这一事实。就以对分析性的基础的界定为例。奎因写道:“但是通常这样一个界定……纯然是在编字典,在说明手头的词语之前先断定一种同义关系。”^[44]在其他两种情形中也一样,对于事实的经验性陈述乃是对于分析性的直观的唯一的和终极的基础。奎因因此就得出结论:“尽管有着种种先天的合理性,在分析性陈述和综合性陈述之间的界线并未被划定。能够作出这样的区分,这是经验主义者的一个非经验性的教条,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45]对奎因的论证还可以加上另一个考虑。要想确定分析性,需要预先设定一个能够给出分析性的标准或定义的层面,以及一个可以运用这些定义或标准的更低的层面。然而,要想维持这些层面之间的区分却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试图给出定义,就意味着在更高的层面上出现诸如“分析性就是……”这样的陈述,那就已经预设了我们辨识出分析性的能力(而那被认为是只会出现在较低的层面上的)。

这最后一个考虑有力地支持了奎因的以下论断:一旦拒绝了分析的/综合的区分,科学哲学(较高的或者元层面的)与科学(较低的或对象层面的)之间的分界线就远不是那么清晰可辨了。科学哲学家重构科学家的推论过程,希望能够证明科学家从 R_1 到 R_2 的推论过程在严格意义上是分析性的或正确的。那么,倘若拒斥了分析的/综合之间的区分,在科学家的所谓综合性陈述与科学哲学家的所谓分析性陈述之间的分界线就崩解了。放弃这一区分,结果就是“在思辨的形而上学与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那道界线变得模糊不清”^[46];科学家与科学哲学家将会拥有一块共同的领地而不是彼此之间泾渭分明,在那里,他们可以用同样的语言彼此交谈。

还有另外一种论证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很显然,分析的维度对应于科学家推理过程的形式化的方面,而综合性的维度则对应于其内容。如果奎因是正确的,无论是科学哲学家,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不能够忽略科学研究或历史研究的内容(正统的观点却把这件事完全留给了要么是科学家要么是历史学家)。有趣的是,这一论证可以颠倒过来。因为人们可以不管这一套,而去表明形式/内容的二分也是一个错觉。于是,甚至还在奎因之前就攻击过分析的/综合的区分的古德曼(N. Goodman)就论证说,说出来的东西(内容)与说出来的方式

[44] W. V. O. 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1953], Cambridge (MA), 1971, p. 34.

[45] *Ibid.*, p. 37.

[46] *Ibid.*, p. 20.

(形式)无法截然分开:“说出不同的东西(内容),可以看作言说某种东西的不同方式(形式),那是包含了二者在内的更为整全的东西。”〔47〕

引用罗蒂下面这段话,我们就可以回到有关分析的/综合的区分的这场争论的结果上来:

然而……奎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挑战了这一区分,以及(康德、胡塞尔和罗素所共有的)这一通行的看法:哲学之于经验科学,正如结构研究之于内容研究。面对奎因的疑虑(那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类似疑虑的奥援)——我们应当如何来分辨,我们是面对“语言”的强制而非“经验”的强制而做出回应——要说明在何种意义上哲学有着一个单独的“形式化的”研究领域,并且因此其结果就会有人们所期望的必真的特性,就成了一桩难事。因为,这两场挑战是对于“知识论”本身,并且因此是对于被视为以知识论为核心的那门学科——哲学本身——的挑战。〔48〕

罗蒂滔滔的论述中的麻烦在于他的断言:我们并非总是能够把握十足地分辨是否“我们是面对‘语言’的强制而非‘经验’的强制而做出回应”。再就是,我们应该看到,罗蒂的断言对于历史编纂学这样一门非形式化的学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从上引古德曼的观点来看,很显然,在历史编纂学中要在说了什么和怎么说的之间做出区分极为困难。于是,历史编纂学**彰明较著地**就是这样一门学科,在其中“语言的强制”往往与“经验的强制”相互混杂,而**貌似**关于实在的争论**其实**乃是关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争论。我在上一节末尾提到的例证,将被证明不过是端倪初露。因此,亟需一种语言学取向的历史哲学(a linguist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正是从这样一种罗蒂式的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够对近来英语历史哲学中对历史叙事的日渐增长的兴趣做出评估。当历史哲学终于加入到英语哲学中语言学的转向时,它是以叙事主义的样式做到这一点的。实际上,英语历史哲学最为奇异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很不情愿发展出一种语言学的历史哲学。自新实证主义消褪以来,大多数英语哲学都是某种有关语言的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可是,无论是覆盖律模型,还是分析的**解释学**,都没有对历史学家语言的特征显示出多大的兴趣。很偶然地才会有历史哲学家将诸如“启蒙运动”或

〔47〕 N. Goodman, “The Status of Style”, in Goodman, *Ways of Worldmaking*, Hassocks, 1978, p. 26.

〔48〕 R.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Oxford, 1980, p. 169.

“革命”这样的历史概念——尽管它们在历史学论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视作可以产生丰硕成果的严肃的哲学研究的论题,而沃尔什(W. H. Walsh)论述他所谓的总括性概念(colligatory concepts)的开创性研究,也未能削弱狭隘的实在论的和实证主义的预设。^[49] 其实,覆盖律模型和分析的解释学都总是与准实证主义的理想跟得很紧——这一点真是令人称奇,因为在所有学科中,历史学无疑乃是与实证主义的路数最没有缘分的。而且即便如今,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历史哲学家,他们对于实际的史学实践和自从比如说维特根斯坦以来全部语言哲学的发展,都淡漠得让人吃惊。麦卡拉(C. B. McCullagh)近来的著作^[50]就是一例。尽管这本书有着各种优点,却没有包含什么无法在20世纪40年代说出来的东西。

这并不意味着,从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到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之间的变化,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也许有必要区分叙事主义的三个阶段或三种形式。叙事主义的第一种形式体现在加利(W. B. Gallie)和劳奇(A. R. Louch)的著作中。^[51] 此种叙事主义可以说是心理学的,因为它关注于历史学家启动了其读者——如果他们要跟随他关于过去的故事的话——心灵中的何种心理机制。尽管针对这种心理学主义的研究路数可以提出严肃的反对意见^[52],倘若将其改造为一种有关修辞在历史编纂学中所起作用的理论,其中的有些部分就可以得到挽救。这就会将心理学主义的历史哲学,至少部分地改造成为一种纯粹的语言学的历史哲学。

在后一个阶段,覆盖律模型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灵感来源。^[53] 莫顿·怀特和丹图将历史叙事视作一系列的“叙事论证”(narrative argument)(用后者的话来说)。那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叙事涉及了可以藉由覆盖律而彼此关联起来的诸多事件。怀特和丹图在对此种关联的确切性质的看法上彼此有分歧,但却一致认为,通常所谓的“发生学说明”(genetic explanations)给我们提供了历史叙

[49] Walsh,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pp. 59ff; W. H. Walsh, "Colligatory Concepts in History", in P. Gardiner,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1974, pp. 127-145; L. B. Cebik, "Collig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he Monist* 53 (1969), pp. 40-57.

[50] C. Behan McCullagh, *Justifying Historical Descriptions*, Cambridge (Eng.), 1984.

[51] W.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New York, 1968; A. R. Louch, "History as Narrative",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pp. 54-70.

[52] 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1983, pp. 12-19.

[53] Danto, *History*, 249ff.; M. White, *Foundations*, chap. 6.

事的模型。丹图的著作实至名归,受到广泛注意,为此种关于历史叙事的眼光取得成功出力甚多。在英语世界关于历史哲学的论争中,丹图的著作扮演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与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之于中世纪相比拟的角色。丹图像阿奎那一样,成功地总结了已经成就的绝大部分东西;两人都把握了时代精神并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许多依然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阿奎那以其理性概念为未来打开了一扇窗户,而丹图以其对于历史叙事的兴趣给现代性赋予了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他对于覆盖律模型作用的坚持,则使得此种“叙事主义风尚”免于失控。这或许可以用来说明,历史哲学家们对于丹图对所谓“叙事句”(narrative sentences)的分析^[54]何以产生如此热情的反应,尽管就像墨菲(M. G. Murphey)所敏锐地指出来的那样^[55],这些叙事句对于理解历史编纂并无太大意义可言。因为,正如丹图所强调的,并非历史学家以新的方式来表述过去的的能力,而是他们提出新的解释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不断地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可是,更加重要的是,可以证明,对于一个可接受的历史叙事来说,与覆盖律相符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56]

最终,分析的解释学从来没有成为某种或多或少被清楚定义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起点,尽管,德雷、卡尔以及尤其是奥拉夫森(F. A. Olafson)等哲学家确实已经非常接近它了。^[57]我觉得这个事实不大好解释。或许,分析的解释学对于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一视角的反感,终究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对于覆盖律模型而论,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障碍)。富于启发性的是,卡尔尤其不满于敏克极具叙事主义特征的断言——“故事不是生活过来的而是讲述出来的”(stories are not lived but told)^[58],并且竭力将叙事“拉回到”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范围之内。同样的倾向在奥拉夫森的著作中也能看到。^[59]

于是,语言学的、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只是在海登·怀特的《元史学》问世时,才显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凯尔纳的评论非常精到:从来没有一位历史哲

[54] Danto, *History*, chap. 8; 丹图心目中的是类似“三十年战争始于1618年”这样的句子,它指涉了两个事件(战争的开始和它结束于1648年),而只描述了这些事件中的一个。

[55] M. G. Murphey, *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 Past*, Indianapolis, 1973, pp. 113ff.

[56]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p. 36-47.

[57] W. H. Dray, “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10 (1971), pp. 153-171; D. Carr, “Review of Paul Ricoeur, *Temps et récit*”, *History and Theory* 23 (1984), especially pp. 364ff.; D. Carr, “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 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 *History and Theory* 25 (1986): 117-131; F. A. Olafson, *The Dialectic of Action*, Chicago, 1979, passim.

[58] Carr, “Narrative”, p. 118.

[59] F. A. Olafson, *The Dialectic of Action*, Chicago, 1979, pp. 160ff.

学家写作过“一部如此充分而又坦诚的关于语言的著作”。〔60〕由于这部最具革命性的历史哲学著作已经在很多地方被仔细分析和讨论过,我只限于做出几点评论,倘若我们想要确定怀特在历史哲学论争的演进过程中的地位,那是必不可少的。〔61〕

当怀特将历史上的过去本身与文本相比较时,他的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就表露无遗了。〔62〕正如一个文本,过去具有某种我们试图发掘的意义,它需要解释,并且构成它的有词汇、语法、句法和语义的成分。因此,历史学家的作为,本质上就是将过去这一文本转换为历史学家的叙事文本。〔63〕这一转换程式总是受到四种转义——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中的一种或更多种的指引。怀特的很多读者被这一最具原创性而又最令人吃惊的观点弄糊涂了。他的论证倾向于以转义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编纂学,可以概括如下:当我们要去解释某个文本(比如有关过去的文本)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寻找一个指南,来向我们表明如何去理解这一过去的文本。这个指南就体现在历史叙事中:

作为一个符号结构,历史叙事并不重新创造出它所描述的事件;它告诉我们,沿着什么方向去思考事件,以及令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思想带上不同的情感强度。历史叙事并不**想象**它所意指的东西;它**在心里唤起**它所意指的东西的形象,正如同隐喻所做的那样……隐喻并不**描绘**它所想要刻画出来的东西,它**指出方向**来找寻与彼物相关联的那一系列形象。〔64〕

这关键的一段话告诉我们两点。首先,历史哲学就是在这里明确地放弃了认识论的路径,而变成一种语言哲学。那种天真的实在论——它认为,对于过去的历史记述就像是一幅画一样,通过认识论的纽带而与过去本身连结在一起——被弃置一旁;毋宁说,历史叙事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结构,是专门为着表明过去的某一部分而建造的。换句话说,历史学家的语言不是一种透明的、消极的介质,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就好像我们透过盖在一封信上的玻璃镇纸

〔60〕 H. Kellner, "A Bedrock of Order: Hayden White's Linguistic Humanism",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19 (1980), pp. 1-30.

〔61〕 H.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H.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1978; 要想准确断定怀特的地位,此书中的论文必不可少。

〔62〕 White, *Metahistory*, p. 30.

〔63〕 “过去是一个文本”这一断言可否视作不止是一个隐喻,还颇有疑问;显然,两者都可以被加以解释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其字面意义为真。

〔64〕 White, *Tropics*, p. 91.

能够看到上面写的东西一样。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所论证的^[65],历史学家的语言更有似于一座观景楼:我们不是透过历史学家的语言、而是从它所提出的视角来看过去的。历史学家的语言并不花费力气来让自己隐而不显,就像认识论模式中的玻璃镇纸那样,而是期望具有就像一件物品那样的坚硬和不透明的特性。我将很快回过头来讨论历史学家语言的不透明性。

其次,既然诸如“我的爱人是一朵玫瑰”这样的隐喻暗示着相似的视角,对于如何看待(过去)实在的某一部分提供了相似的指引,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叙事语言本质上就是隐喻性的或转义的。隐喻总是以彼物来表明此物;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隐喻,引导我们从我们知道与玫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东西的角度,来看我们心爱之人。然而,玫瑰并不是靠认识论纽带或认识论规则而与心爱之人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叙事正是以如出一辙的方式,而让将历史学家语言与其所关涉的过去绑定的全部认识论努力蒙羞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考虑丹图的观点:从逻辑角度看,隐喻与我们在“ m 相信 p ”这样的陈述中所碰到的内涵式语境(intensional contexts)极为类似。在这个陈述中,在 p 和 s 指涉同一事态时,不能由 s 来取代 p ,也不能由 q 来取代,即便 p 必定伴随着 q 。“内涵式语境具有这样的特性,因为它们所进入的句子结构是与特定句子有关的——或者说是与特定表现有关的——而无关于它们在那些语境之外所可能有关的无论什么东西。”^[66]对于隐喻而言也是如此,因为“隐喻表呈其主题,并且表呈其得以表呈的方式”^[67]。隐喻和历史叙事两者都展现出此种内涵性,并且因此就具有一种自我指涉的成分;就倘若我们要对它们的真实性或合理性作出评判,那么它们得以表达的方式本身也需要纳入考虑而论,它们就指涉着它们自己。隐喻和历史叙事有着我们通常只会与事物或物体联系在一起的密度和不透明性;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们是物。^[68]怀特和丹图的论证加在一起的效力,就此可以证明历史叙事和隐喻两者都具有的指涉上不透明的特性,并且因此彰显出作为所有认识论历史哲学的特征的那种对于语言

[65]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 223.

[66] A. C. Danto,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Cambridge (MA), 1983, p. 187; 此书比之作者的《分析的历史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书对于历史哲学家而言有更多启迪。

[67] Danto, *Transfiguration*, p. 189.

[68] 对这一论断的正式论证,参见拙文《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六条论纲》(收入本读本)。毫不奇怪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于语言之为某物有着类似的直觉(将语言视作透明的这种观点更适合于17世纪以来才出现的科学)。见 M.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1973, pp. 34-46.

透明性的信念的根本缺陷。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给我们提供经由某种转换规则而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对于那一过去的反思或那一过去的模式^[69],而是提出一种或多或少具有自律性的可以用来理解过去的工具。人们可以赞同拉卡普拉(D. LaCapra)机敏的评论:怀特的理论强调叙事的“制作的”(making)或“诗性的”(poetic)功能,付出的代价则是一直以来与实证主义强调模仿的认识论(mimetic epistemology of positivism)如影随形的“匹配”(matching)功能。^[70]

这一洞见可以用来澄清怀特论点中让其众多读者困惑不已的一个方面。他的修辞性的转义是在何种层面上运作的?是否隐喻的、转喻的(以及别的)还原是在过去本身之上运作,因此只有以隐喻的、转喻的方式与过去某些部分发生关联的东西才会在历史叙事中被提及?或者,是否隐喻的、转喻的关系只应该被视作出现在我们对于过去的言说的层面上?或者,还有第三种可能性,是否隐喻、转喻等等只在从过去本身到我们的“叙事性”语言的过渡中运作?然而,一旦我们就像怀特那样,拒斥了将历史学家语言视作过去的一面镜子的传统认识论预设,提出这一问题就不再有什么意义,而怀特正确地没有对此给出任何一种答案。

在说明了历史叙事本质上是隐喻性的特征之后,怀特提醒我们,隐喻只是四种转义中的一种。怀特在这里是在追随维科,但是他也从诸如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等诸多不同的著作家那里寻求奥援。^[71] 他的风格库存中就包含了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现在我们或许会自问,是否可以设想,存在着更多的转义——或者可能甚至是更少的,是否两种或者更多种转义实际上可以还原为一种。怀特试图表明,在各种转义之间有着某种逻辑序列,隐喻导向转喻,转喻导向提喻,提喻导向讽喻,而讽喻最终又将我们带回到隐喻。^[72] 倘若我们认为怀特的论证无懈可击,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四种转义所组成的体系既未显示出空隙,也未显示出重复。应该注意到,一方面,这一论证路线的好处是,所有历史写作现在都可以被纳入怀特的风格图式之中;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不那么让人想要的结果,那就是所有有意义的历史讨论的目标和过程

[69] White, *Tropics*, 88.

[70] D.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Ithaca, 1983, p. 76.

[71] White, *Tropics*, pp. 5ff.; 尼采年轻时在巴塞尔任教授期间所开设的修辞学课程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见 P. Lacoue-Lebarthe and J. Nancy, "Friedrich Nietzsche: rhétorique et langage", *Poétique* 2 (1971), pp. 99-141.

[72] White, *Tropics*, p. 5; 有趣的是,早在16世纪拉·珀普利尼勒(La Popelinière)就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见 G.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Urbana, Ill., 1971, pp. 161ff.

都被预先决定了:历史论争注定了要依照四种转义的循环。可是,倘若怀特在断言确实可以在历史著作史中看到历史风格的这种 *corso e ricorso* [循环往复] 时乃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而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这当然就会导致某种语言学的、叙事主义的路径登堂入室。因为,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四种转义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关历史学家语言的一桩事实)而不是历史素材,在历史写作和历史探讨中成为了指南。这样一来,怀特对于“语言的强制”的敏感就变得比之罗蒂的还更加显著。

一场从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到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的革命,就是这样在怀特的著作中上演的:这场革命使得历史哲学最终追赶上了自奎因、库恩和罗蒂的工作以来哲学的发展。

三、前瞻

怀特的成就可以总结如下:首先,虽然姗姗来迟,历史哲学最终还是完成了语言学的转向,并成为当代思想场景的一个部分。其次,放弃了对说明和描述的强调这一来自实证主义阶段的遗产,转而关注历史解释。第三,对于历史研究中细枝末节的纠缠,被代之以对于历史论著整体性的兴趣,以及对于最需要引起历史哲学家关注的东西绝大部分只出现在那个层面上的认识。第四,既然叙事语言逻辑上是一个物,而物并不具备认识论上的关系,就可以舍弃认识论范式。第五,正统认识论观点的那种传统的将过去事物与历史学家语言相比较的两分法,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或正当性。第六,有关某一历史课题,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这一传统的选择问题,被改造成了一个关于风格(*style*)的问题。人们承认,风格不只是历史写作的特色:用盖伊(*Peter Gay*)的话来说,风格不只关系到历史编纂的特征(*manner*),而且也关系到其实质(*matter*)。^[73]再就是,第七,既然过去的陌生性(*strangeness*)不再被还原为在覆盖律中、在规范(*normic*)陈述中(斯科利文)或者在行动哲学原理中所体现的那种让人安心的确定性,认识论传统的那种反历史主义姿态就得以避免。

由这一视角出发,还可以、也应该就利科的新作《叙事与时间》稍作评论。或许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哲学领域中还没有哪一部著作表现出如此

[73] P. Gay, *Style in History*, London, 1975, p. 3.

宏富的学识,对迄今为止该领域的进展作出了如此持平的评判,体现出如此卓越的天赋而能够综合各种彼此不同而相去甚远的传统。这部权威著作是历史哲学的一块里程碑,是所有对叙事主义有兴趣的人所必须认真研读的。在利科的著作中,我们碰到了两个熟悉的怀特式的论点。利科同样相信,历史叙事本质上乃是隐喻的。而且,在他讨论他所谓的模仿(mimesis)——这是一个不恰当的用词,因为它暗示了叙事主义所一直反对的认识论传统中的诸多因子——时,利科就像怀特一样强调历史学家语言相对于过去的自律性。然而,由此开始,利科就远远落在了怀特的后面;因为这两个洞见都没能促使利科去探究一下历史学家的语言。这就仿佛我们被带到了一个新发现的世界,却不被允许摘下蒙在自己眼睛上的布罩。利科在论述怀特的叙事主义时完全忽略了转义理论,这就颇能说明问题。尽管他坦言自己意识到这样的做法对怀特不公平,其结果还是不可避免地使后者的观点变成了一具没有心灵的躯体。^[74]

我相信,利科从叙事主义传统退回到认识论传统,有两个原因。首先,在利科看来,叙事“当其成为时间性存在的一个条件时就获得其全部意义”。^[75] 时间是人类个体所经历的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一事实必须体现在历史学家的叙事中。也是出于这一点,利科才反对敏克的观点;在后者看来,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解释永远是一种综观(seeing together),而不是对历史发展各个单独阶段的逐一回顾(reviewing seriatim)。^[76] 因此,利科就倾向于以认识论传统所一直指示的方式,将历史叙事与过去绑定在一起。其次,无疑是因为其现象学背景,利科想要将历史叙事牢牢地限制在单个历史当事人的视角的范围之内。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就是,利科在其著作各处中讨论冯·赖特的《说明与理解》(*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时都流露出深深的敬意,而大多数历史哲学家都根本不会将冯·赖特的著作划入叙事主义的阵营。这两方面的结果都是叙事主义被折断了翅膀。同样表明了利科这一倾向的,是他提议以“准人物”“准情节”或“准事件”的方式,来对无法轻易还原至以一种实在论的或者拟人式的方式来处理的过去的那些方面,进行重新描述(例如,他就是这样来处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的)。于是,利科就试图通过提出对于过去的各个宏大部分的全景式的观点,来缓和历史编纂的叙事主义意蕴。

[74] P.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Chicago, 1983, p. 163.

[75] Ibid., p. 52.

[76] Ibid., pp. 155ff.

我说怀特的叙事主义比之利科的要远为发达,并不是说怀特的体系就不能加以完善了。倘若我们再次以科学哲学新近的发展作为背景,来衡量历史哲学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就此而言,罗蒂的观点同样是最具启发性的。他的著作本质上乃是对于自从笛卡儿以来的认识论传统的攻击。这一攻击具有历史的和理论的两个维度。从历史角度看,认识论的关切在17世纪之前并未出现。在那时之前,哲学并不需要认识论,因为作为内心(*forum internum*)的现代心灵的概念——在其中映照(*mirrored*)了有关世界(以及有关物质性的自我)的真理——是由笛卡儿首次创造出来的。^[77]在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传统看来,观察(*seeing*)就是认识(*knowing*),而不仅仅是从事认识的心灵即这一 *forum internum* (内心)的一个要件。^[78]亚里士多德派满足于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一世界的知识,而笛卡儿式认识论却引入了 *forum internum* 这第三个概念,在这里,世界有着它自身的镜像,而我们审视其光滑的表面以获取知识。认识论被赋予了一个任务,要将由于认识主体为着这一 *forum internum* 丢弃了实在、而在无意中制造出来的这道鸿沟救平。罗蒂以其非凡的机敏和才智,将过去与我们所有人都接受的那种对过去的辉格式的编码区别开来,成功地表明为何此种笛卡儿式的对 *forum internum* 的设定应该被视作现代哲学——认识论与现代科学哲学——的诞生地。因为自笛卡儿以来,所有哲学家都一致认为,此种 *forum internum*——人们相信可以清晰地阐明其运作——乃是一切真理与理性的唯一圣殿。唯有那些与来自 *forum internum* 的规则相一致并服从于来自那里的裁断的信念,才可以算作知识。当然,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西方哲学中这一演进过程的最高点。这就有了自从中世纪以来大多数西方哲学所特有的、那种从心灵的(先验自我的)知识到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的推论。

然而,罗蒂并不满足于仅仅证明,我们对于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信赖不过是一桩历史上的偶然。他的著作中最大的一个部分(借助于从维特根斯坦、奎因、戴维森和库恩的论著中抽取的论点)致力于摧毁这一作为真理储存地的非历史的 *forum internum* 概念。他表明,倘若所有因为接受了 *forum internum* 概念而产生的心灵论语言都被清除掉,也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失。^[79]结果,我们所理解的认识论——往少里说——就是一桩其 *raison d'être* (存在理由)

[77] Rorty, *Mirror*, p. 50.

[78] *Ibid.*, p. 45.

[79] *Ibid.*, p. 2.

极为可疑的智识事业了,而罗蒂鼓励我们以他所谓的认识论行为主义(epistemological behaviorism)来取而代。那就是说,不应该将涉及语言与实在之间关系的问题转换成有关我们心灵运作的问题;只有弄清楚我们实际上相信什么以及我们这样做是出于何种原因,这些问题才能够解决。简而言之,认识论者力图去解答的问题,只能通过考察科学研究的结果才能加以解决;而语言如何与实在相关联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科学问题。罗蒂毫不迟疑地嘲笑哲学家们以为他们既有义务、也有能力去“建立”各门科学的荒唐主张。

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门学科都有它所偏重的哲学难题。对于各门科学而言,这个哲学上的棘手问题不是认识论,而是形而上学。各门科学和形而上学都号称要去探究实在的性质,因此它们彼此就是天然的对手。形而上学而非认识论,遭受了现代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最为沉重的打击。认识论得到容忍,是因为它被当作懒惰的哲学家们无关紧要的消遣,不会带来真正的伤害。另一方面,在历史编纂学中则是相反的情形。历史学家们能够对关于过去的终极性质的形而上学探究淡然处之。就像认识论乃是——在罗蒂看来——哲学家对于本质上是科学的问题的回答一样,思辨的历史哲学乃是哲学家处理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疑问的方式。然而,比如说,覆盖律模型和分析的解释学的认识论其实是可以让历史写作脱离其原先轨道的。我们知道,分析的解释学的胜利意味着历史编纂的终结,这一点毋庸多说。因此,伽达默尔将方法而非黑格尔或马克思视作各门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正确的。于是,罗蒂对于认识论的指责就没有比之在历史编纂中的情形更为切题的地方了。

由此看来,可以说,怀特历史哲学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并没有完全摆脱“基要”认识论的色彩。怀特本人认识到了他的某些观念的康德式特征,他所分派给各种转义的角色与对知识进行综合的康德式范畴极为相似,这一点也不可否认。另一方面,既然怀特对于转义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见上文)并无太多明确说法,恐怕就很难断言说,怀特的转义学乃是基要认识论(foundational epistemology)的另一个变种。此外,倘若推论下去,他关于每一种转义都会被另一种所取代的论点,就使得转义的纯然语言性的、非认识论的性质得以强化。可是,不管我们怎样看,本质上只有四种表现过去的方式这一观点,终究难以摆脱其不那么让人愉快的“基要论的”色彩。

现在,我们抵达了一个有利位置,可以一览历史哲学的大致前景。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坚定地抵制笛卡儿式的隐喻——认知主体或者他所使用的语言

具有如同玻璃一样的特性——的诱惑。我们不是透过语言来看到(过去的)实在;历史学家的语言不是一个想要将自己隐去的媒介。卡勒(J. Culler)很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为认识论所包裹着的哲学与科学总是“旨在让写作终结”。^[80]人们相信,如果一个问题得到解决,关于它的写作就走到了尽头;透过写作和语言,我们就会看到自然和实在本身的运作。尤其是在历史编纂学中,这幅图景完全是误导性的。在历史编纂中,“怪异的是,一个解释越是有力和具有权威性,它所引发出来的写作也就越多”。^[81]史学史领域内的那些巨著,兰克、托克维尔、马克思、布克哈特、赫伊津哈、梅尼克和布罗代尔的著作,并没有终结某一场历史论争,也不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们现在总算知道过去的事情确实是什么样子,而我们终于获得了对它的清晰了解。相反:这些著作被证明最强有力地激发了更多的写作;因而,它们的效果是让过去与我们疏离,而不是将其放在某一个史学博物馆的展台上,好让我们可以从所有可能的视角来审视它。

真正具有兴味的历史文本,并不是(通过将历史问题清单中的某一项拿走)“清除自身”,而是与它自身具有一种**隐喻**的关联。由于它激发了更多的写作,它就具有这样一层意义,在那里它就像一个隐喻一样,意指的东西并非它字面上所说的东西。德里达为此使用了**延异**(différance)和**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这样的词语。德里达关于文本可能有别于它们自身(这是它们所具有的一个最为奇异的特点,让德里达选用了**延异**一词而非常规的法文词**差异**[différence])的这一论点,其实用历史文本来说明是最好不过的。就像我在别的地方所指出的,倘若关于某些历史论题,我们只有一种历史解释,我们就没有解释可言。^[82]考察过去的一种解释方式,只有在考察过去的**其他方式**也现身的时候,才能够被人们认识到。叙事性解释相互界定,并且因此它们的自性(identity)就来自于它们的文本间关联。

于是,历史编纂中要达到最大程度的清晰性,就有赖于历史解释的**繁荣滋长**(proliferation)而不是企图去**减少**其数量。因此,历史编纂学就永远也不能够遗忘它的过去;即便我们当下所拒斥了的过去的解释也应该被记住,如此方可对我们眼下所选取的解释的自性进行界定。这一有关繁荣滋长的论点,也要求

[80] J.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London, 1983, p. 90.

[81] Ibid.

[82]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 239.

我们尊重每一个历史解释的独特性和延异。因此,我不赞同怀特以四种转义来将叙事性解释归类的做法。而且这种做法还会在实践中带来弊病。我们不可忘记,在理论争议的热潮中,有时候(新的)历史材料会成功地令某些历史解释站不住脚。我们已经看到,在怀特的分析里有着某种或许是他无意中出现的倾向,而将历史争议看作纯然是语言上的。那就走得太远了。这里我们必须牢记两件事情。首先,叙事性解释是由历史学家创造出来以便赋予过去的某个部分以意义的工具——语言制品(linguistic object)。有关历史解释的优劣之处的争议,当然就是有关这些语言制品的争议。然而,我们切切不要忘记,归根结底是历史学家所提及的历史材料让它们成为它们所是的那种制品的。其次,从隐喻性解释到转喻性解释、又从转喻性解释到提喻性解释等等这样的前后相继,无法给解释是否成功提供一个标准。这不是因为那是一个坏标准,应该被更好的标准所取代,而只是因为每一个历史解释,都已经自身就是一个解释是否成功的标准。因为,每一个历史解释都可以看作是在意味着:“如果你从这个视角来看过去,这就是你理解过去的某个部分的最佳保障。”每一个历史解释本质上都提出了一个标准:倘若我们想要理解过去的某个部分,我们应该满足哪些要求。

可是,是否就没有用来衡量这些标准的标准呢,怀特也许会反对这种看法。我并不这样看,因为我认为这样两套标准必定会结合在一起。不可能满足了较高的那套标准而没有满足较低的那一套,反之亦然。如果说一个解释在一个层面上是健全的,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则不然,这样的说法毫无意义(显而易见,我在这里谈的不是人们要去解释的过去的若干单独的部分,而是过去的同一个部分)。因此,对于历史编纂而论,不存在有意思的而又普遍适用的标准,可以用来区分令人满意的和让人不满意的解释。(我特意使用“有意思的标准”这个说法,因为历史学家不该比如说误读史料,并且应该避免犯下费希尔让我们留意到的那种逻辑错误,这一点显而易见。〔83〕)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在某些论题上所恰好拥有的各种历史叙事之间的文本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倘若要到任何地方去找寻这些标准,那么,它就在关于这一论题所实际写作出来的这些历史叙事之中。在这些叙事之外,就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标准来判断解释的确定性和有效性,不管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在这里我显然重复了(但是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如今已经颇为熟悉的罗蒂对于认识论基要主义的拒斥。历史编纂本身就是其解释确定性的来源,而不是应用某些预先就给定的此种确定性的

〔83〕 D. H.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London, 1971.

结果。就像冬季就要结束时覆盖着浮冰的一条水渠,过去被一层厚厚的叙事性解释的壳所覆盖着;历史争议在同等程度上,既是有关这层壳的构成成分的争议,又是关于隐藏在它下面的过去的争议。

怀特之前认识论历史哲学最显著的失败,就是无视叙事性解释这层厚厚的壳。人们没有看到这一事实:历史学的分歧不仅关系到过去本身,而且也关系到历史学家创造出来以理解过去的语言制品。有关历史编纂的最有兴味的问题——为什么历史学家会在对于**特定**历史论题(不能将问题普遍化)的解释中青睐这一种而非另外一种——从来没有被提出来过。这就好像是科学哲学家们从来没有试图处理科学知识的增长,而将自己局限在如何确定单个数据的问题上,对于理论和概念形成并不措意。因为,如果说在历史编纂中有什么东西与各门科学中的理论形成颇为相似的话,那就是历史解释而不是对于单个历史事实的描述或说明(认识论传统则对此兴致盎然)。

在历史学中的解释(其结果常常是诸如风格主义[Mannerism]和冷战这样的新概念的引入)与科学中概念和理论形成之间的相似性,甚至还会是解决科学哲学中的问题的一个有用的指南。在一篇精彩的论文中,麦金太尔认为,在库恩的范式变换中,得到青睐的范式,是让我们能够对于导致这一范式转换的科学史中的那一部分讲出最有说服力的故事的那一种。^[84]可以揣想,至少某些困扰了当代科学哲学家的问题,比如概念形成或者各种科学理论的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问题,可以通过考察在历史学争议中所出现的情形而得到直观(*ad oculos*)的证明。因为,我们在科学史上相对罕见的科学革命时期所发生的这类争论,在历史编纂中却随处可见。而且,在叙事主义者关于历史学语言相对于过去的自律性的论点,与自从拉姆赛(F. Ramsey)以来对于科学理论的模型——理论的和工具主义的解释之间,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由此,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比之覆盖律模型理论家所提出的远为报偿丰厚而意趣盎然的角度来加以研究。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让人好奇甚至让人沮丧的怪事。谁没能够看到自从库恩以来科学哲学如何深刻地让自身历史化了呢?历史哲学却不知道怎么搞的,完全忽视了科学哲学前沿的这一变化。奇怪的是,当代科学哲学要远比历史哲学历史主义得多——当然,除了怀特以来的反认识论的叙事主义传统以外。

[84] A. MacIntyre, "The Relationship of Philosophy to Its Past", in R. Rorty, J. B. Schneewind, and Q. Skinner, eds., *Philosophy in History*, Cambridge (Eng.), 1984, pp. 31-49.

这就是当代历史哲学的困境。历史哲学是延续其古典认识论的传统,还是准备探索本文所描述的那种哲学问题呢?倘若在接下来的四年内,历史哲学满足于成为当代思想界中一块古里古怪的实证主义的化石,那就让它依旧是认识论的吧。然而,如果历史哲学家们有勇气摆脱他们自己的过去,并且真诚地期望着能够提出一种不仅对于历史编纂、而且对于在其他哲学学科内目前正饱受争议的问题的更好的理解,它就必定要成为叙事主义的。

【本文原载 Frank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25. *Knowing and Telling History: The Anglo-Saxon Debate*, 1986, 收入其文集 *History and T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著

彭 刚 译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六条论纲

安克斯密特此文,是对他的出道之作《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一书中主要论点的概括。安克斯密特成为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之后,还颇为重视这部著作,认为自己主要的理论立场均由此发端。在这份论纲中,安克斯密特提出了如下一些观点并将它们相互关联起来:史学理论有必要将(确定事实的)历史研究和(提出解释的)历史写作区分开来;历史文本的整体性特征,并非构成它的单个陈述所能具备;历史叙事的整体意义远远超出其单个陈述的综合;历史叙事的结构并非历史实在本身所具有,历史叙事或解释是历史学家用来看待过往的一种提议等等。此文篇幅虽小,却凝结了丰富的内容。

1. 历史叙事是对于过去的解释。

1.1. 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和解释(interpretation)这样的术语比之描述(description)和说明(explanation)这样的术语为我们理解历史学提供了更好的线索。

1.2. 我们做出解释,不是在拥有的史料太少的时候,而是在其太多的时候(参看4.3)。描述和说明要求的是“合适”数量的素材。

1.2.1. 科学理论不够确定,是因为很多种理论都可以说明已知的材料;解释不够确定,是因为只有很多种解释才可以说明所有已知的材料。

1.3. 解释不是转译。过去并非一个需要转译为叙事史学的文本;它需要的是解释。

1.4. 叙事性解释并不必定是成序列的;历史叙事只偶然地才是有着开端、中段和结尾的故事。

1.4.1. 历史时间是西方文明一个相对晚近而又高度人为的发明。它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哲学概念。因此,在时间概念之上建立叙事主义,就是要在流沙上筑屋。

1.4.2. 叙事主义可以说明时间而不是由时间来说明它(见2.1.3和4.7.5)。

1.5. 二十年之前,历史哲学是科学主义的;人们应该避免相对立的极端,也即将历史学视作一种文学形式。历史主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道;历史主义保留了对于历史学的科学主义的和文学的取径,而避免了两者中的夸诞之处。

1.5.1. 历史学提出对于社会历史性实在的叙事解释;文学则应用它们。

1.6. 在史学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确定的界线(见4.7.5和4.7.7)。

2. 叙事主义接纳如其所是的过去。用同义反复的形式来说:它接纳有关过去的不成疑义的东西。不成疑义的就是历史事实。后一陈述的两种含义都是真确的(见3.4.1和3.4.2)。

2.1. 有必要在历史研究(事关事实问题)和历史写作(事关解释问题)之间作出区分。其间的分别有似于但绝不雷同于科学哲学中对观察陈述和理论之间所作出的分别。

2.1.1. 历史研究的结果以陈述表达;叙事解释则是成系列的陈述。

2.1.2. 有意思的分别不是单称陈述与全称陈述之间的分别,而是全称陈述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分别。对这两者,单称陈述可以一仆二主。

2.1.3. 对时间的断定在陈述之中表达出来,而并非由陈述表达出来,并且因此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对于它就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关注的是陈述而非它们的各个部分(比如时间性的暗示)。

2.2. 在有关历史研究的哲学和历史叙事的构成成分(各项陈述)之间有着某种亲和性。有关历史写作的哲学与就其整体而论的历史叙事则有着类似的关联。

2.2.1. 除了个别例外(沃尔什、海登·怀特和明克),当代历史哲学只关注到历史研究。

2.2.2. 当代哲学因其对于(叙事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排斥,而无法理解历史叙事。

2.3. 历史学家所面对的最为关键也最有意思的思想挑战,出现在历史写作的层面上(选择、解释、如何看待过去)。根本而言历史学家不止于是柯林武德笔下找寻约翰·道伊谋杀者的侦探。

2.4. 因其只关注到历史叙事的构成成分,行动哲学无从推进我们对于历史叙事的洞识。

2.4.1. 行动哲学无法讨论人类行动未曾意料到的结果。作为一种历史哲学,行动哲学只适用于前历史主义的史学编纂。由于不可能超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局限,就历史学而言它就太天真了一些。

2.4.2. 冯·赖特和利科为着行动哲学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并不成功。历史意义有别于当事人的意图。

2.4.3. 要讨论意料之外的结果,就是要进行解释(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的视角与历史当事人的视角并不一样)。

2.4.4. 逻辑关联论证(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是叙事主义的一个特例(就其提供了有关过去的知识是如何编排起来的一个逻辑框架而言)。

3. 叙事主义是历史主义的现代传人(千万不要与波普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搞混淆):两者都认识到,历史学家的任务根本上乃是解释性的(也即在多样性中发现统一性)。

3.1. 解释力图获得作为事物特征的统一性(见4.4)。

3.1.1. 历史主义者力图发现本质,或者,照他们的说法, *historische Idee* (历史理念),那在他们看来是存在于历史现象本身之中的。与此相反,叙事主义认识到,历史解释将一种结构投射到过去之上,而非去发现它,仿佛这一结构就存在于过去本身之中一样。

3.1.2. 历史主义是一种有关历史的概莫能外的理论,倘若我们将它从一种有关历史现象的理论转换成为有关我们对于过去的言说的理论的话(这样一来,形而上学的东西就必定变成语言学的东西了)。

3.1.3. 倘若情节 (*plot or intrigue*) 概念指的是存在于过去本身之中的结构或故事的话,这一概念就是对于历史主义或叙事主义的实在论的毫无必要的让步。

3.2. 历史叙事并非投射(于过去之上)或者是对于过去的反思,通过那些起源于或者是我们对于社会的日常经验、或者是社会科学、或者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转换规则而与过去相关联。

3.2.1. 叙事性解释是论旨而非假说。

3.3. 叙事性解释运用于过去,然而并不(像[某些]陈述那样)对应或指涉它。

3.3.1. 当前诸多有关历史叙事的哲学都沉迷于对于陈述的描绘。

3.3.2. 叙事性语言相对于过去本身而言是自律的。当且仅当此种自律被认识到,一种叙事哲学才会有意义(见4.5)。

3.3.3. 叙事性解释“将你从历史实在中超拔出来”,而且不再(像陈述那样)“将你送回去”。

3.4. 在叙事性语言中,语言和实在之间的关联彻头彻尾地“被动摇了”(见5.1.2)。

3.4.1. 认识论对于有关历史研究的哲学而言很要紧,但对于有关历史写作的哲学或者叙事解释的哲学而言却无足轻重。

3.4.2. 认识论研究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联——只要此种关联还是坚固稳定的,它看不到科学和历史学中真正的问题所在,那些问题只有在困扰着认识论的问题被视作不存疑义之后才会出现。基要主义 (*foundationalism*) 关注的是基本上毫无意趣的东西。

3.4.3. 对于“历史描述的合理性何在”的哲学探讨,是对历史学家智力成就的暗中否定和贬低。

4. 叙事性语言不是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

4.1. 叙事性语言以并不指涉(refer)或对应(correspond)于过去的某些部分或层面的方式来展示(show)过去。就此而论,叙事性解释有似于时装设计师用模特来展示他们服饰的特质。语言被用来展示从属于不同于它的世界的东西。

4.1.1. 叙事主义是一种建构主义,它并非关于过去或许是什么模样,而是关于过去的叙事性解释。

4.1.2. 叙事性解释是格式塔。

4.2. 从逻辑上说,叙事性解释具有(从某种角度来看待过去的)提议(proposal)的性质。

4.2.1. 提议可能有用、有益,也可能不是这样,然而,它不会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历史叙事也可以作如是观。

4.2.2. 在思辨体系与地道的历史学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被运用着。思辨体系被用作其他叙事所要依循的主导性叙事(master-narratives)。

4.2.3. 历史写作与形而上学所共有的是界定实在(的部分)的本质,然而,历史写作因其唯名论而不同于形而上学。

4.3. 叙事性解释不是知识,而是对于知识的编排(organization)。我们的时代因其信息过剩,相比于知识的获取而论,它所面临的问题更其是知识和信息的编排,它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关注叙事主义的后果。

4.3.1. 就叙事性解释而论,认知主义(cognitivism)乃是一切对于历史叙事的实在论误解的源泉。

4.4. 从逻辑上说,叙事性提议具有物(而非概念)的特性;像物一样,它们可以被言谈,而无须成其为谈及它们的语言的一部分。这里使用语言的目的,是建构一个叙事性解释,它本身处于语言的范围之外,尽管解释是由语言“制成”的(类似的情形是,“椅子”一词的意义不能被化约为该词的各个字母)。

4.4.1. 叙事性解释跨越了我们所熟稔的物的领域与语言的领域之间的疆界——就像隐喻一样。

4.5. 例如,有关17世纪危机的一场史学争论,并非关于实实在在过去,而是关于有关过去的各种叙事性解释。

4.5.1. 我们对于过去的言说被一层厚厚的壳所覆盖,这层壳关系到的不是过去本身,而是历史解释以及就相互竞争的历史解释而进行的争议。叙事性语

言并不透明,不像是一个玻璃镇纸,我们可以透过它毫无阻碍地看到过去本身。

4.6. 叙事性语言相对于过去本身的自律,绝不意味着叙事性解释就会是任意武断的(见 5.3,5.6)。

4.6.1. 有关过去的事实可以是支持或者反对叙事性解释的论据,然而却无从决定这些解释(事实只能够证明或者否证有关过去的陈述)(见 1.2.1)。唯有解释能够证明或者否证解释。

4.7. 叙事性解释可以有其专名(比如 17 世纪的总体性危机、冷战、风格主义,或者工业革命)。然而,大部分情况并非如此。

4.7.1. 叙事逻辑是严格的唯名论的。

4.7.2. 诸如风格主义这样的名辞指的是历史解释而非过去实在本身(“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风格主义?”“佩乌斯纳的风格主义”)

4.7.3. 这并不是说,这些名辞漂浮在一个与历史实在本身无关的领域之内(例证:风格主义一词指的是某个叙事性解释的诸多陈述,而这些陈述指涉了历史实在本身)。

4.7.4. 叙事性解释没有存在论上的蕴涵(比如说,工业革命并非历史实在中一个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直到 1884 年阿诺德·汤因比^[1]写作《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都没有人注意和发现,而是为着理解过去而提出的一个解释工具)。

4.7.5. 不过,倘若一个叙事性解释在一段长时期内都没有遭到质疑,被所有人接受,并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其历史学的特性),它就转变为一个(一类)事物的概念。一个叙事之物(见 4.4)就变成一个实在之物。这就是我们关于事物(类比)的概念产生的情形。分类程序决定了什么东西依然是解释性的,什么是实在的;在何者为解释、何者属于实在之物的范畴之间没有什么固定的和绝对的分野。

4.7.6. 物(的类别)的概念(比如“狗”或者“树”)在逻辑上比之叙事性解释更为复杂,因为它们预设了在后者的情形中不存在的分类程序。解释在逻辑上先于我们的事物类别(的概念)。本体论是解释的系统化。

4.7.7. 隐喻和叙事性解释构成我们语言的基础。

4.7.8. 没有分类的理论,叙事主义就是不可能的。没有了它,我们必定误入歧途。因而事物(的类别)比之叙事性解释更为根本。

4.7.9. 要让诸如冷战或者风格主义这样的词获得稳定的意义,就等于要求

[1] 此汤因比是后来写作《历史研究》的那位更著名的汤因比的叔父。——译注

停止史学争论。历史写作不以定义为预设,而以其作为结果。

4.7.10. 诸如冷战这样的概念是成系列的陈述,它们在逻辑上有别于理论概念。

4.8. 因果说明——比如说,按照覆盖律模型的路数——只在历史研究的层面上(以及在历史叙事构成成分的层面上)有其功用:我们不应该追问冷战的原因,因为这个术语指涉的是一个叙事性解释。追问一个历史解释的原因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人追问冷战的原因,实际上是在追问对于1944年到1990年代初各种事件的一个有力的解释,而非追问两个单独系列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

5. 历史叙事的各项陈述总是有着双重功用:(1)描述过去;以及(2)将对于过去的某个具体的叙事性解释进行界定或个别化。

5.1. 从逻辑上看,历史叙事和隐喻只包含了两种操作:(1)描述;以及(2)对某个(隐喻性)观点的个别化。历史叙事是一个持存的隐喻。

5.1.1. 隐喻表明的是隐喻性话语以别的东西来谈及的是什么(比如,“约翰是头猪”);类似的是,历史叙事以并非过去的东西(也即,某个叙事性解释)来表明过去(见4.1)。

5.1.2. 历史叙事因其相对于历史实在的自律——在历史叙事中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总是不稳定的——而像隐喻一样,乃是新的意义的诞生地。为人所公认的、字面上的意义则需要语言与实在之间的稳定关系。

5.2. 分别来看的某个历史叙事的个别陈述的(字面)意义与整体来看的历史叙事的(隐喻性)意义之间的不和谐,正是历史叙事的涵盖面(scope)所及。这表明了编年(与单个陈述相对应)与历史叙事(与作为整体的叙事中的各个陈述相对应)之间的差别。一个任意拼凑起来的陈述系列没有涵盖面可言。

5.2.1. 仅当就其整体而论的历史叙事的(隐喻性)意义超出了其单个陈述的总和的(字面)意义之时,历史叙事才成其为历史叙事。因此,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叙事,就是一个程度问题。

5.2.2. 历史叙事就像脚手架:在攀登上了其单个陈述的台阶之后,人们的视野之所及,远远超出台阶建基于其上的那片地域。

5.2.3. 历史学家提出(隐喻性)叙事涵盖面的能力,是其智力装备中最让人敬畏的一样。

5.3. 最好的历史叙事是最具隐喻性的历史叙事,有着最大涵盖面的历史叙

事。它还是最“冒险”或者最“有勇气”的历史叙事。相较而言,非叙事主义者只会青睐没有内在条理而缺乏意义的历史叙事。

5.3.1. 一个历史叙事的叙事涵盖面不能只考虑到那一历史叙事而得以确定。只有在人们将叙事性解释与相互竞争的各种解释进行比较时,叙事涵盖面才会出现。如果关于某些历史论题我们只拥有一个叙事性解释,我们就没有解释。

5.3.2. 因此,历史学的洞见只出现在相互竞争的叙事性解释之间的空间中,而不能将其等同于任何特定的解释(系列)。

5.3.3. 认知性的知识(cognitive knowledge)与人们用来表达它的语言手段(单称陈述,全称陈述,理论等等)就是同一回事;史识(historical insight)置身于各种叙事性解释之间的空白的叙事空间之中(这么说吧,它是立体的)。

5.3.4. 史识就存在于史学争论中并且是由史学争论产生的,而不是由史学争论的个别层面产生的,因而也就不是由孤立于其他解释的单个叙事性解释产生的。

5.3.5. 史学争论归根结底不是旨在达成一致,而是解释性论旨的繁荣滋长。历史学的目标不是将叙事之物转化为实在之物(或者它们的类概念)(见4.7.5)。相反,它试图消解那些看似已知的和不成疑问的东西。它的鹄的不是将未知的还原为已知的,而是使看似熟悉的东西陌生化。

5.3.6. 此种对于分歧和史学争议的强调,就要求我们拒斥笛卡儿式的或者康德式的那种可以互换的先验认知主体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更为可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经验和知识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互动,而非被某种先验主义的形式化的图式所决定了的抽象。与此相似的是,历史解释是从各种解释的互动之中产生的,既不应该将其归功于某个具体的个别的解释,也不能将其归功于某个超历史的、先验的主体。

5.4. 叙事涵盖面在逻辑上独立于价值领域;因此,历史叙事并不必定就得为了具有较大的涵盖面——也即,为了客观——而保持价值中立(比如说,波普、塔尔蒙、阿伦特等人提出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概念并非价值中立的,却具有很大的涵盖面)。

5.4.1. 历史学家乃是职业的“旁观者”:他总是企图去弥合他自身与历史实在之间的鸿沟,这同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鸿沟是一回事,而那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所试图去弥和的。因此,伦理的维度在历史学中无处不在。现代历史学是以政治决断作为其根基的。

5.4.2. 隐喻与叙事将“是”与“应该”连结起来——一个历史解释的断言陈述当中的“是”，或许就表明了“应该”做的是什。

5.5. 莱布尼茨概念原则中的谓词是历史解释的逻辑之中关键性的原理。与历史叙事相关的所有陈述在分析上都要么为真，要么为假。

5.5.1. 认为量化中的可变项会在陈述中取代主词位置的流行观点（罗素、奎因），对于叙事性陈述（也即与历史叙事相关的陈述）而言并不正确。叙事陈述中的主词无法出声，恰恰是因为它不过是“汇集”了一个历史叙事中所包含的各个陈述。

5.5.2. 叙事性解释具有说明的效力，因为对于历史事态的描述可以从分析上来自于它们。

5.6. 历史怀疑论没有可以藏身之处。历史学家们缘何会在历史争论的某个特定阶段青睐某个而非另一个有关过去的观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合理性。只有人们不满足于历史争论的合理性，并且要求绝对的基础，才会导致怀疑主义。然而，在实践中，此种要求不过就是告诫历史学家们干活时要小心谨慎。

6. 历史性的根基比之现代史学或当代（历史）哲学所展示的要更为深厚。

6.1. 自我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叙事性的解释——它是别的所有历史解释所预设的叙事性解释。这是英美解释学的真理内核。

6.1.1. 因此，叙事性解释已经在人类个体生活的层面发挥了作用这一事实，绝不会成为有利于叙事实实在论的某个变种（也即这样一种观点：历史认识是以我们对于日常现实的经验作为范本的）的证据。情况正好相反：解释性的叙事主义已经入侵到了我们的日常现实之中。

6.1.2. 个别事物（的类别）的概念在逻辑上依赖于叙事性解释（同一性），因此：同一性先于个体性，而非如实证主义所认为的相反情形（见 4.7.5）。

注：以上论纲是对于我在《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一书中所提观点的总结。

【本文原载 F. R. Ankersmit, “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收入其文集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著

陈 新 译

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文本和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近年来,人们注意到我们对于信息现象的态度变化了。对后现代主义而言,科学和信息都是遵从它们自身规律的独立的研究对象,语言和艺术并未被设定在与实在对立的位置,而是一种伪实在,因而是在实在之内的。我们现在更应该思考过去而不是研究过去。未来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我们对过去的洞见将是一种比喻性的,而不是平实性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拒斥科学历史编纂,而只是使我们注意到现代主义者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会令我们相信在它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但实际上,在它之外是历史的目的和意义的整个领域。

在此文中,我的出发点是现今我们学科中的产品过剩。我们都很清楚,在史学任何一个可以想见的领域内,在任何专业中,不计其数的书籍和论文每年都被生产出来,而要全面地了解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对同一个专业方向内的单一论题也都是如此。让我以政治理论这个我相对熟悉的领域做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20年前,想要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人只需要两种有关霍布斯的重要论述,即沃特金斯(Watkins)和沃伦德(Warrender)两人的研究论述,就可以去诠释霍布斯。当然,尽管还有更多成果,但读了上述两人各自的著作后,读者便相当进入霍布斯研究的状况了。然而,到了1989年,任何人若胆敢说有关霍布斯的研究哪些重要,他首先就得把广度与深度俱全的20—25种相关研究成果如数通读一遍,尽管在此我不会列举一份这些书的清单。这些研究通常有很高的研究水准,研究者的确不能不读。

这种研究过剩未预料到的结果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有关霍布斯的讨论意在呈现有关霍布斯之解释的实质,而非其著作本身的实质。对于今日正在进行的解释论战来说,著作本身有时看起来不过是几乎要被遗忘的前提。其次,由于它明显具有的多元解读能力,霍布斯的原始文本在历史辩论中逐渐丧失了其充当仲裁者的功能。由于各式各样的解释,文本本身变得模糊不清,成了一幅边界交错的水彩画。这就意味着,天真地相信文本本身能够解决我们解释中的问题,就像是相信风向标可以当作路标一样荒唐可笑。这一切造成的荒谬结果乃是因为文本本身在一种解释中不再具有任何权威性,并且我们甚至感到不得不指导学生别再单读《利维坦》;他们最好是尝试着先从解释的丛林中开辟出一条路来。一句话,我们再没有任何文本,再没有任何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

当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或者在以惊人数量增加的专业性刊物上读到那些新书评论与预告时,我毫不怀疑,在历史编纂的其他领域内,情况也是如此。大约100年前令尼采感到恐惧的情形、历史编纂自身阻止我们评论过去的情形看来成为了现实。这种历史写作大潮的确不仅仅让我们所有人有一种强烈的沮丧感,而且,这种过剩不可否认存在一些不文明的情况。在其他一些情况中,我们将文明与一种中庸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在过剩与匮乏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状态。然而,任何有关中庸的感受在我们今日这种学术性酒精中毒的情况中似乎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处用酒精中毒加以比照非常适合,因为针对某个特定话题的最新著作与文章往往冒充是最后的学术饮料。

当然,这种情形并不新鲜,而且据此也并不缺少那种尝试着为心神沮丧的历史学家维持某些对于未来可以重建信心的前景的努力。荷兰史学家罗曼(Romein)在过剩的情形中看到这样一种专业化的趋势之后,便呼唤一种理论的历史学,它能使我们消除因专业化而导致的把握过去的那种碎化。理论历史学能将我们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从此,我们又能进行通盘考虑,给专业化与过剩导致的混乱带来秩序。^[1]

可是,罗曼那本有关两个时代分水岭的著作证明,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问题在于,在罗曼假定的这一更高的层面,不同专业之间的互动仍然难以实现。整合性历史编纂导致的是列举,而不是综合。

超越该两难之境的另一条途径是年鉴学派采取的策略。他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在过去中发现新的研究对象。凭借这种策略,史学家们的确使自己再次有机会发现那种处于尚未侵蚀状态的历史。自然,这提供的只是暂时的喘息,用不了多久,其他不可计数的法国或别处的历史学家将扑向这些新选题,它们也将被厚厚的有着不透明硬壳的解释所覆盖。然而,关于年鉴学派在寻找新的和令人惊喜的选题方面多么有智慧,可谈的就多了,在下文我会再论及。

现在,关键问题是,我们该对这种历史写作的过剩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它在各个领域内就像癌症那样扩散开来。那种对50年前纯洁的历史世界存在的保守渴求就如同绝望地退缩那样毫无意义。我们不得不承认已经无路可退了。算起来,现在以研究过去为业的历史学家,其数量比自希罗多德以来至20世纪60年代加起来的史学家还多。不用说,要禁止所有这些现在正在写作的学者们所写的新文新作,是不可能的。抱怨丧失了与过去的直接联系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帮助。但是,的确有益也有道理的是,以我们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所处的位置进行的一种完全的、诚实的认识为基础,界定一种与过去的新的、不同的联系。

此外,朝那个方向努力还有另一个理由。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传统上关于历史编纂的任务和意义的思想,那么,目前历史写作的过剩确实可以被称为像庞然怪兽一般。今天的历史编纂已经挣脱了传统的、自我授权的理论外衣,因此它需要新衣服。这并不是为了要教会历史学家应该怎样开始其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是要发展一种关于历史对生活的利与弊的理论。就这一陈述的

[1] J. Romein, "Het vergruisde beeld" and "Theoretische geschiedenis", in *Historische Lijnen en Patronen*, Amsterdam, 1971.

前半部分而言,史学家工作方法的规则并不能从历史编纂本身之外来制定;如果历史学家认为某事有意义,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至于这一陈述的后半部分,我不认为历史编纂是有用的或者具有公认的缺点。这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历史编纂毫无用处,而是说有关历史编纂是否有用及其缺点的问题是一个不合适的问题——用赖尔的话说,这是一个“范畴错误”。历史和历史意识与诗歌、文学、绘画等等都属于文化,而要问文化有没有用就没有意义了。文化包括历史编纂,倒不如说它是个背景,从这一背景中或者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能形成关于事物是否有用的观点,如有关某种科学研究或者某种政治目标是否有用的观点。因此,科学和政治不属于文化;如果某一事物能够有一种用途或者一种缺点,或者能让我们操纵世界,那么,它就不是文明的一部分。文化和历史定义了用途,但是它们本身不能按照有用性来定义。用柯林武德的术语来说,它们属于“绝对预设”〔2〕的范围。这也是政治不应该妨碍文化的原因。

正因为此,若正如前面认为需要的那样,我们试图为历史编纂找件新外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历史编纂放在现今作为整体的文明中。这个问题具有文化—历史的性质或者解释的性质,它可以与另一类问题相比较,即那种我们在自己生活史的整体中思考某个特定事件的地位和意义时,有时会扪心自问的问题。一般来说,在过去四十年中,对于现在历史编纂的发展与文学、文学批评、绘画——简而言之,文明——的发展之间的平行,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们关注得如此之少,这是很奇怪的。显然,历史学家并没有比化学家或者天文学家看到更多的理由来想象这种平行的存在。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在此以这样的方式来决定历史编纂的位置。相反,我将更进一步远离该方向,去确定历史写作中的过剩是否在现在的文明和社会的相当一部分领域中有相似情况。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这样的陈词滥调,有谁不知道呢?所有这些有关信息的理论化过程中——它在有的时候比在另一些时候更深刻一些——有两件事很突出,它们对我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很重要。首先,奇怪的是,人们总是谈论信息,就好像它几乎是物质性的。信息“流动”“移动”“传播”“被买卖”“被存储”或者“被组织”。利奥塔把国家说成是一个抑制或者传播信息流的主体。〔3〕信息似乎是一种黏稠度很低的液体;我

〔2〕 R. G. Collingwood, *An Essay on Metaphysics*, Oxford, 1940.

〔3〕 J. F. Lyotard,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Paris, 1979, p. 15.

们被它淹没,并濒临淹死的险境。其次,当我们谈论信息的时候,就所涉及的信息的实际主题而言,信息本身同样取得了显要位置。这种关系通常是反过来的。以一个给出了信息的陈述为例,例如:“1984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个提供了信息的陈述本身被它所描述的事态所隐藏。然而,在我们如今谈论信息的方式中,该信息涉及的实在倾向于被归入背景。实在是信息本身,而不是信息后面的实在。这就赋予信息本身一种自主权、一种它本身的实在性。正如存在描述现实中事物行为的法则一样,看来也会有一种科学体系,它能够描述我们称为信息的那种非同一般的液体的行为。顺便提一句,我想要在这里补充一点,从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观点来看,信息既可以说是纯粹表演性的,同样也可以说是没有一点表演性。^[4] 这的确是信息现象令人着迷的一个方面。

近年来,许多人已经察觉到我们对于信息现象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关于这种转变的理论已经形成,并且,如通常发生的那样,这些理论家给了自己一个名头。在这种情境下,我们经常谈论后现代主义者或者后结构主义者,并且,可以理解,拿他们与刚过去的现代主义者或者结构主义者来比较。1984年,在乌得勒支开过一个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很有意思的会议,听了会上演讲的任何人都会同意,要令人满意地定义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实属不易。^[5] 然而,要识别一般线路却有可能,就像乔纳森·卡勒在最近一本书中做的那样。^[6] 科学是现代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最重视的部分;他们不仅把科学看作是最重要的假设,同时还把科学看作是现代性的终极假设。科学理性本身对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并不构成问题;他们宛如从外面或外部来看待它。他们对科学既不批评也不反对;他们不是非理性主义者,但是,他们对科学表现出超然的态度,和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我们如今对于信息的态度一样。这不是我们在科学哲学中习惯的对于科学研究或科学方法的元批评问题。科学哲学依然内在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主义中,科学哲学家遵循科学家的思路,研究他们在经验数据的发现和理论之间走过的道路。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科学哲学和科学本身都构成了假设,这是后现代主义者们反思的起点。并且,对于从事研究的科学

[4] 信息是表演性的,它有纯粹的“言内表现行为的”和“言语表达效果的”力量,因为确定性成分已经丢失;信息不是表演性的,因为它服从自己的规则,而不是服从人际交流的那些规则——交流只是信息生命的一部分。

[5] W. Van Reijen, “Postscriptum”, in *Modernen Versus Postmodernen*, ed. W. Hudson and W. van Reijen, Utrecht, 1986, pp. 9-15; W. Hudson, “The Question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Ibid.*, pp. 51-91.

[6] J.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85, 18ff.

家们如何相互作用,或者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样的社会学问题,后现代主义者几乎不感兴趣。他们的注意力既没有集中在科学研究上,也没有集中在社会消化科学研究成果的方式上,而是集中在科学以及科学信息本身的机能上。

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科学和信息是遵循自身规则的独立研究对象。后现代主义信息理论的首要规则是信息增殖规则。信息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真正重要的信息永远不会是信息谱系的末端,但是,它的重要性实际上是由源自于它的学术后裔来评定的。对此,历史编纂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绝好的说明。史学史中那些巨著,那些托克维尔、马克思、布克哈特、韦伯、赫伊津哈,或者布罗代尔的著作,多次被证明为是新潮著作最有威力的兴奋剂,而不是终结某个信息谱系,仿佛那样,某个特定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荒谬的是,一种解释越有影响,越是权威,它就会引发越多的作品。”〔7〕在现代主义看来,真正有意义的信息产生更多信息的途径当然难以理解。对于现代主义者而言,有意义的信息是真正能够结束写作的信息;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正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东西成了科学进步必需的东西,为什么像巴什拉说的那样,那些富有争议的事实才是真实的事实。

在本文的框架内,重要的是要更细致地考察这种与其说是反科学的(anti-scientistic)不如说是非科学的(ascientistic)后现代主义。首先,这能告诉我们,通过一种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我们应该理解什么;其次,非常明显,也告诉我们,历史编纂一直都有着某些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后现代主义科学准则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尼采对因果关系的——用恰当的术语说——“解构”。很多人认为,因果关系是科学思想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用因果关系的术语来说,原因是源,结果是次级假设。因而,尼采指出,只有在对结果进行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才被引导着去寻找原因,因此,结果实际上是原初假设,而原因是次级假设。“如果结果是使得原因成为原因之物,那么,作为源头的应该是结果,而不是原因。”〔8〕如果有谁提出反对,认为尼采分别混淆了研究与现实中事物的顺序,那么他是没有理解尼采思路的要义;因为这一要义恰好是传统因果层次的人为性。可以说,我们的科学训练将我们“稳住”,令我们坚信这种传统层次,但是在这种智力

〔7〕 J.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85, p. 90.

〔8〕 *Ibid.*, p. 88.

训练之外,并没有任何事物强迫我们继续这样做。我们有同样多的理由,虽然不是更多的理由,帮助倒转这种层次。

在后现代主义中,这就是事物存在的情形。科学被“动摇”了,被置于它自己的中心以外。人们强调的是思维模式和思想范畴的可逆性,却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替代物。这是对科学的一种不忠实的批评,是一种可能不太公平的违规攻击,但是,正因为如此,它确实击中了科学的要害。科学理性并不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对别的事物进行的扬弃,如果说每种观点自动地让人想起它的反题,那也不太正确;它不如说是这样一种认识,即认识到每种观点除了它在科学上认同的内部之外,还有一个科学没有注意到的外部。就每一种有效的推理思路而言,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早已提出了一些类似的观点。事实上,正是这种有效的推理思路令自己成为了多余的,因而,它总是一段在不真实的地域进行的旅行——也就是说,从最初的误解到正确的领悟的一段旅行。结果,真实之物总是被不真实之物玷污。

逻辑的和本体论的结论都能够与这种洞见联系在一起。它们共同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革命本质这种观念。让我们先看看逻辑方面。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现代主义者通常倚为基石的科学的确定性都是一些变量,处于撒谎者自相矛盾的情形下,也就是说,处在那个克里特人说的所有克里特人都说谎的悖论之下;或者,更简洁地说,在以“这个陈述是假的”说自己这个陈述的悖论之下。当然,后现代主义的所有戏剧性都包含在这种洞见中,即这些悖论应该被看作是不可解决的。在此,我们应该记住的是,罗素凭借他的类型理论以及他对于谓词与谓词之谓词所做的区分,在《数学原理》中建议的对说谎者悖论的解决办法,迄今仍然被认为是当代逻辑最重要的基础之一。^[9]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是,抽去科学和现代主义的根基。这里,对于后现代主义论题的最好说明实际上是由历史学提供的。对过去所进行的历史解释第一次变得可以识别,第一次通过与其他解释进行对比获得了它们的身份;只有以它们不是什么为基础,才知道它们是什么。任何仅仅知道一种解释的人,比如说只知道有关冷战的一种解释的人,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那种现象的任何解释。因此,每一种历史见解本质上都有一种矛盾特性。^[10] 毫无疑问,当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

[9] J. van Heijenoort, "Logical Paradoxes",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P. Edwards, London, 1967, pp. 45-51.

[10] 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1983, pp. 239, 240.

学》这本过去 25 年来历史哲学领域最具革命性的著作中,把所有历史编纂描绘成根本上是反讽的时候,他也是以同样的思路进行考虑。^[11]

现在让我们转向本体论。尼采在对传统因果层次进行解构时,挑拨起我们谈论实在的方式与实在自身的过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当前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区分因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特别是,科学的语言不再是“自然之镜”,它和科学所研究的实在中的对象一样,只是实在总量中的一部分。科学中所用的语言是一种事物^[12],并且,正如汉斯·伯顿斯在乌特勒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会议上曾坚持的那样^[13],实在中的事物获得了一种“类似语言的”特征。历史编纂再一次为所有这些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就像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那样,正是历史语言具有我们与现实中事物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同样的不透明性。并且,海登·怀特和利科(我当然无意称他为后现代主义者)都喜欢说,过去的实在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用外语构形的文本,它和任何其他文本一样,有着相同的词汇、语法、句法和语义层面。^[14] 同样独特的是,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反思中,经常表现出一种显著的倾向,即他们谈论起历史语言就仿佛它是实在本身的一部分,而实在也是历史语言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说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好像他是在讨论关于实在的种种陈述,而不是这个实在的各个方面。同样地,历史学家们经常会愿意看到历史语言也像历史现象一样,实现了同样的独特性。^[15] 简而言之,历史学家们一直表现出对于语言/现实二分法隐约的、经常是潜意识的抵制,这实际上起源于历史学家们对于他们这个学科所具有的根本上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洞见,这种洞见虽未经思索,但仍然是正确的。

当语言与实在的二分法受到攻击时,我们离唯美主义就不远了。小说家的语言和历史学家的语言不是都给了我们一种要么是虚构的、要么是真实的实在幻象吗?更重要的是,贡布里希在诸多著作中告诉过我们,艺术作品,也就是

[11] H.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p. 37.

[12] F. R. Andersmit, "Th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Working with Language*, ed. H. Coleman, forthcoming in 1989 from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13] H. Bertens, "Het 'Talige' Karakter van de Postmoderne Werkelijkheid", in *Modernen versus postmodernen*, pp. 135-153. 伯顿斯的立场实际上依然是现代主义的:他认为语言永远不可能表现出现实的丰富,这一论点使得他选择语言和现实对立之中的位置,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者会要求的那样去选择这两者对立之外的位置。

[14] White, *Metahistory*, p. 30; P. Ricoeur,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in *Interpretative Social Science*, ed. P. Rabinow and W. M. Sullivan, London, 1979, p. 73.

[15] Von der Dunk, *De Organisatie van het Verleden*, Bussum, 1982; 如见 pp. 169, 170, 344, 362, 369。

说,艺术家的语言,不是一种对实在的模仿性再现,而是对现实的替代或替换。^[16] 语言和艺术与实在并不对立,而是,它们本身乃是一种伪实在,因此,它们是在实在之内。实际上,梅吉尔在他描述的那出色的后现代主义谱系中,早已表明了从尼采到德里达(包括德里达在内)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想要把唯美主义延伸到实在表现的整个领域。^[17]

这种唯美主义也和最近获得的对于历史编纂本质的理解——也就是说,对于历史写作的风格层面的认识——相一致。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风格是该诅咒的东西,或者最多是不相干的东西。我引用了贝特尔斯(C. P. Bertels)最近的一次讲座上的话:“好的作品是文学风格的展示,它不会给历史研究增加一丁点真实,也不会给任何其他科学研究增加一丁点真实。”^[18] 重要的是内容;方式,也就是内容表达的风格,是不相关的。但是,自奎因和古德曼以来,这种形式或风格与内容之间令人愉快的区分就不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们的论点可以概括如下。如果不同的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同一个主题的不同方面,由此产生的内容上的差异不妨描述成处理那个研究主题的一种不同风格。“被言说之物……可能是一种谈论其他事物的方式;比如说,写文艺复兴的斗争与写文艺复兴艺术,它们是写文艺复兴的不同方式。”^[19] 或者,用盖伊的话说,“方式”,即风格同时暗示了某种有关“事物”,即“内容”的决断。^[20] 并且,在风格和内容可以彼此区别之处,我们甚至可以把优先权赋予风格而不是内容;并且,由于种种史学观点不可公度——也就是指这一事实,即观点的历史差异,其本质是无法按照研究主题而令人满意地界定的——如果我们要保证历史争论的进展有意义,我们只有专注于每一种历史观点或者看待过去的方式中体现出来的风格,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这种争论中,关键的是风格而不是内容。内容是风格的派生物。

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编纂之美学特征的认识可以更确切地描述如下。在分析哲学中,有一种所谓的“意向情境”现象。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相信 P”或者

[16] E. H. Gombrich, “Meditations on a Hobby Horse, or the Roots of Artistic Form”, in *Aesthetics Today*, ed. P. J. Gudel, New York, 1980.

[17] A. Megill, *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Berkeley, 1985; 尤其 pp. 2-20.

[18] C. P. Bertels, “Stijl: Een Verkeerde Categorie in de Geschiedwetenschap”, in *Goniek* 89/90 (1984), p. 150.

[19] N. Goodman, “The Status of Style”, in N. Goodman, *Ways of Worldmaking*, Hassocks, 1978, p. 26.

[20] P. Gay, *Style in History*, London, 1974, p. 3.

“约翰希望 P”（这里 P 代表一个特定陈述）这样一个陈述。关键是，在像这样的一个意向情境中，P 绝不能被另一个陈述代替，即使这另一个陈述与 P 等值或者直接由 P 产生。毕竟，我们不知道约翰事实上是否知道其信念的后果或者希望那个 P。比方说，有可能约翰相信水开了，而他不相信水的温度是一百摄氏度。换句话说，在意向情境中，表达陈述的确切形式是这一陈述真实性的前提之一。可以说，句子把注意力吸引到它自己身上。因此，陈述的形式在这里当然和内容一样重要。丹托在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中早已指出，陈述和文本（或者至少是它们的一部分）的这种意向性质在任何地方都不比在文学中更清楚：“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比在那些文学文本中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种内涵因素）。在文学文本中，除了作者想要陈述的任何事实之外，他或者她还要选择词语来陈述这些事实”，并且，“如果改用了其他词语”，作者的文学意图“会落空”。^[21] 因为文学文本的意向性特质，它具有某种不透明性，一种令自身引起注意的能力，而不是把注意力引向文本之后的某种虚构的或历史的实在。这是文学文本和历史编纂共有的特征；因为，在历史著作中展现的有关过去的观点，其本质严格地说，是由历史学家们在他或她的作品中使用的语言来定义的。由于历史编纂的观点与历史学家们用来表达这种观点的语言这两者间的关系——一种在任何地方都不与过去的领域交叉的关系——历史编纂具有与艺术同样的不透明性和意向维度。

因此，艺术和历史编纂可以与科学形成对照。科学语言至少自命透明；如果它阻碍了我们对实在的看法，它将不得被精练或阐明。确实，有些科学哲学家，比如说玛丽·赫西，甚至想要把上面提到的美学和文学维度也归因于科学。那当然会给我在历史编纂方面的主张添加一些额外的说辞，但是我把精确科学与历史编纂之间的差异不仅仅看作是个细微差别的问题。一门学科中提供的见识，在其句法性质远甚于语义性质时——就像在精确科学中的情形那样——比较起来，意向情境的空间就更少了。毕竟，只有从语义角度上，问是否有同义词这个问题（那是意向情境中最重要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同意以上的看法，也就是说，同意后现代主义的洞见适用于历史编纂，我想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得出一些结论。对现代主义而言，在科学的世界图画中，在我们最初都接受的历史观点里，证据本质上是过去发生过某事的

[21] A. C. Danto,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A Philosophy of Art*, Bridge, Mass., 1983, p. 188.

证据。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沿袭一种从他的原始资料和证据中推理出一种隐藏在这些资料背后的历史实在的路线。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证据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对过去的不同解释;因为那实际上是我们运用证据的目的。我们可以用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对现代主义来说,证据是一片瓦片,他捡起来看看底下有些什么;另一方面,对后现代主义来说,证据则是他踩在脚下的瓦片,为的是向另一片瓦片踩去:以水平状态代替了垂直状态。

这不仅仅是对实际上发生过什么的一种洞见,同样也是对历史学家将来应致力于什么的洞见。这最好能够描述为历史资源的当代化。证据不是我们能通过它研究过去的放大镜,而是更像画家用来达到某种效果的笔法。证据并没有把我们送回到过去,而是导致了此时的历史学家能或不能利用证据做些什么的问题。乔治·杜比阐明了对待证据的这种新态度。睿智的居伊·拉赫多(Guy Lardreau)采访他的时候问,对他来说,是什么构成了最有意义的证据,杜比说,这可以在没有提及的东西中找到,在一个时期就其本身没有涉及的东西中找到,因此,他将自己的历史著作与某种否定的发展加以比较。^[22]正如鱼不知道它在水中游一样,某个时期本身是不知道该时期的最大特点,以及其中最普遍的事物的。直到该时期结束,它才被揭示出来。该时期的芬芳只能在随后的那个时期才能被闻到。当然,黑格尔和福柯早已对此做了许多有趣的评论。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杜比观察到,一个时期的精髓,用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的话来说,取决于收信人(*destinataire*),取决于历史学家,该历史学家此刻不得不根据那些未被说出的,或者仅仅是被私下说的,或者只是用不重要的细节来表达的一切,展开他对该时期的批评。历史学家就像鉴赏家,他不是根据艺术家所具有的(因此也是可以模仿的)特点来识别艺术家,而是根据可以说是本能地“逃离”他的那些东西来认可他。“风格即人”,我们的风格就是我们尚未思考自身就成了我们自己的地方。这便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自我陶醉的年代,具有风格的人如此之少。简而言之,恰如杜比所主张的,处理证据的方式独特,并不是因为它如此多地指向过去隐藏在证据之后的东西,而是因为它只是通过面对其后历史学家生活和写作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才获得它的目的和意义。一个时期的精神状态只有在它与以后时期精神状态的不同中才能揭示出来;证据所指向的方向因此也经历九十度转变。正如经常发生过的那样,这也被赫伊津哈预

[22] G. Duby and G. Lardreau,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 Dialoge*, Frankfurt am Main, 1982, pp. 97, 98.

料到了。他在谈到历史感的时候说：“这种与过去的接触伴随着对真实性、真理的完全确信，文书或编年史里的一句话、一件印刷物、一首老歌里的几个音符就能将它唤起。它不是（过去的）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用某些词句引入的一个成分，……读者使它苏醒来与作者相会，它是读者对作者召唤的回应。”〔23〕

毫不奇怪，杜比和罗曼在这种联系中指出了历史编纂和心理分析之间的关系。〔24〕在历史编纂和精神分析中，我们都在词语最基本的意义上关注解释。在历史编纂中，杜比所建议的这种处理过去痕迹的办法迫使我们避免去寻求过去自身中最初无形的机制，正是这种机制使得这些痕迹可以在表面上被辨别出。同样，尽管弗洛伊德自己奏出了实证主义的音符，精神分析实际上是解释策略的常备节目。精神分析教我们理解精神病患者所说的话，它并没有令我们注意精神病患者心灵中那些基本的和不可分割的小矮人的因果效应。〔25〕精神分析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试图在那些痕迹之上套上一种模式，他们并不想探求痕迹背后的一些事物。在这两种情况下，解释的行为被严格地按照唯名论的方式来理解：即在历史实在中或者在精神病患者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事物符合解释的内容。〔26〕

但是，仍然有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与精神分析式的解释相似。当然，杜比认为，历史学家应该重视未说的和被压抑的东西——用福柯的标准说就是疯狂、谎言、禁忌。杜比的论点显然与分析者的工作方法有关。正如我们乃是我们所不是的或者我们不想成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过去也是它所不是的东西。在精神分析和历史中，被压抑的事物只是以次要的、似乎不相干的细节来彰显自身。在精神分析中，这就导致一种洞见，即人并没有那种可以作为理解他的基础的、容易被观察到的实质或者本质，而人格的秘密在于那些日常表现背后仅仅是极少的、飞逝般可见的东西。用罗蒂的话说，我们的人格是一张抽

〔23〕 J. Huizinga, “De Taak der Cultuurgeschiedenis”, in *J. Huizinga: Verzamelde Welken 7*, Haarlem, 1950, pp. 71, 72; 黑体部分为本文作者所加。

〔24〕 Duby and Lardreau, 98ff.

〔25〕 *Letimotif* in D. P. Spence, *Narrative Truth and Historical Truth: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82.

〔26〕 拉赫多是这样为历史编纂表述的：“因此只存在关于过去的诗论（Diskurse），这个过去又由那种当下利益在其中起作用的话语（Diskursen）组成。一场周密编排的、由反映当下的利益和冲突的面具所构成的芭蕾舞，有着各种变换的角色，却在相同的地点上演——历史是想象出来的登记名录的储衣间，历史学家是塑造假面的服装设计师（这些假面具从来不是新的）：历史由我们梦的材料所编织而成，而我们短暂的记忆则被睡眠所包裹。”在这种语境下，拉赫多显然是在谈论唯名论。参见 Duby and Lardreau, p. 10。

象拼图而非某种实质内容：“我们把自己想象成特别构成的拼图而不是一些实质内容，这种能力在我们抛弃我们有一个一切人都共有的真我这种观念的能力中，一直是重要的因素，……弗洛伊德把自知的范式当成是对异质性偶发事件的发现，而不是对某种本质的发现。”〔27〕

这也是历史编纂中的情形，至少在我所称的后现代主义（精神状态）史学中是如此。让我们用后现代主义者中最流行的悖论法来阐明这一点：过去的本质不是或者不在于过去的本质。正是在废弃残余中，在口误中，在过去的失误动作中，在过去“情不自禁”的极少片刻，我们发现了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我猜想，在此，我们至少可以为耶尔恩·吕森所称的当前历史编纂中的“范式转变”找到部分解释。在吕森看来，这种范式转变主要在于把宏观历史结构变换成微观历史情境和生活环境，以此作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28〕我们正在目睹的一切或许就是暂时与所有本质主义的雄心所做的最后道别，这些雄心自存在以来实际上一直统治着历史编纂。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搜寻那些可以标记为过去的本质的东西，即把过去（或者过去一部分）中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的原则，并且，在该原则的基础上，每件事最终都能得到理解。在过去诸多世纪中，历史编纂的这种本质主义已经用无数不同的方式表现了自己。当然，本质主义曾经突出地呈现在各种思辨体系中，那些体系指引着西方人思考自己的过去。奥古斯丁关于历史的神学概念及其世俗化了的种种变体〔29〕、进步的观念，以及人们对科学进步的盲目信任和对人们预料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福祉的盲目信任，这些一直都是利奥塔所称的“元叙事”；借助于这种元叙事，不只是历史编纂，文明与社会其他的基本方面也都被合法化了。〔30〕

随后就有了历史主义，它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朴实〔31〕，认为过去的本质体现在事实与观念的奇特混合之中。只有在人们轻易地把对过去本质的感知能力具有的信仰和信念当作想当然的事，以至于任何人对于自己在本体论上的傲慢都没有什么概念时，历史主义者关于诸种历史观念的教条所具有的认识论上的朴实才成为了可能。吕森所讨论的社会历史是这条本质主义历史观链条上

〔27〕 R. Rorty, "Freud and Moral Reflection", p. 17. (作者给我复印了这篇文章；不幸的是，我不知道关于这篇文章的更多信息。)

〔28〕 *Programmaboek Congres "Balans en Perspectief"*, Utrecht, 1986, p. 50.

〔29〕 这当然是指洛维特在其《历史的意义》一书中的论题。

〔30〕 Lyotard, pp. 49-63.

〔31〕 F. R. Ankersmit, "De Chiastische Verhouding Tussen Literatuur en Geschiedenis", in *Spektator* (October, 1986), pp. 101-120.

的最后一环。社会史的进入(尤其在德国)奏响的胜利的音符,对于这些历史学家而言,这正是他们乐观地高估自我的最有力证明,他们觉得自己现在找到了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钥匙,它将打开一切历史之门。任何人如果知道这种社会史的本质主义性质以及本质主义与科学之间的传统敌意,都不可能不注意到社会史家们所用托辞的滑稽性质。但是,历史哲学家当中仍然能找到最糟糕的现代主义者——顺便说一下,这一点不是很让人吃惊;一旦他们认为他们在伪科学的炫耀中看到了对其陈腐的实证主义观点的证明,他们甚至比历史学家们更欣然欢呼任何伪科学的炫耀。

我想通过以下意象来澄清上文所指的历史意识中的运动。让我们把历史比作一棵树。西方历史编纂中的本质主义传统把历史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树干上。当然,思辨体系就是如此;可以说,他们定义了这个树干的性质和形状。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科学历史编纂则位于这棵树的枝杈上,它们对于过去事实上发生的事所倾注的注意力基本上值得称颂,对于先验构想则缺少接受能力。但是,从他们所处的那个位置看,他们的注意力的确还集中在树干上。正如他们的思辨型先驱们一样,历史主义者和所谓的科学历史编纂的倡导者依然还抱着最终能够就树干说点什么的希望和要求。在这种情境下,所谓的科学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有着特殊意义。无论它是用本体论的、认识论的还是方法论的术语来阐述,历史主义之后的历史编纂一直都是旨在重建贯穿过去或过去各部分的本质主义路线。

伴随着那种尤其能在精神状态史中找到的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人们第一次与这种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本质主义传统分裂了——为了避免任何伤感和夸张,对此我要马上加上这样一句:我这里指的是趋势而不是彻底的断裂。抉择不再降临在树干或者树枝上,而是落在树叶上。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中,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和总体,关注的中心恰恰是那些历史的碎片。比如说,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他随后写的其他书、金兹堡的《微观史》、杜比的《布汶的星期日》或者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在15到20年前,我们会惊诧地问自己,这类历史作品会有什么意义,它试图要证明什么。并且,我们那种想要知道历史学运作机制的现代主义愿望,一定像往常那样,早已提出了这个非常明显的问题。然而,在反本质主义的、唯名论的后现代主义观点中,这个问题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如果我们无论如何想要坚持本质主义的话,我们可以说,本质并不在历史这棵大树的树枝上,也不在树干上,而是在树叶中。

这就把我引到了本文的主要论点上。树叶相对零散地挂在树上,每当秋冬来临,它们被风吹走,这些正是树叶的特征。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可以假定秋天已经降临西方历史编纂。首先,当然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我们的反本质主义,或者是如今流行的说法“反基础主义”,已经弱化了我们对科学和传统历史编纂的承诺。欧洲自1945年以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是第二个重要迹象。这种附加在欧亚大陆上的历史不再是世界历史。^[32] 我们曾希望视为西方历史之树的树干的东西,如今已经成为整个森林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的历史、理性的胜利、为19世纪工人无产者的解放所做的光辉斗争,这些我们想要告诉自己的元叙事,都只有局部的重要性,因此,它们也不再是恰当的元叙事。照罗曼认为的,1900年前后西方和东方同时刮起的那阵寒风^[33],最终也在20世纪后半叶吹落了我们的历史之树上的叶子。

现在留给西方历史编纂去做的,就是把吹走的树叶收集起来,独立研究它们的来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可以说被翻了个底朝天。当我们像勒华拉杜里或者金兹堡那样把过去的树叶收集起来,重要的不再是它们曾经在树上的位置,而是我们现在能用它们构成怎样的模式,以及此模式能适应现存文明的其他形式的方式。罗蒂曾经写道:“从歌德、麦考莱、卡莱尔和爱默生他们那时候起,就发展出一种写作,它既不是对文学作品的相关优点所做的评价,也不是思想史、道德哲学、认识论或社会预言,而是所有这些混合而成的一种新体裁。”^[34] 卡勒在对罗蒂这句话进行评注时指出,“这种新的作品”的特征是在涉及历史的或其他方面的起源和情境时显然很冷漠:

各特定学科的研究者都抱怨说,声称是这种体裁的著作都是在固有的学科模式外研究而来:学理论的学生读弗洛伊德的时候,不会去问后来的心理学研究是不是怀疑过弗洛伊德的表述;他们还没有把握哲学传统就在读德里达了;他们读马克思的时候,也没有研究对政治和经济形势所做的替代阐述。^[35]

恰当的历史情境作为背景,已经失去了它传统上的重要性、功能和自然状态,这

[32] 欧洲的过去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其显著证据参见 M. Ferro, *Hoe de Geschiedenis aan Kinderen Wordt Verteld*, Weesp, 1985.

[33] J. Romein, *Op het Breukvlak van Twee Eeuwen*, Amsterdam, 1967, pp. 1, 35.

[34] J.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p. 8.

[35] *Idem*.

不是因为人们急于要占据一个非历史的主场,或者人们缺乏公平对待历史进程的愿望,而是因为人们已经“释放了”历史情境。每件事物现在都在昭示自己是未被昭示的,并且在此我们仍然存在着唯一的希望,它能使我们将来免遭灭顶之灾。如同树叶彼此之间并不相连,它们的相互关系仅仅是通过树枝或树干得到保证,正是上面提到的种种本质主义假设,通常确保了由可靠的“历史情境”所起到的突出作用。

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谈论一种新的主观性形式的候选资格,不是在谈论为过去强加当代模式具有的合法性。毕竟,将任何事物合法化这种事最好留给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正是,我们应该避免指出过去中的本质主义模式。我们因而就能怀疑最近人们所做的一些尝试的意义,这些尝试为了历史编纂的地位和名誉而试图给古老的德国人文修养(Bildung)理想注入新生命。^[36]我想立即顺带补充一点:尽管如此,我还是更加同情这些尝试,而不同情社会历史学家在历史编纂的任务和用途方面表现出的科学上的朴实。但是,对社会科学史学所提出的那些愿望充满憧憬,这是浪费精力。另一方面,人文修养理想的复苏确实是对我们当前文明具有地图般特征所做的一种有意义的反动。尽管过去的文明更像一种方向标,它为社会和道德行为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方向,但现在的文明在我们必须往哪去方面教给我们的并不比地图多;如果我们自己做出了选择的话,它也没有指点我们是应该走捷径还是走风景优美的弯路。人文修养理想的实现至多给我们一幅我们迄今一直在走的那条路的画面。人文修养理想在文化上就相当于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著名论点,即单个个体的发展是物种发展缩略版。人文修养是单个个体文明史的缩略版,借此,他能够成为我们社会中令人钦佩的、体面的成员。

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历史意识中,这种对我们的文化发展史简化的、个体发生式的重复不再有意义了。我们的文化发展史包含的这一连串历史情境的进化环节毕竟已经被打断了。每件事物都变成了同时代的,其显而易见的推论,用杜比的话说,即每件事物也都变成了历史。当历史在现在被重新组装时,这

[36] 1985年11月,艺术学院在格罗宁根组织了一次关于人文修养的讨论会。发言者包括威斯(M. A. Wes)、考斯曼(E. H. Kossmann)、莫伊(J. J. A. Mooij)。也可参照E. H. Kossmann, *De Functie van een Alpha-Faculteit* (Groningre, 1985); 考斯曼也注意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人文修养理想不再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毕竟,如今形势下的人文修养理想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同质的、规定性的伦理及美学标准和规定的学识模式。确切地说,它将以一种可能的伦理和美学标准的清单形式存在,以目的形式存在,这些目的是可能的,并且在历史中同时由人类实现。日前人文修养的理想不是规定性的而是描述性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p. 23)。

就意味着,现在具有了过去的恶名。人文修养因而要求用后现代主义所排斥的指南针来定位。我们一定不要遵循过去或者适应过去来塑造自己,而是要学会与它一起玩我们的文化游戏。具体而言,这句话的意思由卢梭在他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中用以下方式为单个个体做了描述:有一种

状态,在那里,心灵能够找到一个坚实的位置,整个儿地静息在那里,并在那里聚集它整个的存在,既不必追怀过去,亦不必思考未来;在那里,时间对于它是虚无的,“现时”一直延伸着,但又不显出它的连续性,不显出它那相继接续的印迹。^[37]

卢梭随后指出,这种处理时间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唤起了一种绝对幸福的感觉——“一种丰盈的、完备的、充实的幸福,它不给心灵留下半点空虚之感,使它需要填补。”^[38]

这里的历史不再是对我们生活中不同阶段发生的事所进行的重构,而是一种和对它的记忆连在一起的连续游戏。记忆优先于被记忆之物。历史编纂也有类似情形。那种对过去进行的野蛮的、贪婪的和不受控制的发掘,受到了想要发现过去的实在并科学地重构它的愿望的激励,如今,它已经不再是历史学家无可争议的任务了。如果我们更留意检查一下我们150年来发掘到的结果,并且更多地问问自己这些结果加起来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会做得更好些。现在,到了我们应该思考过去而不是研究过去的时候了。

但是,历史编纂的一个阶段可能已经开始,在这个阶段,意义比重构和起源更重要;在这个阶段,历史学家们为自己所订立的目标是,揭示我们的过去中许多根本冲突的意义,做法是展示它们的同时代性。让我们看些例子。像黑格尔那样对苏格拉底与雅典城邦之间冲突的理解,可能在成千上万的地方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雅典相矛盾,但是,它还是不会失去它的影响力。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权力与求真话语之间的紧密联系,或者关于语言与16世纪现实之间的奇怪关系,福柯所写的言论在事实方面遭到了许多批评者的攻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这些构想失去了魅力。我并不是说历史真实和可靠性不重要,甚或说它们是通往一种更有意义的历史编纂道路上的障碍。恰恰相反:像黑格尔和福柯这样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这也是我以他们为例的原

[37] J. J. Rousseau, *Les re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Paris, 1972, p. 101. (中译文参考张弛译:《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38] 同上。

因——历史编纂中的比喻层面比文字层面或事实层面更为有力。语言学界的威拉莫维茨试图驳斥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他就像是一个企图只身推翻一节火车车厢的人；在事实的基础上来批判比喻，这种行为实际上既无意义又无品味。只有比喻能“驳斥”比喻。

这就到了我该做最后评论的时候了。正如我指出的那样，有理由相信，未来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我们对过去的洞见将是比喻性的，而不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我的意思便是如此。“桌子长两米”这个字面陈述引导我们注意用语言表达的、外在于语言本身的物件的特定状态。举个恰当的例子，像“历史是一棵没有树干的树”这样的比喻性表达把重点放在纯粹的词语“历史”和“没有树干的树”之间正在发生的事上。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焦点不再是过去本身，而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我们当前用来谈论过去的语言与过去本身之间存在的和谐。不再有“贯穿整个历史的线索”来中和这种不和谐。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关注表面上不和谐但却是令人惊讶的、甚至希望其扰人的细节。弗洛伊德在关于**诡异** (Unheimliche) 的论文中把这种细节定义为“原本应该隐藏的东西现在出现了”^[39]。简而言之，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关注从科学历史编纂的角度看来毫无意义、毫不相干的任何事物。因为这些不协调和诡异的事件恰当地处理了历史学家的语言与过去的关系中存在的和谐性。

就像尼采和海德格尔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哲学中整个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也就是那种认为理性将使我们能够解开实在之秘密的理性主义信仰一样，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对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历史也有一种天生的怀乡之情。希腊人最早的历史编纂是史诗；希腊人用叙事史诗彼此讲述他们祖先过去的事迹。尽管他们彼此讲述的故事相互矛盾，但并不相互排斥，因为最重要的是，它们激发了道德和美学方面的沉思。由于战争和政治冲突刺激了一种更加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并且，由于书面词汇较之口头词汇对于分歧的传统容忍度要小，这种对过去“逻各斯中心式的”单一化被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人后来引入。^[40] 据此，过去这棵树的幼小树干冒出了地面。我当然不是想要暗示我们应该回到赫卡泰乌斯以前的时代。在此，它也是一个比喻性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字面真实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并

[39] S. Freud, "Das Unheimliche", in *Sigmund Freud: Studienausgabe IV. Psychologische Schriften*, Frankfurt, 1982, p. 264.

[40] 对于这些关于希腊历史意识起源的评论，我要特别感激克鲁尔-布洛克女士。

不拒斥科学历史编纂,而只是使我们注意到现代主义者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想令我们相信在它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但实际上,在它之外是历史的目的和意义的整个领域。

【本文原载, Frank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8, 1989。】

佩雷斯·扎格林 著

张云波 译

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

本文是一篇论辩之作。扎格林认为安克斯密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将历史学审美化,从而脱离了历史学信守的真实与实在这一根基。扎格林首先归纳出后现代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并着力论证安克斯密特的史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其后,扎格林就安克斯密特关于解释、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因果律、历史学的美学特质、对“宏大叙事”的态度等论点进行逐条批驳。在本文中,扎格林强调事实与真相,注重历史研究中的证据。大体上他信守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以历史事实为依归。

佩雷斯·扎格林(Perez Zagorin),美国历史学家,研究领域为16—17世纪英格兰和不列颠历史,兼及近代早期欧洲史,任罗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多年。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宫廷与乡村:英国革命的开端》《反抗与统治者(1500—1600年)》等。

当今的历史编纂学已变得如此多元和易受时尚的裹挟,以至于当我们看到 F. R. 安克斯密特在《历史与理论》新近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历史学家们应该奉行后现代主义这种视角,并将其作为某种理解其学科全新且优长的形态时,我们绝不应感到惊诧莫名。^[1] 鉴于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如今一道在某些人文学科及文学理论等领域大行其道,安克斯密特的这种举动是不难想见的。安克斯密特或许不是历史编纂学界中最先拥抱后现代主义的人,然而,他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公开这样做的人。这一趋向在福柯的信徒中也颇为明显。而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所收录的几篇文章声称修辞乃是历史学与人文学科的主要特征,其立场与安克斯密特颇为相近。^[2]

《历史与理论》的读者熟知安克斯密特,是因为该刊新近刊登了一组英美历史哲学界讨论其学科当下问题的文章,安克斯密特是其中一篇的作者。^[3] 在上述那篇文章中,安克斯密特以历史编纂学中叙事—修辞视角的热切拥趸示人,这种看法是海登·怀特在《元史学》(1973年)及随后的著作中提出的。在怀特看来,文学隐喻和文字结构在历史思想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安克斯密特则强调怀特这一思想的革命意义,并高呼怀特的著作乃是未来潮流之所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支持怀特观点的人是文学理论家,而与之相对,大多数哲学家与具有哲学倾向的历史学家对其抱持坚决的批判态度,如果不是简单地对其视而不见的话。尤其是,许多历史学家反感怀特的观点,就如同从前他们反感那种亨佩尔式实证主义的有关历史解释的覆盖率理论一样。他们之所以反对亨佩尔的科学主义,是因为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这是一种对历史知识的特性造成损伤的错误看法,同样,他们也倾向于反对怀特的语言学转向及其修辞取向,因为这一语言学转向无视且扭曲了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的某些本质特征。^[4]

[1] 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28 (1989), 137-153.

[2] John S. Nelson, Allan Megill, and Donald N. McCloskey,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Madison, Wisc., 1987).

[3] F. R.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Knowing & Telling History: The Anglo-Saxon Debate,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25 (1986).

[4] 参看《历史与理论》增刊第19期《元史学:六个批判》(*Metahistory: Six Critiques,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19, 1980)中的几篇文章,尤其是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的文章(Maurice Mandelbaum, "The Presuppositions of Metahistory"),还有弗里德里克·A. 奥拉夫森在别处的评论(Frederick A. Olafson, "Hermeneutics: 'Analytical' and 'Dialectical'", in *Knowing & Telling History*, pp. 40-41)。还可参看保罗·利科对怀特的观点所做的批判性观察及所持的审慎态度,Paul Ricoeur, *The Reality of the Historical Past*, Milwaukee, Wisc., 1984; 以及 William H. Dray,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Realism", in *O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History*, Leiden, 1989, chap. 7。从我与诸多史家的交谈及历史哲学研习班上与博士生的讨论中,我观察到,他们对怀特的《元史学》及《话语转义学》普遍不大感冒。

在支持后现代主义时,安克斯密特恰如一个哲学上的时尚预测者,用他的眼睛盯着最新的东西。一个作者矢志于察觉其学科中最新的时尚,并指明其内涵,毫无疑问,这终归是有些许价值的。然而,安克斯密特不仅打算辨认何为新生事物,而且与之保持一致。他不将其作为谬误与有害的东西加以反对。相反,与其他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一样(尽管我知道他会反对这一称呼,但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称呼是合理的),他欢呼其新异之处,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事业。

安克斯密特的后现代主义也许可以视作是对先前服膺怀特叙事主义原则的延伸。这是更进一步将历史审美化了,从而将历史与其原本所接受的真实与实在的根基割裂开来。虽然他并没有给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但他却将后者与某些全新的情况及必要性联系在一起,并以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后现代主义。在下文中,我试图对安克斯密特就其立场所提出的某些主张及依据的有效性加以审查。

甫一开始,为了清晰起见,强调与后现代主义这一理论或观念通常相关的几项特征是颇为重要的。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就本质而言,它乃是一个历史主义的概念。那些宣称后现代主义到来的人们,将其视作当下文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并且是与过去的断裂,鉴于当前的社会状况,那一过去已经无法维系下去了。因此,某种强烈的宿命感与不可抗拒性笼罩着这个概念。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冲动端在于其对先前现代主义运动盛期的各种价值观和预设的拒斥,而后者曾给20世纪的人文学科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后现代主义还对它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同样予以拒斥。这种哲学相信语言的指涉性(referentiality)、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以及语言和知识与之相关联的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存在。然而,颇为明显的是,这些后现代主义的议题并未受到锐气、前进与进步信念的滋养。相反,正如后现代主义的名字所示,它透露着强烈的衰落、老迈以及处于某个时代的终点而非开端的意味。

末了,后现代主义一个核心的要素是它对人文主义的敌视。正如福柯乐意想见的那样,后现代主义预言了人的终结,它将人文主义视作某种过时的古物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象而加以反对,认为它是诸多个体想要通过自由的行动来创造其历史的幻象。而后现代主义则将这种幻象视作资产阶级社会对妇女、劳工阶级、非白种人、性行为反常者及遭受殖民的原住民进行压迫的遮羞布。进而言之,它对具有精英色彩和压迫意味的所谓的经典观念也予以批评,而经典则是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都要严加守护的。此外,经典所引发的文化创造中不可或缺的分化与等级化也在挞伐之列。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后现代主义

奉行某种明显的文化标准的松弛,纵容某种极端的折中主义和异质性,而不包含任何关键的或统合的原则。就文化领域整体而言,它意味着彻底抹消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由广告和商业传媒所形塑、主宰,而这二者之间的区别被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视作是天经地义的。

我上面提到的一些特征,已经被詹明信这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在其汪洋恣肆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谈到了,尽管是以某种颇为赞赏的口吻。为了思考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对詹明信的论说进行简要的审视将会有助于扩展我们对后现代这一概念的理解。

关于他的讨论,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其典型的历史主义特征,他将后现代主义视作一个历史分期的范畴。詹明信向自己发问道,究竟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时尚,还是众多可供选择的风格或潮流中的一种,他的答案是二者皆非。在他看来,不论我们对后现代主义抱持欢迎抑或道德上厌恶的态度,我们都必须将其视作文化领域中一种根本的变化予以承认。这种变化反映的是世界资本主义中全新的多民族阶段,以及与之相伴的先进技术层面。有些人则用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社会或电子社会等词汇来称呼这一阶段。此外,资本主义社会自其最早在西方出现以来尚不满两百年,因而比其之前或同时的其他类型的社会都要年轻得多,但詹明信却罔顾这一事实,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处于**晚期阶段**。但他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不消说,他根本不知道。然而,他之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为他提供了保证,正如它也(错误地)令列宁在1917年之前及以后确信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并且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已迫在眉睫。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同样都要服从詹明信的历史主义的逻辑,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使他认为,寻求社会变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派必须放弃他们对后现代主义在道德上的谴责,而应使其运思策略及政治政策适应后现代主义业已存在这一现实,并将其视作当今世界主导性的文化力量。

詹明信对待后现代主义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则是他分析后现代时所采取的做法,他将不同艺术门类中的许多当代文化产物视作后现代的化身。他将其中的一些艺术品归诸后现代,比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绘画和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在洛杉矶闹市区建造的波那文图拉宾馆,它们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颇为典型(symptomatic),并且其在艺术上的价值也大有可议之处。但我们对他的选择却不必措意。要紧的是,他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观察得出了一些共同特征,这使他认为这些作品属于后现代主义。这些特征包括:前所未见的肤浅与浅薄;一种迷恋意象的文化;情感的消退,感情的消失或解放;真实这一概念被视作形而

上学的累赘而被抛弃；自主个体的退隐及主体的死亡；历史性(historicity)及过往的消隐；时间感被分解成一系列单纯且不相干的当下；对过往风格进行混合、模仿或肢解的做法大为盛行。以詹明信敏锐的观察看来，这些乃是后现代的最重要的一些特征及主题，也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无可避免的主导风格。^[5]

毫无疑问，安克斯密特不愿接受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条，以之作为他所拥护的后现代主义的表征。然而，上述特征与安克斯密特的观点颇为接近却是不容辩驳的。后现代理论中所隐含的历史主义的宿命论，从他相信“秋天已经降临西方历史编纂”中可以窥见。在他看来，西方历史编纂学已经没有任何主题或元叙事了，自二战以还，欧洲就不能等同于世界历史了，它已经凋零衰亡，成为亚欧大陆的附属了(第150页)。安克斯密特对历史起源和历史背景的重要性的拒斥，以及他认为证据与过往实在无关，而只与历史学家提供的解释相关时(第145—146页，第150页)，他对过往的无视就显露无遗了。二者之间的相似在安克斯密特所倡议的史学编纂观中可以进一步窥见。照他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讲，历史学家应该放弃解释这一任务及因果律这一原理，真实这一观念也应一并放弃，这些东西都是过时的“本质主义”的一部分，应该统统打倒。相应地，他认为历史编纂学应该是一种美学式的追求，而风格则至关重要(第141—142页，第144页，第148—149页)。

安克斯密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编纂观最引人注目的特征端在其浅薄及其与史学实践和史家通常对其工作所持的看法的脱节。它使历史学变得琐碎不堪，并且架空了其在智识上的所有责任。而且，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的逻辑和事实判断，远不能令人信服。

他的起点是当下历史书写的生产过剩，用他的话讲，这就像癌症一样扩散，令他颇为沮丧。就本质而言，这一状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归之于社会学上的原因。他未提及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这一点也许并不是很重要。众所周知，其原因在于战后高等教育及大学科系的大幅扩张，而作为职业提升的前提，学者被迫发表著述的需要则加剧了这一趋势。姑且让我们以关于哲学家霍布斯的文献为例吧。安克斯密特注意到相关文献已是如此卷帙浩繁，以至于霍布斯本人的文本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权威，而被大量的解释所淹没。从这个例子他推论道，“我们再没有任何文本，再没有任何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第

[5] Frede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46 (1984), pp. 53-92. 时至今日，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献相当可观；对其主张及其与解构主义的关系所做的深入讨论，可参看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Minneapolis, 1983, and the essays in *Postmodernism*, ed. Lisa Appignanesi, London, 1986。

137—138 页)。

对于历史出版物不断增加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我们有许多话可讲,但绝不会被某种悲观的意见所吞没,而安克斯密特却因其骇人的不合逻辑(illogic)导致了这一境况。一方面,J. H. 赫克斯特在 1967 年描绘的景观于今为甚:

1. 往昔的历史写作从未像当今这般蠢笨;也从未产出如此巨大而又让人难以忍受的无聊琐事,在写作这一令人愉悦的行当中那些识短器小之辈的著作眷顾于无关紧要之事,而对那些事情他们甚少思虑而又漠不关心。

2. 过往的历史学家也不像今天的历史学家那般出色地、充满活力地及思虑丰赡地书写历史,后者可以抵达那些先前忽略或因故步自封而被回避的领域,可以使这个学科中前人完全未曾使用的资料得到有效利用,可以用方法上的普遍周全、精确严密及圆融熨帖来处理所面对的问题,而这是历史这门技艺中那些先前的践行者前所未闻的。〔6〕

我敢肯定,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会认可他的评价。它的意思是,尽管受到平庸日增和历史作品的寿命短如朝露的拖累,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大量具有卓越原创性、深厚学养和精审洞见的著作,它们不仅拓宽了我们的智识视野,而且深化甚至改变了我们对过往许多领域的知识。

另一方面,尽管史学过剩这一现象有时候会使我们沮丧,甚至手足无措,然而,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一事实获得些许安慰。即这一后果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经由淘汰过程而被抵消,那些不足为道的出版物会湮没无闻,而那些相对重要的著作则会在适当的时候为学人所知晓,如果那些著作确实优秀,最终也会在史学圈流传开来。

然而,史学过剩这一状况怎么会使我们丧失文本及过往,而只剩下解释呢?碰巧,与安克斯密特一样,我对霍布斯也颇有兴致,并不时发表与之相关的撰述。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我试图对过去数年间出现的与霍布斯相关的文献作一总括。〔7〕与安克斯密特的论断相反,即使是二十年以前,一个人只读沃伦德

〔6〕 J. H. Hexter, "Some American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 (1967), pp. 5-6, cited in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1988, p. 377.

〔7〕 Perez Zagori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54), chap. 13; "Thomas Hobbe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larendon and Hobb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1985), pp. 593-616; "Cudworth and Hobbes on Is and Ought", forthcoming in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Science in the Later Seventeenth Century*, ed. Richard Ashcraft, Richard Kroll, and Perez Zagor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bbes on Our Min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1 (1990), pp. 317-335.

(Warrender)和沃特金斯(Watkins)二人的著作,而想在有关霍布斯政治思想的讨论中不致茫然失措,也是不够的。至少他还需要通晓列奥·斯特劳斯的经典著作、奥克肖特对其编定的《利维坦》所写的导言及麦克弗森(MacPherson)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等著作。如果要与专业研习搭上边,他还需要熟悉一些其他的重要著述,比如A. E. 泰勒关于霍布斯道德信条的文章和大卫·戈提埃(David Gauthier)对《利维坦》所做的研究,遑论与之相关的其他著作了。

当然,时至今日,有关霍布斯的文献确实是卷帙浩繁。然而,无论是先前还是较为晚近的撰述中,霍布斯政治理论的文本及对其所做的解释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极为密切的,这一点颇为彰明较著,毫无摇唇鼓舌之必要。文本根本没有被取代或消失,而是始终作为史家所提出的任何解释性结论的基础被人们所审查和讨论。此外,像昆廷·斯金纳这样的一些霍布斯的研究者,他们的目标旨在复原霍布斯的含义和意图,更是坚持需要全面地立足于历史背景来进行解读,这也就意味着需要了解霍布斯写作时所处的智识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状况,及政治语言的惯常用法。尤其在那些将研究政治哲学从本质上视作一门历史学科的人们看来,解释并未遮蔽过往;相反,当我们用历史来理解过往的时候,过往反而成为检验解释有效性的试金石。

从文本和历史依据的角度看,解释既可能站得住脚,也可能站不住脚,这一点颇为明了。在上一代人当中,对霍布斯的解释引发最为广泛讨论的是沃伦德和麦克弗森的著作。前者试图将霍布斯关于道德及政治义务的理论最终归结于上帝的律令来解释;而后者则认为,霍布斯对自然状态及政治秩序这二者的设想乃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反映,而相互竞争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乃是这一社会的基本特征。公允地讲,这两种解释都没有得到大多数研究霍布斯的学者的首肯。在他们看来,二者与霍布斯文本的含义、其信念的特征或对其所谓的社会的恰当理解都不契合。

上述对霍布斯的研究状况所做的概括,在现代早期英国史及欧洲史的其他领域也可作如是观,我对后者也颇为熟稔,并将之作为我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当这些领域中的一种修正式的解释被提出的时候,文本上的证据(在我看来,它不仅包括文献资料及哲学文本,还包括各类档案材料)及背景方面的考量毫无例外都处于讨论的核心位置。如果不是安克斯密特在我们这个后现代时代得出了解释已经消灭了文本和过往这个奇怪的发现的话,我强调这点就会显得多余了。

尽管伽达默尔及利科等人的著作有助于使得解释和阐释性的理解(hermeneutic understanding)等问题在历史哲学中再度成为重大的关切,但安克斯密特

的论文对这一主题却毫无裨益。相反,他对这一观点着墨较多,即在后现代历史编纂学当中,解释已经占据了某种全新的地位。鉴于当代社会里,信息和解释似乎自身就会不断地衍生,他对某种他所谓的吊诡现象进行了强调,即强有力且新颖的解释不会终结书写,而是会生发更多关于解释的书写。这一所谓的吊诡事实也许只有从某种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才能得到解释(第140—141页)。但是它因何而被视作吊诡呢?历史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理论及假说颇为类似。与科学一样,任何一种原创的新颖解释都会有支持者,也会有反对者。支持者会试图运用、强化并扩展这一解释,以证明它比其他解释优越。而反对者则会寻找这种解释的弱点,并试图驳倒它。如果某种历史解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它就不再被人们所争论,而成为我们据以对过往进行理解的牢靠的一部分。当然,这并不会久驻不逝。后起的其他解释会让它不断经受挑战,并使它遭受质疑,也许还会取代它。其实,眼下那些重要且新颖的解释会激发而非终结讨论的情形,并无任何吊诡之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安克斯密特曾就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对科学所持的态度发表过评论,由此我们更可窥见其立场的空洞无物。在他看来,前者对后者持一种冷漠和超脱,而非对立的态度,也就是“非科学”而非“反科学”的态度。这与他的言论极不契合。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已经动摇了科学,并且通过解构因果律这一概念使科学大受创伤,因为因果律乃是科学思想的一个主要支柱。它是如何取得这一重大胜利的呢?接下来的论证与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一书中的论证如出一辙,并且同样来自卡勒的启发者——尼采。其论证如下所示。当我们考察某一结果时,它会促使我们寻找原因;因此,结果就先于原因或成为原因的原因;从而,结果就成了原因的起源。职此之故,这与传统上因果的等级结构正好相反,并且证明了因果律乃是人造之物(第141—142页)。

这种字眼上的花招乃是彻头彻尾的混淆,约翰·塞尔在对卡勒的著作所做的批判性的书评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8]就认识论而言,结果可以是探究原因的源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果在时间上先于原因,也不意味着结果产生了或引发了原因。如果我的汽车因为没油而熄火了,我会寻找原因。正是空空如也的油箱,而非我对空油箱何以没有发动汽车的好奇心,使汽车熄火了。简而言之,结果乃是我兴趣的起因,而非事情的原因。此外,将原因和结果视作某种等级结构并无任何问题,这一点毋需争辩。很明显,原因与结果是密

[8] See Searle's review of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haca, N. Y., 1983),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7 (October, 1983), 74-79.

切相关的,须臾不可分离。

在上面所做的批评中,我并没有采用历史学家在运用因果律这一概念时可能给予的某种特定含义。历史学家语言中的“原因”是否表示历史主体的某种缘由或动因,还是将某一事件、行为或现象置于某一普遍的因果律则之下,抑或二者皆非,端视所考察的主题而定,这依然是历史哲学中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9] 但无论如何,认为历史编纂学可以抛弃因果律这一概念乃是一种幻觉。只要历史学还将解释作为自己的一项目标,因果属性就依然会是史学思维中必不可少的要素。^[10] 后现代主义揭橥的相反看法不仅错误,而且是白费力气。

安克斯密特所做议论的一个主要目标乃是凸显“后现代主义的革命性”,以便发挥其颠覆性的作用。他所列举的颠覆性作用的显例不仅体现在所谓的对因果律原理的解构,还体现在这一观点,即我们所有科学上的确定性就逻辑而言其实都是说谎者悖论的自圆其说。他挑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是错的”,以此作为这一悖论的简明版本。他想象着,凭借这一逻辑武器,后现代主义会给科学和现代主义来个釜底抽薪。在他看来,历史编纂学也是这种具有内在悖论的解释的写照(第142—143页)。

这些论断的松散及缺乏明晰使得我们很难严肃地将它们视作学术观点。然而,我们却可以对他们提出的结论加以评说。说谎者悖论提出了一个关于自反性(reflexivity)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个陈述对一组陈述做出了其为谬误的断言,但由于它本身恰好是这组陈述的一份子,因此,指陈这组陈述为谬误的断言也应适用于其自身。然而这样的自反性又该如何运用到历史编纂学或科学理论当中呢?安克斯密特并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认为历史学家的解释或事实陈述只是这般地充满悖论。即使略过这一疏漏,他所选择的悖论例子是否真是一个悖论也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这个句子事实上并没有言说任何事情,因而不是一个命题。要想成为一个命题,它应该具有真值或某种具体的真实境况,而他的例子却无法做到这些。因此,它并不能得出安克斯密特所期望的颠覆性结果。

[9] 新近的讨论可参看 W. G. Runciman's *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Eng., 1983), chaps. 1, p. 3。在书中,作者首先通过区别报道(reportage)、描述、评价与解释四者,继而认为历史学或社会学的解释都是通过将待解释之物(explanandum)作为某些普遍因果律或因果联系的案例而予以解决。

[10] 然而,对于包括安克斯密特在内的这些批评者,我同意他们的一点看法,即,在他们看来,分析的历史哲学仅仅盯着解释这一问题,从而忽略了史学思考和史学实践中其他一些重要的特征。

安克斯密特赋予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洞见乃是它对历史编纂学中美学本质的承认。他将这一洞见与当代思想中这一新颖理解联系起来,即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区别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随着这一区别的消失,他指出,美学大幅扩展,主宰了表现的所有形式。准此而论,这让人觉得历史编纂学最终成了某种文字制品,史家不再制作对实在的再现(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关于过往的再现),而是制作关于实在的替代品或替身。风格被认为先于内容,并且内容成了风格的派生物。同理,史学上的差别也被归之于风格上的差别(第143—145页)。

后现代主义及解构理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试图通过将各色思想化约为写作的共同状态,以取消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因此,它宣称,同历史编纂学一样,哲学也不过是另一种书写而已,也得受制于文学的法则,而不是一种对独特的哲学问题进行反思的独立门类。^[11] 语言与实在的同一性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论证(无论如何,这一问题都超出了我们讨论的主题),对此问题我们暂且不论。但我敢放言,没有几个历史学家会认同安克斯密特将历史编纂学划入美学范畴的做法。而过分突出历史编纂学中文学性的做法也不大会得到他们的认可。正如俄国的形式主义者和罗曼·雅柯布森教导我们的那样,文学性的特质端在于突出语言和措辞(expression)的地位,从而赋予它们以独立的价值和重要性。尽管安克斯密特坚持认为文学作品和历史作品在这方面是类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历史编纂学当中,企图让人们去关注语言自身的做法被普遍认为是极不适当的,并且是对历史书写律则的公然践踏。在历史学中,语言很大程度上要服从历史学家的需要,从而以最为全面、无比清楚和极度敏锐的方式,表达对过往的某些事物的理解或知识。

为了维护风格乃是历史编纂学中主导要素的观点,安克斯密特强调史学作品中词语和陈述的内倾性特征及语境,这就意味着,它们不能被其他与之相当的陈述所代替。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也同样是错误的。假如它是对的,那我们就不可能在不改变要旨及含义的情况下,对史学作品进行改写或加以概括。然而,这样的概括却是可能的;对于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像是吉本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起源和成功的叙述,我们能够对其进行很好的描述,不仅可以有效地传达吉本关于这一事件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理解,并且同样可以表现出其叙述当中弥漫的反讽。

总之,我们不得不说,安克斯密特对于风格是如何决定或产生史学作品的

[11]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请参看 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1982), and *The Deconstructive Turn: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Philosophy* (London, 1983)。

内容的解释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而像解释取消了文本和过往这样的想法,也属于诸多极端看法中的一种,尽管荒唐可笑,但后现代主义者却喜欢援此来证明他们想法的革命性意味。毫无疑问,它与历史学家对其学科中某些最为牢靠的信念和直觉相抵触。历史学家对此最有可能给出如下解答:内容来自于对史料和证据的批判性研究、对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其他著作所做的批判性考察,以及史家对与其研究对象相关的无穷多的事实之间相互关系的感知。

安克斯密特意欲通过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将历史编纂学纳入文学和美学的领域,但他却忽视了历史学这一概念中那些最为核心的特征。其中的一项特征乃是史学认定事实或真相与虚构(fictionality)的分别,而美学视角则无此种分别。与文学作品不同,历史著作并不包含一个凭空创造或虚幻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它以有关过往的事实及真实的或可能的陈述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许多句子乃是依附在这些东西之上的真实命题。如果不是这样,读者就不会对它发生兴趣了。因此,历史学一再宣称的独特意义端在于其对真实不伪的彻底依赖。即使历史书写可能会包含许多虚假或错误的陈述,并出于对极为复杂的证据的考量而提出了一些存有争议的解释,但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真实不伪依然被历史学家普遍视作一项基本的约束法则。

证据的地位乃是历史学的另一项特征,而它在美学中并无任何地位可言。证据因其性质及局限对历史学家造成了一些明确的限制,历史学家对此心知肚明,并在此种境况下开展工作。他们要认定何为证据,以及证据支持何事,在他们准此行事的时候,证据持续地对他们施加影响。他们无法忽视证据,也无法随心所欲地运用证据。对历史著作的形成而言,证据的压力是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与上述内容相关的乃是历史编纂学的另一个内在特征,那就是,它必须对其具体的知识论断给出证明,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历史学家深知,就某个具体的陈述、解释,甚至是整体性的论述,他们需要对其真实性、充分性及可靠性做出证明。他们书写的形式也颇为关键,历史学家会有许多判断,会表达一些看法,也会对过往进行描述和分析,而书写的形式要利于整合对上述各项所做的论证。即使是最为纯粹的叙事史也无法摆脱证明的必要性,如果它要想被那些具有批判头脑的读者和研究者所接受的话。

安克斯密特认为历史编纂学的美学化乃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大洞见,但这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历史学的琐碎化,因为这种做法没有体认到历史学作为一种思想形式及赋予了历史学以意义的诸多特征。而他文章结尾处给历史编纂学提供的对策,其明显的弊病也与此相同。他给出的一种对策是历史学家应该像精神分析那样,关注先前被压制的过往的无意识层面,那只是通过“口误”

(slips of the tongue)才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来(第147—148页)。尽管我并不否认这一诉求可能具有些许价值,但它比之试图发现和理解构成了过往社会很大一部分有意识层面的生活的各色价值观、信念、预设、惯例、规则及社会实践等,则要卑微得多。对这些东西的研究不仅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因为它需要独到的眼光和非凡的想象,而且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后现代主义对这些事物的优先性却不加理会。

安克斯密特提供的另一种对策,是教导历史学家不要再处理宏大的问题,也不要试图重建或发现过往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现代科学化的历史编纂学的志向和做法业已成为明日黄花。现在留给历史学家关心的只有微观主题和“历史碎片”(historical scraps),而当代某些社会史家的著作乃是其典型,尽管他们炮制出来的著作似乎毫无意义可言。安克斯密特宣称,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史学的目标不再是统汇、综合和整体性了”,现在,细小的题目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第149—150页)。

毋庸赘言,没有几个历史学家会以赞赏的眼光看待这一方案,而这种新式的好古成癖式的研究乃是琐碎、繁冗和颓废的史学观的产物。与安克斯密特的信念恰恰相反,由于专业化的增加和史学视野的扩展在同步进行,当代的历史编纂学呈现出扩张与碎片化的趋向,这使得进行统汇和综合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重要。并且,这种需要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可以形成全面的世界历史观或历史进程观,因为这几乎是根本无法做到的。然而,它并不排除这种可行性,即在相当普遍的层面上关注宏大的主题及那些超越专门的和学科界限的问题,以便为社会和文明的全貌及过往社会中那些广阔的领域和层面提供某种理解。现代的史学文献中不仅包括了大量此类著作,而且某些历史学家总会抱持智识上的雄心,来研究那些无比宽广且意义重大的主题。

安克斯密特在其文章中论及历史编纂学的有用性这一问题,仅仅是为了将其贬为一个无关紧要的论题、一个范畴上的错误。他解释道,由于历史编纂学乃是文化的一部分,关于前者有用性的问题就像文化有用性的问题一样毫无意义(第139页)。〔12〕对于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略做让步,然而,我们却可以提出

〔12〕 这是安克斯密特思路浅薄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他乐于承认科学有用性这一问题,因为科学与历史编纂学不同,不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不禁要问,当我们对现代西方文明进行思考,并将其与古往今来的其他文明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科学乃是西方文明中一种独一无二的强大力量,并且科学式的思想对西方文明中的哲学和其他学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又怎能将科学排除在文化领域之外呢?

这一问题,即,历史的功用何在?历史在文化和社会中起着或者说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尽管人们有时会说,西方社会正在迅速丧失与其自身过往的联系,然而,它却依然珍视历史,并相信历史是颇为重要的,这从它提供了大量资源来资助历史研究和教学来看就显露无遗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西方社会有必要这样做吗?

对这一问题的间接回答曾经由安克斯密特的同胞——赫伊津哈给出,这位覃思卓越且具灵心善感的人文学者,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给文明的往昔提供记录的智识形式”。这一定义也暗含着对史学功能的描述。赫伊津哈继续说道,“我们的文明最先将自己的过往变成了世界的过往,我们的历史最先成为了世界历史”。就这一观察,他继续说道:

只有科学的历史学才足以表彰我们的文明。现代西方文明用来理解世界的智识工具乃是批判性科学。如果我们牺牲了科学上的确定性这一要求,就必然会对我们文明的良心造成伤害。对过往所做的神话式或虚构式的表现也许像戏剧这种形式一样,具有某些文学上的价值,但对我们而言,这绝不是历史。^[13]

在这段话中,赫伊津哈并不是以实证主义者的口吻来谈论科学。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他完全遵循着柯林武德对这一词汇的理解,也就是说,是指严密的认知标准、不可或缺的(exigent)批判方法及对于过往的全球视野等。西方历史编纂学在其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将上述几点内化为自己的特征了。

当然,历史编纂学具有许多功能,并且有些功能是颇为实际的,然而,赫伊津哈是从将社会视作整体的普遍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无论我们是否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他对历史编纂学的看法却与当今许多西方史家对其行当的看法相去不远。安克斯密特却贬损这种看法,认为这是现代主义的陋见,但它提供的后现代主义观点较之现代主义则显得极为贫乏。如果这种意见占了上风(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那历史学将不再具有任何真正的功能。它将无法在教育和文化这些领域中履行其最主要的智识上的义务。而教育和文化的职能,端在将关于其社会和文明,以及其社会和文明所居处的更为广阔的人类过往的最为宽广和最好的知识,告诉每一代人。后现代主义则放弃了这一义务,而这却是历史编纂学在文化上的终极责任,即使当这个疾速变化的世界以前所未有

[13] J. Huizinga, "A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Philosophy and History*, ed. Raymond Klibansky and H. J. Paton [1936] (New York, 1963), pp. 8-9.

的速度前行的时候,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原载 Perez Zagorin,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Reconsider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9, No. 3 (Oct. ,1990), pp. 263-274。】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著

张云波 译

答扎格林教授

安克斯密特的《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发表后,遭到扎格林教授的激烈批评,本文是安克斯密特对扎格林教授所作批评的反批评。在安克斯密特看来,他与扎格林之间的区别肇因于研究范式的不同。他认为,扎格林依然固守“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而他本人则服膺“后现代主义”。在安克斯密特看来,“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关注于单个陈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真理的符合论是相契的。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则聚焦于整个文本,试图考察历史学家在形成文本的过程中的审美因素。随后,安克斯密特围绕“叙事实体”、因果律、语言的自主性等论点展开论述,厘清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差异,并指出“后现代主义”乃是“现代主义”发展的结果。

与其他学科一样,历史哲学也有其自身的历史。如果我们愿意追溯的话,其历史与历史书写的历史一样久远。自赫西俄德以还的古典作家不断论说着历史作品的性质与用途。^{〔1〕}然而,如果我们对历史哲学那悠久的历史加以思考的话,其历史中的某个特征便马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我看来,那就是历史哲学自主性的缺失。也就是说,在其漫长的生涯中,历史哲学的发展,尤其是其最显著的演变,经常被外在于这一学科的状况所支配。历史哲学从来没有多少内在的动力,而往往将自身局限于某一苑囿之中,即将别处获得的洞见应用到历史思想这一领域之中。

因此,历史哲学在其大部分生涯中都是基督教神学的婢女。晚近以来,当对过往的神学解释被世俗化之后,历史哲学又以历史进步理论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同样,这些类型繁多的历史哲学并不建基于历史或史学思想之上,而是建基于诸如(辩证)理性(黑格尔)、科学理性(孔多塞、孔德),或人的理性本质(康德)等理论的基础之上。然后,如果对当今时代略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科学哲学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决定着历史哲学。颇为讽刺的是,脱胎于这一路数的所谓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竟比先前的任何一种历史哲学都要短命,尽管其坚信在经过诸多世纪的无益思辨之后,它最终给历史哲学提供了唯一正确的问题。这是因为,自其诞生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批判的历史哲学就不得不将这一领域拱手送给那种运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等工具的历史哲学。就历史哲学缺乏自身动力或自主性这一通例而言,只是由兰克、洪堡、德罗伊森及梅尼克等人发展起来的德国历史主义是个例外。历史哲学不愿自力更生的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通常对历史主义不屑一顾。此外,与前者不相伯仲的是,历史主义被伦理学(在“历史主义的危机”中)和科学哲学(二战后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予以致命的一击,而这两个哲学中的分支学科经常以臭名昭著的敌对态度看待史学思想。^{〔2〕}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哲学的历史经过了许多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是由历史哲学与某些其他学科结成联盟来主宰的。为简便起见,我将其称为历史哲学中的“范式”。然而,我们必须马上指出,“范式”这一名词并不确切。因为在科学的历史中,范式转换的来源和原因都肇始于某种科学自主的发展,而历史哲学中的范式转换则与之有别,它是由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家们师法某个全新且

〔1〕 关于古典作家对历史哲学所作的理论性表述的目录,可参看 F. Wagn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Munich, 1966), pp. 8-41.

〔2〕 对这一主题所做的阐发,请参看 F. R. Ankersmit, *De navel van de geschiedenis* (Groningen, 1990) 的导论部分。

相异的“主导性学科”所引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改头换面,推倒重来。然而,如果不同科学范式的拥护者之间进行的辩论因为共同根基的缺乏而受到阻碍,那么,我们不难想见,这些障碍将会阻碍历史哲学中两种不同范式在其前沿之间进行有意义的讨论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思想上的保守或激进倾向所做的无力指责,只是在两种倾向之间进行推诿;同样,我们可以想见,不同范式的信徒将会认为其他流派的思想倾向是浅薄和无用的。那些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在寻求历史意义的过程中只会感到对批判的历史哲学家的蔑视,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只会纠缠于“覆盖律模型”或“逻辑关联论证”等技术细节。因此,扎格林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肤浅”“空洞无物”,并且与历史写作中的实际问题毫无关联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事实上,扎格林与我之间的差异即是这种境况的写照。扎格林关注的是历史真实、证据及因果律;他不断坚称历史事实与虚构(fiction)之间在本质上有着截然分明的界线。而这些特征,连同他思考的风格,在在表明他抱持着“现代主义”的范式,尤其信守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信条。而且,扎格林也乐于将自己的立场称为“现代主义的”。当我读过扎格林对我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所做的雄辩、独具只眼及颇具说服力的反驳之后,我该如何进行讨论呢?我大可以向他指出,现代主义的范式业已消耗殆尽了,从而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讨论(就像是罗蒂会做的那样)。尽管老的范式在它自己的时代一度硕果累累,但它最终难逃回报递减律的消磨。我也可以向扎格林逐条列出后现代主义者对文本特性的见解,向他展示海登·怀特、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及汉斯·凯尔纳等人^[3]的确用这些见解使我们知晓了历史写作中以前尚未被人留意到的诸多层面。然而,我担心上述策略可能对我和扎格林之间进行的争论毫无助益。他也许会机敏地指出,我这是在避重就轻,而他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此外,若是将方才提到的那些作者们卷入到扎格林对我的驳斥当中,可能会使他们承受无妄之灾:这些作者有恩于我,而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回馈他们的恰当方式。职此之故,我将采取另外一种策略。我将从“现代主义的”预设开始(这些预设至少不是必定会与现代主义的视域不相契合),以此为起点,借助“现代主义的”推理方式得出后现代主义的结论。我对这一策略抱有信心是源于这一事实,即通过这种方式,

[3] H.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1978), and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1978); D.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and London, 1985); 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Madison, 1989); 在我看来,最后一册书中的第1、3、7、8及9诸章尤其是这种见解的典型代表。

我可以回顾最近一些年来我从现代主义的(也就是历史主义的^[4])信条走向后现代主义立场的道路。^[5]

当我们刚从现代主义迈向后现代主义的征程时,我们发现了(历史)文本。关于文本,我们可以讲以下两点。首先,历史文本乃是由(许多)单个陈述所构成。这些陈述在历史文本中也许具有许多不同的功能,然而我们却可以不容置疑地指出,大多数这样的陈述声称是在对过往的某些事件作出精确的描述。历史学家正是通过从档案馆或别处发现的证据来形成这些陈述的,而且正是现在或将来能够获取的证据决定着这些陈述的真伪。其次,除了考古或古代史这样的领域,历史学家能够采用的证据往往允许他们书写比我们在他们的文本中能够看到的多得多的关于过往的真实陈述。在文本中,这些陈述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以及得到何种强调绝不是偶然或随意的。从历史学家们可能提出的、关于过往的某些相关部分的所有陈述中,他们仔细地挑选那些他们最终决定在其著作或论文中提及的、作为描述性的内容和表陈的历史陈述。人们也许会说,历史文本的写作需要历史学家在对待陈述时需要某种策略(politics),而文本乃是这种策略的产物。历史学家在这种选择过程中需要当心的原因乃是基于:当诸多陈述统合起来以后,它们会决定历史学家意欲展示给读者的关于过往某部分的“图景”,而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一“图景”在重要性上绝不比构成它的那些陈述为低。

继而,我们可以指出文本中那些陈述的两点内容:1)它们指向并且描述过往的某个部分,然而,它们既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2)它们界定了(就此而论,我将使用“摹写”[to individuate]这一技术性词汇,而不与“等同”[to identify]这一词汇混同在一起)历史学家意欲传达给读者的“关于过往的图景”。不同的陈述,将会展现出不同的“关于过往的图景”。我们还需补充两点。首先,在实际状况中,人们很难辨别究竟是哪组陈述将某种“关于过往的图景”的样貌摹写出来的。历史学家(包括文本的作者)在关于这些陈述的组合如何形成这一点上可能会发生分歧,即使某段时间达成了一致,但这种状况也可能会随时间的

[4] 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伽达默尔为历史主义辩护道,它并不是对“现代主义式”规划的攻击,恰恰相反,它乃是启蒙状况下“现代主义式”规划的一个新的巅峰;参见 H. 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1973), pp. 185-205.

[5] 如果历史主义从一种关于国族(nations)、民众(peoples)或个体等历史事物的理论变成了一种我们用来谈论这些历史事物的一种关于语言的理论,那么,后现代主义正是其结果。后现代主义乃是历史主义的唯名论的版本。

变迁而改变,历史书写的历史正表明了这一点。对历史学家提议的“关于过往的图景”进行确证(与摹写相对),以及在进行确证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某组陈述究竟为何,我将会在下文中加以讨论。然而,无论在确认上面提到的组合时会遇到何种困难,毫无疑问,总有**某些**组合来摹写上面提到的“关于过往的图景”。其次,历史写作(在理论与实践皆然)中最本质及最有兴味的东西并不发生在单个陈述的层面,而是发生在历史学家采用何种策略来选择陈述,以摹写他们心中“关于过往的图景”的这一层面。我们发现,正是在这里引发了最多的历史争论,并且在最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过去的观感。说出过往的某些真(true)事可谓易如反掌,任何人都能做到,然而,说出过往中那些恰当的(right)事情就很困难了。这的确需要历史眼光与原创性。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对历史写作发表一些有价值的言论,我们就必须聚焦于对那些“关于过往的图景”进行理论反思,而不应着眼于对过往有所言说的那些单个(或一些组)的陈述。

后一种观点将我引向了我所有论证中最为关键的阶段。我在其他地方将这些“关于过往的图景”称为“叙事实体”,而其原因在此处则毋庸赘述。^[6]从而,所有的问题都转变成了这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准备将这些叙事实体视作与主语、谓语、理论概念、陈述等相同的逻辑实体,而后面这些东西我们已经从哲学逻辑上知悉了。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在下文将会照此行事),所有这些令扎格林怒火中烧的后现代主义的离谱做法则将随之而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依然停留在现代主义构想的范围之内,从而在现代主义的论证迷宫中打转。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文本及其中的叙事实体,那么我们会变成后现代主义者;如果我们只看到陈述,那我们依然是现代主义者。或者,用一句口号来讲,那就是:陈述是现代主义的,而(历史)文本是后现代主义的。^[7]

我假定这一全新的逻辑实体的存在,而我也认识到要想表明其必要性殊为不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我无法进行详细论证。^[8]我只限于回答从直觉上而言对引入这一概念最为明显的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叙事实体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因为用叙事实体来谈论的有关文本的一切,用陈述也完全可以做到。我初步的回答是这样的,陈述告诉我们关于文本的一切以及不同陈述之间的差

[6] 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io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1983), pp. 96-104.

[7] 职此之故,对于某些后现代主义作品中偶尔出现的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路径来分析陈述的做法,我予以谴责。当巴特试图在问候语“星期一。明天返回。让-路易”中指出他认为的模糊性时,劳什(Louch)予以批评。我完全同意劳什的做法。参看 A. Louch, “Does Deconstruction Make Any Difference?”,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0(1986), pp. 330, 331.

[8]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p. 104-140.

别,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差别的标识,那就是叙事实体之间的差异。当然,如果没有额外的论证来支持后一种观点,以表明确有深层次的差异卷入其中的话,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只能处于僵持状态了。而额外的论证是由这一思考促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叙事实体这一概念,我们就无法辨别历史学家们关于历史解释的争论中何者最为关键以及历史学家的工作为何会比只是写下真实的陈述要复杂得多,而历史写作则一再表明了此点。

再次,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看法。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既然任何一种(组)陈述可能用来指称某个叙事实体,而这个叙事实体可能只是另一个叙事实体的一部分,这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所称之为叙事实体的东西只能通过对其所有属性的列举来加以指称(叙事实体所在世界与我们所在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构成是不同的,这乃是其原因之所在^[9])。(再次重申,我在下文将会解释如何找出这些相关的陈述。)其次,我们还可得出,关于叙事实体的陈述永远只能在分析上为真,而不可能在条件上为真。关于“ N_1 是 p ”(在这个句子中, N_1 是用来指称某个具体叙事实体的叙事实体的名称,而 p 则是被那个叙事实体所包括的陈述)这种句型的任何一种陈述都是分析上的真,因为假如 N_1 是错的,那么这个陈述就不可能是真的。即使这些指称我们所处世界中的物体的陈述是真的,它们也只能是条件上的真。这也就意味着,莱布尼茨所谓的“概念中的谓词原则”(predicate in notion principle)(这一原则认为,所有的谓词都可以从命题中的主词得出),对于像“ N_1 是 p ”这样表达文本中各个陈述的叙事性意义的陈述而言,乃是正确的。^[10]

为了摹写某个历史文本所提出的叙事实体,我们必须将文本中相关的陈述作如是观,即每一个陈述可以看成是“ N_1 是 $p_1 \dots p_n$ ”(在这句话中, N_1 表示句子中提到的叙事实体,而 $p_1 \dots p_n$ 则指与之相关的一组陈述)。“ N_1 是 p ”这样的陈述表达的是我所谓的文本中单个陈述的叙事意义,这与其描述性意义(指的是它们描述过往的能力)相对。如果我们想要捕捉文本的叙事意义,我们就需要将 $p_1 \dots p_n$ 读作“ N_1 是 p_1 ”...“ N_1 是 p_n ”,这解释了历史文本的自我指涉特性,但扎格林却将这视作是“极不适当的,并且是对历史书写律则的公然践踏”而加以反对。然而,如果没有文本(作为一组陈述)与文本(作为对某种叙事实体的提议)之间的自我指涉,我们就不会拥有对过往的解释。失去了这种自我指涉性,文

[9]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p. 116-118.

[10] 关于将莱布尼茨的逻辑作为叙事逻辑之核心的解说,可参看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p. 140-155。

本立刻就会解体成毫无意义的断片：自我指涉的确是历史见解得以可能的“超验条件”。^[11]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历史文本的不透明性：从叙事的意义来看，文本在反映过往上是不透明的，但它自身却吸引着读者的注意，这种做法遮蔽着人们对过往本身的观察。这一趋势又被历史文本的“学科化目标”（disciplinary goal）所强化，因为它有效地用文本代替了过往（对这一论点的详细说明，请参看下文我对历史表现的论述）。这可以消除扎格林对历史文本内倾特征（intentional character）的疑虑。当我们考虑文本的自我指涉性这一维度时，文本的内倾性（intensionality）必须与文本所指涉的物件相关联。并且，事物绝不是无关宏旨的；改变事物就会改变历史学家对过往所做的描述的性质。因此，没有内倾性，任何关于过往的图景或解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让我们以更近的距离来审视这些叙事实体吧。人们也许会问，叙事实体与其所表现的过往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也许给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某种背景是颇有助益的。叙事实体自身通常并不具有名称，但在历史写作的历史中，它们有时却会得到某些名称。我们可以想起诸如“工业革命”或“冷战”这样的词汇或概念。很显然，我们使用这些概念是为了对过往进行解释或表现，而这些概念也就是叙事实体。那么，诸如此类的概念与实际的过往是什么关系呢？现代主义者必定会寻求上述概念与过往某部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或者坚信这个概念具有描述过往某部分的能力。如我所见不谬，沃尔什和明克（Mink）（我们这里讨论的对于这类概念的分析，其中许多颇有价值的贡献就来自这二位^[12]）就是以这种方式看待此问题的。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概念都应该视作是叙事实体的名称（names），并且，就指涉性与符合性而言，这些名称都不应具有指涉文本以外任何东西的能力：它们只指向叙事实体（也就是说，由文本所包含的一组陈述，并且只在文本之内）。当然，这决不意味着这些概念完全与过往自身无关：在某组陈述中，叙事实体的名称指向过往，而这种对过往的指涉乃是人为的（reference is made to the past）。接下来，让我们考察叙事实体本身而非其名称的指涉。叙事实体必须与某组反映历史文本中与之相关的陈述的叙事意义（与描述意义相对）的陈述相一致，也就是与“ N_1 是 p_1 ”...“ N_1 是 p_n ”

[11] 叙事实体通过单个陈述来组织关于过往的知识的做法其实与卡西尔的象征概念颇为相近。卡西尔赋予象征这样一种超验的能力，即将经验的纷繁多样统合成感知的整体性，而康德则总是将这一能力赋予超验的自我。可参见 S. W. Itzkoff, *Ernst Cassirer: Philosopher of Culture*, Boston, 1977, chapter 4。

[12] W. H. Walsh, “Colligatory Concepts in History”, in *Studies in the Nature and Teaching of History*, ed. W. H. Burston and D. Thompson (1967); L. O. Mink,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 Brian Fay, Eugene O. Golob, and Richard T. Vann, Ithaca and London, 1987, 尤其参看第 2、3、6、9 诸章。

这样的集合相一致。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叙事实体的所指(referent)必定是叙事实体本身,因为它是 N_1 这一名称的所指。刚才我们谈到了叙事语言的自我指涉性,因此,这一结论不应使我们感到惊讶。从而,叙事实体就是我们可以指涉的语言物(linguistic object),我们可以在陈述中使用它的名称,如果它恰好有名称的话。我们还可以在陈述中表达历史文本中的叙述性意义。然而,它只能指向其自身,而决不会指向任何外在于它的事物。就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这个世界来说,叙事实体的确是语义学上的“黑洞”。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假设我们拥有两个或多个大体上关于同一个历史主题的历史文本,并且我们试图在它们之间加以评判。像奥克肖特、戈德斯坦(Goldstein)及斯坦福这样的建构主义者^[13]已经成功表明,并没有一个独立于我们的过往(there is no past that is given to us),我们也不可能比较这两个或多个文本来发现它们中的哪一个与过往相一致,或哪一个不相一致。从这些建构主义者的论证中,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过往作为历史文本的复杂所指就整体而言在历史论争中并不发生作用。而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这一具有所指功能的过往(referential past)从认识论上而言是一个无用的概念。这就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机器上的轮子虽然可以转动,但却不能推动任何东西一样。我们拥有的只是文本,我们也只能在文本之间进行比较。如果我们试图寻找关于过往的最佳描述,我们只能询问我们自己,在这些文本当中,哪种文本使现有的历史证据得到了最为合理的使用。但我们根本无从通过比较所选的文本与“过往”本身来检验我们的结论。因此,叙事实体并不指涉过往,而从历史争论的角度看,这样的指涉也是不必要的。

下面我们将对此加以说明。当我们用简单的断言陈述,比如“猫躺在垫子上”这样的句子来谈论现实时,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语义上的惯例来决定这类陈述的意义、真伪及其指涉。意义、真伪及指涉这样的惯例是如何黏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20世纪哲学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注于此。然而,当我们使用现在正在考察的这类历史概念时,这类语义上的惯例却显然并不存在;因此,面对此种境况,我们无法严格地谈论真、伪、指涉或指涉上的失败。然而,我们能够说的是,诸如此类的历史概念或叙事实体是极为复杂的语言符号,

[13] M.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Eng., 1978, chap. 3; L. Goldstein, *Historical Knowing*, Austin and London, 1976;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istorical Past,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16 (1977); M. Stanford,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 1987, pp. 114-115.

它们被历史学家仔细地建构出来以便为了某个特殊的目的(即,在面对过往的某个具体部分时,将词语与事物联系起来)来**强行规定**(stipulate)诸如此类的语义惯例。事实上,当某个叙事实体恰好以某个历史学家赋予它的意义被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被历史学家以外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一个新的惯例被引入到了语言之中,以便将言与物联系起来。然而,只要人们还没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并且那个词汇还没有实现从历史话语向日常话语的转换),我们就只能说,这样的一种语义惯例只是被历史学家所**提议**。这一点从而会诱使我们在本质上将叙事实体视作将言与物联系起来的**提议**而已。^[14] 它的含义是,在历史文本及历史解释的层面,我们就无法恰当地使用真伪这样的词汇了,这也是我对扎格林另一个驳斥的答复。比如,我们可以说这些提议是成果丰硕的、深思熟虑的、机敏睿智的、切中肯綮的(或者文不对题的)等,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它们是真的或假的。正如我在人们如何构思提议的案例中所展现的那样,提议既不为真也不为假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合理的理由来支持或反对某个提议。我们无法认定某个叙事解释或叙事实体的真伪这一事实并不会使我们在历史争论中处于手足无措之境。^[15] 如果我们认为,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或应当将历史解释与解释论证局限于言说那些关于过往的真事时,这一错误做法不仅危险,而且愚蠢。

我曾经数次提到了叙事实体的确证(indentification)这一问题,在此,我再次重申,我们不应将确证与摹写混为一谈。我的论点如下,叙事实体的确证需要其他叙事实体的存在,事实上,某个叙事实体的属性乃是(部分地)由其他叙事实体所决定。我将为这一论点征引一些经验上的支持。历史老师经常会被一些本科生的作为所震惊(当时的我也是如此)。一些本科生尽管机敏睿智,但其历史教育却异常缺漏,以至于在某项历史研究中根本无从感知或确认历史学家提议的关于过往的某个观点。本科生经常会把无足轻重之物看得非常重要,或者反之;并且他们经常无法分辨出描述止于何处,解释始于何时。对他来说,历史研究中那些对过往的解释几乎不具有可辨认的轮廓,他们无法设想多种抵牾观点的存在,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不知道这些观点是与哪些观点相抵牾的。而

[14] F. R. Ankersmit, "Th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Working with Language*, ed. H. Coleman, Berlin, 1989, pp. 57-83.

[15] 一般而言,只有在论及某个叙述句的陈述时,我们才能够使用真伪这样的字眼。然而,在这个一般性的规则中,我们应该排除那些包含叙事实体名称的陈述。另外,对于极为简单的叙述句,如果我们也禁止使用真伪这样的字眼,那就颇为迂腐了。参见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p. 178, 179.

在那些相对较为抽象的历史学的分支,比如思想史中,这些现象尤为明显。然而,如果在本科生的课程当中,关于上述主题的其他观点也得到了讨论,那么,对历史学家在其著作或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学生们能够辨识的能力则会有显著提高。

这一教学上的经验可做如下解释。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叙事实体乃是我们如何看待(部分)过往的提议。因而,当我们只有一种看待过往的方式时,我们就无法辨认出这种方式。因为只有当我们知晓不同的看问题或做事情的方式时,我们才可以对其予以言说。而这也正是学生们在辨识描述与解释,以及关于过往的不同解释时遇到困难的原因。接下来,让我们假设,我们确实拥有关于同一个历史主题的大量的历史文本,并且我们也作如是观。这些文本都会提议一些叙事实体,但这些文本之间的共同点并不是各自(*sui generis*)部分地采用哪种具体的叙事实体来看待过往。这些文本之间的交汇处决定着历史实际的面貌,因为这组文本谨守着文本的律则,正是那些解释以外的东西变成了描述。此处,我们遇到了从历史话语向日常话语的转换,这一点我在上段中已经指出了(并且我衷心地支持这一点,即历史话语在逻辑上先于日常话语^[16])。因此,在关于某些主题的历史争论中,对于叙事实体的辨识不应着眼于它们之间的交汇处,而应该只关注其差异。如果我们只有一种叙事实体,那我们就无法分辨其差异,那么最终将没有任何叙事实体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描述。然而,如果存在着几种叙事实体,那它们的特征乃是拜其差异所赐。总而言之,正是由于其他叙事实体及它们之间差异所形成的体系的存在,我们才能够辨识出某种叙事实体的样貌。

叙事实体的样貌乃是由时间长河中历史学家们所提议的其他叙事实体来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观点:对于叙事实体的样貌,我们永远无法形成非常明晰和确定的看法。它们的样貌取决于现有那些重要的叙事实体的组合,而在确定叙事实体重要性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却有可能产生分歧;此外,当全新的叙事实体在日后被人们提出来时,现有组合的样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然而,叙事实体的样貌会始终处于两种“描述的极端”之中:一端是只存在一种叙事实体,另一端是存在着无穷的叙事实体,并且其汇合处几近完全相同,每种叙事实体只有一句陈述与其他的叙事实体不同(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中,叙事实体就被简化成了那句陈述)。顺便提一句,我注意到这一观点与索绪尔的看法颇为相近。在索绪尔看来,符号的意义乃是由它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

[16]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117, 167-169.

的。“语言乃是一种系统”，索绪尔写道，“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元素都拼接在一起，并且任何一种元素的价值都取决于与之同时共存的所有其他元素”。^[17]法国式的后现代主义，不论是作为语言学理论、文学批判，还是社会学理论（布迪厄），就本质而言，都是对索绪尔式的旋律进行无尽的变调而已。我不打算对这些领域中索绪尔式主张的丰硕成果发表意见，遑论其有效性了。只打算重复一遍这样的论点：叙事实体的样貌是由其所处的一组叙述实体中差异的体系所决定的。扎格林控告我没有澄清说谎者悖论（the liar's paradox）如何及为何可以适用于历史写作，而上述理论则促使我答复扎格林的控告。答案如下所示。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史学争论的情况下，叙事实体已经通过相互排斥的方式被两极化了：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叙事实体，那么我们为此（eo ipso）就必须反对其他的叙事实体。其次，那些另外的叙事实体乃是我们所接受的叙事实体用来确认自身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所反对的那些关于过往的观点，恰恰是我们接受的关于过往的观点以及叙事实体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准此而论，人们可以言之凿凿地宣称，关于过往的某种观点，或某种叙事实体，乃因其所非恰而成其所是（is what it is not）。这与说谎者悖论的相似之处是颇为明显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扎格林对因果律的讨论。他批评我用探索式的做法（heuristics）（是什么促使我们寻求原因的？）取代了现实中事件的实际进程，而在现实中，原因永远是先于结果的。通过援引一则带有决定性意味的例子，他试图表明结果永远不可能先于原因（正如我所建议的那样）。然而，即便在相对简单的例子中（正如扎格林所提出的那个例子），事情也不像他认为的那般简单。在关于因果律的理论中，我们通常会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这两种情况。A 是 B 的充分条件意味着每当 A 出现时，B 也会随之出现；A 是 B 的必要条件意味着当 B 出现时，A 也会随之出现。因此，充分原因和必要原因之间是一种对称关系，这就是说，当 A 是 B 的充分条件时，B 必定是 A 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因此，如果 A 与 B 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并且 A 是 B 的必要条件，那我们会赞同丹图的结论，即“某个事件的充分条件可能会在此事件之后发生”。^[18]

另外一种思考也会引致相同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描述事件，也就是借由再次描述，因果律之箭与扎格林设想的方式背向而行，而在

[17] F.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Roy Harris, London, 1983, p. 113.

[18] A.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Eng., 1968, p. 155; F. R. Ankersmit, *Denken over geschiedenis*, Groningen, 1986, pp. 160-163.

扎格林看来,因果律之箭只应沿着一个方向行进。丹图给出了如下一个例子。人们可以说,哥白尼在1543年发现了日心说,但它却是下面这一事件的原因,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陈述来恰当地描述此事,“在公元前270年,阿里斯坦克(Aristarchos)已经先于哥白尼发现了日心说”。^[19] 如果没有日后对于日心说的发现,阿里斯坦克就不可能先于某人发现了这一学说。原因再一次晚于结果。

类似这样的说明,即使身处现代主义的范式之内,也可以稀松平常地取得,这对于扎格林的质问完全够得上是一个决定性的答复。然而,我不打算止步于此,而是打算对他的看法,即指责我将探索式的做法与事件的实际进程混为一谈的调调进行更为严格地考察。打个比方,假设我们在探求“工业革命”或“冷战”的原因。我们现在应该记得,这些词汇并不指称文本之外的历史现实,而是只指涉叙事实体。这就意味着,此类问题并不是追问18世纪末叶或二战之后许多复合事态的原因,而是关于某个概念或叙事实体的原因的问题。如本人所见不谬,这个表面看来颇为奇怪的问题其实与某些历史学家为何决定提议某个具体的叙事实体的问题并无二致。很明显,这正是扎格林认为我不应该询问的那个探索式的问题。

无疑,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这里肯定是出错了:一个理智清明的人决不会将工业革命的原因这个问题解读成关于历史学家起而维护某种关于过往的解释的问题。我对这点也深表赞同。如果有什么地方出错了,那也是因为我们这里所使用的关于因果律的语言超出了其合理限度所致。关于因果律的语言只能限定在陈述的层面:只有在那种层面上,单个陈述所描述的关于事物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够确立。^[20] 一旦在文本与叙事实体的层面引入因果律的语言,就会导致混乱和无稽的论断。事实上,那些询问工业革命原因的人们,是想对那场革命的起始阶段及稍早时期这段时间通盘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叙事解释,而不是询问这两个独立的(复杂的)历史事件能否通过某些因果机制联系起来。^[21] 后一种策略充其量只是暗示在两个不同的叙事实体(一种叙事实体指涉前者,另一种叙事实体指涉后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概念上的关联,而这种概念上的关联只能给我们提供语言上(*de dicto*)的真,而非事件上(*de re*)的真(对于

[19]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p. 156.

[20] 在社会经济史当中, C. L. Lorenz, *De constructie van het verleden* (Amsterdam, 1987) 一书对因果解释的理论思想的最新进展做了出色的总结。

[21]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p. 154-155. See also M. Mandelbaum, *The Anatom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London, 1977, pp. 49-53.

因果解释,我们只对后者感兴趣^[22])。并且,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诸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或西达·斯考切波等人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展现出来的所谓的因果关系其实已经隐含在这些作者所使用的主要概念当中了。

我现在可以处理许多比较容易处理的问题了。扎格林对“风格产生内容”颇感困惑。让我们以凡·艾克和弗拉戈纳尔(Fragonard)大异其趣的绘画来加以说明吧。我们发现,凡·艾克通常喜欢描绘大量惟妙惟肖的细节,而弗拉戈纳尔则不会这样做,借用巴特的话来讲,就是后者不会寻求这样的“实在性效果”。当然,这是两位艺术家在风格上的重要差异,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这也关乎内容。^[23]采用凡·艾克风格的画家将会绘制出与弗拉戈纳尔大异其趣的东西(内容)来。从而,风格产生了内容。将这一洞见移至史学这一领域简直易如反掌。刚才,我论及历史写作中在辨识叙事实体时遇到的困难,这乃是由于叙事实体内在的模糊性及其对其他叙事实体的依赖所致。我认为,如果我们试图克服这些困难,风格将是一种有益的工具。风格的多种范畴就像一张网,促使我们去捕捉历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解释和叙事实体,海登·怀特关于福柯的论文及汉斯·凯尔纳关于布罗代尔的论文乃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例证。^[24]

扎格林向我关于历史作品内倾性特征的看法开火,他认为“在不改变其本质及意义的情况下,改写或概括一部历史作品”是可能的,而我关于内倾性的论点则事实上排除了这种可能。盖伊或戈斯曼对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所做的“概要”能否精准地反映吉本原作的含义,我本人对扎格林会真心抱持这样的看法表示难以置信。如果二者可以等同,我们就可以节省出宝贵的时间,只看“概要”而不必读原作了。因此,我大胆揣测,扎格林还是会认为二者之间是存在一些差异的。如果原作与“概要”之间永远存在意义上的差异,那么,哪种意义上的差异会超越意义的同一性这一准则,而哪种差异又不会超越这一准则呢(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谈论意义的同一性)?很显然,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历史写作(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历史书写史的写作)所关切的。比如,当扎格

[22]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 144.

[23] N. Goodman, *Ways of Worldmaking*, Hassocks, 1978, p. 26. 显而易见,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风格上的差异都等同于内容上的差异,反之亦然:“只有说出来的东西(what is said)的某些特征才可纳入风格的范畴;只有说出来的东西的某些特性上的差异才构成风格上的差异。”参见 Goodman, *Worldmaking*, pp. 26, 27.

[24] H. White, “Michel Foucault”, in *Structuralism and Since*, ed. J. Sturrock, Oxford, 1979, pp. 81-116; H. Kellner, “Disorderly Conduct: Braudel’s Mediterranean Satire”, *History and Theory* 18(1979), 197-222, reprinted in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Madison, 1989), pp. 153-189.

林写到霍布斯的时候,他对霍布斯的著作进行了“改写”或“概括”,这在他看来与原作的含义几无二致。其他研究霍布斯的学者也在向我们展示着不同的“改写”,也同样以为他们是在复述这位伟人的作品的“意义”。在这里,意义的同一性并不是给定之物(a given),而是一个问题。因此,我疑心,当扎格林在口头上谈及“改写”可以“在不改变其本质及意义的情况下概括某种历史著作”,这其实是一种想当然,只有在模糊的玄思终结的地方,历史学(或历史写作的历史)才能起飞。

此外,对于将吉本《衰亡史》的“意义”与比如说戈斯曼对它的出色研究的“意义”相等同的看法,我也持反对意见。我们拥有的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像吉本著作中那些关于词汇与句子的符号串,另一种则是对这些词汇与句子的符号串所做的解释(也包括作者本人的解释)。当我们谈及吉本《衰亡史》的“意义”时,事实上,我们是指那些诸多解释中的某一种(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骄傲地宣称其解释与吉本本人的解释是一致的),而不是指吉本著作中某些隐藏的本质。当人们谈及“吉本著作的意义”时,人们通常会念及这个所谓的隐藏的本质,但它在认识论上却是个无用的概念,它与我们刚才谈到的所谓“固定不变”(the)的过往这一概念同样无用。这是另一个位于机器上的维特根斯坦之轮,它并不推动任何事物。在这里,我对历史这一行当并不抱持过分的相对主义或愤世嫉俗的看法;我只是阐明事物的本来面貌,并且认为史学界富有意义的争论可以在思想之光的照耀下予以开展和分析,而不必乞求于认识论这个无用之物。

在其他地方,扎格林强调“对于整合与汇总的需要比以往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与扎格林一样,我也是一位历史汇总与综合的热心拥趸。但问题的关键与我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无关,而是当代的历史学是否在沿着碎片化而非综合的方向行进。当我说,在目前,碎片化而非综合取得了优势时,我注意到,扎格林对现状的诊断与我一致。既然扎格林对我关于当代历史学这一趋势的解释不置一词(尽管这是我论文的主要观点),我遂以为我们在这里并无分歧。^[25]

在扎格林对我论文予以发难的那篇文章的结尾,他不大适当地将我的观点与赫伊津哈的观点进行了比较,然而赫伊津哈却要求历史学家遵守所有与科学性相关的标准。无论是在眼下这篇文章,还是在那篇被扎格林批评的文章中,

[25] 对历史学科中碎片化倾向的另一种处理方式,可参看 F. R. Ankersmit, *The Reality Effect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msterdam, 1989。

我从来都没有建议历史学家“放弃那些强有力的认知标准和必不可少的批判方法”等等。不过,当我们进入历史解释的层面时,这些标准对我们就没有多大帮助了。我的观点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在这里,我们“超越”了科学性的标准,而非“反对”这些标准。我在论及历史写作的非科学性而非反科学性时曾对这一事实有过描述。我在下文处理历史表现时,将对争论如何在这种“非科学”的层面进行加以讨论。此外,除了赫伊津哈也是一位荷兰人,并且与我都在同一所大学任教外,我对扎格林在指责我不大尊重科学的严谨时,援引赫伊津哈的做法略感惊讶。众所周知,《中世纪的衰落》一书的作者在风格上和内容上从20世纪初荷兰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氛围中获益良多(主要是所谓的“八零代”[Tachtigers])。当《中世纪的衰落》一书出版之时,这一事实就很明显了,以至于引发了某些中世纪学家(而以与赫伊津哈相距甚近的乌特勒支的O. A. 奥伯曼[Oppermann]为甚)指斥该书“缺乏科学上的精密”。所以,扎格林让我看到的赫伊津哈大概根本不可能写出其最伟大的著作。扎格林将赫伊津哈奉为史学中“科学性”圭臬的做法,无疑是失败的。〔26〕

扎格林竭尽所能地暗示我对历史大不敬,对于这一污蔑,我敢放言,我认为询问历史用途的做法其实是犯了范畴上的错误,这较之扎格林之流坚信历史有用性是个颇具意义的问题,更能表现出对历史的尊重。关于用途的争论往往需要更为宏富的背景,只有置于此背景之下,此类争论才有望得以解决。而在我看来,历史乃是那一背景的组成部分,从而,历史成为衡量上面所说的用途的标尺而非被衡量之物。〔27〕

在扎格林论证的起始,他先胪列了后现代主义的三个特征。我不知道大多数的后现代主义者是否会在扎格林所绘的肖像中认出自己。后现代主义者们可能会对扎格林将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及相信历史必然性联系起来的做法持保留意见。然而,由于词汇是模糊的(我会说,这是叙事实体的一个极好例证),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心目中的后现代主义者,因此,对扎格林所绘的后现

〔26〕 J. Kamerbeek, Jr., “Huizinga en de beweging van Tachtig”,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67 (1954), pp. 145-164; F. Jansonius, “De stijl van Huizinga”, *Bijdragen en mededel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88 (1973), pp. 195-213. 至于扎格林征引赫伊津哈的语句,我们不应忘记将其还原至赫伊津哈与P. N. 凡·艾克及其外甥(M. ter Braak)进行论战的背景当中。关于另一个赫伊津哈,也许比他本人还要像赫伊津哈,请参看其就职演说:“Het aesthetische bestanddeel van geschiedkundige voorstellingen”, in *Verzamelde werken* 7 (Haarlem, 1950), pp. 13-29。

〔27〕 关于试图将历史的用途问题与历史写作中价值的角色问题相联系的有趣尝试,参看C. Lorenz, “Het gewicht van de geschiedenis: Over het waardeprobleem in de geschiedwetenschap”, *Kennis en method* 14 (1990), pp. 129-163。

代主义的肖像我将存而不论。然而,假如我也获准拥有同样的自由,我将会说,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关于写作的理论。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不是像解释学那样关于解释的理论,而是关于解释性写作的(始料未及的)效果的理论,我们在文学理论中会看到此种效果,当然,在历史写作中也可以看到。

我认为,在历史编纂学中,解释性写作会生发更多的写作,这一始料未及的结果所产生的所有写作会增大而非缩小我们与所写之物的距离(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论点,即,历史写作倾向于取代过往或文本自身)。扎格林对我的看法持反对态度。他也意识到了史学过剩这一现象,但对此却倾向于抱持乐观的看法。他将历史写作中新近的大爆炸与科学进行了比较,而在后者那里,最近几十年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但却没有引发我在史学中看到的那些始料未及的副作用。然而,扎格林自己的说明却表明他在史学与科学之间所做的比较是不恰当的。

在此,我讨论的起点是扎格林这一颇具自信的观点,即:历史学就是这样的历史解释,当其被历史学家“逐渐广泛接受”并最终被普遍认可,就成了“对过往的理解的牢靠的一部分”。当提及这一可喜的共识时,扎格林进而天真地继续写道,“当然,这或许不会久驻不逝”。在我看来,这句补充无疑是一种掩饰。因为,当扎格林向我们展示关于霍布斯政治哲学之论争的新近历史时,他向我们描绘的图景竟与其对史学与科学之间高度一致的乐观信念相左。我想让扎格林向我指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科学中的哪个部分(就像他所描绘的关于霍布斯的争论当中)竟有两种、三种甚至多种互不相容的理论能够大体平和地共存(也就是说,没有哪位科学家会认为异常的或显著的变化正在发生),并且最终所有的理论都将消失,以便为某些全新理论的多元性让路,而它们只在未来经由某个颖悟异常的修正主义者决定使其再次现身。我无意否认科学与历史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除此之外,二者之间也存在着诸多显著的差异。如果我们致力于对历史进行如实和公正的评价,我们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不能视而不见。而扎格林对霍布斯的论争所做的说明在任何一种科学中都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也可算作二者诸多差异中的一个吧。

如果我们借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黑匣子”这一方便概念^[28],那么,与这场讨论最相关的历史与科学之间的差异就好辨识了。在科学中,一个黑匣子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没有哪位科学家会庸人自扰地“打开”这个匣子以查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当科学陷于完全的死局之时,人们才准备重新思考黑匣子)。正是由于许多黑匣子的存在,科学才得以

[28] 参见 B.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Stony Stratford, 1987, especially the introduction.

进步。而历史学则与之不同,与我所认为的扎格林的观点相反,历史学并不承认黑匣子的存在。扎格林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论争所做的描述充分表明,讨论并没有导致黑匣子的产生。历史写作引发了更多全新的解释,而不会产生任何结论(黑匣子),这一现象其实是对我观点的解释,但我的这一观点却遭到了扎格林的攻击。

黑匣子这一概念对我们还有其他的用处。扎格林认为,史学争论(就像关于霍布斯的争论)往往围绕着原始文本而起,而史学争论往往又会将我们带回到文本(霍布斯的文本)那里。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在对解释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文本本身既是讨论目的的起点,也是全新解释得以发展的起点。但这一事实其实是削弱而非证明扎格林的这一论断,即:历史学家可以像在科学中那样检验其解释的“有效性”(他的用语)。当科学家解决其论争时,他们会将论争转化成他们都能接受的关于黑匣子的语言;面对这些黑匣子,他们会回溯其差异,以便找出对错(当然,对于什么应该视作某组相关的黑匣子,人们会产生另外的分歧)。物理现实中当然没有这样的黑匣子;黑匣子是理论,科学赖此以进步。在许多情况,尽管并不是所有情况下,探究物理现实其实是在回避问题。因此,当扎格林(正确地)指出,史学争论会将我们送回文本(这乃是科学家的物理现实在历史学家中的对应物),而非某些史学黑匣子的时候,他此处无比清楚地揭示出史学与科学之间的本质差异。

如果史学与科学之间在进行争论时的确存在这种差异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询问历史学家是如何解决这些争论的。历史编纂学中的合理论点是什么样子的?我再次诉诸叙事实体这一概念,这么做非常自然,因为叙事实体是历史写作中那些独特见解(我刻意避免知识这个字眼,因为它与真、伪等概念过于接近)的体现。继而,我们可以说,在文本中,历史学家致力形成某个语言物体(linguistic object),也就是叙事实体,他企图让我们借此来理解过往。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史学洞见及历史文本当中隐喻(转喻)特性的解释。正是由于隐喻式话语的性质,比如“A是B”这样的表述,我们才能够通过B(也就是瑞恰慈术语中的“喻体”^[29])来理解A(“本体”)。“地球是飞船”这一隐喻提议(正如叙事实体所提议的那样)我们用言说飞船的语言来言说地球。在隐喻和历史解释中,我们都用适于某个话题的语言来言说它物。

下面我将详谈隐喻与历史解释之间的类比。“地球”,也即上述隐喻中的本体,对应着历史叙述中的描述性意义,在二者当中,它们都指涉语言之外的某种

[29] I. A. 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Oxford, 1971, pp. 89-115.

实在(reality)。“飞船”,也即隐喻中的喻体,对应着历史叙述中的叙述性意义,这二者都不指涉语言之外的实在。这一类比证明了这一结论:在历史解释中,叙事实体倾向于取代过往的地位,而将自身作为讨论的主题(正如飞船及我们能够因之联想到的所有事物倾向于取代地球的地位一样)。易言之,在历史解释中,叙事实体倾向于扮演(部分)过往的“替代品”或“替身”。叙事实体可以比作杜莎夫人博物馆中的蜡像,二者都是以极度的精心建造出来的,以致对其进行的言说也适用于原物。从中我们可以引申,如果历史学家想要将其叙述的解释力予以最大化(毋庸赘言,这是所有历史解释的惯常目标),他将会在牺牲描述性意义的情况下强调叙述性意义。因而,制造叙事实体,并让叙事实体扮演意欲取代过往的替身(就其字面含义而言),这无疑是历史写作的学科化目标。一方是替身,一方是惟妙惟肖的相似物(good likeness)(由后者可以联想到符合、真、正确的描述、原物及对其所作描述的在场等等),二者之间的区别简洁地概括出我与较为惯常的立场的差异。

完美的“错视法”(trompe l'oeil)可以取代它所表现的事物,而艺术却无法完全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正如隐喻无法完全抹去其本体(tenor)一样,因此,历史叙述也无法在事实上实现历史写作的学科化目标。具体而言,历史叙述永远都会包含论点,也就是说会与意见相左的历史学家进行广泛的讨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具有对过往进行言说的特征,而非让过往自身进行言说,这就导致了这一结果,即使过往与对其进行的表现二者都具有文本形式的时候,我们事实上绝不会将那些试图取代过往的关于过往的历史叙述错认成过往本身。^[30] 画家在“压缩”实在的时候,会使用投影画法来描摹实在,并以此作为对实在的替代,我们可以将历史文本中这些论辩性的特征与这一做法进行对比。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都必须与展现给我们的那些有形或无形的关于替代物的“脚手架”打交道。然而,无论我们是否认为这些陈述(叙事实体)是对论点、讨论或历史学家对过往所作的言说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正如在艺术中那样,画作是否是投影

[30] 事实上,关于历史写作旨在生产替代品的论调可以用这一观点加以驳斥,即,许多历史写作展现给我们的是论点而非表现,这一点在当代史学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立场的强有力的例证可见 B. Verschaffel, “Geschiedschrijving—een waar verhaal, of de waarheid over verhalen?”, in *Op verhaal komen*, ed. F. R. Ankersmit, M. C. Doeser, and A. Kibédi Varga, Kampen, 1990。即使我感到了这种反对意见的力量,我并不认为这对替代论点构成了致命一击,因为所有的论点都会形成结论。从而,对于结论,人们可以说(1)它们是论点存在的原因,并且(2)它们是对过往进行表现的一部分。换言之,“历史问题”往往成为“历史书写”的预备知识(propaedeutics)。诸多当代史学话语所具有的论辩性这一特征并不必然对我们这里所规定的历史书写的学科化目标构成决定性的反对。

法应用的结果,在史学和艺术中,其理想都是提供一幅可以作为替代品的“图画”。〔31〕

就这一理想已经在历史书写中所实现的程度而言,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过往的缺失,从而催生了所有的历史书写,而过往的缺失也因为叙事实体的存在从而得到了弥补。我毫不怀疑,由于扎格林抱持着(历史)语言透明这一现代主义的理念,他肯定会愤怒地谴责这种做法是他所见过的最为卑鄙、最应予以挞伐的关于历史书写的学科化目标的定义。然而,奇怪的是,他自己的观点有时竟也与此暗合。因为,如果概要和改写可以,并且在理想状况下应该具有与它们所概括的东西相同的意义(正如扎格林所要求的那样),那它们除了成为原作的替代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呢?事实上,我认为,正是思想史这一史学中的分支学科激发了扎格林的大部分思考,它也是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的最好写照。因为,那些书写霍布斯、洛克或马克思的思想史家们要求他们文本的读者不必再参考洛克、霍布斯及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不正表明了他们的自负吗?并且,事实上,尽管历史学家的文本业已存在,但我们依然需要参考原文的必要性不正表明那些文本的不完善吗?这不正说明,它无法有效地扮演替代品的角色吗?

我在上段中的论点可以证明我对贡布里希或丹图关于艺术品的理论的兴趣,这一点在扎格林批评我的那篇论文以及在这一刊物先前刊发的那篇论文中都展露无遗。〔32〕同时,还可以证明我何以全心全意地拥抱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将历史作品美学化的做法。这也是我更喜欢提及历史表现而非历史解释的原因。因为前一种说法较之后者更能体现历史文本具有替代品的功能的抱负,也能体现艺术作品与史学作品之间所具有的相似点。现在,我将利用这些相似点就史学争论的可能性和局限,以及我们能从中期待或不能期待哪些东西,做一些试探性的评论。

我并不打算就这一论题发表某些深刻或原创性的意见;我只打算表明美学路径可以像理性论争在历史写作中所运用的那样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在我看来,毋庸赘言,我们最重要的论据乃是这一事实,即,史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一样,乃是一种替代品(或者,至少矢志于此)。从而,就本质而言,史学争论就成了关于替代品,以及关于扮演这些替代品的叙事实体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

〔31〕 对历史书写的学科化目标所做的这一定义可以解释并证明历史学家的这一要求,即他们应该尽量使对过往所做的解释的“范围”最大化,因而应当选择这一定义而非后者作为对历史学家的学科化目标的一种定义。

〔32〕 F. A.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27 (1988), pp. 206-229.

在面对富有成果的历史争论时许多问题的一个首要表征。因为叙事实体是**各不相同的**(*sui generis*),并不适合进行理性的论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叙事实体的样貌(*identity*)形成任何非常精确的看法都是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其样貌而言,它们相互依赖,并有一种相互缠绕的倾向,这就危及到了其样貌(或同一性)。此外,我们还遇到了这一障碍,即某个历史文本很少恰好(如果下述情况存在的话)是对其他历史文本所研究的同一主题的表现,这也增加了我们辨识叙事实体的难度。不过,当我们对叙事实体的整体性进行考虑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指出叙事实体的表现性价值(*representative merits*);而将叙事实体分解成便于操作的部件,只会带来一组不同的叙事实体,并且,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部件之和是否依然等同于原来的叙事实体。最后一个问题是,在这些叙事实体之间,并不存在中立的转换空间,以便那些关于叙事实体的争论可以在其中展开。无论人们试图采取何种措施来逃离某种叙事实体的重力场,论点都不会是对某种相反的叙事实体的接受,无论人们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如此。总而言之,就叙事实体所打的笔仗在很多方面与在完全风平浪静之时打一场17世纪的海战颇为类似:笨拙、拖沓以及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无疾而终。总之,当海登·怀特说,真正战胜某个叙事性解释的论点只能是制造一个更好的叙事性解释,我对此点颇为赞同。^[33]

然而,艺术史表明我们并不是完全无助的。我以荷兰17世纪的风景画为例,它明显是受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的”理想所激发。如果我们分别拥有霍贝玛(*Hobbema*)和詹·凡·凯塞尔(*Jan van Kessel*,有时被人们称作“穷人的霍贝玛”)的一幅描绘树木繁茂的风景画,任何具有健全视力的人都会看出霍贝玛要比凯塞尔在绘制关于林景的“替代品”方面更为擅长。与此相类,当我们转向史学的时候,萧思克(*Schorske*)对19世纪末维也纳所提议的叙事实体要明显优于贾尼克(*Janik*)和图尔明(*Toulmin*)二人。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层面,在那里有关艺术表现和历史表现的审美上的争议能够克服我刚才臚列出的那些障碍,而对于何者可以、何者不可以称得上是“现实主义的”解释的合理性论证,也就有了施展身手的机会。然而,让我们假设,我们正在对霍贝玛与雅各布·凡·鲁伊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甚至与相对不大知名的画家,比如罗洛夫·詹兹·凡·弗里斯(*Roelof Jansz van Vries*,事实上,他的画作有时也被归于鲁伊斯达尔的名下)的森林风景画进行比较。在这里,理性的考量会诉诸现实主义的再现这一标准,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无法评判;在有些人看来,鲁伊斯达尔的

[33] H. White,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p. 89.

《一棵树的肖像》(Portraits of a tree)(比如他的杰作《池塘边的橡树》,该画现藏于柏林达勒姆[Dahlem]的德国美术馆)从现实主义或描述主义的观点来看,在与霍贝玛或凡·弗里斯的画作比较时,肯定是一种更好的“替代品”。但有些人对这种看法却不认同。从这里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或描述主义的精确性显得过于粗糙了。

当我们衡量艺术作品的质量时,并不能诉诸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评判,艺术史与艺术鉴赏史当中所发生的这一情形对研究史学论争的理论家也极为重要。由于当代的历史学家对过往进行了大量表现,这些表现具有前所未见的高水准,并且许多表现意见相左(扎格林对当代史学的学术成果极为感佩,我对此完全赞同),史学中的讨论也促使我们在史学表现当中的鲁伊斯达尔、霍贝玛和凡·弗里斯(还有许多其他人)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在艺术史及艺术鉴赏史当中的注意力就会从关于现实主义或描述主义的精确性的应用转移至风格及绘画天赋诸问题上来。我们认为鲁伊斯达尔是比霍贝玛更为伟大的画家(这一看法也颇为合理),这是因为前者的绘画,就其作为替代品而言,在风格上优于霍贝玛或凡·弗里斯。当这一步迈出之后,争论就再次变得相当精确和有效了,艺术史家的作品在在表明了这一点。当如实摹画的现实主义这一标准失去效力之后^[34],鉴赏家那训练有素的眼睛依然能够看出哪位画家所展现的对现实的替代品优于其他画家。此外,即使关于风格的争论并不总是能形成定论,它们依然通过清晰地界定争论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从而保证了未来进行理性争论的可能性。风格这一概念为富有成果的讨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历史写作也同样如此。对于历史学家提供的关于过往的那些替代品,我们就其“现实主义的”精确性以及它们是否真正与过往“相符合”这类问题进行理性的论争,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讨论的合理性却因两个原因而受到相当的限制,因此,我们对其不能抱有太大期望。首先,正如古德曼所示,就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精确性这一标准而言,它与受时间约束的框架相关,这一点在史学中也许比在艺术中更为真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个林木繁茂的景观,并使得我们可以进入某种与时间无涉的框架的现实之中,然而,在历史写作中我们却不具备这样的便利。的确,历史编纂学是一门颇为典型的后现代学科,因为在历史编纂学中,(历史)现实臣服于对自身的描述,因此,我们拥有的

[34] 当然,身处今天的人们质疑照片的现实性(realism)已成为陈词滥调。比如,可以参看 R. Barthes, *La chambre claire*, Paris, 1980, pp. 54, 55。

只是表象,也就是说,由各种表现来反映并不存在的过往实在。其次,对现实主义精确性的要求是与历史文本作为替代品的这一特征相抵牾的。正如贡布里希曾经讲过的那样,对替代品所提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它们是否酷似原作,而是它们是否能够像被取代的原作那样“发挥作用”。〔35〕关于现实主义精确性的理性争论需要某种共同立场作为条件,然而,显而易见,诉诸“发挥作用”的做法则会将这一共同立场摧毁殆尽。

因此,如果我们准备接受艺术史家的忠告,进而专注于历史写作的美学特征,我们就可以期望更多的斩获。此外,正如艺术史所示,用来完美地处理这些美学问题的学科早已存在了。毫无疑问,我指的是历史编纂学,也就是历史写作的历史。然而,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像富埃特(Fueter)、西比克(Srbik)或者勒费弗尔等人的历史编纂学(然而,我深信他们的作品及其在现代的继承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并且认为我们应该拥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及史家)。我们最需要的历史编纂学乃是对历史写作进行鉴赏的学问,这种历史编纂学并不满足于只是记录内容、纲要及史家作品中的政治预设,而是应该对历史文本最为隐蔽的角落探赜索隐,对作者未曾经心的文本中的某些方面保持敏感,并且知道如何寻找文本的密钥,不是在其宣称的与实际过往的契合中,而是在文本的编排中寻找密钥。正是这种历史编纂学明白无遗地向我们表明,为什么我们更喜欢诸如吉本、兰克、梅尼克或布罗代尔这样的史家,而非那些才华略逊一筹的同辈。正是这种历史编纂学向我们指明了应该向何处寻求历史编纂学的进步,并且如何辨认历史编纂学的进步,从而,我们现在可以对文本(也许还可以对史学流派)之间的好恶给出一个理性的确证了。

在这种历史编纂学未经证明之前,我也许不应对其抱有如许信心,也不应对其期望过高。然而,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正是此书开启了这种历史编纂学)以还,历史哲学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最好的作品提供了充分的证明,表明对历史文本进行美学式的解读是可行的。在这种历史编纂学当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历史哲学,它不再被寻求某种“宏大理论”所鼓荡,这些“宏大理论”试图概括出某种普遍适用的哲学标准,以对过往与历史描述或历史解释之间的精确与符合做出说明,而这正是每一位史家谨守的家法。怀特、凯尔纳、拉卡普拉、奥尔(Orr)或巴恩(Bann)等人的作品乃是一种颇为谦逊的历史哲学,这是因为,它是对关于史学实际做法与历史写作的历史所做的反思。然而,在某些重要方

〔35〕 E. H. Gombrich, "Meditations on a Hobby Horse", in *Aesthetics Today*, ed. M. Philipson and P. J. Gudel, New York, 1980, P. 175.

面,这些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依然追求那种老式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某些牢靠的理想,因为这些研究与先前范式下的作品一样,都希望就某些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何以能够得到我们的尊敬与钦佩提供某种清明且合理的解释。然而,这种对历史编纂学殊胜之处所做的解释只在历史写作自身当中寻找其原因,而不是通过采纳“科学式的打气之语”(scientific pep-talk)来解释,因为后一做法会偏离我们对历史主题所做的反思,也会使历史编纂学中的庸俗气(philistinism)系统化。

据我猜想,大多数读者在看过扎格林对我的论文所做的公允与切题的批评之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已经处于某种颇为绝望的境地,在大厦倾覆之际只能徒劳地抢救些许残砖碎瓦。我希望这篇答复可以使这些读者确信我的境况并非如他们最初所想的那般绝望。就我在这一点上所取得的成功而言,它证明了假定我所谓的叙事实体这一逻辑实体的存在是必要的。这也就是说,叙事语言作为某物而具有了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不透明的;它是自我指涉的;它是具有内倾性的,并且因此就根本而言是美学的;(历史)文本的叙事意义是不确定的,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语词甚至具有自我矛盾的痕迹;叙事意义只有在其他意义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确认(互文本性);就叙事意义而言,文本决不指向其自身以外的某种实在;真伪这对标准并不适用于对过往所做的历史表现;我们只能在陈述的层面严格地谈论原因和结果;叙事语言是隐喻的(转喻的),职此之故,它体现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过往的某种提议;历史文本是对阙如的过往的某种替代品;关于过往的叙事表现具有分崩离析的趋势(尤其当许多关于过往的相异的表现存在的时候)^[36];所有这些后现代主义的论调在现代主义者看来都是如此骇人,甚至令人厌恶,然而,如果我们准备开发一套哲学逻辑以便恰当地处理叙事实体的话,这些论调都可以得到正式的,甚至是“现代主义”的证明。“证明”在此处并不意味着优长;我不想称赞或谴责任何事物。叙事逻辑只是为了便于理解,此外更无其他目的。

然而,如果现代主义者和扎格林反对的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那种好辩夸谈的风格的话,那么,我与他们则并无二致。的确,人们经常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著作中发现拙劣与勉强的观点、过多的技巧以及晦涩的术语。此外,在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其论点的内核与作品的长度经常成反比关系。打个比方,每个胖子体内都有个瘦子想要出来的典故,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绝好写照。然而,我可

[36] 对叙事表现具有分崩离析的倾向所作的解释,可参看 F. R. Ankersmit, "Het verhaal in de filosofie", in *Op verhaal komen*。

以确信的是,在后现代主义看似臃肿芜杂的背后的确有其精审不移之处,而且我们应该聆听它的教诲,因为它可以教导我们许多先前未曾知晓的关于(历史)文本的知识,而现代主义者却从未注意这些问题,遑论教导我们了。

【本文原载 Frank Ankersmit,“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History and Theory*, Vol. 29, No. 3 (Oct. ,1990), pp. 275-296。】

基思·詹金斯 著

李任之 译

“曾经”：论历史

本文原为詹金斯的教授就职演讲。作者通过思想自传的形式介绍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逐步接受高等教育、并最终获得大学教职的。作者早年阅读加缪、尼采等人的作品，培养了他对理论问题的思考。在接触到海登·怀特之后，他开始对史学理论，特别是持后现代立场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兴趣，并最终吸纳并阐扬了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等人的思想。大体而言，詹金斯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单个的历史陈述的确可能符合于客观发生的过去。但是从话语的角度、从历史文本的整体而言，历史作品还包含了许多非认识论的、审美的、伦理的因素，它终究是历史学家个人的诗性建构，是一种转义。由此，我们虽然不能彻底忽视认识论的、经验性的维度，但是历史文本从根本上却不再受其制约。詹金斯不无极端地宣称，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应该被彻底遗弃，因为它对于身处后现代的人们而言已经不再适合。历史学需要被完全重塑，而代之以一种全新的，他所谓的“时间性研究”（temporal studies），只有这样它才能跟得上后现代的“解放事业”。

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当代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曾任教于奇切斯特大学历史系，2008年退休。詹金斯是后现代史学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著有《重思历史》《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为什么是历史？伦理与后现代性》等，主编《后现代历史学读本》，合编《历史学的本质读本》。

2005年,我在奇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Chichester)做了一个姗姗来迟的教授就职演讲。这篇在此之前未“公开”出版过的演讲稿并不好写,因为我面前的听众是由历史学家、史学理论家、其他院系的学者以及大体与此相关的人所组成的。由此,困难在于,我需要一方面试图向历史学家们——以他们未曾完全听闻过的方式——传达我的思想,且同时不“失去”其余的听众(他们占大多数),鉴于他们会觉得我准备谈的问题太过“内部化”了。最后,我选择了某种“思想自传”的路径——这可能会被认作太过私人化,甚至太过坦白,是非职业的,然而我还是把它加进了我的演讲中,因为它能够帮助我思考为何我以这种方式思考历史,也因为这种路径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也会有些意思。这次演讲部分地采用了一些我在另一篇更早的文章的要点,它载于某期《重思历史》杂志的名为“历史学家的邀约”的“专栏”中;其中,每位历史学家都被要求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成为了如其所是的历史学家。^[1]

我需要在一开始就说明的是,这次演讲将会采用某种思想自传的形式。在演讲的开头,我想以某种可能太过平实的方式思考:一个历史学的教授就职演讲应该是什么样的、演讲者应该被要求做些什么?好吧,就演讲的职业性因素而言,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这样的演讲会让演讲者公开地坦言——就历史学以及/或者它的某些方面的话语而言——他或她信奉什么。然而,就职这个概念使得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一方面就职通常意味着开始,它也暗示着早已完成的东西。虽然就职演讲的确是一个明确的起点——它公开标志着对一位新任教授的任命——然而这位就职者陈述的东西则通常不会那么新鲜。事实上,首先正是以这些“窖藏陈酒”为基础,某人才会被授予某个教席。结果就是,在就职演讲中,演讲者——现在也就是我——也许会乐意坦陈一定的“回眸”性的东西。

当然,这种工作并不是必须的;我的回眸也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即使这样的做法在某些场合会有益处(比如像现在这种场合),如果我想要将过去变为一个历史故事,过去本身其实并不会向我提供多少东西。我的意思是,过往的“事件”的内部并非似乎早已具有可被“发现”的故事形态。也即,我在这里讲述的任何故事不可避免地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可被理论化的工程的制品;这个工程由一系列的决策所构成,而这些决策至多有条件地涉及那个我不得不有些断定为我的“实际指向”的“真实过去”。不宁唯是——不过上面这点非常重要,

[1] “After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Vol. 3, 1999.

因为我还会在后文详谈——或许更加可能的是,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已经走到了共同地历史化过去这一过程的终点,以至于如果我们在将来仍需要将这种文化的某些方面提升到历史意识的层次,这种提升的形式很可能与“已被我们所了解的历史”这一形式没有多少共鸣——如果尚有共鸣的话。好了,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如我所料——已经为我的演讲暖了场,甚至已经有些跑得太远了。我实际上只希望用这些对“教授就职演讲”的思索为这次演讲布景,并且由它指明我的演讲的终点在哪里,以及如何抵达那里。就此而言,我想要做的不过是一些传统的事情。我希望在一开始对我生命中的一些片段进行印象性的召唤,这些片段在回答“为何现在我以我的方式思考历史”这一问题时是我不得不想到的。接着,我想要提及目前我对于历史的思考以及我所谓的“时间性研究”(temporal studies)。最后,我还将介绍这些思考如何能够决定任何——为我所“变幻”出的——我的未来著作。这些作品一旦被“变幻”出来,我会接着准备向大家陈述。

历史作品、甚至历史都是“变幻”而来的这种观念(目前我暂时继续使用“历史”这个词,而不是时间性)暗示了某种诡计和花招正在上演。有人怀疑,在过去被转化为某种绝不如其本身所是的东西——即历史——这一生产过程中,某种魔法出现了。我认为,这种怀疑是颇为正确的。正如卡洛琳·司迪曼最近提醒我们的,对于那些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们而言,“历史性的”(historical)一词的语法上的时态并不是将来完成式,也不是过去式,而是故事的呈秩序排列(syntax)——“曾经”(once upon a time)是修辞模式,是对于大部分历史学家来说通常不用言明也不加假定的起点,并接着塑造了他们对过去的历史化的全部。“在1914年的夏季,八月和九月间曾经的某一刻”,或者“在遥远的1361年的法国、在可以俯瞰鲁昂的一座山坡上,曾经住着……”等等。凡此种种一直都是这种被称为“历史”的特殊的“文学”类型的一部分,并且将一直继续是——这就是有魔力的实在主义(realism)的光环。^[2] 历史作品使用的是形式与体裁被严格规定的语言,并且永远是由一连串修辞工具与文体象征所构成的——它们确保历史作品永远是被剪裁、被形塑、被整理、被定制好的类型,并成功地适合所有的形状、所有的尺码与所有的需求:历史学家们近似于神秘地永远能从他们对“过去”的造访中带回他们想要的历史。正如司迪曼所说,这些历史与下面这类故事其实是别无二致的,如“一个会飞的女孩,一座会移动的山,一面会倒

[2] Carolyn Steedman, *Dus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0.

着走的钟和在活人中行走的死人[这一点是历史学家的特别的贡献]”。〔3〕司迪曼还认为,如果档案或者历史是梦之船,那么它尤其能使这一点变为可能:“让死者能重新走路、说话”,或是让他们魔法般地重现并“围绕在我们左右”,即使他们并不、且永远也不会真的这样。〔4〕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自己的“过去”。我的过去永远在我的体内驻留;我八岁、九岁、十岁时的那个曾经的我无处可寻,除了在现在的这个我的身上——那个我仍旧是我,除了变老了之外。然而我无法真的重新变成那个我,就像一个只留存在记忆中的文化无法按照记忆的模样重现。我们——有意或无意地——记忆、遗忘、撷取,这种方式确保了我们对过去的所有重现都只能是局部的、甚至是失败的。在被捏合出的记忆遗产中,我们通过某种比喻与情节化的混合来处理那些我们显然希望记住的事;当然我们无法记住所有的事,否则这就不是遗产了,否则我们的历史就无须以“曾经……”这种模式为开头了,然而实际上,它们一直如此。并且,这种开头押解并整塑着我们的历史,直到它们抵达那同样专制的终点——它也同样有着一个魔力性的称呼:“最终”。

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成长在一个劳动阶级的家庭,它位于德比郡中部的一个小村庄的边缘。一直到15岁,我都住在一个一边高、一边低的小木屋内,没有室内的厕所,没有热的自来水,没有电。我依然能够记得从煤油灯灯罩上的小洞中散逸出的气体所发出的嘶嘶声,我们的房间全靠这盏灯才能被微微地照亮;我还记得在冬天,卧室的窗户上从里面积满了厚厚的冰。不过,在那里(请记住,虽然那里的一切都显得很“乡村”,它依旧位于英格兰的中部,而英格兰早已经历了150多年的工业化,并且是世界上最为领先的经济体之一),我们的牛奶可是由车顶带着搅拌机的马车每天运送的。除了相对的贫困之外,我认为我享受了一段颇为田园牧歌式的童年。我没有任何知识上的抱负,也没有人要求我有,所以我就不停地嬉戏、游玩——通常是在户外,风雨无阻地在附近的森林、旷野和小巷中奔跑。我上了当地的小学,但并不知道教育有什么意义,我成功地没有通过标准成绩考试〔5〕——老实说,这倒不花什么力气。于是,我上了当地的中学。其实,我也不是经常去上学。回忆起来,我从未做过任何家庭作业,从未温习过哪怕一点点功课。结果是,在15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合适的奖励——没有从我的学校得到任何一份写有我名字的资格证

〔3〕 本文的所有引文中出现的“[]”中的内容都为本文的原作者所加。——译注

〔4〕 Carolyn Steedman, *Dus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0.

〔5〕 即 Standard Attainment Tests, 英国11岁的小学毕业生必须参加的考试。——译注

书——不过在那里,所有学生都不用参加公共的考试。

那么,现在我想很浪漫地(在座的诸位中,如果谁能够辨识出一个不太遥远的故事的情节化模式,那么他早就可以意识到我的故事采取的是一种浪漫剧的模式)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如何离开这种境地的呢?

我不相信单一的因果解释——我的意思是,谁会相信呢?——然而如果一定要选出那个带我离开的主要载体(它真的是一个“载体”),那就是我十一岁那年得到的一辆新自行车。那不是一辆赛车,然而当我听说附近有一家自行车俱乐部的时候,我尽我所能地改装了我的车,并加入了俱乐部。我在放学后非法打工,并且终于在十四岁那年攒够了钱,如愿以偿地买到了真的赛车:一辆 Mer-
cian Championissimo。我开始认真地训练,并且从16岁那年起参加了英格兰中部的一些正式比赛。我不知道我是否虚度了我的青春,不过我的生活中没有迪斯科,没有酒吧,而只有漫长的训练日程,并夹杂着比赛。

然而,赛车的重要性在于——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它那漫长的夏季训练和周末往返于赛事的旅程把我带离了我的村庄和那些无所事事的朋友们。由此,我开始逃离,我开始真切地看到崭新的风景,我的抱负渐渐无法为我这十几年来所熟稔的事物所束缚。我感到我必须离开。在训练、比赛的旅途中陪伴我的,关于欧洲大陆的文学作品(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阅读)暗示了我的目的地。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的自行车手——生活在欧洲大陆,追随着布莱恩·辛普森和托米·辛普森的脚步。直到在18岁那年,我在一场公路赛中发生了车祸,这不仅损伤了我的体魄,它还让我在接下去的那个冬天开始严肃地考虑放弃赛车生涯的可能性,虽然我在当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纠结地做出的这个决定是我对于德里达笔下的“绝境”(aporia)的第一次真实经历。经此事变,我决定不再把时间浪费在骑车上,而是向欧洲进发。我卖了车,放弃了白天卑微的工作,在19岁那年离家,远赴欧洲大陆。我花了两年时间搭便车穿梭于东西欧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在需要的时候时不时地工作,然后开启下一段旅程。这不过是另一个游玩的机会。然而,当我在21岁重新回家的时候,我面对着另一个需要做出的决定:从长远来看,我应该去做什么?我想找一份能允许我有充分的自由的工作,经过了一番考虑,我决定当一名老师。这时出现了一个障碍:我没有任何的资格证。于是,我决定拿到五项普通中等教育证书^[6](在当时这是担任教师的最基本条件)。但是,当地的继

[6] 即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英国中学毕业生必须参加的考试, 俗称 O' Level。——译注

续教育学院(F. E. College)^[7]所提供的最短的学制也要两年,这对我来说显得太过漫长了。所以,我参加了一个许诺我“快速成效”的课程——由伦敦速效成绩学院支持——并在8个月的学习后奇迹般地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在21岁那年,我进入了教师培训学院。

我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我选择历史作为我的“主修学科”、体育作为我的“辅修”(这样的话我可以继续东奔西跑去游玩),我开始拼命地读书,终于在三年之后毕业并获得了教师资格。然而我却并不想走。我在中学的教学实习的表现还不错,而这些经历也让我意识到我可能更愿意在如学院之类的地方、甚至更有野心地——在大学里授课。这样,我就做出了另一个决定。我决定先在中学里教一年课,然后去拿一个学位。就这样,在1969年,我开始在诺丁汉大学学习中世纪与现代史,并在1972年转到政治学系开始做博士的研究。

现在先让我们暂且停顿一下——在这个我应该继续讲下去的时刻,我想先简单作一番追溯,以便能让我解释我是如何逐渐开始涉足史学理论领域的。

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以为历史知识不过是“真实发生于过去”的诸多事实的集合。通过阅读D. C. Heath出版社出版的“欧洲文明的问题”系列丛书(所谓的Heath系列,在每一卷内都收进了关于某个相同主题的不同读本),当我第一次碰到对于同一“事件”的如此多种解释这一情况的时候,我被彻底弄懵了。我完全不理解。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既然只有一个过去,那么为什么职业的历史学家们无法对真实的过去取得共识呢?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过去本身与历史学是完全不同的,从本体论上就是有差异的。那个先于历史化的“过去本身”绝对不是历史,并且(幸赖事实—价值的二分法)“有关过去的事实”从逻辑上无法担负一种、或仅仅一种对它们的解读。不过,我想这种历史解释上的“人人皆可分一杯羹”一开始那么困扰我也可能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当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何历史学家们无法在某一种“解释”上取得共识的时候,实际上我指的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同意我的解释——在当时一种幼稚却十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解释。

我知道,作为劳动阶级的一份子和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左派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在我身上它们的确有着某种联系。当我在60年代末第一次读到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时候,我以为这就是全人类都会认同的理解过去的方式。他们并不如此——以及逐步意识到他们不能如此(鉴于阶级/意识形态主宰着阅读)使我深切地了解了所有的——包括我自己的——阅

[7] 即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 英国介于中学教育与大学之间的教育体系。——译注

读的真谛。由此,我再也没有感受到作为学者的历史学家们施加于“事实”之上以及“真实地”“客观地”发生的事情之上的力量;我再也没有了“为了过去本身的目的、站在过去本身的角度研究过去”的愿望,这些历史学家们发现的、所谓的“本身的目的、本身的角度”无非是他们投射到过去之上的——而这首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上的。换一种说法,我很快地意识到,无论过去被历史化为一幅如何有意义的画面,我们都是这种历史化的语义学来源。我是(并且依然是)政治上的左派,我偏爱(并且依然偏爱)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然而我再也不会认为我所偏爱的就是真理,或者历史与真理可能是一体的。我意识到所有对过去的历史化都和我对过去的历史化一样,不过是一种伦理—政治的赋予(investments);并且,我自己的政治化的历史并不需要被掩盖——好像它包括了某种不雅的缺陷似的,它反而是可以被敞开的,这至少使得我自身的立场不是——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充满神秘色彩的(mystified)。

现在请允许我再将话题岔开一下。我想要说的是,至60年代末,我已经开始接受某种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在这个词出现之前,或至少在我接触到这个词之前。当然,在60年代,后现代主义还处在萌芽期,但是当它在80、90年代开始不断壮大的时候,我早已为迎接它做好了准备——尤其是鉴于我已经陈述过的原因。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事件促使我转向了后现代,转向了理论。

我依然可以准确地描述出这件事。虽然我离大马士革十万八千里远——事实上我当时正乘坐在从德比驶出的一辆公车上——我依然记得我从书的某一页中看到“上帝之死”这行字时的震撼。这本书是那个周六下午的早些时候我刚买的——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正如某些人说的,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被萌发的时刻。几乎一个晚上,加缪的文本就将我带入了一个我从未梦想过可能存在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反抗的世界、一个存在主义的世界、一个现象学的世界、一个荒谬的世界、一个崇高的世界。它由充满紧张感的文字写成,并且涉及一长串让我感到迷惑的人和事。谁是圣·茹斯特(St. Just),谁是德·迈斯特,谁又是马克斯·施蒂纳、波德莱尔、屠格涅夫以及最重要的——尼采?他们又都说过些什么?接着,是封底上的简介:

自由之大旗下的奴隶集中营、在慈善的名义下合法的屠杀、对超人的偏好——这让人如何辨明是非。当罪恶披上了清白的外衣的那一天,[那

么]就该是清白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了。〔8〕

在此之前我从未如这般思考过。看看这些章节的标题：“该隐的儿女”“花花公子的反抗”“挑剔的暗杀”“虚无主义的谋杀”“反抗与风格”。它们都代表什么？也许有些悲哀，但绝对戏剧性地——尤其是现在看来——我当时感觉我必须把它们搞清楚。但我又面临着一个问题。开始阅读加缪是我依然还在教师培训学校上学的时候，虽然这些阅读帮助我将注意力转向“理论”的维度，然而这些东西大都在学校里是不教的。所以，从更加心智的层面上分析，这可能是将我推向大学学习的另一个原因。

一开始，诺丁汉大学似乎并不太适合我，然而慢慢地，我发现来到这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里面有三个原因。首先，我当然在这里通过“正统”学术的、经验性的方式学习了大量的历史。然而，这却反而让我更“反叛”、更加亲近“理论”。其次，我有时间继续进行那种由加缪而挑起的阅读。在70年代初，我已阅读了几乎所有他的作品；我知道了谁是圣·茹斯特和德·迈斯特；我阅读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作品，并且最重要地——我开始阅读尼采。我还——有些旁敲侧击地——开始从花费巨大努力、英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的“新左派”丛书中获益匪浅；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他们时不时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与悲观主义，不知不觉地帮助我对原本所了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有了准备。我的书橱开始被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本雅明、科莱蒂、阿尔都塞等人的作品所填满。第三，通过“辅修”政治学，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位“真正的”政治理论家——J. S. 麦克莱伦。

麦克莱伦新近出版了他厚达800页的大作——《西方政治思想史》。〔9〕不过在70年代初，他还是一个就任不久的讲师。他师从乔治·斯泰纳，在剑桥大学刚拿到他的博士学位。他是一个极其傲慢的人，我在他那困难得令人发指的马克思主义专题课程中经受了无比的煎熬。我在1972年拿到了学士学位，随后开始在他的指导下继续博士研究，并在1975年完成了我的学位论文（《尼采、弗洛伊德与索雷尔政治思想中的意识形态与科学》）。不过，麦克莱伦颇为奇异地，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对我有着影响。不管怎么说，我已经算是一个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了，我需要的只是一份工作。

然而我没能如愿。1974年至1978年间，我所能发现的政治理论教席的招聘数量一共只有两个，而我都没有应聘成功。从1975年到1978年，我只能在一

〔8〕 Albert Camus, *The Rebel*,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2.

〔9〕 J. S. McClelland, *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98.

些中学、学院以及诺丁汉大学兼职授课,直到1978年,我终于在奇切斯特大学的历史系谋得了一个职位。

想来,有两件事促使我将兴趣从政治理论转向了史学理论。首先,虽然我被安排教授欧洲史的课程,然而我在中学教书的经历帮助我接手了中学历史的教育资格培训课程(PGCE)。^[10] 这门课程让我在接下去的十五年中接触到了几乎所有英国大学的毕业生,并且更加促使我思考“历史学的本质”问题。让我震惊的是——除了几个显著的例外——我的学生们在理论思维上的匮乏。大多数人都在名牌大学中的历史课程中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然而他们对这门学科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方法论的、美学的以及伦理/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还茫然无知,并且也无意去探究。他们埋怨道,为什么要把历史学理论化,“让我们直接去做不就好了”。

在我看来,这种情形真的是对英国的历史学学位的惊人控诉,并且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只要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存在,就依旧是不可接受的)。我越发受到对史学理论的,以及特别对美国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的兴趣的影响,由此开始以一种更加理论化的方式授课。

我第一次阅读海登·怀特于1973年出版的作品——《元史学》——是在70年代中期,当时我完全不理解它。^[11] 我要颇为惭愧地说,直到80年代中期我购买了他的《话语的转义》(出版于1978年)之前,怀特是被我忽视的。在那之前,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作品的阅读让我深怀挫败感;即使这个领域最为重要的期刊——《历史与理论》——在那时也显得沉闷不堪。那些关于“历史学的本质”的标准的介绍性文本也好不到哪儿去:如布洛赫(M. Bloch)、卡尔(E. H.

[10] 即 Post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这是英国培养中学教师的一种研究生课程 ——译注

[11]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还可见怀特的其他几部作品, *Tropics of Discourse* (1978),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1987), *Figural Realism* (1999), 都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出版。虽然多年以来怀特一直受到许多批评,但我依然几乎完全赞同他的“叙事主义”。我对于“叙事主义”的理解,正如怀特所说:“没有任何一组给定的事件明确地具有故事所提供给他们的那种意义……没有人、没有事能够生活出一个故事”(*Tropics of Discourse*, p. 111); 以及“事件的意义、形式和融贯性,无论它们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是作为对事件的叙事化的一种功能”(*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67);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在理解历史记录的时候,我们无法在记录本身中发现任何根据——可以借此来偏爱某一种理解其意义的方式。”(*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67.); 以及选择“某一种、而不是其他的看待历史的视角,其唯一的根据最终是关乎美学的[和]道德的”(*Metahistory*, p. xii) 等等。另外,我还同意怀特的看法,即认为如果话语要被“重塑”的话,那么改变形式较之改变内容更加重要,特别是对于历史话语而言:“在正统的定义中,形式要比内容来得重要”。关于这点,后文我还会涉及

Carr)、埃尔顿(G. Elton)、马维克(A. Marwick)、托什(J. Tosh)等人的作品都显得那么的中规中矩。由此,通过阅读《话语的转义》而对怀特的重新发现对我而言不啻于天赐的礼物;另外在同一时间,我“进一步发现了”怀特的欧洲伙伴——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和反基要主义者、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这样,正是他们的作品,为我在80年代写的一系列论文提供了基础,并被吸收入我的第一部书——《重思历史》(1991)中。^[12] 这部作品被我计划为一种将引发争议的干涉,它有意地反对那种我知道大部分年轻的历史学者都会接触到的历史学。我试图将怀特的理念与当时那些带着“后……”标签的理论家们融合起来,他们因其启发性都可以被拉入“后现代主义”这面大旗之下。于是,正是这种理论的杂糅使我能将历史话语与后现代——至少从些许程度上——以前人所未及的方式编织在一起。紧随着《重思历史》,我又在1995年出版的《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埃尔顿到罗蒂与怀特》一书中阐发了一些新的见解。再接着,我又在1997年编撰了《后现代历史学读本》。

在结束了这段蜿蜒曲折的记忆之旅后(你可以将其称为我的演讲的第一部分),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同样你可以称之为我的演讲的)第二部分。其中,我准备概述目前我对历史(以及时间性)思考的方式与结果。在这一部分中——对于我目前的立场非常重要——我会从强调和讨论我前三本书中所关注的问题,转向我的另外一些关注;它们支撑了我接下去的那部作品——《为什么是历史?伦理与后现代性》,并且是我想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看法所赖以生成的素材。^[13]

在我开始写作《为什么是历史?》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产生了一系列前提假设,它们现在已经像公理一般指引着我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经过深思熟虑,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生活在后现代中、我们身处现代性之后。当然,很难确定到底什么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但是我的工作的前提是:我们已经来到了“现代性实验”的终点;也即,那种试图建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形式下的“基于人权的共同体”的后启蒙运动实验,已然在种族灭绝、古拉格和集中营中自我毁灭。另外,后现代——无论它是什么——就是伴随着这个实验的崩塌而来的,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被上升到更普遍的意识层面,以及更为特定的理论层

[12]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2nd edition, 2003);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Keith Jenkins,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13] Keith Jenkins, *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1999.

面的后现代境况。^[14] 另外,就我所欣赏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设法继续维持——无论它在 20 世纪受到怎样的攻击——那德里达要求我们永远不要放弃的“伟大的解放故事”这一点,我将后现代主义视作一件好事;这种对“启蒙的降临”的盼望也许依然允许受人期待的新鲜事物的涌现,即使这里的启蒙与其 18 世纪的先驱大相径庭。另外——又一个另外——为了使“降临”能够真正降临,我将后现代主义视作在清除所有旧有的、可能阻止这个全新的解放性的启蒙运动的话语预设的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由此,后现代理论可以驾轻就熟地扮演某种对西方传统(特别是西方传统的“现代晚期”形态)的“批判性回顾者”的角色,并从一片杂乱无章中筛选出一些传统的构成因子,看看哪些可以被保留并依然能够对“将要降临的新社会”提供帮助。当然,恐怕非常少。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为什么是历史?》中我提出,后现代的这种回顾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死亡和终结的:后现代是某种“验尸”的工作。在各种文献中有着—长串这样的死亡和终结:上帝之死、人之死、主题之死、作者之死、中心之死;形而上学的终结、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进步的终结、文学的终结、奥斯维辛后哲学的终结,还有历史的终结。并且,正是“历史的终结”这个观念,现在要求我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路径上。

历史的终结这个观念主要攻击的是那种宏大的元叙事结构(如带有黑格尔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结构声称要“发现”人类进程的方向、目的与意义:将那过往现象的偶然性中内在的本质与目的表现出来。当然,后现代主义将这些一并摧毁;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与反基要主义将所有事物的本质意义与价值一扫而空——任何本质的东西都没有留下——这意味着任何假定的意义都是由“外部”加诸其上的。并且,一旦所有的事物都向外部开放——向非本质性开放——那就再也停不下去了:外部不断赋予事物意义,或者如德里达所说:“一个超验的能指的缺失将意义的赋予扩展到了无限。”无论对于哪一种情况,现在

[14] 如果我被迫需要对后现代性给出一个定义的话,我会将其认作“一个将‘绝境’(aporia)概念提升到意识层面的时代”。对于“‘绝境’的时代”,我指的是在这个时代中,我们所做的所有决断——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理解性的、表现性的、比喻性的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可决断的(aporetic);我还指的是,我们选择哪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背后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基础,以及对于历史话语来说,从根本上还是需要将它视作一种美学的——一种塑造性的、比喻性的话语——而不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的和具有基础的认识论。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在鉴别这种认识论——它反对将历史审美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显然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局限的工作中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见 F. R.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以及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被剥夺了任何本质意义的过去可以被按照任何人所喜欢的任何方式历史化（如：使其具有意义）。这样，过去可被认为是处于一片混沌之中，谁都能将它带走——马克思主义者、托利党人、经验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现象主义者——谁都能拥有它。而在现在这样的民主化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作者、不容置疑的权威、权威的视角与独裁者的命令？然而至少对于那些相信本质性的旧有的信仰者们、那些延续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话语谱系的信仰者们来说，凡此种种还是颇为恼人的。他们无法忍受历史可以完全按照人们的愿望被书写这一观念。没有任何元叙事可以经历这种本质性的消逝而完好无损——但这样的话，也没有任何学术化的历史学能够保持完璧。

然而，事实上，很少有学术化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上述这些终结中的一个——认识论的终结——的毁灭性——当它不仅针对元叙事并且同时也适用于他们自己那种类型的历史学的时候。当然，这种以经验性为基础的、有认识论保障的——这是职业化的/学术化类型的历史学的“本质”——历史学的终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兼具实践与理论问题的领域，不过在此我可以把《为什么是历史？》一书中详细的讨论做些精简，并总结如下。

学术性的历史话语肯定包括了从经验上可被证实的、与过往事件相关联的成分，比如在单个陈述或语句“符合于”（correspond to）一个或一组可作为证据的单个史料或确凿的“事实”这个层面上。但是，作为话语的历史、作为唯一可以成为真正的历史这一层面上的历史——也即在文本层面上的历史——是由在本体论上并不相关的事物所组成的，且由此无法仅仅被化约为这些可被经验性地证明的、“认识论性的”成分。因为对于作为复合型叙事的历史文本——也即历史叙事——来说，它必须包含所有那些对叙事体本身而言最常见的成分。也就是说，历史文本需要被各种论证模式所转义、情节化与支撑；对它们的阐明依靠对文本的诗性建构、修辞的技艺、构成性的策略、互文理解、易变/非必然性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个人化的主题等等。凡此种种都为文本注入了生命力，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忽视经验性的/认识论的因素，但是文本却不再受其摆布：档案里有着许多东西，但却完全不包括上述的这些成分——而它们恰恰就是“制造历史”的途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最好将历史学视作某种比喻、某种模型、某种充满想象力的行为——即某种美学，并且作为某种美学，它无须在认识论的法庭上担负什么责任。由此，学术性的历史学家们——就像信奉元叙事的史学家们一样——不仅可以以任何自己偏爱的方式阅读过去，并且还不得不接受过去并不具有可以用来“自称”的形态这一点。

另外，显然还有一点似乎是反对后现代的学术化的历史学家们所不加怀疑

的。这就是：从逻辑上说，历史的终结——作为某种认识论——应该是一个从未发生过的终结。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经验性的/基于认识论的历史学其实从未真正存在过。因为如果最好的定义历史学的方式是将其视作美学的/转义性的话语这种后现代的论点是正确的话（它们当然是），那么实际上就从未有过其他类型的历史学。换句话说，并不是好像“现在”才有对于过去的美学性的历史化，并站在现代主义的、经验性的/基于认识论的历史化——它们完全不是一种美学现象——的对立面。因为如果历史学本身即是一种具有美学性质的话语，那么历史上所有的历史学就历来都是、并将一直是（后现代帮助我们意识到的）这种类型的。从逻辑上说，如果严格地界定，那么在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经验性的/基于认识论的历史学和经验性的历史学家的存在。于是，伴随着无论哪种类型的“为认识论而奋斗”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都走到了其终点，我们就终于回到了故乡——就像从前一样。并且，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接受这种归乡；也即，为认识论而奋斗的历史学只是一次越界，历史学如果从未变得现代的话反而会更好。在接到了这样的信息之后，当然没有几个学术化的历史学家会喜欢后现代这个传信人，这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上述的这些——或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我早在写作《为什么是历史？》之前就已经认识到的。然而我突然开始感到——自此我开始改变我早先的立场——具有生命力的现代主义历史学的终结（这种历史学因为无法达到自己所建立的标准而受到质疑）也许会进而质疑历史学的、包括尚有“生命力”的后现代历史学的作用——就那个德里达要求我们永不忘记的解放工程而言。这是因为，虽然在早期的著作中我提出，成问题的元叙事史学和学术史学的终结及其为后现代的名义所取代，也许可以继续维系德里达的工程，然而现在我开始怀疑这种工程是否根本就无须历史学——无论它是否有生命力——的帮助。

在写作《为什么是历史？》的时候，我审视了一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的那一代无可比拟的、最为伟大的，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批判性理论家——他们解构了这三十年之前的所有西方传统——的名字，立刻深受震动。他们有一长串的名字：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J. F. 利奥塔、雅克·德里达、让·波德里亚、盖亚蒂·斯皮瓦克、茱蒂斯·巴特勒、欧内斯托·拉克劳、阿兰·巴迪乌以及理查德·罗蒂。立刻感到震动的原因是，这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并且，当我把这份名单扩展到二十人、三十人，甚至四十人，还是没有。在汉斯·伯腾斯和约瑟夫

·纳托利编写的《后现代主义：关键人物》^[15]一书中，他们选取的43名理论家里面也只有一个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由此，我不禁开始思考——我在这里长话短说——如果巴特勒和罗蒂无须以成为历史学家为前提就可以提供所有的有关解放的分析与辞章，如果罗蒂无须历史学就可以，那么也许我们也可以。

由此，在《为什么是历史？》中我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观点，并总结为也许我们根本不再需要——在“真的需要”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甚至包括后现代的历史学。恕我直言，当碰到解放这个问题时，我们是否具有历史意识仅仅是一个选项而已。当然，传统的历史学家们正在从事某种旧有的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而激进的和/或后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则在从事某种适合于他们的、拥有不同构造的类型，他们都显然可以自顾自地继续下去。然而，就紧迫的解放实践这个问题而言——这是我在《为什么是历史？》中的唯一关注点，并且依然是我用来评价任何以过去为焦点的作品的价值的主要标准——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今这个就其后现代性而言如此后历史的文化（这是可以商榷的）来说已经不太切题了；也即，依然保持如此现代显得太过落伍了。

然而，所有的这些指出了这一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统摄了这次的讲座——当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已经走到了历史学可能的/很可能的终点，对于它我还能承认些什么。我早已知道什么是我无法承认的。我不能承认现代主义的历史学，无论元叙事的类型还是学术化的类型；利奥塔可能仅仅对前者抱有怀疑，而我则早就对二者都不信任。^[16]但是，就像我已经解释过的，对于现代主义史学的“离去”所造成的真空，我曾认为需要用我曾支持过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这种具有解放性质的类型——来将其填满。不过，意识到伟大的理论家可以在不成为历史学家的情况下从事解放事业这一点，提出了“为什么还需要操心历史学？”这一问题。然而……我还是不愿让历史学彻底地离开我们。我想，能否重塑历史学，使得它能够继续在某些（有时）需要它的场合提供对于未来的激进政治的思索？我认为也许可以。由此，为了使历史学满足那可能的需要而对其进行重塑就是在过去几年中占据、并且在未来也将占据我的头脑的问题。在《重塑历史：对旧学科的新思考》一书（2003）、《历史学的本质读本》

[15] Hans Bertens & Joseph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Oxford, Blackwell, 2002.

[16] 见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一书的各处。

(与我的朋友阿伦·芒斯洛在2004年合编)^[17]中的一部分,以及我在近五六年所写的一些论文中,我已经试图去重新思考那个“旧的过去”——不再把它当作历史,而是以时间性研究(temporal studies)的名义进行,鉴于我们可以生活于“历史之外”(比如,超于历史之外特别是西方根本性话语中的一个类型)却无法生活在时间之外(另外,即使经历了后现代的摧毁,历史学还是如此能够发散旧有的内涵,以至于通过“历史学”这个陈旧的名称来思考不再具有益处)。由此,从事于全新的塑造时间的方式为我构造了一个——我承认——具有发展前景的立场,虽然这种方式非常不完善且——可以想见地——费时又费力。另外,鉴于我认为这种重思不仅对我个人来说是有益的,我便想以某种准普世化的姿态、用复数形式表达我对它的拥护:对于“时间性研究”,我们都应该如此看待。所以,接下来,在这次演讲的第三、也是最后一部分,我想简要地描绘这个立场的几个基本预设:一共有五点。

首先,我想要坚持:当我们从“历史的重负”(语出海登·怀特)中解脱出来后,我们应当将人类解放这一目标特权化,使其完全主宰我们应该阅读/书写时间性研究的方式。我们无须响应来自过去的号召(不同于传统的史学家的做法),而径直响应来自伦理的、政治的号召,以及来自现实与未来的号召。在这里,我只能响应德里达的“‘过去’需要服膺于政治”的看法,并以此作为我的理由。前所未有地,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写道:

在世界的、人类的历史上,暴力、不平等、驱逐、饥谨和经济压迫曾经影响到那么多人。我们绝不要忘记这个由无数的苦难组成的明显而巨大的事实——任何的一点进步都不允许我们忽略:在此之前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如此多不计其数的男人、女人与孩子们被奴役、忍受饥饿或惨遭屠戮。^[18]

其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具有某种不懈的伦理—政治奉献精神。在此,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的作品而获益,并帮助我们达

[17] K. Jenkins, *Refiguring History: New Thoughts on an Old Discipline*, London, Routledge, 2003. K. Jenkins & A. Munslow ed.,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还可见 Keith Jenkins, “On Disobedient Histories”, *Rethinking History Journal*, Vol. 7, 2003, pp. 367-385; “Modernist Disavowals and Postmodern Reminders of the Condition of History ‘Today’”, *Rethinking History Journal*, Vol. 8, 2004, pp. 365-385;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and Historian: On the Possible End of History ‘of a Certain Kin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3, 2004, pp. 43-60.

[18]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New Left Review*, Vol. 205, 1994, p. 50. 还可见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Routledge, 1994

成这个目标,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与后现代的立场并不十分契合。

在巴迪乌的《伦理学:对“恶”的理解》一书中,他对某种思维方式展开了讨论——凭借这种方式,人类能够成为在伦理上负责的主体、成为“真理的主体”。^[19] 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另一个被他视作公理的论点之上的。这就是,“社会性”(“人类活动的范围”)应该被分成两个各自不同却又互相关联的“次领域”。一个是普通的、日常的世界。它包括了既定的利益与实践,它构造了我们自动而不假思索地渡过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共性。另一个则是关于“个体创造力”的和“真理”的“超异”领域,它的存在与持久只能通过“那些稀有的个体的激进的宣言——他们将自己建构为真理的主体与自我目标的斗士”。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这些稀有的主体、这些真理的激进的掌握者呢?

好吧,对巴迪乌来说,要成为这样的掌握者只能从中断与“日常”世界的联系开始,而这要通过参与某个大写的事件(Event)才能做到——这个大写的事件无法被验证,它只能通过某人积极地经历而被把握、被确信、被声明;对它的确信只能通过吸纳某种忠诚的态度、或者某种信奉才能达成——如巴迪乌所言:“相当于某种无私的热忱,对激荡人心的任务或目标的全心投入,某种高昂的兴致,被某种超越琐碎的、私人的、物质的关怀所深深吸引……对人、对原则、对理想保有真心。”除此之外,还需对大写的事件持有某种伦理上的态度。在这里,伦理被理解为某种确凿地激励主体“前进”、不要回头并坚持对目标无私奉献的东西。对于巴迪乌来说,大写的事件就是那将处于发展中的主体从日常社会撕扯出去的催化剂。由此,事件在不同的生活模式之间构建了一种分裂。巴迪乌写道:

也许我应该将“真理”称作对某一事件保持忠诚的真实过程,它是在某种境遇下为这种忠诚所制造的。比如,1966年到1976年间法国“毛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就是试图认定、并践行对两起交织的事件的忠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或者如所谓的“当代流行音乐”……也是对20世纪早期伟大的维也纳作曲家们的一种忠诚。或者

[19] Alain Badiou,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London, Verso, 2001. 巴迪乌的作品最近被大量译成英文,可以特别参见 *Theoretical Writings*, eds. R. Brassier & A. Toscano (London, Continuum, 2003), *The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3), *Infinite Thoughts* (London, Continuum, 2005)。另外, 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Minneapolis, 2003) 也已经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著作了。“历史的伦理”是一个长期以来就被人们讨论的问题,如《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 杂志 2004 年第 3 期(总第 43 卷)的主题就是“历史学家与伦理”(Historians and Ethics),而安克斯密特与凯勒·比兰宁(Kalle Pihlainen)针对这个领域也有许多有趣的讨论。比如,见前注中已经列出的安克斯密特的作品,以及 Kalle Pihlainen, *Resisting History* (Turku, Turku University Press, 1999); “Understanding and Commitment...”, *Clio*, Vol. 34 (2004-2005), pp. 59-82。

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代数几何学等等。从根本上说,一个真理[应被追溯到]……从那个决定起始——自此真理从某一境况的补充物的角度与这个境况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这是一个内在的决裂。“内在”是因为真理从且仅仅从境况中[浮现]……决裂是因为促成真理—过程的事件对于在某个境况中引领风潮的语言和既有的知识体系而言什么都不是。〔20〕

这种全新的真理排空了常规的“境况”,由此制造了一个好像由“事件性的决裂”而引起的新局面,并接下来迫使某人改变之前的行为方式,脱旧入新。巴迪乌认为,在这种意义上,“事件性的决裂”就其能够外在于、且/或超越于传统的“让事物产生意义”的方式进行思考这一点,它是诗性的(poetic):“当境况为自我的规范所充盈,当它对自身的估算被没有停歇地记录在案……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超越自身之外有着诗性的准备。因为对某个事件——在言说‘它’的意义上,即作为某种无法被决定的补充物而必须被命名而得以存在——的命名……这种命名永远是诗性的。命名……是侥幸的,是不可预料的,我们必须在智性的空缺处着手,在缺乏既有的意义的情况下,迈入语言的风险中。我们必须进行诗化,而事件的诗性名称就是那把我们扔出自我之外的东西。”〔21〕我再最后引用一段巴迪乌的话,其中对于上述看法有更具体化的表述:

非常清楚的是,在尝试了一段爱的邂逅(事件)之后,如果我真的想对它保持忠诚,[那么]我必须彻底重造我的常规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如果我想对“文化大革命”这一事件保持忠诚,那么我必须至少参与政治……以某种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者与工会传统的姿态。又如贝尔格(Berg)与韦伯恩(Webem),他们忠诚于勋伯格这一音乐事件,那么他们就无法继续坚持世纪末的新浪漫主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在爱因斯坦于 1905 年发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之后,如果我忠实于其中的极端原创性,那么我就无法继续在经典的理论框架内从事物理学实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事件的忠诚”[由此]就是一次真正的——与那事件发生(无论是政治性的、爱情的、艺术的还是科学的)于其中的特定的秩序的——决裂(无论从思维上还是实际上)。〔22〕

如果我想忠诚于“后……”思想——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关于解放的伦理学,那么我就不能继续做一个结构

〔20〕 Badiou, *Ethics*, p. 42.

〔21〕 Badiou, *Infinite Thoughts*, p. 75.

〔22〕 Badiou, *Ethics*, p. 42.

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与旧伦理信奉者。我必须进行一次决裂,我必须誓言忠诚,就像我吸纳了“时间性”这个全新的看法意味着我必须和“旧有的历史学”决裂一样。我必须忠诚于“新”。忠诚在这里的意义并不是不能“在真理内部”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对于巴迪乌来说,试图实现某个总体的、或不具资格的真理是不忠于真理永远且唯一公理性的地位,并由此被认为是“恶”),而是向“新”足够忠诚,并向“旧”决裂;以及忠诚于持续不断的可能性、忠诚于无止境地重新阐发它们,且除此之外不忘记那个首要的需求——人类的解放。

第三,上述的这种信奉必须影响、并被嫁接到某种对“时间性”的思考方式上——这种方式能够表达“我们自身”和处于变动中的后现代主体(相比于巴迪乌笔下的主体有一些细微的不同,然而可以对巴迪乌的给予补充)。这些主体与笛卡儿模式的、处于现代性中心的主体完全不同。

由此,让我们与下面这个观念同行:无论我们如何构想过去,如果它永远都是在构思者的脑海中被制造出来的,永远都是我们将自己的声音投返于其上,那么我们的过去就将以这种方式被理解、被构成——它具有的特性和我们用来构成、理解我们自身的特性是相同的……这是过去变得为我们熟悉的唯一的方式:当塞尚画一幅风景画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试图模仿,毋宁说他试图去画的是塞尚自己。所以现在不妨想想我们这些后现代的主体所拥有的特性——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是否知晓——并且思考这些特性打开并超越现代性封闭的可能性吧。

由此,这种(变动中的)主体会被“行为性地”构成,由此她会偶然且持续不断地被塑造与被重塑、被阅读与被重读、被书写与被重写。这种主体缺乏基础性的依存、固有的本质与目的、可知的意义与命运,以至于她会变得极端去中心化与碎片化,即使对自己本身都保持神秘。这是一个后笛卡儿式的主体,并且被组合成一个彻底拟制性(fictive)的整体,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她至少可以对付现有的生活;而最好的情况是,她可以成为“通往真理的主体”。

于是,这个“自我”将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理解过去(与现在——以及与将来),并将自己的特性赋予过去。由此,她的过去在假定的整体上就会是崇高的,而在每部分中则又是相对的;这个过去会很容易地接受无尽的组合与重组、阅读与重读、书写与重写。作为某种极端偶然的、并由此非目的论的类型,它只能通过一系列无法抉择的决定(这样,在“决定的无法抉择性”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无处不在的德里达的“绝境”概念)而被赋予某种暂时的形态与形体,并由此制造一个转瞬即逝的整体——一部历史,一个时间性的驻点。这个整体很明显地就是一种想象性的行为,并且可以很确切地被认作具有十足的故事性——也

即某种被言说之物,并且在言说之外,它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实存(或真正的实存本身)。这是一个当且仅当我们“拜访它”“邀请它”的时候才会“重新存在”的过去,是一个永远不完美的话语召唤(因为它与它被讲述出来的样子永远不同)。^[23] 这些故事性的/惊异的/魔术性的召唤与重述行为把过去开放给人们重塑,这与现代性的情况不同。当然,这是一个太宽泛的领域,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在此指出一条想象“全新的关于过去的诗学”的途径。

第四,在《终结的幻觉》^[24]中,让·波德里亚提出,“终结的幻觉”的终点——即过去(或时间)有一个终结这个幻觉的终结——为我们提供了机会,使我们能够探索在我们实际且/或能够寄居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中含有的无限可能性。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首先只是我们语言内部的融贯的文法规则才能允许我们创造对于过去的历史化——而不是允许我们“发现它们”。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世界以及它的过去永远遵循着我们语言的句法:“它们”的意义、对“它们”语义学上的表达永远来源于我们自身。历史的表面上的融贯——它满载意义的开头,它的中段与结尾,它的结构,它的模式,它的语境与转折,它那破坏了时间顺序、并确保过去径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指向性开关——无论从前还是现在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发现的融贯或指向,而永远且完全是(我说的就是完全)从句法/语义学形塑的被加以应用的形式而来。这些句法/语义学的形塑嵌在叙事形式本身之中,所以从来没有一系列事件能具有由我们讲述的、关于它们的故事的那些形式上的属性。那么现在让我们思考——就像波德里亚要求我们做的那样——一些不同的、能够引起全新语义形体的句法形式。^[25]

[23] 对于“话语的”(discursive)以及作为话语的历史,我指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品,历史学家的可能的研究对象在其中得以辨识,各种方法与程序在其中得以被考虑与应用,某种看似恰当的讨论研究对象的方式在其中得以被计划。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历史知识的诗学”。在这里,诗学指的是对一个它倾向于否定的“学科”的“制造”“创造”“构造”等层面上的因素。

[24] Jean Baudrillard, *The Illusion of the End*, Cambridge, Polity, 1994.

[25] Ibid., pp. 120-122. 特别见此书的最后(非常短的)两章,其中他强调了他的“新历史诗学”。在某种程度上,波德里亚的诗学有点像并行性的历史。厄尔玛斯(Ermath)在她的 *Sequel to History* (还可参见后文脚注中所罗列的她的其他作品)中也多次使用了并行(parataxis)来切断所有的如贯通性、线性和流畅的(从属性的, hypotaxie)意义。当然,一旦时间不再如“流线”般被记忆,而是作为并置的、处于一片混沌中的地点、空间与事件,以及作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来回穿梭而产生的效应,并出于当下的原因而不断跌宕起伏,那么流畅的编年就会让位于总体的并行,以至于并行的“历史”讽刺性地较传统的、“直线”的历史离“真实的”历史记忆更近。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话题而无法在本文中详查,读者若想窥其大概不妨比较着或综合着来看下面这些著作。如 Amy Elias, *Sublime Desire, History and Post 1960s Fi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eter Hallward, *Absolutely Postcolonial: Historical Writing Between the Singular and the Specific*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那么,对于波德里亚来说,过去从来就不是符合于某种演化的进程,以线性形态展开的。过去根本不知道我们所谓的直线(或者我们的循环,或随便什么),它不会将自身整合起来,以适合我们脑海中的图形。不,线性的过去是一种幻觉且主要衍生自另一个幻觉——即语言也是通过从线性的形式展开的。但语言当然不是。在语言中,所有事物都是蜿蜒地移动、比喻性地移动,事物之间的关联是盖然性的(enthymemical),而非逻辑性的。波德里亚问道,我们如何可以不将新的语言/美学化游戏置换入过去,使其变成全新的时间性——并且不仅要使用那些主要的比喻形态(转喻、提喻与反讽),还有那些“天真的、形式主义的游戏,那些不规则的比喻——它们是通俗想象力的趣味:易位构词(anagram)、藏头诗(acrostics)、首音互置(spoonerism)、韵律(rhyme)、诗节(strophe)与悲剧的结局(catastrophe)”。我们如何可能不去想象一种易位构词式的时间形塑,在那里“意义被肢解并随风飘散,就像如果将上帝的名字易位那样”〔26〕;或者不去想象时间通过诗节的形式被组织起来,借此某几行诗句就与其他诗句相分离并组成某种无法从上下文或整个诗篇中得出的含义(想想微观史的例子)。好吧,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就像波德里亚所说,这是“一种对线性历史的带魔法的替代品”或诗性的替代品——它要重塑那些早已被“实在性的努力”(我们已经忘了这种努力仅仅是一种效果,而将其视作了实在本身)所塑造的过去。

由此,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是,我们不能让自己忘记,那全新的实在、那全新的“时间性的驻点”仅仅只是“实在性效果”并且并不能帮助我们与“实在”——完全的真实不妄——接触。和波德里亚一起,伊丽莎白·厄尔玛斯(Elizabeth Ermarth)也提醒我们不要再次沉入“过去的深渊”中,并要求我们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轻轻地跳跃,当现代主义的价值——中立性、客观性、经验主义以及认识论崇拜都不仅从哲学上,还“被后现代世界”所削减、瓦解的时候,厄尔玛斯依然在许多作品中思索是否依然可能在过去中发掘些什么。她借用了纳博科夫作品中的“anthemion”这一概念。纳博科夫用这个概念来指那种有内部花纹的、花状的设计,它的条纹与花纹纵横交错,且没有严格的重复与方

〔26〕 易位构词指的是任意改变某一单词的字母顺序,使其变为一个新词,并以此产生与原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含义。如“mother-in-law”等于“Women-Hitler”之类。在这里,“上帝”(God)如果被易位构词的话,就可以变成“狗”(Dog)。——译注

向,然而却可以制造出某种饱含韵律的循环往复。^[27] 这种“anthemion”的式样——是一种完全表面的现象——改变事物的次序而不赋予它们情节,无方向地漫步而不是直线前进,并且将枝节变成了一条准则:所有的直线都是扭曲在一起的。事物是押韵的而非演进的,每一个特殊之处都是一次全新的语义创造;在每一点上,多重意识与多重书写的可能性帮助制造了一种复杂而随意的形体——这只是一个形体,而不是一个再现。在这种并列的视角下,如现代主义的历史学那样努力发现过去,那种“在干净、有序且‘进步’的形态下将整个世界存于心中的尝试”——只为了“好像被一部巨型的、能够覆盖整个世界历史的照相机记录下来”那样将所有“看似随意或灾难性的事件”都一一析出——就变得不仅不可能而且完全不需要了。^[28]

在引述纳博科夫的小说《通透的事物》^[29]时,厄尔玛斯在“anthemion”之外又加入了“折射”这个概念,她再次强调此书的叙述者是如何警告刚上手的读者(在这里,我们还得加上有经验的历史学家)不要像现代主义者那样沉入过去的深渊中,而是恰好停留在事物当下的表面上。她写道:

为实现[现代主义的]历史学所需要的力量,[实际上]通过沉浸入过去而摧毁了过去。让过去经过“通透的事物”而折射需要历史学能够像在水上行走那样神奇,然而对于新手来说这倒是可能的……他们学着站在那准确的时刻上,让过去穿透。[在这里,]“事物”不再起到现代性的客观化语

[27] 见 Elizabeth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Beyond the ‘Subject’: Individuality in the Discursive Condit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1, 2000, pp. 405-420), “Beyond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Journal*, Vol. 5, 2001, pp. 195-215), “Ethics and Metho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3, 2004, pp. 61-83)。事实上,厄尔玛斯是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中少数几个能够看出后现代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本质对于传统史学所蕴涵的意义,以及超越传统史学的可能的需求的人。由此,她写道:“在西方的普遍理解中,史学方法依然停留在刻画了现代性的那些公约价值上。历史学家们似乎将这些价值视作普遍有效的,并且很少承认它们的存在。后现代性……无法被如此顺利地搪塞或简化,它与众不同地拒绝了任何这样的普遍共性的可能。这种挑战给历史学家们制造了一个直插历史学心脏的难题……[这样的话,]负责地思考、应对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它们为历史写作制造了那么多挑战——已经为时不早了。这种批判更加让标准的历史写作变成一种好像和画现实主义风景画一般精密的事业:无疑值得称赞、引人入胜、使人安心,然而它对文化的革新来说并不起什么作用”(“Ethics and Method”, pp. 61-62)厄尔玛斯的作品提出了这一问题:到底哪些替代性的方法(如果有的话)可以提供给那些历史学家——他们不仅希望在后现代的境况下重思“历史”写作,还希望制造“一种后现代的号召与参与,它们起源于让我们的启蒙的与政治的预设符合于我们实际的文化境况的努力……这些预设……当境况改变时依然可以被革新”(“Ethics and Method”, p. 62)。

[28] Ermarth, “Ethics and Method”, pp. 78-83 等各处。

[29] Vladimir Nabokov, *Transparent Thing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3, pp. 1-2.

法中的作用；“事物”不是“客体”，而是机缘巧合，是运载者，是新的注意力能够得以完成的地方，它是记忆被一次次重新塑造的地方，它是一种从事于创造独特的与不可重复的生命之诗的想象意识。^[30]

现在让我为厄尔玛斯，特别是她的评论（建议）——我们对待历史化、时间化的态度应该是折射性的——作一些补充。那么，让我们将过去想象为一个拥有不同密度的介质，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只能倾斜进入其中：我们透过表面看到的、在表面之下的东西永远不是在它实际的地方，它永远“不符合”于实际；永远存在着一种错搭、一种断裂、一种错置（就像我们看到杯子里的棍子一样）。除此之外，让我们将对过去的时间化（temporalisation）视作断裂，视作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且永远无法——我们也不用担心它们会——被弥合成一个完整的、没有破碎的意义，并且正是这些裂缝才会有空间来安放各种各样的能够被想象出来的事物。^[31] 另外，我们对待所有历史正统的态度需要变得折射，也即对它唱反调，不加尊重，倔强、固执、顽固，以及任何你能想到的词。让我们停留于表面，掠过表面，并与诗性安排下的比喻、情节与情节化、形态与形塑嬉戏，这种安排拒绝汇总，拒绝合并，拒绝正统性的停滞。无论这种思维类型能够制造出怎样的时间化，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不会像我们所知道的历史那样——甚至根

[30] Ermarth, "Beyond History", p. 417.

[31] 这种“裂缝中的活动”不仅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是绝对无法避免的——如果历史的制造根本上是来自于一个并不遥远且历史性的过去的话。Carolyn Steedman 在 *Dust* 一书中提出，在历史解释、历史分析与历史叙事中（如在历史本身中）有着一个“双重缺失”。那么，这两个“不在场”是什么呢？首先是关于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家的）所指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理解历史写作并不直接指向过去，无论是档案还是过去留下的遗迹。相反地，它们指向的是早先的实体——结构、过程、统计流量、趋势、影响、运动、语境与意义等等——它们从不存在于这些外部的史料中，而是通过对各种“遗迹”的推断（绑架）而得以存在。然而这样的话，历史学家的陈述所指向的就并不是遗迹本身，而是这些遗迹指示/暗示的关于过去的方面，并且正是这些推断富于想象性地填满了裂缝。其次，正如司迪曼所说，由此仅仅只是历史学家（以及那些表现得像历史学家的人）“通过他们的思考和写作将过去的素材（或任何事）制成了一个结构或一起事件，一次偶然或一个事物——首先，他们从未存在于过去；或者，他们也至少不会按照肉豆蔻粉碎机的方式，更加肯定不会按照‘他们被告知的’的这种方式工作”（p. 145）。由此，历史写作中的“双重缺失”就是——历史是“从未像它被表现出来的方式（在口耳相传或文本中的事件）那样发生过的东西；它由已经不存在于过去的——留存于档案等物中——材料（推断）组成”。（p. 154）雅克·朗西埃以简明得令人赞叹的语句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因为有不在场，所以才有历史……历史的地位取决于它是如何对待这个‘事物自身’的双重缺席的。一个是那个不再存在的事物自身[那个已经过去的过去]，另一个则是那个从未存在过的事物自身……因为过去从来都不是它曾经被[现在被]讲述出来的模样。”参见 Jacques Rancière, *The Names of History: On the Poetics of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 63。

本就不是历史。

对于那些可以以这种方式,以德里达、巴迪乌、波德里亚、厄尔玛斯……利奥塔、萨义德、巴特勒、拉克劳等人的后现代方式思考的人来说,继续按照这样的历史意识——它沦入属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的实在论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的思维定式的深渊——来思考已经变得无法想象了。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思考方式不是——所谓的“正统”历史学家肯定要为此懊恼不已了——某种时尚或者某种“批判性的话语”,它无法被忽视且/或在“多重理解”和“对语言多加注意”的伪装下被重新拉回到现代性中。因为现代主义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历史学与后现代的、以美学为中心的时间化的不同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性质上的、本体论上的。这也解释了为何现代主义的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时间化之间的分裂不是“认识论上的分裂”(似乎它们在某一天的重新“聚首”与“和解”是可能的)而是“永恒的分裂”——因为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那些不满于后现代的“极端”与“过度”的现代主义者其实根本就没讲到点子上,他们就是不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分裂——从长远来看——就像中世纪与现代的分裂那样的划时代:它们就是不同的世界。从这种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只能是它自己的过渡;后现代主义是一切现代性永远无法成为的东西。那么,对于我来说,后现代主义就意味着持有一种态度,或者一种好斗的、不服从的性情,它强调历史化过程中的语法的、虚构的形式而没有哪怕一点点歉意与怀旧,并且站在它们的位置(如果有人依然需要它们的话)提出放弃过去——这种全新的、尚未被人设想过的方式:现代主义的历史学从此消逝、死亡。然而,这个终点也恰恰是另一个可能的起点。而我认为,这个“再次的起点”是我可以公开宣扬的,并且我可以试图让其他人也对它抱有兴趣,由此他们可以试着彻底改造自己。那么,为什么不呢?说到底,他们除了那个过去,其实什么都没有失去。

附记:

我本来准备到此结束的。我原本打算讲一个小时,讲完后剩个一两分钟左右,实际情况和我想的差不多。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在我刚宣读完的讲稿后再加上一篇小小的附记,以强调两个组织起全文的主题。

首先,我认为对我而言(如果不是对其他人的话),显然“后现代的解构”——让我姑且先这么说吧——是具有非常乐观的前景的:它打扫干净了屋

子,并且暗示了事物应该如何被重塑。^[32] 这种乐观主义是你可以在尼采——我似乎一直在提到他——那里发现的那种乐观主义。我希望没有人——绝对没有人——会真的希望生活在尼采本人理想的政治体中(尼采尤其不),然而通过他对“西方传统”的解构,他预见了很多的后现代的东西。下面是他的《快乐的智慧》中的一番乐观宣言:

事实上,我们这些哲学家、这些自由的心灵们在得知[终于送达的]那个陈腐的上帝的死讯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如同沐浴在曙光的照耀下一般。我们的心中洋溢着感激、惊愕、预知与期待。终于,地平线似乎又一次升起。即使承认阳光尚未普照,我们的船终于可以出海面对那所有的危险了;所有的冒险都再次被允许……这片海、属于我们的海又重新荡漾在我们面前;也许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样一片宽广无垠的大海。^[33]

我想,这就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是谁现在都在其中随波漂流的那片海;在这片神秘莫测的海上,我们必须习惯于在缺少——正如德里达在《另一条航道》^[34]中指出的——被提前精确设置好的航线的情况下航行。对于一种正在移动中的文化来说,“没有一条航道”意味着让自己更为极端地对未来、对“将临之事”开放。在这里,历史不是——当然时间性也不是——一条提前设计好的、通往一个可预见的、可预期的、可控制的未来的航线;相反地,我们都必须在没有什么

[32] 这种乐观主义建立在一种已经绝对过时的对后现代的分析上。虽然 Gilles Lipovetsky 归入“高度现代”(hypermodern)名义下的许多特征,在我看来如果放在后现代的名下也显得挺合适,然而他做出的分析使得德里达式的“将临之物”变得相当不可能。而同时,利波维茨基的“悲观的方面”,对于那些依然希望看到历史学的必要性的人来说并没有提供任何宽慰。如果历史学本身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必要的话,那么对“全新的时间性研究”就更提不起什么兴趣了。可见 Gilles Lipovetsky, *Hypermodern Tim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The Empire of Fashion: Dressing Moder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当然,还有许多文献告诉我,为什么不应该对后现代成为一种解放性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先驱者的可能性保持乐观,鉴于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需求沆瀣一气——比如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文化逻辑。这种看法尤其受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作品的影晌,特别是他的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91), 并且被如 David Harvey, Terry Eagleton, Christopher Norris, Alex Callinicos 等人阐发。这种看法来自于“左派”,要比我对“政治”更加不抱有幻想,不过我这种看法缺乏对应事物的观察,并且——讽刺性地——不够历史性/时间性。

[33] Nietzsche, *The Joyful Wisdom*, Edinburg, Foulis, 1910, p. 167.

[34] Derrida, *The Other Heading: Reflections on Today's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航线的情况下出航,我们要站在船头面对新鲜的事物,“而不是一条航道”。^[35]

其次,由此而言,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终将归于何处、“止于何处”就都是不确定的。然而,我不希望有太多多愁善感,鉴于我在这里提议的(无论我在这里的措辞、用词与语体是什么)是一种政治^[36]——一种也许与我们已知的所有的政治一样复杂的政治。但是,我们依旧可能实现它,“否则”那些为现代性所承诺的“人权的共同体”就会葬送自我的危机,且被自我的危机所葬送。这样的话,在不远的未来,在德里达式的“将要临近”的未来的某一天,通过那些未来的故事讲述者们的回眸,我们可以了解一个这样的故事——关于我们正经历的现代性实验与后现代反思之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话,无论这个故事所演说的(话语性的)客体是什么,它都会以这样一个、所有故事都必须具有的开头而开头:“从前……”不过,这一次如果这个故事能够拥有只有那些真正非常动听的故事才会拥有的结尾的话,那可就好了——那就是:“他们就这样永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剧终。”

【本文原载 Keith Jenkins, “‘Once upon a time’: On History”, in *At The Limits of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9。】

[35] Jacques Derrida & John Caputo, *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7-118. 我很感激 Mark Mason 先生,他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德里达的 *The Other Heading* 以及 Caputo 对其的评论。见 Mark Mason, “Exploring ‘The Impossible’: Jacques Derrida, John Caputo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Journal*, Vol. 10, 2006, pp. 501-522。

[36] 关于政治分析的问题,我大体上一直同意那种为 Ernesto Laclau 阐发的观念。见其与 Chantal Mouffe 合著的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1985),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1990.), *Emancipation* (London, Verso, 1985.), *On Popular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还可见 J. Butler, E. Laclau, S. Ziz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London, Verso, 2000)。这些分析著作并没有在本文中得到讨论,但是它们站在本文的背后,支撑着本文,并且指引着本文的总体政治立场。

阿兰·梅吉尔 著

李任之 译

“宏大叙事”与历史学学科

“宏大叙事”指的是对于作为整体的、唯一的且融贯的历史的某种认识、解释、展现与诉说。作者又将这个唯一的“历史”称为“大写的历史”。在作者看来，一共有着四种对于“大写的历史”的态度，分别是(1)认为“大写的历史”现在就可以通过被讲述的方式得以再现；(2)认为存在着一个“大写的历史”，但是它需要在人们进一步的研究以后才能为人所知；(3)认为虽然存在着一个“大写的历史”，但是它永远无法为人所道出；(4)不存在所谓的“大写的历史”。态度(1)与态度(2)都强调作为客观的历史进程的、融贯的“大写的历史”。态度(3)则放弃了宏大叙事，而更强调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应该是内部融贯的、具有统一的思维模式的。也就是说，态度(3)为历史学设立了边界与门槛。而作者认为，我们恰恰需要对此进行反思，历史学家需要跨越这些边界，从而避免过度的学科化与门类化。在文章的最后，作者针对历史学的前景，给出了四条他个人的建议与展望，希望历史学家们能更多地关注多样性、理论与虚构等维度。

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当代美国著名史学理论家、思想史家。1990年至今担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极端性的先知：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与德里达》《卡尔·马克思：理性的重负》《历史知识，历史谬误》，并主编《反思客观性》，合编《人文学科的修辞：学术与公共事务中的语言与论述》。

在 为出版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论文集《历史写作的新视角》所写的导言中,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提出:“自从差不多上一代开始,历史学家的世界就已经在以一种令人炫目的速度扩张。”〔1〕在本文中,我希望能指出这种所谓的扩张的一些界限。早在繁盛于 20 世纪的各种“新史学”出现之前,历史学是一个具有吸纳性的事业这一观念就包含在这个学科的神话体系中——它能够和所有的学科保持亲近的关系,并对它在其他领域里发现的任何有用的路径和方法持特别开放的态度。〔2〕

在本文中,我希望展示,历史学的吸纳性与开放性其实是非常受限的。一个特别的假定——从根本上是一个本体论的假定——奠基并加强了对历史学的吸纳性的信仰。用最简要的说法,这就是关于终极的世界统一体的假定。这个假定隐藏在风靡于西方历史学中的各种宏大叙事的背后。〔3〕在此,我拟考察宏大叙事这一概念的各种变体,它们在现代西方职业化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的传统中早已出现过。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也会关注到历史写作与历史思考在当下的境遇。这种境遇有其历时性的一面,它与这个持续着的传统有关;它也有共时性的一面,并和目前特定的生活状况和文化状况有所联系。

本文的目标是:力图对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的学科化及门类化背后的深层思想基础提供一番解释。历史学所生产的并不是人类与过去的合法接触的全部,但它是这种接触中极重要的一部分。鉴于历史学宣称自己在对过去的理解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权威性——即使现在,对这种权威性的表达依旧基本是在认知的角度上进行的,基于历史学拥有更好的方法与更合理的见识——就有必要对它进行认识论上的反思。是学科(包括历史学)就有边界。固守于学科内部的学者通常大都不去思考学科的边界。相反,他们认为有了边界的约束就等于有了一般而言优秀的学术。

〔1〕 Peter Burke, “Overture: The New History,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1991, p. 1.

〔2〕 可参见题为“史学全方位”(History the Great Catch-All)的讨论,见 Jacques Barzun and Henry F. Graff, *The Modern Researcher*, 4th ed., San Diego, 1985, pp. 8-13.

〔3〕 我从利奥塔那里借用了“宏大叙事”这个术语,但在保留原义的基础上也有所改动。见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1984, p. xxiii。宏大叙事指那种包罗万象的故事,并且被按照“开头—正文—结尾”的秩序排列——也即“叙事”这个词最为明显的含义,在受到亚里士多德对于“叙事”的定义影响的情况下。我不准备完全放弃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因为它在实际上部分地符合这里所指的“历史”),但我希望拓展这个术语的含义,让它指向一种融贯的视界——特别是,一种足够支撑客观性要求的融贯的视界。

造成这种情况有着制度方面的原因。它涉及共同体以及进入到共同体的社会化模式的问题。除了有时在一些跨学科领域,某个人文或社会学科的从业者通常缺乏与其他学科的同僚的严肃交往。虽然他们偶尔会借用其他学科的成果与方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这些学科的论证模式之中的经验,更不用说写出能够对其他学科有所贡献的作品了。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学术体制越庞大、声望越高,它的门槛就越高。我们讨论的这些体制都是以相当学科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整个大的学术世界亦是如此。历史学家的研讨班与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讨班老死不相往来,而其他学科的研讨班互相之间也是如此。实际上,每个学科的研讨班本身也是高度碎片化的,只吸引针对某个特定地域、特定时代与特定主题的专家或者服膺于某个特定方法、路径的学者参加。通常,真正的研讨班根本不在学科这一层面上,而仅仅是在更具体的历史学的下属领域内展开。当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只在这样专业化的、而非更广泛的学术群体中发生,那些更醒目的错误反而会被很轻易地放过。

在此,我的论述和行文将有意地以一种高度概括化的方式进行。我承认,也可以在其他层面上对历史学学科进行一番解读,产生出更加复杂而更具历史具体性的观点。^[4] 采取这种高度概括的方式的原因是,我的目标是要反思历史学学科的概念基础与总体特性。更为具体地说,我要反思的这门学科的基础与特性出现于19世纪早期的德国。非常显著地,当时奠定的历史学的概念基础至今依旧屹立不倒,尽管它们很明显地遭到了挑战。这种对概念史的概括性的探究,可能会导致凿空之论,为此我提前致歉。我准备将宏大叙事这一概念的历史放在历史学学科的语境中予以考察,而这一学科实际上对自身的概念基础并不措意。我还要求读者对于我给出的定义详加注意:它们不仅严格而且重要。我在这里所尝试的这种反思——但显然,它们仅仅是历史学家们能够做且应该做的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揭露了某些若非如此依然不会得到检查的偏见。

这种反思显然有其理论价值。但是,它对实际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来说

[4] 读者可以参见如 Horst Walter Blanke 的 *Historiographiegeschichte als Historik*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1) 一书。这本共 809 页的作品描述了自 1750 年之后的德国史学传统。其他(部分地)关于现代西方历史学的历史的研究著作还包括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nover, NH, 1997), 这本书部分地是针对后现代的一种论辩。Michael Bentley 的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1999) 是一部非常细致且扼要的著作。Donald R. Kelly 的 *Fortunes of History: History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 (New Haven, CT, 2003) 是一部渊博的作品,它捍卫了历史学,并试图同时唤起和平息我们对于过去的好奇之心。

也同样具有意义。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越发地意识到历史学正在变得碎片化;作为对此的回应,历史综合(historical synthesis)成了一个被严肃讨论的历史学问题。^[5] 在历史写作中,综合应处于怎样的地位?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另外还有文学形式的问题。比如,叙事在历史学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另外,在历史写作中,虚构性(fictive)的因素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历史综合如何永远需要有人倡言(propose)而同时又需要被人质疑的话,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历史叙事是如何被充满成见却通常不被承认的预设所支撑的话,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虚构性如何既是史学家工作的必需品而同时也是某种危险的源头的话——如果我们这么做,就需要对历史学的理论基础与理论蕴涵有所把握。我所希望的是,本文所提供的概念工具,能够既得到那些带有批判性的心灵的历史读者们的严肃对待,也得到那些历史学家们的严肃对待——他们以在认识论上负责的方式从事历史写作这一艰巨任务,同时又努力让他们不因被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所困而伤及自己的历史想象力与史家之笔。

显然,这里的一个重要的、可能也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融贯性。这个主题无法被仅仅一篇文章所容纳,不过我们至少还是可以对它做出一些重要的判断。将“融贯性”概念化为四个不同的层面——这一做法似乎就是有益处的。这四个层面是:(1)严格意义上的叙事(narrative proper);(2)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或综合,它要求对某些特定的历史部分给出权威性的解释;(3)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它声称为历史整体提供权威性的解释;(4)元叙事(metanarrative,最通常的是对上帝的或内在于世界的合理性的信仰),它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正当性。本文将特别关注宏大叙事的层面,因为这可以让我提出一个框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更具体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时代的问题这一事实。从本质上说,我关注的是“职业”的或“学科化”的历史学力图在我们理解过去的过程中扮演某种特殊的权威性角色这一要求——

[5] Thomas Bender, "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3, 1986, pp. 120-136. 针对此文, Nell Irvin Painter, Richard Wightman Fox 和 Roy Rosenzweig 都做出了回应,而 Bender 又针对这些回应有进一步的阐发。他们的论文都刊登在 "A Round Table: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4, 1987, pp. 107-130) 中。另外,对于德国历史的“主导叙事”的问题,还可以参见 Michael Geyer and Konrad H. Jarausch, "The Future of the German Past: Transatlantic Reflection for the 1990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2, 1989, pp. 229-259, 特别是 234-247 页。

也即,它对“客观性”的诉求(在这个术语的最宽泛的意义上)。^[6]

关于历史的整体融贯性的四种“理想型”态度

直到最近,现代西方职业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这一传统的参与者与观察者们依然普遍认为,每一部历史学作品都应该聚焦于一般的历史——即某种独一无二的历史(single history),我在这里将其命名为“大写的历史”(History)。^[7] 我们似乎有理由认定,这个传统通过四种方式将历史写作与“大写的历史”联系起来。这样,它就展现了四种对待“大写的历史”的“态度”。我们可以历时地为这四种态度排列顺序,然而它们同样也是可以共存的,并且我认为在最出色的历史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全部这四种态度,至少是它们的踪迹。它们都是概念化的类型(conceptual type)。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某种特定的、要求从整体上理解历史的“宏大叙事”的信守。“态度1”的要点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融贯的“大写的历史”,并且现在它就可以被讲述(或重新讲述)出来。“态度2”认为,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融贯的“大写的历史”,但是对它的讲述将被推迟至将来的某一天,当“进一步的研究”得以完成的时候。“态度3”认为,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融贯的“大写的历史”,但是它将永远无法为人所道出。显然,如果以叙事主义者的观点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存在着悖论,因为一个永远无法被道出的宏大叙事根本不具有叙事的“形式”(form)。然而,这种宏大叙事却自我展现在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学科自主性的信奉中,这种信奉是为了在历史学无法汇集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的情况下维系学科的纯洁性与融贯性。“态度4”则甚至对这种融贯性的形式都提出了质疑。

职业化的历史学预设了某种融贯性观念的存在,即使它并不一定需要

[6] 如果想要在一个更具体的层面上了解美国历史学,可以参看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1989) 一书。读者可以将本文视作试图为此书提供一个深层的背景,而此书的第八章则部分地是本文的“简明”版本。

[7] 对此,最为显著的例外(若非如此,他很可能被定义为职业的历史学家了)是瑞士历史学家雅可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开头部分,布克哈特写道:“针对这项研究的其他作品,很可能不仅采取完全不同的对待主题的方式和应用,还可能得出从根本上完全不同的结论。”布克哈特的这种令人震惊的反权威性的观点不啻是在否认“大写的历史”这一观念。同样地,他还认为对于艺术鉴赏者来说,“辩证的”和“以对象为中心的”的客观性较之“绝对的”客观性要更为合适。见 Peter Burke 撰写导言、Peter Murray 校注的版本: 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trans. S. G. C. Middlemore, Harmondsworth, UK, 1990, p. 19.

被道出,而这一点是为历史学家们大都视而不见的。当然,史学家们大都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对融贯性问题有所意识,无论是在建构一个独一的(从其定义上看就是融贯的)叙事之时,还是在阐述某些具体的历史领域的或隐或显的“主导叙事”之时(像盖耶尔和亚拉乌什所做的;见本文注〔5〕)。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在“整体”层面上的融贯性。鉴于表述一个概念预设是理论的而非历史编纂的任务,史学家们很少会这样做。另外,研究者们(包括史学史家在内)往往恰恰是忽略了对于他们而言最“自然”不过的那一境遇的种种特征。

不过,依然有一些史学史家——他们都受益于跨学科研究的成果——看到了这里指出的问题。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一位对概念史异常敏感的历史学家指出,德语“Geschichte”(即“历史”或“故事”)一词的他所谓“集合单数”的用法是在18世纪末的德国出现的。他认为,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才开始将“Geschichte”视作单数的而非复数的。另外,也只有到那时,人们才开始用它代表总体的历史,而非甲的、乙的或丙的历史。根据科泽勒克的说法,这种“集合单数”意义下的历史“奠定了所有可能的个别的历史的地位”〔8〕通过对文学理论的阅读,小罗伯特·F.博克霍福(Robert F. Berkhofer Jr.)在历史学家对语境的关切这一行为中发现,他们假设过去是一个“复杂但却具有统一性的事件之流”,即一个“伟大的故事”(Great Story)〔9〕哲学家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发现,18世纪的“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概念一直存活

〔8〕 这个论点可见 Koselleck, “Die Entstehung des Kollektivsingulars”,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ed.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8 Vols., Stuttgart, 1972-1997, Vol. 2, pp. 647-653. 英文的缩减版可见 Reinhart Koselleck, “On the Disposability of History”, in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Cambridge, 1985, pp. 200-202. 科泽勒克其实是阐发了他的老师——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的一个观点,后者将德语中“历史”的“实体单数”(substantive singular)用法与希腊语中缺乏对应的称谓这一情况做了对比。见 Karl Löwith, “Mensch und Geschichte” (1960), in *Der Mensch inmitten der Geschichte: Philosophische Bilanz des 20. Jahrhunderts*, ed. Bernd Lutz, Stuttgart, 1990, p. 228.

〔9〕 Robert F. Berkhofer Jr., “The Challenge of Poetics to (Normal) Historical Practice”, in Paul Hernadi ed., *The Rhetoric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hetoric*, Durham, 1989, pp. 188-189. 我们是如何从对语境的关切走向最终只有一个单一的语境这一看法的? 实际上,从历史著作“有着丰富的语境”这一观察很自然地可以得到“每个有意义的部分、每个有意义的个人、每个有意义的选择都对它的故事负责,并且都与故事成为了一个整体”这一结论。见 Michael Kammen,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in *Selvages and Biases: The Fabric of History in American Culture*, Ithaca, 1987, p. 37.

至 20 世纪的历史学。^[10] 最后,从康德式的立场着手,莱昂纳德·克瑞格(Leonard Krieger)强调了职业历史学对融贯性的持续追寻。^[11]

克瑞格的解释是特别有说服力的。他向我们展示,当历史学家们缺少对于人类历史的性质的基本共识的时候,历史学这一事业的融贯性即会受到威胁,反之亦然。如果我们从当下的视角发挥克瑞格的观点,可以发现,职业化的历史学自 19 世纪出现以来,在对待人类历史的态度上就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无论他们的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多么不同,几乎所有的职业历史学家都同意:历史是有关政治的、欧洲的、男性的。然而最近,职业化的历史学意识到自己已被卷入一个更大的多元主义之中。这种变化令达成有关过去的一致性观点的希望变得遥不可及,甚至还对历史学原先所具有的同质性构成了挑战。这种变化还动摇了历史学可以、并且也应该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保持自主性这种观点。克瑞格是一个研究职业历史学家的职业历史学家,他颇为信奉历史学的自主性。他认为,历史学家虽然应该向相邻的学科学习,却也需要行使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的职责(即,作为一个未受到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的污染的历史学家),因为“独具历史性的知识”的融贯保证了“过去的融贯性”。^[12] 然而,克瑞格自己对于主观的历史学与客观的历史之间的联系强调,就对一个融贯性的学科视野在社会分化的年代的前景提出了质疑。

态度 1: 存在一个独一的“大写的历史”,并且我们对其早已洞悉。

态度 1 体现在“普遍史”这一传统中。普遍史与学科界限的问题是相关的,因为通过它的世俗化的形式,它对职业化的历史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然它的源头早在教父哲学时期(Patristic Period)就可以被发现,它最早成为一个持续的学术与教育的传统还是在新教德国的大学中,在 16 世纪中期支持宗教改革的人文主义者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thon)于威腾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发表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讲演之后。在一个德意志还没有像英、法那样发展出民族国家的时期,普遍史为德国的新教徒们提供了某种关于统一与荣

[10] Louis O. Mink,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in Louis O. Mink,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 Brian Fay, Eugene O. Golob and Richard T. Vann, Ithaca, 1987, pp. 194-195.

[11] Leonard Krieger, *Time's Reasons: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Old and New*, Chicago, 1989. 克瑞格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学科”的信奉让他对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历史学有着某种争议性的误读,虽然这无法掩盖此书的其他优点。还可参见 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Chicago, 1977) 一书,其中他给出了一个相似的、然而没有那么概括性的论述。

[12] Leonard Krieger, *Time's Reasons: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Old and New*, p. 170.

耀的景象(若非如此则不会有这种景象)。^[13]

基督教的普遍史侧重于希伯来人,并且采纳了《圣经》中的编年与分期。在现代早期,这种对《圣经》的聚焦受到了挑战,并被最终遗弃。然而,基督教式的普遍历史的逐渐瓦解并没有破坏普遍历史这个观念本身,它以世俗化的(也即非圣经化的)形式继续存在。当然在德国,这种观念还得到专为其而设的大学教席的支撑。

普遍史的世俗化传统将是本文论述的真正开始。虽然世俗化的传统并没有赋予《圣经》任何特权,然而早前基于《圣经》之上的普遍史构想的基本理念依然存在——即最终有一个独一的历史,其统一性为上帝所保证。从概念上说,在基于《圣经》的普遍史向虽然依旧预设有神论、却并不给予《圣经》任何特权的普遍史的跨越中,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对于前者,那个宏大的叙事现在就可以为我们所道出,这是因为我们的讲述不过是一种重述(*retelling*);而对于后者,我们的讲述则没有任何业已存在的模型。既然宏大叙事不再为《圣经》所规定,我们又怎么能够发现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真的可以了解宏大叙事吗?如果可以,那能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什么方法去了解呢?

康德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 1784)是对普遍的历史这一传统的一种明确的贡献。并且,他在《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the Human Race Constantly Progressing?*”, 1795)一文中又回归到了这个问题上。^[14] 在前一篇文章中,康德暗示,某种关于人类的“哲学性的历史”是可以被书写的。哲学性的历史将显示,当我们“从更大的规模”来看,看似表面一片混沌的个体意志如何可被视作展现出,“在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中存在着某种合乎规则的进步”,而这个进步的终点将是“人类的完美的公民联合体”。的确,书写这样一种历史

[13] 现代早期对于普遍历史的标准论述可见 Adalbert Klempt, *Die Säkularisierung der universalhistorischen Auffassung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Zum Wandel des Geschichtsdenkens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Göttinger Bausteine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ol. 31, Göttingen, 1960。另外还可见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Chicago, 1983) 一书的《普遍史:一个纷扰的传统》(“*Universal History: A Troubled Tradition*”)一章。在20世纪末,普遍史在一种非常不同、近似目的论的语境下复活。见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1992), 特别见此书的第五章。

[14] Immanuel Kant, “*Ideas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 trans. H. B. Nisbet;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the Human Race Constantly Progressing?*” trans. H. B. Nisbet, in Hans Reiss ed.,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1991, pp. 41-51, pp. 177-190.

会有助于实现那个备受期许的目标。^[15] 然而康德知道,这种历史无法在经验中获得证实,他打消了任何“取(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任务而代之”的期望。^[16]

在写于 1795 年的《重提这个问题》一文中,康德再次强调,“有关进步的问题是無法直接由经验解决的”;然而他也坚称,“肯定有某些经验或其他的东西可以显示出来,人类具有这样的资质与力量,能够成为自我改进的原动力……和始作俑者”。^[17] 在思考他自己的时代的时候,康德在到当时为止最为宏大的事件——法国大革命——的“旁观者的心态”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经验性的指示。这些旁观者并没有通过革命得到任何东西,但他们对革命的欢迎态度近乎狂热——即使在普鲁士都是如此(在那里,这种狂热是非常危险的)。康德认为,他们对革命的同情只有通过某种人类内心的“道德特质”才可能引发,而这种特质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历史是进步的。^[18] 黑格尔同样声称可以辨识出并诉说历史的本质形态,他将其视作一个人类自由的不断实现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人的自由,接着是一些人的自由,再接着是所有人的自由。^[19]

然而,讲述宏大叙事是有风险的,因为未来的事件可能偏离已被暗示的故事主线。比如,1789 年 5 月,弗雷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为就职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演讲。为康德的“普遍历史的观念”所激发,他的演讲题目是“什么是普遍历史,我们又为何要研究它?”他回溯了从在一些原始民族中仍可见到的野蛮状态,到真理、道德与自由都已前所未有地强大的 18 世纪欧洲文明这一跨越过程。在他眼中,“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洲社会似乎已变成了一个大家庭”,其成员可能“依然对他者抱有敌意,但是不会再

[15] Immanuel Kant, “Ideas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 pp. 11, 51-53.

[16] Ibid., p. 53.

[17] Immanuel Kant,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the Human Race Constantly Progressing?”, pp. 180-181.

[18] Immanuel Kant,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the Human Race Constantly Progressing?”, p. 182. 关于康德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可见 Leonard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Boston, 1957, pp. 104-105.

[19] 对这种观点最为细节化的论述,可见 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J. Sibree, New York, 1956. 而对此更为简化的展现,则可见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Allan W. Wood,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1991, pp. 341-360, 372-380. 对于黑格尔来说,宏大叙事背后的目的论支撑是非常明显的;如他著名的论断:“世界历史……就是一部真正的神义论,上帝在历史中得到合理性。”关于黑格尔思想中“历史中的基督教目的论”的问题,可见 Laurence Dickey, *Hegel: Religion, Economics and the Politics of Spirit, 1770-1807*, Cambridge, 1987, p. 149.

互相将对方撕成碎片”。^[20] 但显然,对于他在就职演说上对欧洲历史自鸣得意的解释与仅两个月后在法国爆发的惊天动地的事件间的矛盾,席勒则从未给出一个说法。^[21]

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被纳入宏大叙事的细节的程度。赫尔德在1772年为奥古斯特·威廉·冯·施罗泽(August Wilhelm Von Schläzer)的《普遍史》(*Universal-Historie*)所写的书评中,批判了施罗泽,认为他书中所提出的普遍历史的蓝图并没有得以实现。在回应中,施罗泽同意赫尔德的看法,认为计划容易、做起来难(*dass sich etwas leichter sagen als thun lasse*),但他同时争辩道:“在一个关乎世界历史的问题上……它必须在完成前就被计划(*gesagt*)好……必须起草一个关于这门科学^[22]的计划、理论和理念。”^[23]换言之,施罗泽认为整个故事的轮廓现在就可以被道出,但是它的完整版本需要被推迟。显然,施罗泽肯定认为,之后道出的完整版本仅仅是对轮廓的丰富而已。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质问,如果后来的完整版本不仅仅是对主线的丰富、反而是修正,那又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声称已经了解了唯一的“大写的历史”。

态度2:存在一个唯一的“大写的历史”,但是我们只有在更进一步的研究完成之后才能够了解它。

态度2推迟了诉说故事的时间。它是作为对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所引发的剧变的回应而在历史上变得显要的,并且与职业化历史学的出现有着微妙的联系。作为历史学学科的正统开创者,利奥波德·冯·兰克对那些普遍历史

[20] Friedrich von Schiller, “Was heis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 in *Über das der Geschichte*, ed. Wolfgang Hardtwig, Munich, 1990, p. 27. 英文版可见“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 An Inaugural Lecture [1789]”,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1, 1972, p. 327

[21] 路易斯·明克也指出了这一点。Louis O. Mink,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p. 189.

[22] 德语中的“Wissenschaften”一词一般被翻译成英语的“science”,但是“Wissenschaften”的含义超过了狭义上、“自然科学”意义上的“science”,它不仅包括“科学”,还可以指任何一种知识共同体、或者学科。以此言之,那么历史学当然就是一门“Wissenschaften”。在这里,我们需要在广义的层面上理解“科学”,不只是将其当作“自然科学”;所以,本文中出现的(无论来自于作者还是引文)“历史科学”(history science)、“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一类的称谓,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指历史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或是将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当然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而是在一门“学科”的意义上被使用。——译注

[23]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A. L. Schläzers 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 in *Sämmtliche Werke*, ed. Bernhard Suphan, Vol. 5, Berlin, 1877-1913, p. 438. 以及 August Wilhelm von Schläzer, *Vorstellung seiner Uniseral-Historie*, Göttingen, 1772, 1773, 2nd Vol., “Vorbericht”。转引自 Reill,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Berkeley, 1975, pp. 47, 232-233

学家持批评的态度,如迦特勒(Gatterer),约翰斯·缪勒(Johannes Müller)和弗里德里希·克里斯多夫·施罗塞(Friedrich Cristoph Schlosser)。^[24]而对于黑格尔那样的、试图设置一个先验(a priori)的人类历史进程的哲学家,兰克的批评更甚。但是对于普遍史本身,他则没有持这样的批判态度;相反地,普遍史依旧一直是他的关切。^[25]

我们可以思考下面这段话,引自兰克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某部作品的残篇:

对某个特定之物、甚至是对某一单独的点的研究,只要完成得出色,就是有价值的……然而,对特定之物的研究永远是和一个更大的语境相关的。地方的历史与它所属国家的历史相关,一部传记与一个发生在国家或教会中的更大的事件相关、与民族历史或整体历史上的某个时代相关。然而就像我们已提到的,所有这些时代本身又都是那个我们称之为普遍史的宏大整体(Ganzen)的一部分。以越宽的眼界研究它,带来的价值也相应地越大。尚未达成的终极目标将永远是对人类历史的构想与描绘……当然,理解整体且同时合理地对待研究的需要将永远是我们的理想。这以在坚实的基础上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性加以理解为先决条件。^[26]

兰克在这里设想了三种不同层面上的历史学的关怀。首先,“对某个特定之物、甚至是对某一单独的点的研究”——这种历史被今天的历史学家们称为微观史。第二个层面揭示了某一特定之物如何与一个“更大的语境”相关联,这种历史在当今的历史学中也不乏实例。第三个层面关乎“人类历史的总体性”,即“理解整体”。这个层面的关怀似乎隐而不彰,但是它的理念却是我们相当熟悉的:那就是宏大叙事的理念;就是人类的统一历史的理念。

[24] 参看兰克为1848年夏季学期课程所写的导言(“Erster Teil der Welgeschichte oder Geschichte der alten Welt”)的附录——被他的作品编辑者命名为“Die Universalgeschichtsschreibung seitdem 16 Jahrhundert”。见 *Aus Werk und Nachlass*, by Leopold von Ranke, ed. Walther Peter Fuchs and Theodor Schieder, 4 vols. (Vienna, 1964-1975), Vol. 4, *Vorlesungseinleitungen*, ed. Voler Dotterweich and Walther Peter Fuchs, pp. 208-210。

[25] 克瑞格对此有详细的讨论。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pp. 103, 107, 112-115, 124, 151-153 等处。兰克对于普遍史的关切,可见 *Aus Werk und Nachlass* 第四卷,兰克的索引中“Universalgeschichte, -Historie”条目。

[26] Leopold von Ranke, [Die Notwendigkeit universalgeschichtlicher Betrachtung], in Ranke, *Aus Werk und Nachlass*, pp. 297-298. 本文被 Wilma Iggers 译为“The Role of the Particular and the General in the Study of Universal History (A Manuscript of the 1860s)”,载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with a new translation by Wilma A.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New York, 1983, pp. 58-59。

在指向“那个尚未达成的终极目标”时,兰克承认,对这种整体历史的讲述需要被延后。我们还可以在他文集的其他地方发现类似的表述;比如,在1867年的一份讲演稿中,他写道:“历史科学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在全新的基础上重建普遍史。”〔27〕事实上,坚持推延讲述宏大叙事这一点对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来说是必须的。康德、席勒和黑格尔都相信他们已经知道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轮廓——或者至少他们相信,他们知道最好要将哪种人类历史的轮廓视为真。然而,他们的信念剥夺了历史研究的理据,因为如果被这样的论述说服的话,人们就“只会希望知道,在何种程度上哲学原则可以在历史中得到证明……对钻研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就没有任何兴趣了……也没有兴趣知道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段是如何生活、思考的”。进而,“如果这个步骤(在先验的基础上建构‘历史整体’)是正确的,那么历史(Historie)就失去了它全部的自主性(Selbständigkeit)”。〔28〕如果通过《圣经》、通过关于人性的知识、或通过其他方式我们现在就可以讲述那个故事,那被认为是职业历史研究所独具的各种方法又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呢?〔29〕

兰克一直笃信独一无二的“大写的历史”的真实性(即使现在它无法为人道出),而他的理由是来源于宗教的。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预知了世间所有的一切,一个上帝,创造的只能是一部“大写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兰克的《普遍史的观念》一文中发现这种观点的踪迹。其中,在涉及“总体性的构想”(Auffassung der Totalitat)——普遍史的特点之一——的时候,他坚称我们不可能完全把握普遍史:“只有上帝知道世界的历史。”〔30〕不过,上帝的观念与“大写的历史”的统

〔27〕 Leopold von Ranke, “Neuere Geschichte seit dem Anfang des 17. Jahrhunderts (28. Oktober 1867-10. März 1868)”, in Ranke, *Aus Werk und Nachlass*, Vol. 4, p. 411. 正像克瑞格正确地指出的,“兰克坚持认为,历史学家成功地认识到存在于普遍历史中的客观的融贯性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见 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p. 103)

〔28〕 Leopold von Ranke, “Idee der Universalhistorie”, in Ranke, *Aus Werk und Nachlass*, Vol. 4, pp. 74-75. 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曾被 *Wiley Annals of History*, p. 105 转载

〔29〕 Leopold von Ranke, “Idee der Universalhistorie”, in Ranke, *Aus Werk und Nachlass*, Vol. 4, pp. 74-75

一性的观念(History's unity)二者之间的关联,恐怕最为清楚地被表述在一封青年兰克于1820年写给他兄弟的书信中:

上帝寄居在、生活在所有的历史之中,并且他可以在所有的历史中被了解。所有的行为都证实他,所有的时刻都宣扬他的姓名。然而对我来说,最关键的还是历史整体的贯通性。它(贯通性)就像一个神圣的符码般耸立在那里……对我们而言,但愿我们能揭开这个神圣的符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在为上帝服务。这样做,我们就成为了牧师。这样做,我们就成为了导师。^[31]

由此可见,在兰克与更早的基督教式的对普遍历史的构想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延续。

对宏大叙事这一概念的皈依决不以宗教信仰为必需,因为世俗信念的形式同样可以。想想J. B. 伯里于1902年就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教授时,发表的题为《论历史科学》的就职演说。其中,伯里认为:

人类未来发展的理念……赋予……许多已被完成的、现在正被完成的辛劳的历史学研究以合理性。收集有关地方性小事件的材料、校对手稿并记录其中细小的差异,在州政、市政的档案中耐心地苦干,所有这些微观的研究都是由那些辛劳的学者们完成的……砍树、挑水这些工作只有在信念的支撑下才能完成——相信某个由人类历史中最为细小的事实所组成的完整集合最终会被道出。辛劳是为了繁荣——为了遥远的繁荣。^[32]

19世纪晚期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以及科学与合作的理念——在伯里看来,正是这两种理念使得扩张变得可能——为伯里的信仰提供了合理性。伯里的立场在结构上与兰克的如出一辙,尽管它聚焦于世俗。像兰克一样,伯里也皈依于态度2,他也将宏大叙事的讲述推迟到了未来。伯里的论敌——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Mathew Arnold的父亲)则是第一种态度的明确支持者,他在1841就任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教授的就职演说中提出,“现代”是人类的故事的“最后一步”——它的标志是“时间的完满性,似乎未来不会再有能超乎其

[31] 兰克于1820年3月致海因里希·兰克(Heinrich Ranke)的信。载 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ed. Walther Peter Fuchs, Hamburg, 1949, p. 18。这里采用了克瑞格的译文,见 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p. 361。

[32] J. B. 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2nd edition, New York, 1972, p. 219。

外的历史”。^[33] 伯里反对这种看法,然而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唯一的“大写的历史”这个观念本身。他相信,认为现在就知晓历史的形态还为时过早,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能够被知晓的单一形态。

我们很容易会想到,推迟讲述宏大叙事会急剧减弱对“大写的历史”的信奉与历史写作之间的关联。然而这种关联依然存在,因为对普遍历史的信奉(虽然是某种尚无法被道出的普遍历史)具有某种重要的认识论上的后果。这种信奉让史学家们可以坚持认为,对历史的描述就是某种客观的再现,是与“大写的历史”本身的立场相关的。如克瑞格所说,兰克“对历史家的客观性的确信”,是基于他信奉存在着一个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单一进程”(single process)。^[34] 在《论历史科学》中,伯里正好提到了这一点。他的演讲以坚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开始。^[35] 对于伯里来说,“科学”意味着纯然客观的再现:它“不能安全地为主观的兴趣所控制或指引”。^[36] 伯里排斥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域之间的关联,而是要求把自己和作为整体的历史进程拴在一起。他相信,“统一性与连续性的原则”存在于历史中。^[37] 这些原则表明了人类未来发展的理念;作为某种“限制性的、控制性的构想”,它告诉历史学家,什么应该被包括在某个历史描述中,而什么是应该被排除在外的。^[38]

态度 3: 存在一个唯一的“大写的历史”。然而它永远无法被道出。它仅仅作为一个自律的学科无法触及的目标而在理念上存在。融贯性不再驻足于(被讲述的或被预见的)宏大故事中,而在于学科内一致的思维模式中。

态度 3 放弃了唯一的“大写的历史”终会被道出这种看法,但却没有放弃存在着一个“唯一的历史学”——也即,某种唯一的、权威性的探究过去的模式。同时身为历史学家与史学理论家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他自 1852 年至 1882 年讲授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近乎于这一态度的阐发者。在授课

[33] Thomas Arnold, *Lecturers o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1874, p. 46. 转引自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p. 217.

[34] 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p. 242.

[35] J. B. 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p. 210.

[36] 我们可与兰克的一个著名的论述做一番比较。兰克说:“我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我自己,只为了能够重述那些事情:它们借助那强大的力量得以出现,并历经几个世纪而终于能通过彼此,并和彼此一道变得强大。”见 Leopold von Ranke, *Englische Geschichte, vornehmlich im Siebzehnten Jahrhundert*, Fünftes Buch, “Einleitung”, in *Sammtliche Werke*, 2 Aufl., Leipzig, 1867-1890, p. 103.

[37] J. B. 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pp. 213, 216.

[38] *Ibid.*, p. 219.

过程中,他坚称,宏大叙事永远无法被讲述,至少无法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被讲述。他断言,历史的“最高目的是无法被经验性的研究发掘的”〔39〕提及“最高的目的”,表明德罗伊森依然相信有一个融贯的“大写的历史”存在。兰克与伯里相信,历史学家可以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发现融贯性,而德罗伊森则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主观的方面。他并没有否认客观的融贯性的存在,但他选择“建立的并不是客观的‘大写的历史’的法则,而是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的法则”〔40〕德罗伊森的看法所暗含的一点是,历史学本身必须是一个融贯的事业——因为若非如此,怎么还能够有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的法则?进一步的暗示则是,历史学必须和与其对立的事业或关怀划清界限。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颇为合理地指出,德罗伊森提供了“对于历史思维的自主性的前所未有的持久而系统的维护”〔41〕

兰克也强调历史学的自主性,并谨防从哲学借来现成的宏大叙事来处理这一问题的那些人;然而德罗伊森对历史学自主性的坚持有着一个额外的作用:他不仅保护历史学,使其不受上述第一种、前职业化的信念(即我们已经知道宏大故事)的威胁,还要防止来自多样性和碎片化的威胁。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史学家,德罗伊森(一个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对这样的观念异常敏感:历史实在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方式下被讲述、被解释、被理解。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德罗伊森似乎意识到,那些相互竞争的认同的依附者们会声张他们自身历史的合法性,正如他会声张普鲁士历史的合法性那样。〔42〕

〔39〕 Joliann Gustav Droysen,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trans. E. Benjamin Andrews, Boston, 1893, p. 47. 相较于出版于德罗伊森身后的讲课手稿中、以更长篇幅展现的对历史学的思考,本书提供了一个浓缩的版本。见 Gustav Droysen, *Historik*, ed. Peter Leyh, 3 Vols. Stuttgart, 1977(其中,据编者称第二和第三卷将马上出版,但直到2006年4月依然尚未问世)。这个德文版本包括了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的1882年版本。

〔40〕 Droysen,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ppendix 2, “Art and Method”, p. 118. 试比较他的 *Historik* 一书第69页的说法:“我们的学科所从事的活动……只是因为我们在检验中并通过检验而将其设想为历史性的才成为历史性的,并不是它们本身、或客观上就是如此。”(摘自德罗伊森1857年的讲课手稿)。

〔41〕 Hayden White, “Droysen’s *Historik*: Historical Writing as a Bourgeois Science”, *The Content of Form*, Baltimore, 1987, p. 99. 还可见 Jörn Rüsen, *Begriffence Geschichte: Genesis und Begründung der Geschichtstherie J. G. Droysen*, Paderborn, 1969, p. 119。

〔42〕 可以注意德罗伊森的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第6页第一部分的这段话:“对于现实的观察教育我们,如果从不同的视角上观察,每个事实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描述与结合,对于私人世界与公共世界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有不同类型的解释。即使一个最为审慎的人也很难从大量的、相差悬殊的言谈中辨别出一幅即便是较为安全与持久的、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图景。”关于相似的主题,还可以参看德罗伊森1867年的讲座手稿,见 Droysen, *Historik*, (转下页)

另一方面,对于兰克来说,由于他对欧洲已经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这一点确信不疑,也由于他深信历史学的任务就是书写这个(欧洲)体系的历史,故而他可以免于面对德罗伊森受到的那类威胁。^[43] 德罗伊森似乎对各种利益和认同之间的冲突更为敏感,相应地,他更加能够将多样性视作一个问题;他承认多样性是合法的,但同时也坚持要对其加以抑制。^[44]

态度3放弃了表述一个客观的宏大叙事的任何希望(即对作为整体的“大写的历史”的权威性叙述),然而它却依然在历史学这一事业本身的层面上保留了融贯性的信念,这里的统一性可被视作来自于对共同的方法和目标的服膺。态度3是20世纪历史学界(1914—1991)中占主导性的立场的理想化版本。^[45] 在一战——显然没有人从中得到任何益处——的肆虐之后,大部分的职业历史

(接上页)pp. 113-114, 236-238。但是,德罗伊森从理论层面上承认解释的多样性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在实践上接受它:无论作为个人还是历史学家,他都是一个极为虔诚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关于这点,以及关于他在德国历史传统中的“异数”地位,可见 MacLean, “Johann Gustav Droys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1, 1982, pp. 347-365。

[43] Ranke, “The Great Powers” (1883), trans. Hildergarde Hunt Von Laue, i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p. 65-101, 特别是 pp. 99-101。在这里,兰克认为,“世界历史并不像它乍一看来那样呈现为混乱不堪的动荡、战争以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毫无章法的前后相继”(p. 100)。兰克对于历史中基本的统一性的发现,是受到他坚持将欧洲历史视作世界历史这一点的支持的,这是19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中所盛行的。关于兰克的普遍主义观念,可见 Krieger, “Elements of Early Historicism: Experience, Theory and History in Rank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4, 1975, pp. 1-14, 特别是 pp. 9-14。关于德罗伊森对于由列强所组成的欧洲体系这一概念的拒斥,可见 George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rev. ed., Middletown, CT, 1983, pp. 106-107。

[44] 见 Droysen,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sec. 73, p. 44。他说:“即使是最为狭小的人类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奋斗与活动都有一个进程、一部历史,并且对于涉及其中的人来说,它们都是历史性的。家庭的历史、地方的历史、专门的历史都是如此。然而,超出所有这些历史之上的,是‘大写的历史’。”

[45] 在 Peter Novick 的 *That Noble Dream* 中,作者总体上支持我的20世纪的职业历史学家(至少是美国的职业历史学家)大都遵守态度3这一观点。我可以撰写一篇详细的论文来证明为什么是这样,不过在这里我仅仅想指出以下几点:(1)诺维克确定了对学科自主性的坚持在历史学界是广为接受的这一点(见361—411页)。对自主性的坚持也许是态度3的最典型的特征,鉴于它暗示了历史学家总体而言能够在不受无关的、外部的污染的情况下取得某种对历史的观察,而并不被要求真的这么做。(2)他确定了,历史学家具有某种普遍的、然而一直受挫的对于历史解释可以达到“趋同”这一点的关切(这遍及书中各处,仅以206—207页、320—321页、438页、457—458页为例)。对于某个单一的、权威的叙事的愿望,以及这一愿望永不会如愿这一点,对于态度3来说都是确定无疑的。(3)他确定了碎片化被广泛视作一件坏事这一点(见577—599页,以及书中其他各处),而这暗示了单一的、权威的叙事是一件好事。(4)他确定了“对客观性这一理念与理想”的长期坚持(第1页),而历史学家们非常愿意承认这是永远无法被实现的。又一次,宏大叙事被放置到了理想的层面。

学家们不再将他们的任务视作解开那个神圣的符码,或者讲述某个关于进步的伟大故事。即使许多人依然相信历史在本质上是充满善意的,然而他们也不再视描绘这种善意为历史学家的任务。^[46] 态度 3 具有这样的优势:它允许历史学家皈依某种独一无二的理念,但并不同时要求这个理念在某些具体的历史内容中得以体现。

然而态度 3 是极其悖论且充满紧张感的。在对作为一个独一的、融贯的事业的历史学的信奉背后,对客观的宏大叙事的期盼依然如幽灵般盘旋着——即使这种宏大叙事无法为人道出。鉴于德罗伊森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并且依然相信一个“为许多目的,并最终为那个至高无上的目的所驱动的道德世界”,故而从是否与态度 1 和态度 2 划清界限这一形式上看,我们无法最终将他视作体现了态度 3。^[47] 在史学理论家中,柯林武德是态度 3 的最佳表现者,并因此最好地展现了态度 3 的内在矛盾。(需要承认,我们也同样可以观察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或者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他们也像德罗伊森和柯林武德一样将注意力放在了主观的维度——即历史学家的思维上。^[48] 然而柯林武德是他们中思想最为明晰的一位,并且他的明晰就使得他能暴露出在别人那里被隐藏起来的了的东西。^[49])

[46] 让我们想想韦尔斯(H. G. Wells)的 *The Outline of History, 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 (2 vols. New York, 1920, reprint. 1921), 它显然不符合上述观点,特别是第 41 章《论世界不可能统一成一个知识与意志共同体》(Vol. 2, pp. 579-589)。通过职业历史学家对韦尔斯的窘迫的回应,他们自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一直在展现他们的信念——只不过这类善意无法在历史学中被描绘。

[47] Droysen,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p. 15. 还可见 Johann Gustav Droysen, *Vorlesung über das Zeitalter der Freiherrskriege*, 2 Aufl., Vol. 1, Gotha, 1886, p. 4。他说:“我们的信念给予我们慰藉,它让我们知道有一双神圣的手支持着我们,让我们知道它指引着大大小小的命运。历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证明这种信念:它正是由此成为一门科学的。它在那混沌中找到方向、目标与计划。”吕森强调了德罗伊森对黑格尔式的、关于自由的宏大叙事的信奉,见 *Begriffence Geschichte*, pp. 126-130 等。

[48] 见 Wilhelm Dilthey,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Rudolf Makkreel and Frithjof Rodi, Princeton, NJ, 2002, orig. pub. in German, 1927。与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1933, 特别是 pp. 92-96, 以及 Michael Oakeshott, “The Activity of Being an Historian” in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62, pp. 137-167, 特别是 pp. 166-167。

[49] 对于柯林武德的整体哲学以及他对针对历史学的特定理论引发了许多有趣的理论上与诠释上的困惑,我无法在这里涉及了。在对柯林武德的作品讨论中,读者可参见 Louis Mink,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Bloomington, IN, 1969), W. J. 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The Hague, 1981) 与 William H. Dray, *History as Re-enactment: R. G. Collingwood's Idea of History* (Oxford, 1995)。

关于历史学,柯林武德给出了两条关键的“态度3”式的宣言。职业的历史学家们很易于亲近这两条宣言,因为它们符合20世纪的史学家们“一直以来”对他们事业的构想。

首先,柯林武德宣称,历史学的融贯性扎根于史学家的心灵之中。更概括地说,柯林武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康德式的。康德接受了大卫·休谟的关于我们无法感知因果性的断言(尽管我们可以感知到惯常与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在空间上的接近、时间上的相继以及恒常伴随)。休谟的看法引发了某种彻底的怀疑主义的威胁;对此,康德的回应是,因果性不是从经验中可被发现的,而是我们心灵中的某种构成性原则。人所共知的是,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书中攻击了消极的“剪刀加糨糊”式的史学,并且认为那些依靠档案来提供融贯性的史学家们将会无尽地等待下去。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正是在将康德在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施之于历史学。^[50]

其次,柯林武德不断强调历史学的“自主性”。^[51]他提到自主性时,实际上指的是两种不同的看法。首先,他关切地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在与“史料”的关系中保持自主性,对过去作出自己的决断,而不是依赖“史料”的所谓权威性。这种强调,就是融贯性根植于史家心灵之中的另一种说法。然而,柯林武德笔下的“自主性”也同时指向另一种看法,即史学家应该在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保持独立。在这里,柯林武德的论点是,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拥有它自己的、经过长期试错过程而得出的家法(与其他学科的法则不同)。^[52]我们可以发现为何他要强调历史学应该在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保持自主性,因为只有坚持历史学拥有清晰的边界和一套自己独特的法则,我们才可以期待历史思维能带来融贯性。换言之,融贯性的主观化——即将它重新置入历史学家的心灵中——为历史学是一个自主的事业这一论点添砖加瓦。

然而,在许多地方,柯林武德削弱了、甚至直接否认了历史学应是一个前面所说意义上的自主的事业这一观念。比如,他在其《自传》中坚称,站在五十多岁的角度回看,他这一生的工作“主要是尝试在哲学和历史之间建立一种和睦

[50] 《历史的观念》一书的“后论”中的许多篇幅都是为了发明这一点。见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rev. ed., with Lectures 1926-1928, ed. W. J. van der Dussen, Oxford, 1993, pp. 205-334, 特别是 pp. 266-302。另一个更扼要的版本可见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1939), ch. 10, “History as the Self-Knowledge of Mind”, pp. 107-119。在《历史的观念》中,柯林武德多次提到了他的理论中的康德源头(pp. 60, 236, 240)。

[51] 还有几处与此相关的段落,可见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p. 109, 136, 156。

[52]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p. 210, 231。

的关系”^[53] 当时,柯林武德的哲学论敌们鲜明地区分了历史问题(如:亚里士多德关于责任的理论是什么?)和哲学问题(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合乎真理吗?),并且只将后者视作重要的(第 59 页)。柯林武德抨击了将这两桩事业分离开来的做法。并且,他进一步主张:“20 世纪哲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思考 20 世纪的历史学。”这种主张与另一种他期望的和睦关系——即理论与实践的和睦——是分不开的(第 79 页、第 147 至 167 页)。他的立场是,不仅哲学应该是历史性的,并且历史也应该变为哲学性的;另外,二者的书写都应该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因为,他强调,各种各样的事件打断了他作为一个超脱的职业思想家的状态,而驱使他卷入其中(第 167 页)^[54]

在《历史的观念》中,柯林武德对历史学自主性的削弱并不那么明显。^[55] 然而,这种削弱还是清楚地摆在那里的。比如,显示在他的另外一个否则就会使人捉摸不定的主张中:即历史学是“对过往经验的重演”^[56];这种措辞较之仅仅“重思”,似乎意图在更大程度上强调历史学家的能动性。相似地,他的主张——“每个当下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过去,且任何对这一过去的想象性重构,都旨在重构这个当下的过去”——暗含着某种破坏性的因素,并潜在地推翻了他更加保守的断言——“一切历史都必须自洽。”^[57]

态度 4: 存在一个独一的“大写的历史”这个假设无法继续维持,无论是主观上作为某种事业,还是客观上作为某种实际、在现在或是将来被讲述的宏大叙

[53]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p. 77. 后文中引用《自传》的地方,页码将直接在文后标出。

[54] 在《自传》的这一章节中,柯林武德分辨了三种“柯林武德”,一种是作为“职业的思想家”而存在,另两个则分别信奉理论与实践,并且鼓动它们二者的统一。

[55] 阅读柯林武德的历史学家们通常对他的《自传》不加注意。考虑到他们持有的态度 3 对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的偏好,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柯林武德对学科自主性的反对常常被忽略。比如,那个常与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波考克(J. G. A. Pocock)等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就部分地将柯林武德阅读成支持学科的“自主性”,并以此受到鼓舞。见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8, 1969, pp. 3-53。波考克曾写道,历史学和理论之间的交往会导致一种伪历史学,所以它们应该像猫头鹰与老鹰一样“置身于另一方的航道之外”,或者如他在另一个比喻中所说的,它们应该像夜晚航行的两艘船,可以互相传送消息,却始终在完全不同的航程上。波考克的这种态度,其实是对柯林武德的一种尖锐的反对。见 Pocock, “Political Theory, History, and Myth: A salute to John Gunneill”, *Annals of Scholarship*, Vol. 1, 1980, p. 23, p. 24。在诠释学看来,解释者在他们的解释物中发现的永远是他们准备看到的東西。在此,这种看法似乎是正确的。

[56]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p. 282-302.

[57]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p. 246, 247. 请着重注意 247 页。

事。由此,一种可靠的历史学会质疑独一的“大写的历史”这个假定。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容纳态度1、2、3。态度1规范性地、态度2与态度3探索性与反讽性地分别预设了一个独一的“大写的历史”。

态度4不仅包容其他三种态度,并且也对它们提出质疑。它似乎可通过对表1的思考而被深入地理解,这份表格暗示了各个态度之间的亲密性。作为理想型,这四种态度各不相同。然而在实际中,它们相互之间逐渐转化,彼此共存,后一种观点将前一种观点包含在内。态度1要转化为态度2,只需对“大写的历史”可在当下即被道出这一点有些许怀疑即可,正如上文所述赫尔德与施罗泽之间的例子所呈现的。^[58] 态度2若要转化为态度3,只需对“大写的历史”可以在将来被道出这一点有些许怀疑即可;想想兰克,他在同一篇残篇中分别写道,讲述“大写的历史”是“尚未达成的终极目标”,以及“理解整体……永远是我们的理想”。^[59] 相似地,在柯林武德那里,对历史学自主性的强调在即使面对永远无法道出客观的宏大叙事这一情况的时候,依然维护了主观的融贯性;但当这种强调被推演到一定程度,就会落入这样的观点:历史思维所处的时刻与过去本身的时刻同样重要——甚至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被现在的视角所重构。简而言之,这几种态度存在着某种概念上的不稳定性,而将一种类型的态度推入另一种、或另几种类型中。

更精确地说,除了态度1之外的三种类型都具有某种概念上的不稳定性。态度1是唯一一个自洽(self-consistent)的类型。它的来源是那些最早曾是地方化的、且以神圣经典为权威的一神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只要信仰的合法性得以保证,态度1似乎就没有理由瓦解。然而其他几种态度就不同了。态度2在下面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已,即“更多的研究”可能永远无法得出客观的普遍历史,和我们已经知道客观的普遍历史,或至少已知道其轮廓——这一观点如启示录或金科玉律般被坚守。态度3则徘徊在对历史学的学科技艺的自豪,与这些技艺可能永远无法揭示客观的普遍历史所导致的不安二者之间。至于态度4,它处于皮浪式的或蒙田式的怀疑主义的困境中,甚至奋力地怀疑自己本身的怀疑主义。从态度3的角度看,态度4与融贯的思维方式——即合法的历史学的思维方式——相抵触。另一方面,从态度4的角度看,我们不应该根据先验的理由而排除任何理解过去的模式,无论这些理由源于方法论还是本体

[58] Shlözer, *Universal-Historie* (见本文注23), Vol. 2, “Vorbericht”.

[59] Ranke, [Die Notwendigkeit universalgeschichtlicher Betrachtung] (见本文注26), p. 297.

论。由此,态度4并不反对(比如说)态度3,除非态度3试图排斥态度4。然而态度4永远处在掉入这样或那样的独断论的危险之中——要么是独断地坚持“没有一个独一的‘大写的历史’”这个观点(这种看法本身也是一个关于“大写的历史”的总体特征的陈述),要么独断地拒斥学科的标准和惯例。

本文的关注点当然是在概念的预设上。那些对于历史学的制度基础的研究也许会展现出一幅更为色彩斑斓的图景,然而我的主要观点在某种制度层面上看似同样合理的。心智生活的制度结构主要包括了职业组织、学科期刊和大学的院系机构;而所有的这些都在历史学家们从事的是一个独一的事业这一预设下获得智识上的合法性。我对此的看法是,在当前的境况下我们应该看到,制度结构和使这些结构正当化的预设,既像它们一望而知地那样是知识生产的支柱,也同样对其构成了限制;并且,我们还应该严肃地考虑这些限制的性质。

表1 四种关于单一的“大写的历史”的态度

态度1:存在一个独一的“大写的历史”,并且我们现在就知道它。	态度3:存在一个独一的“大写的历史”,即自律且融贯的历史学学科。
态度2:存在一个独一的“大写的历史”,但只有在更多研究完成以后,我们才可以知道它。	态度4:独一的“大写的历史”并不合理,然而它可以被包容。学科边界的跨越及方法论上的超越可能是合理的。

历史学终究是一项独一的事业这一预设,会产生这样的偏见:更青睐那些由信奉存在着独一的、自主的历史思维模式的历史学家所写就的作品。这种思维模式是一种追求“历史和历史学职业”的“统一性”的路径、甚至方法,即便在历史学的各种主题层面上有着某种明显的不统一(在此我涉及了美国历史学会于1992年12月召开的年会的主题^[60])。它的目标是将历史学的对象“历史化”——也就是说,使它们服从于某种独一的历史思维的方法。对于统一性的预设还造成了一种偏见——排斥那些不以自律的历史学的方式,而是致力于以其他的理解模式来思考过去的作品。就历史学如此这般践行与其他理解模式的联系而言,它是为了历史学而将那些模式“挪用”。我并不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否则就与我反对用先验的标准判定学术作品这一点不一致了。正相反,因为

[60]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rogram of the One Hundred Seventh Annual Meeting*, December 27-30, 1992, Washington, D. C., p. 40.

我们很久以来一直持有那种“自主”的观点——如态度 2 与态度 3,我建议我们需要思考边际回报递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生产新鲜的且令人惊奇的知识变得越发困难这一现状。这是一个建议,而不是那种涉及事实的坚硬断言,毕竟任何科学的未来从其本质上说都是无法预测的。^[61]

为了历史学的局部去学科化,我们还可以提及其他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大部分都曾被阐述过——有时还相当详细,但是基本都是在历史学家不会关注的语境下。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特别针对历史学,提出了他所谓的“当下我们学科的过分产出”的观点。他认为,“……我们都很清楚……不计其数的书籍和论文每年都在被生产出来,而要全面地了解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62]安克斯密特认为,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偏离了关注于“树干”的“西方历史编纂中的本质主义传统”。相反地,我们可以发现某种将我们拉向边缘的“拉力”,这表现在历史学不再以对“意义”(在法语中,这个词是 *sens*,它同样可以表示“方向”)的关注为其形式,而是转向那些曾被视作“注脚”的过往的方方面面(比如心态、性别等等),并且不再给予历史的整体规划以重要性。^[63]

在历史学之外,还有哲学上的论证路线——比如,这在雅克·德里达早期作品的某些方面得到了令人瞩目的表达——对于各个学科所普遍要求的统一性而言,这种论证路线显然有其意义(我尤其想到了德里达“原初差异”或“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部分地视作对趋同的反对)。^[64]分析哲学家尼古拉斯·莱彻(Nicholas Rescher)认为,“定向的多元主义”(orientational pluralism)应该在哲学中占据合法地位,这一概念对于历史学中对“综合”(syn-

[61] 当我最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写下上述论断的时候,我并没有预见到某种福柯式的对(我们或可称为)“范式思维”的信奉会到这样的程度,在历史学的一些部分中那么有影响力。这种信奉具有的独断论色彩标志着它成为了某种态度 1 的反转。

[62]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8, 1989, p. 137. 已收入本读本。

[63] *Ibid*, p. 149. 关于安克斯密特对“结构的拉力”(the pull of the frame)与“记号”(notation)的反思,可见其“The Reality Effect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he Dynamics of Historiographical Tropology”,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1994, pp. 150-153, 157. 关于“符号”的概念,可见 Roland Barthes, “The Reality Effect”,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1984, pp. 141-142.

[64] 特别见 Jacques Derrida, “Différance”,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1982, pp. 1-27. 原初差异的概念与从德里达作品中(我认为是错误地)得出的极端严格的字面含义是不同的。

thesis) 的关切,似乎也像它对于哲学中对“共识”(consensus)的关切一样适用。^[65] 政治学家马蒂·多甘(Mattei Dogan)和罗伯特·帕赫勒(Robert Pahre)在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学科的“杂糅”——而非学科内部的专门化或学科之间的统一化是目前最为可靠的通向全新知识的途径。多甘和帕赫勒的论点暗示了混合或杂糅模式与继续保持学科性二者的共存。^[66]

所有的这些看法都指向了某种比一般的历史学、甚至人文科学更宽阔的东西。它们指向了一种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广泛认定为“后现代”的文化状态。这里不是考察那些为解释“后现代”这个称谓与“后现代”的实质而产生的汗牛充栋的文献的地方。^[67] “后现代”这个称谓本身显然并不令人满意,但是它在某个特定时刻却又不可或缺。在整体上对其进行定义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下依然如日中天的社会和文化境况中的一个特征,在人们一度视为“后现代”的东西中颇为扎眼。这个特征就是多样性的并置——各种相互竞争的认同的并置。情况可能并不是目前的社会与文化的境况变得比以前更明显地具有“多样性”了,而是当今的交流模式将多样性无比接近地放在我们面前,以至于至少在那些未由多样性而引发战端的社会里,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显著的差异和分隔。

被并置起来的社会多样性与被并置的学科二者是颇为类似的。在这两个情况中,我们处理的都是边界问题——我认为,边界是无法抹去的。对于学科的自主性诉求的怀疑(这是“对宏大叙事的怀疑”最终会导致的),意味着对于边界的疑问而非否认。简而言之,我的论点并非是要对各个学科进行统一——因为“开放”也有界限。通过站在其他学科的从业者的立场上和他们论辩而获得的经验,我们就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们的论辩模式,我们就更不会认为不同的论

[65] Nicholas Rescher, *The Strife of Systems: An Essay on the Grounds and Implications of Philosophical Diversity*, Pittsburgh, 1985, p. xi, pp. 276-277.

[66] Mattei Dogan and Robert Pahre, *Creative Marginality: Innovatio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al Science*, Boulder, CO, 1990. 还可见 Clifford Geertz, “Blurred Genres: The Re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1983, pp. 19-35。“模糊不清的体裁”也许是误导性的,鉴于“模糊”也许暗示缺乏明晰性,而“体裁”暗示了转变仅仅是某种文学模式。

[67] 最为中心的文本——如果中心是一个合适的说法的话——也许是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对于“后现代”这个称谓的各种用法的尝试性探究,可见 Allan Megill, “What Does the Term ‘Postmodern’ Mean?”, *Annals of Scholarship*, Vol. 6, 1989, pp. 129-151。

辩模式之间可以足够兼容,以至于可被某一个人同时采用。^[68] 并且我们还可以知道,只要其他的论辩模式是成熟的,同样也可以为知识做出贡献。由此,我的观点毋宁说是:我们需要跨越边界,暂时寄居于其他领域内,尝试着使用或至少理解外来的语言(一项不同于翻译的事业),同时历史学内部应该明确地承认这类构想是有其需求的,并以此取代职业化的历史学拥有良好的吸纳能力这一误导性的观点。^[69] 我的论点也可以说是要创造一种混合国家,或许像目前的安道尔^[70]那样,将现存的国家糅合在一起。

根据上文得出的四种假定

鉴于上文的讨论并未止于过去——无论是多近的去,而是在现在与将来,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指示性的维度。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科学与学术研究”这个问题,唯一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从事它;因为答案本身永远都是一种博彩。然而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似乎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指示性的假定。并且,这些假定都或多或少地与当下的境况密不可分(虽然我的目的不是对当下的境况给出权威性的描述,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

1. 多样性的假定:“永远不要假设存在着一个独一的、权威性的历史方法或主题”。

态度3下的历史学引发了某种现象,这种现象的最使人心醉神迷的形态就

[68]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某位大学的行政人员关于终身教职、升职与书评制度的这番评论:“我们很少意识到‘多文化’的紧张不仅存在于种族的事务上,还有学科之间与学科内部……我对不同学科的教职员工的世界观会如此不同感到十分惊诧。”见 Raymond J. Rodrigues, “Rethinking the Cultures of Disciplin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9 April 1992, pp. B1-2。

[69] Sharon Traweek, “Border Cross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Science Studies and among Physicists in Tsukuba Science City, Japan”, in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ed. Andrew Pickering, Chicago, 1992, pp. 429-465. Traweek 关于边缘性的、或者处于 *bachigai* (在不合适的位置) 的处境的主题, 远比她的文章题目所提示的宏大, 她提供了整个一条知识航线。关于对边缘性的关切可得到的认识论益处, 见 Sandra Harding, “After the Neutrality Ideal: Science, Politics, and ‘Strong Objectivity’”, *Social Research*, Vol. 59, 1992, pp. 567-587, 特别是 pp. 577-585。

[70] 安道尔位于法国与西班牙两国的国境线上。根据目前的安道尔宪法, 共设两名大公为其元首, 分别由法国总统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Seo de Ugel 地区的天主教主教担任, 为虚职。安道尔的国防由法国与西班牙共同担负。——译注

是它对“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诉求,而这又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个名字最为紧密地连在一起。布罗代尔将自己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视作是对这种类型的历史的“写作尝试”。^[71]然而对“总体史”的狂热不可避免地促成了它的对立面。^[72]《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杂志是这种追求统一性失败的最佳纪念碑。我们也会想到,《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本身最终是靠文辞上的勃勃雄心拼合在一起的。^[73]我们还会想到布罗代尔后期的作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部汇聚了众多并不怎么相关之物的作品。^[74]由此,毫不奇怪的是,历史学的观察者们指出,历史学的“多样性”和“多产”,以及从“一个历史”到“多个历史”(from ‘history’ to ‘histories’)的转变已经屡见不鲜了。^[75]

多样性受到激发的原因部分来自于:社会的变化将那些对至今仍被忽略的研究主题有些兴趣趋向的人领入历史学这个职业中。比如,来自于 WASP^[76]群体之外的人和那些双亲被排除出政治实践之外,且穷其气力以被美国社会同化,在美国社会取得成功的人,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重要方式促进了社会史在美国的出现。历史学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同样与更多的女性进入历史学这一职业有着明显的关系。^[77] 曾被排斥、被挫败的群体认为新的研究主题更吸引他

[71]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iân Reynolds, 2 Vols., New York, 1973, Vol. 2, p. 1238.

[72] 以其自主性自矜的态度³也是如此。然而如果历史学的自主性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有“思想史的自主性”(见 Leonard Krieger, “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4, 1973, pp. 499-516)? 而如果思想史的自主性是一种价值取向,那么所有其他的历史——如现代早期法国史或现代晚期美国史又为什么不可以呢?

[73] Hans Kellner, “Disorderly Conduct: Braudel’s Mediterranean Satir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8, 1979, pp. 197-222)一文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篇对某些书评的再评论)。本文后又收入 Hans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WI, 1989, pp. 153-187。

[74]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trans. Siân Reynolds, 3 Vols., New York, 1981-1984.

[75] 保罗·韦恩说:“‘大写的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历史’”(当然,这是对科泽勒克看法的反转,前文中已提及,后者认为对 *Geschichte* 一词的“集合单数”用法是18世纪晚期才发生的)。见 Paul Veyne, *Writing History: Essays on Epistemology*, trans. Mina Moore-Rivoluceri, Middletown, CT, 1984, p. 26。另外,弗朗索瓦·傅雷认为,为了克服目前的“历史学的多产”这一问题,应该从“叙事史学”转向“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见 François Furet, “Introduction”, in *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 trans. Jonathan Mandelbaum, Chicago, 1982, p. 16。

[76] “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盎格鲁-撒克逊种的白人新教徒。——译注

[77] 关于女性与历史写作(无论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的问题,可见 Bonnie G.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Men, Women,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Cambridge, MA, 1998。

们,这部分是因为个人的和家庭的经历使得他们更易于接受这些主题,而那些早期的历史学家们则关注的是相对小范围内的上层政治人物。

对于研究者来说,有一些可以利用的策略来应对这个事实:他们在职业中处理的主题目前以某种“明显”的方式与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和经历联系在一起(早先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因为社会差异性的程度更低)。一种策略是同化。在坚守(态度3标准下的)历史学的自主性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们也许真的可以承认他们的社会抱负,然而他们却也要宣称,在他们的史学研究中“客观性”与专业精神并未有所动摇。这样的话,什么都没有变,至少没有显著的变化。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策略。它认为应该继续坚持专业精神,但却极力地想要改变“宏大”叙事,或至少是“主导”叙事,并通过吸纳此前被排斥的主题——如性别——对宏大叙事做出改进。那些采纳这种策略的人甚至可能声称,他们正在制造的最终是某种关于过去的权威性描述——“那完整的故事”。同样地,这种策略依然清楚地停留在态度3的界限内。让我们继续“性别”问题的例子。更进一步的跨越发生在从“妇女史”到“女性主义历史”中;后者所要求的更加是非专业的权威而非专业性的权威。向女性主义历史的跨越包括了对已被承认的教条的接受,如态度1和态度2那样;另外,它还牵涉到某种与过去以及与自身境况的辩证性的关联。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很易于将其视作不仅归属于态度4,并且就其在认识论上依然保持可靠这一点而言,认为它归属于态度3。想想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就知道了。

2. 关于杂糅的假定:“永远在学科之外建立一个居所”。

从定义上来说(读者们应该认识到,我的论证大部分都是基于定义的),坚持学科自律的、持第三种态度的历史学实际上不承认除其自身之外的有关人类世界的合理论证形式的存在。在态度3看来,其他学科最多只是“辅助性”的。由此,在20世纪50、60年代,历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有了某种联系,这导致历史学引进了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而在70年代,相似的联系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发生,而这使得全新的、文化取向的看待过往社会的方式被引入历史学中。^[78]在这两个例子中,守护着历史学的学科界限并未被挑战,无论这

[78] 关于历史学与政治科学的联系,可见“Introduction”, in William O. Aydelotte, Allan G. Bogue, and Robert William Fogel eds.,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Princeton, NJ, 1972), 特别是 pp. 3-14。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系,可见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1989, 特别是 pp. 1-12 以及此书的第十章。

些跨过边界的突袭带来了怎样的洞见。^[79] 在态度 3 看来,其他的学科——因其与历史思维相异而可能揭示某些历史思维无法察觉的东西——并不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只是作为被引入历史学的方法与结论的来源,且并不从根本上对历史学有所改变。

比较而言,态度 4 对学科的和研究主题的碎片化这一情况的回应是:部分地或暂时地寄居于其他的知识共同体中。通过对理论与经验的结合而达成的跨学科混合体就此出现。通常,这些共同体是特别的和地方性的,依赖于其性质、地理环境和知识文化上的偶然性;它们被壁垒与等级所阻隔,而为交往与平等主义所滋养。然而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关切——暂时通过对一些共同的研究途径或研究对象的追求来统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在每个这样的团体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这种混合语言(lingua franca)不同于每个参与者所来自的特定学科的语言游戏(因为加入某个学科依然是进入多学科语言游戏的前提)。^[80] 新的类型的作品产生于每一个“混合”领域,与那些在具有贡献性的学科中完成的很不一样。

在人文学科中,转型性的多学科互动是不多见的。这种情况也许在物理学与生物学中更加典型,它们的学科界限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加动态,并且经常为了回应新出现的研究问题而有所调整。^[81] 并非偶然地,秉持态度 4 的历史学最广为人知的实例来自于科学史: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82] 作为一名转入科学史研究的科学家,库恩写作此书是受到了科学哲学中一些重要议题的激发。在破坏学科界限的同时,这部作品失去了学科确定性所带来的好处,它的勇气把自己带入了疑问性的区域中。然而部分地正因为此,它也带来

[79] 诺维克曾经对芝加哥大学的历史系有如下的讨论:“在 1987 年,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有整整一半的教师在学校的其他部门也有任职,而其余人的研究领域则没有这样的能量。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压倒性的大多数人还是不加迟疑地且明确地将自己定义为历史学家,并将其他的学科降低到从属性的地位。”见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 591, 注释 20。

[80] 在这方面,具有启示性的作品是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特别是第 13 章“Postmodern Science as the Search for Instabilities”, pp. 53-60。

[81] 我们可以思索一下芝加哥大学的这段声明:“自(1984 年)7 月 1 日起,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以及分子遗传学与细胞生物学系取代原有的微生物学系、生物化学系、生物物理学系和理论生物学系。”(“Biological Sciences Reorganization Reflects Current Areas of Study”,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7[Summer 1984], pp. 3-4., 转引自 *That Noble Dream*, p. 585, 注释 13) 可见对“科学方法”的共同信仰使得搬开那些——被视作仅仅是内在的——边界变得更加方便。还可见 Gérard Noiriel, “Foucault and History: The Lessons of a Disillus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6, 1994, pp. 567-568。

[82]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1970.

了非常重要的洞见；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 20 世纪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提出了如此多的新问题，并给出了如此多的探索老问题的新路径。^[83]

3. 关于虚构性的假定：“永远坦率地面对所有的历史作品中暗含的虚构性”。

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柯林武德认为，“纯然想象的各个世界之间既无法冲突，亦无须一致”——鉴于“每一个都是其自身的世界”，然而“历史的世界只有一个”。^[84] 总的来说，柯林武德的看法并不正确（因为这个唯一的历史世界就预设了无数个反事实的世界），然而作为对态度 3 式的史学的观察，它倒大体是正确的。在这种历史学中，坚持某一种思考方式，就很容易产生某一种历史研究的对象，并且给可能出现的历史解释类型设置了界限。柯林武德的看法进一步暗示，历史学家们离开“大写的历史”越远，他们作品的“虚构性”方面就越容易显现。

我在这里触及的，是我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无法被解决的一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需要被提出。历史/虚构这个二元对立就像很多其他的那些对立一样，没有什么分析的价值——尤其容易在辩论中被滥用，既被那些将虚构想象成“什么都行”的人滥用，也被那些对此种观点惊骇不已的人滥用。通常，在面对这样的二元对立时，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将其复杂化。即使是刚接触这个问题，这一点似乎也很清楚：在虚构性的总体范围内，我们至少需要对两种概念做出区分；我分别将其称为“文学性”与“虚构性”。所谓“文学性”，我指的是那些我们通常在虚构作品中注意到的文学技巧，它们在历史学——在其职业模式中倾向于培养某种中立的声音——中被视作不同寻常且值得怀疑的。所谓“虚构性”，我指的是历史作品中脱离了与经验实在相吻合这一意义上的真实的那些维度。在这种意义上，所有因果性分析都是虚构性的，

[83] 鉴于历史学作品的流行与否有时也变成了一个问题，在这里也许值得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售出的数量远远超过任何历史学家的“学术”作品，也超过了大部分的（除了少数例外）“流行”历史作品。自从 1962 年 3 月 5 日首次出版至 1991 年 1 月，它一共售出了 768774 本。不宁唯是，从众多作品的引用情况来看，许多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活跃于知识圈中的学者都曾阅读过，至少是部分地阅读过这本书。

[84]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 246. 当然，他没有提到历史世界是伴随着无数的反事实的世界这一点。对此，可见《观念》一书的第 4、6、7 章。另外，Geoffrey Hawthorn，在 *Plausible Worlds: Pos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i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1991) 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有趣的阐发，此书还涉及了历史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

因为它们都以反事实为预设。与此类似,所有的类型化都是虚构的,因为类型永远是对凌乱的实在的理想化。事实上,鉴于实在的复杂性,定义本身在这种意义上也是虚构的。为了避免错误,请诸位在心中牢记:因果、类型化、定义都是所有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中最为根本的部分。换言之,所有历史学都拥有某种虚构性的或思辨性的维度。

关于历史写作中的文学性维度,如海登·怀特、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史蒂芬·巴恩、汉斯·凯尔纳、菲利普·加拉德(Philippe Carrard)和安克斯密特这样的史学理论家都已经有过不少讨论。^[85]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现一小部分体裁上具有“试验性”的历史作品,它们被有意无意地依照态度4的模子而写出。^[86]在这些更具试验性的作品中,“声音”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另外还包括对平稳、流畅的叙事这一传统的离弃,以及历史学家公然介入正在进行的历史记述之中的趋向。这些具有文学性的试验暗示了一种深层的、本体论上的要点:历史客体本身就是一个“虚构性”的造物,是历史学家和她的读者们的心灵建构的客体。这并不是宣称“不存在那个过去”;而是,历史学家在她的作品中呈现的某个特定的历史客体是由历史学家(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建造出来的。

4. 关于理论的假定:“永远理论化”。

在一个不再相信单一的“大写的历史”的世界里,只有当历史学家能够在他们的作品中关注理论性的问题时,才可以唤起普遍性的兴趣。比如,美国不再将自己的历史视作对英国的政治史与宪政史的直接延续,在这样一个国度,比

[85]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Stephen Bann, *The Clothing of Clio: A Study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France* (Cambridge, 1984); Hans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hillippe Carrard, *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 (Baltimore, 1992). 还有安克斯密特,他的作品庞杂,故而无法在此处全部征引,对于他的主要立场的简介,可见“Th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Hywell Coleman ed., *Working with Language: A Multidisciplinary Consideration of Language Use in Work Contexts*, Berlin, 1989, pp. 57-81。

[86] 比如,可见 Jonathan D.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ew York, 1978);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 1983) 和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CA, 1987); 以及 Robert A. Rosenstone, *Mirror in the Shrine: American Encounters with Meiji Japan* (Cambridge, MA, 1988); David Farber, *Chicago '68* (Chicago, 1988)

如说,一个关于“1605年火药阴谋”(The Gunpowder Plot)的描述,只有当它引发了某种理论性的问题时才会有人对它感兴趣,而这种理论问题与发生在1605年的具体事件是无关的。然而同时,正如从“一个历史”向“多个历史”的转变,使得历史与虚构的界限成为一个问题,它也使得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界限成为一个问题。回想一下柯林武德的希望,即哲学会成为历史性的,而且相应地,历史学也会成为哲学性的。在充满了多样性和分裂的当下的时代,这样走运的综合和中间道路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可以设想在历史与理论之间的更为局部的、有限度的联系。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1)历史学能够为理论提供(局部的)帮助,并通过严肃的方式对理论性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87]无疑,不同的历史会根据不同的理论目的而被诉说。我们还可设想(2)历史学家对理论的更大关注;当然,有对不同的理论的关注以及对理论不同的关注方式。还可以设想(3)相比于当下的风格,某种更具反讽性的历史学。就对过去的理解来说,它更加谦卑、更具反思精神。就这点而言,这种历史学会更多地希罗多德、而不是修昔底德那里找到自己的源头。希罗多德在叙述梭伦对克罗索斯的忠告的时候,为他自己的、可能也为我们的历史写作展示了一条准则:要到那没有更多的历史可知的时刻,才能对历史有所确知。^[88]然而,这种历史较之现有的,将会更关注自我本身的预设、证据与观点,并且更愿意、更有能力将历史认识论应用于——那习惯于谎言与自我欺骗的——当下的问题。最后,鉴于现有的主流历史学庞杂宏富而完全无法把握,我们设想(4)某种更具沉思与评论姿态的历史学,它现在可以通过蒙田式的精神与随笔的形式,品评当下历史学对于我们的意义何在。持态度4的历史学以其静思和反省的姿态,不再致力于挖掘新的事实——即不再从事通常理解下的历史研究,而是致力于反思那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知”的事实的意义这一哲学任务。

[87] 对这一点最为显著的展现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对库恩来说,向理论提供帮助是一个有意识的目的。在此书的《导论:历史学的任务》中,他说:“如果我们将历史视作知识锦囊而非秘闻录或编年,那么它就能在我们现有的科学影像下制造出一次决定性的转型”(p. 1)。

[88] Herodotus, *The History*, trans. David Grene, Chicago, 1987, I. 32, pp. 47-48; I. 91, pp. 76-77; I. 5, p. 35. 这些段落需要被反复阅读,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洞悉作为历史学家的希罗多德。直到吕底亚的国王克罗索败亡之后,之前五代发生的事件的全部意义以及各种过去的神谕才变得明晰起来。因为人事无常而无法被预见,希罗多德将大事件与小事件一齐告诉了我们,而并不假定自己知晓之后的事情会怎样发展。

后 记

在化用麦考莱(Macaulay)的话时,兰克曾写道:“历史学以编年为起点,而以随笔为终点——也即,反思那些能够引起特殊共鸣的历史事件。”^[89]如兰克的观察所暗示的,这四种态度——在西方的传统中,从前职业化的编年史(依靠着假定已为人所知的普遍历史所具有的融贯性)到后职业化的随笔——已经在这个学科的传统中——登场。如果我们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来阅读这段传统,并敏锐体察其中的矛盾,就可以发现它那被压制的自我怀疑。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过是阐发了某些早已存于过去的东西。然而,是我们时代的(在“西方”与西方之外的)具体的社会境况促成了对传统的这番阅读,并使其变得有分量。

【本文原载 Allan Megill,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89] Ranke, “Neure Geschichte seit dem Anfang des 17. Jahrhunderts (28. Oktober 1867—10. März 1868)”, p. 412: “Geschichte beginnt mit Chronik und endigt mit Essay, das ist, in der Reflexion über die historischen Ereignisse, die dort besonders Anklang findet.” 似乎早在1853年的夏季学期的课程中,兰克就已经说过这段话。麦考莱的原话是:“历史以小说为始,而以文章告终。”见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Stern ed., *Varieties of History*, p. 73.

威廉·克罗农 著

熊旭辉 译

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

本文回顾了19世纪以来有关美国南部大平原环境史的多个文本，分别结合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时代背景，归纳出大平原历史叙事的多种情节模式：边疆史学派的进步主义、罗斯福新政派的悲剧论、反集体主义者的乐观主义、反资本主义者的衰退论，以及印第安人视角的衰退论等。作者力图证明，在不同的大平原历史文本里，同样的证据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叙述。大平原历史文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是被设计好的，故事要求的结局不同，开篇的场景也不同，看似客观的自然环境其样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由此看来，即便是环境史这样一个将大自然纳入研究主题的领域，叙事工具也深植其中。面对环境史的叙事困境，本文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历史作品不能公然否认已知的关于过去的事实；第二，环境史作品必须具有生态学意义，其叙事受到生物学和地质学等学科的基础性限制；第三，历史学家本身有其天然的立场，应当努力地预见批评，吸收对立陈述，并使叙事和已知的研究主题相符。

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美国历史学家，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在环境史、历史地理学、美国西部边疆史等领域成就斐然。著有《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编有《不同的立场：重思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等。

孩子们，只有动物才完全活在此时、此地。只有大自然才既不知道记忆也不知道历史。但是人——让我给你一个定义吧——人是会讲故事的动物。不论人走到哪里，他希望留在身后的既不是一片杂乱的足迹，也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故事里让人欣慰的一个个路标和记号。他需要继续讲故事。他需要坚持编故事。只要有故事就行了。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即将倒下的千钧一发之际，或是快要溺水身亡的时候，他一生的故事还是会迅速地在眼前掠过。

——格拉姆·斯威夫特《沃特兰》

开头就是一个故事，或者说，是从很多地方用很多声音讲出的许许多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指向千千万万个结局。

1979年出版了两本关于20世纪30年代席卷美国大平原的大干旱的书。两本书的标题基本相同：一本是由保罗·博尼菲尔德所著的《尘暴》(*The Dust Bowl*)；另一本是由唐纳德·沃斯特所写的《尘暴》(*Dust Bowl*)。^[1]两位作者实际上论述的是同一个话题，研究的文献也有很多是相同的，对大部分事实也持相同看法，但他们的结论却有霄壤之别。

博尼菲尔德的结语是这样的：

说到底，尘暴的故事乃是人的故事——有能力有才干的人，随机应变、执着勇敢的人。……尘暴袭击的人们不是受到挫败、丧失了希望的一贫如洗的人。他们是明天的建设者。在那些艰难岁月里，他们继续建设和经营他们的教会、生意、中小学、大学和他们的共同体。他们靠上帝更近了，对这片土地更加一往情深。他们过去都经历了艰难岁月，然而将来属于那些做好了准备抓住这个瞬间的人们……因为他们在那些艰难岁月中坚持下来，在土地上劳作，开发那上面的资源，上百万的人们有了更好的食物，在更卫生的地方工作，享用了更加温暖的住房。由于那些坚忍不拔的人们没有在一场危机中逃离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今天这个国家有了更好的生活水平。^[2]

[1] Paul Bonnifield, *The Dust Bowl: Men, Dirt, and Depression*, Albuquerque, 1979. Donald Worster, *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 New York, 1979. 关于一般的尘暴史学，参见《大平原季刊》第6期上的论文(*Great Plains Quarterly*, 6, Spring[1986])。

[2] Bonnifield, *The Dust Bowl*, p. 202.

但另一方面,沃斯特所描写的画面却显得阴郁一些:

尘暴是20世纪南部大平原生活中最黑暗的时光。这个名号就标示着一个地方——其边界像沙丘一样变化不定的一个地区。然而,这也是一个有着全国性、甚至全球性意义的事件。在世界粮食问题上广受尊重的权威乔治·博克斯特罗姆将尘暴的发生列为历史上人类铸成大错的三个最糟糕的生态灾难之一。……无法将其归咎于无知无识、人口过多或者社会混乱。它之所以到来,是由于那种文化按照人们设想的方式在运行……尘暴……是某种自觉地以主宰和剥夺土地上的全部财富为己任的文化的必然后果。^[3]

对于博尼菲尔德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主要是一场自然灾害,在雨水耗尽之后,人们就要为农田、自己的家园和生计而奋斗。在那场奋斗中的成功是个人和集体精神的胜利:大自然把一切弄得一团糟,人们将之清理干净。沃斯特的版本有很大不同。虽然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下过雨,但雨水的消失是因为一个半干旱环境的循环气候。尘暴的故事更其关系到人类之未能与自然相调适,而不是自然本身的失调。人类一连串的故意误解和侵犯最后导致了崩盘,追根溯源主要是文化原因。

不论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哪个解释,它为那些研究过去环境变化的学者们制造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确实对所有历史学家来说都是进退两难。就像历史学中经常发生的一样,这让我们感到困惑,即两位优秀的作者在看待来自同一过去的相同材料时,怎么会得出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但不同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结论。虽然他们所叙述的是同一范围的事件系列,其角色名单也基本相同,他们讲述的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在两个文本中,故事一直都是紧扣结论的,其中历史分析的效力大都由情节跌宕起伏的发展而来。所以最后我们必须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这些故事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比它表面上看起来的更难回答,因为它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在传统社会科学和后现代批判理论之间纷争不休的领域。作为一个努力将历史学分析传统和生态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其他领域融合的环境史学家,我对于我们如今所处的变动不居的理论立场深感不安。一方面,我研究的领域的基本前提是人类行为是发生在一个人际关系、过程和系统的网络中的,它们既是文化的,也

[3] Worster, *Dust Bowl*, p. 4.

是生态的。对于基本的历史范畴如性别、等级、种族，环境史学家会加上一个理论词汇，这样植物、动物、土壤、气候及其他人之外的东西就会成为不仅仅是人类历史，而且还是地球历史的协作者和共同决定因素。对于那些赞同我观点的学者，自然界的重要性、它对人类的客观影响以及人们反过来影响它的具体方式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它们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核心。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历史研究与科学界的同事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们的模型不论有多么不尽完善，仍在尽量模拟大自然的运作机制。^{〔4〕}

与此同时，环境史学家们也会牢牢坚持叙事的形式。当我们描述一个生态系统中的人类活动时，似乎我们总是在讲故事。^{〔5〕} 像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我们将过去的事件编排成因果序列，即故事，从而将它们整理、简化，赋予它们新的含义。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叙事是试图在一堆极其庞杂无序的编年史料中发掘出意义的主要文学形式。当我们选择了一种情节来整理我们的环境历史时，我们赋予了它统一性，这是大自然和过去都未曾如此清晰地拥有的。这样做，我们就跨越了自然界，而进入了紧张的人类价值王国。在那里，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后现代主义对叙事的攻击，那不仅对我们所讲述的故事，也对一开始激励我们的深层目的——试图弄明白大自然在人类过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

通过书写关于环境变化的故事，我们用一把修辞学的剃刀，将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因果关系切分为要包容进来的和要排斥在外的、相关的和无关的、强有力的和软弱无力的。在将故事和非故事分开的过程中，我们使用了最有力也是最危险的叙事文体的工具。叙事展现其对实在的见解时的权威性常常是通过掩盖大部分的实在来实现的，这是现代文学理论的老生常谈。叙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遮蔽了那些会削弱故事主旨意义的不连续性、省略，以及相互冲突的经验。无论它公开的目的是什么，它都不可避免地暗地里是权力的演练；它不

〔4〕 关于探究环境史的新兴学术议程的广泛讨论，参见“A Round Table: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March 1990), pp. 1087-1147

〔5〕 在整篇文章中，我将会交替使用“故事”(story)和“叙事”(narrative)，而不考虑两者之间可能的技术上的差别。对某些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哲学家来说，“故事”是一种限定的风格，然而叙事(narrative，或者拉丁语 narratio)是经典修辞学里涵盖面更广的一部分，它能够将时间的所有表现形式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编排好的完整的行动序列。我想对这两个词都作宽泛的理解，因为“讲故事”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一种我既要批判又要捍卫的活动。我希望一开始就把这一点讲明白了，即我并不渴望回归到那种以“伟人”的生平为中心内容的“传统的”叙事历史；而渴望历史学家们认识到，即使在那些几乎毫不关注单个的人的长时段历史中，讲故事也是必不可少的核心。环境史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并且我的大部分论点用在其他的例子上也同样合适

可避免地要支持一些观点,同时扼杀另外一些声音。一个强有力的叙事会将常识重构,从而使偶然变成必然,人为变成自然。如果这是真的,叙事就给环境史学家制造了一个特别的难题,因为人为和自然之间的界限正是我们最想研究的。博尼菲尔德和沃斯特两人关于尘暴的两个版本的差异,就如我对于自己史学技艺的理论支柱的不安一样,都显然和这个界限有关。〔6〕

文学理论的弊病在于写得太过抽象,所以即使是最简单的含义也变得难以理解甚至晦涩透顶。为了避免这篇文章陷入文学批评的迷雾,让我把它放在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平台上。我将会通过回到大平原调查历史学家是如何讲述该地区过去的历史,来考察叙事在环境史中的作用。我在这里提供的将不会是一个面面俱到的历史编纂学,因为我的文本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我会略过很多主要的文献。我会运用若干有关大平原的史书来探究叙事为所有历史学家带来的麻烦问题。一方面,我希望承认后现代主义给那些拥护“叙事的复兴”的人带来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我希望记载我自己的信念——它虽经锤炼却依然强烈——即叙事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横跨大西洋之后的五百年来看大平原,某些具体的事件似乎就会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长时段历史中凸显出来。如果我不将它们编成故事而是仅仅列一个简单的清单——这样做我不会完全成功,

〔6〕 在形成这篇论文背后的大量阅读不可能简单地附在一个论点或脚注里。以下是有助于我形成自己关于叙事的重要性和困难的看法的著作,包括:William H. Dray, *Philosophy of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1964; Robert Scholes and Robert Kellogg,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New York, 1966; 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New York, 1967;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1978; Robert H. Canary and Henry Kozicki, eds., *The Writing of History; Literary For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Madison, 1978; W. J. T. Mitchell, ed., *On Narrative*, Chicago, 1981;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1981;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haca, 1982;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1983;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3 vols., Chicago, 1984, 1985, 1988,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Ithaca, 1983; Arthur C. Danto, *Narration and Knowledge; Including the Integral Text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1985;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1986; Wallace Martin,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Ithaca, 1986; Louis O. Mink,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thaca, 1987;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1987; Kai Erikson, "Obituary for Big Daddy: A Parable" (未刊稿)。

因为描述过去时不用讲故事的方式实际上比看起来要困难得多——结果写出来的编年史可能会是这样的。

五个世纪以前，人们向西横跨大西洋。他们也带去了一些植物和动物。其中的一种动物——马——出现在了大平原。土著人用马来猎捕野牛。最终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人类移民也出现在了大平原上。人们之间发生了很多打斗。野牛群消失了。土著居民迁移到了保护区。新来的定居者为自己建造家园。家牛的数量在增加。定居者开垦了草原，种植玉米、小麦和其他谷物。铁路将人和其他东西运入运出。有时候因为降水不足，作物的收成不好。有些人放弃了他们的农场搬到了别的地方，其他人留了下来。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一场极其严重的干旱，还夹杂着沙尘暴。然后干旱结束了。很多人开始从地下抽水用于灌溉农田或日常生活。今天，大平原上的农民继续种植庄稼，饲养动物。有些人入不敷出。很多印第安人住在保护区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将会很有意思。

我相信任何阅读这个清单的人都会觉得它很奇特，就像一个小孩在不知道如何讲故事的情况下试图讲一个故事。我已经努力将这细节中的关联意义尽可能地除去。我以编年史而不是叙事的形式将事件呈现出来，以它们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简单地罗列。^{〔7〕}这不是纯粹的编年史，因为我只展示了大平原历史中我认为“最重要的”的事件。通过将重要的事件和不重要的事件分离开来，我实际上偷偷地把一些不是那么隐秘的故事带入了这份清单，所以诸如马的传入，大平原上的原始部落被征服等，在我表面上不讲故事的记述中形成一些小的叙事涡流。一部纯粹的编年史应该包括在大平原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不论大小，因此1623年9月的一场美丽的日落或1897年菜文沃思^{〔8〕}附近一个农场的挤牛奶的场景，应该和野牛种群的毁灭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占有同等显著的地位。

这样的文本连想都没法想象，更别提要造出来了，这解释了历史学家们钟

〔7〕 关于编年史和叙事之间的差别有更为充足的分析，参见 White, *Metahistory*, pp. 5-7;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p. 109-11; Louis O. Mink,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in *Writing of History*, ed. Canary and Koziicki, pp. 141-44; David Carr,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1986, p. 59; Danto, *Narration and Knowledge*; Paul A. Roth, "Narrative Explanations: The Case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27, 1 [1988], pp. 1-13.

〔8〕 Leavenworth(莱文沃思)，美国堪萨斯州南部一个小镇，最早由一批德国移民建立。——译注

情于叙事的缘故。〔9〕当我们遇见的过去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出现时,它对我们来说就变得不太容易识别。想要找出事情为何在那个时间以那个样子发生的原因是很麻烦的,而且想要评估事件的相对意义也很困难。事情看上去不那么相互关联,而且它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也变得模糊不清。最重要的是,在一部编年史中我们很容易丢失掉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发生的事件的线索。没有某种特定的情节来组织事件之流的话,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无从理解。

我们如何发现一个能让大平原的历史事实变得更加容易识别和理解的故事呢?可以用于我刚才载入编年史的所有事件的历史情节不可胜数,且它们不仅仅能从历史中,也能从所有文学和神话中找到。为了缩小选择的范围,让我来提供两大组可能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大平原的历史讲成是一个不断提高改进的故事,其情节主线渐趋于一个更加积极的结局——比一开始更加快乐、富足、自由,更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讲故事,即整个故事朝着一个更消极的结局发展——比故事刚开始的时候更悲凉、贫穷、更不自由,更糟糕。第一组情节可以被称为“进步的”,它的历史背景依托于18世纪启蒙思想的进步概念;另外一组则可以被称为“悲剧式的”或者“衰退论的”,其历史根源可追溯到反对进步的浪漫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如果我们观察历史学家对大平原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实际的书写方式,进步和衰退的跌宕起伏的线索在文章各处都会很明显。我们非常容易识别它们,这给我们即将进入的领域形成了一个警示。无论这些故事在对环境变化的描写上有多么引人入胜,它们的叙事形式与大自然的关联都不如它们与人类话语的关联那么大。它们的情节是一些深深根植于我们的语言中的文化建构,其回响远远超出了大平原。历史学家没有创造它们,而且我们对它们的熟稔促使我们把讲故事的模式塑造成符合它们的样子。假如把它们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的或意识形态的语境中,两组情节都不是单纯的:它们都有隐秘的议程,影响着叙事包含什么和排除什么。这些议程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即使是身为作者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完全控制它们。

以那些把大平原历史叙述成一个边疆进步的故事的历史学家为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毫无疑问是运用这种基本情节的最著名的人,对他来说这个国家的故事就重演了欧洲文明的上升阶段,它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民主

〔9〕 这里有一些更深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我将不予讨论,比如:我们如何识别构成一个“事件”之物以及我们如何划定它的边界。“事件”本身就是被我们用来编排它们的故事所定义和划界的,并且可能脱离了叙事的语境就无法想象。

和平等的社会。特纳目睹了美国土地由一片荒芜变为交易站再到农场再到新兴城市的转变,这场转变是这个国家核心的英雄传奇。^[10]倘若说有一种叙事是通过抹去其真实的主体来达到其结果的话,特纳的边疆就是这样的:拓荒者和“自由土地”之间的英勇遭遇,看上去之所以可信,只能是通过掩盖以一群人的自由换取另一群人的自由的征服而来。通过把印第安人变为这个进步故事的陪衬物,边疆情节让征服过程看起来自然,符合常识,不可避免。但说这些只是为了证实叙事的力量。在这一关于边疆奋斗和进步的故事获得经典的特纳式风格之前和之后的无数个版本里,它都成了最为古老而又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关美国历史的叙事之一。由于这个故事有能力把普通人变为英雄,把一场烽火连绵的侵略展现为一个通往文明开化的民主国家的史诗般的征程,它完美地满足了其所处的19世纪晚期的意识形态需要。^[11]

最终得到证明的是,比之这个国家的其他许多地方而言,大平原都不那么容易被边疆进步的故事所驾驭。特纳自己会说这个地区构成了美国农民的“第一次失败”,但这并未阻止定居者们通过边疆故事来叙述他们的过去。^[12]达科他地区的主要传教士之一威廉·罗伯特·哈尔主教在19世纪80年代预言,定居达科他的故事情节将会沿着移入、奋斗和胜利的上升线条来发展。他写道:

你也许正站在一片无人居住的荒野,脚踝深深埋在短时间焚烧过的草地里——下个月,一列混合火车会滑过荒地,停在这条铁路上某个决定设立城镇的地方。男人,女人和孩子会跳出车厢,把他们的牲口一股脑儿倒出来。而从那一刻起,建设开始了。这些开拓者的勇气和信念非同寻常。他们的精神力量仿佛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13]

对于哈尔来说,这种进步的视野是持续的和前瞻的,是对未来发展的预言,但是同样的模式也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回顾的视野。俄克拉荷马的一位早期的

[10]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20, p. 12.

[11] 我有两篇文章论及特纳作品的修辞结构: William Cronon, "Revisiting the Vanishing Frontier: The Legacy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18, April [1987], pp. 157-76; 以及 William Cronon, "Turner's First 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History," in *Writing Western History: Classic Essays on Classic Western Historians*, ed. Richard Etulain, Albuquerque, 1991, pp. 73-101; 还可参看 Ronald H. Carpenter, *The Eloquence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San Marino, 1983.

[12]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p. 147.

[13] William Robert Hare, 约1887年著,引自 Howard R. Lamar, "Public Values and Private Dreams: South Dakota's Search for Identity, 1850-1900", *South Dakota History*, 8, Spring [1978], p. 129.

历史学家路德·希尔可以置身于1909年回望19世纪90年代,说这是一个“给俄克拉荷马地区带来巨变的”十年:仅仅十年里,定居者就将印第安人未曾开发的“一潭死水”变成了“茂密的庄稼地,成群的牛,以及农业繁荣的广阔前景,这给旁观者带来了欢乐和惊喜,让他们看到文明的结果是创造了财富的奇迹”。〔14〕普通人将这样的描述视作在他们一生的时光中开展的伟大故事的实现。一位堪萨斯的城镇女居民,约瑟芬·米德尔考夫这样总结道:

在开拓海斯六十年之后,我可以写出几卷本关于它的发展和进步的书……我一人独享这份权利,能从舒适的家里,教堂里,学校里,铺好的街道上,树上,水果上和花朵上,看到它从原材料发展成为基本成形的产品。〔15〕

让我们更加抽象地来考虑这些小的叙事。它们讲了一个几乎是线性进步的故事,故事里人们在努力改造一个相对来说容易改造的环境。可能其间有一些小的挫折,但它们在叙事中的角色是用来衬托那些战胜困难的英雄们。社会很快就变得更加文明和舒适。这些故事的时间框架是简洁的,只限于一代人的一生,而且被放在了入侵的定居者刚刚占领印第安人土地之后的历史时期。我们作为读者,注意力放在了当地的事件上,即那些影响个人、家庭、城镇和其他小共同体的事件上。所有这些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历史性的框架工具都促使我们朝着这样一个结论前进,即这基本上是一个欢乐的故事。其间只是略有一点对消逝的旧世界的怀旧感伤的情怀,一丝暗中涌动的对正在退去的年轻激情和精力的暮年叹惋之情。

如果这些叙述者所讲述的是关于殖民移居的戏剧和拓荒者的勇气的故事,那么它也恰恰同样是关于演出这部戏剧的不断变幻的舞台的故事。堪萨斯小镇的转变不仅仅体现在新建的建筑里,还体现在它的成荫绿树、苹果园和花园里;俄克拉荷马的胜利繁荣体现在它的麦田、养牛场和钻油塔上。正如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很久以前提出的,一个故事的场景对于故事中所发生的内容来说,和对于组成其更加生动的情节和行动来说同样重要。实际上,伯克认为一个故事里的行动和其场景基本是一致的,他写道:“一个场景的性质就暗示了

〔14〕 Luther B. Hill, *A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Oklahoma*, Chicago, 1909, pp. 382, 386, 385.

〔15〕 Josephine Middlekauf, 引自 Joanna L. Stratton, *Pioneer Women: Voices from the Kansas Frontier*, New York, 1981, p. 204.

在其中所发生的行动的性质。”〔16〕

如果说,叙述者构建场景的方式和他讲述的故事有着直接联系的话,这对环境史来说有深远的意义,毕竟环境史是把过去的大自然的场景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如果大平原的历史是一个关于草场是如何演变为牧场、农场和花园的进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就需要为了必然达致成功的一直上升的情节主线而设置一个特别场景。同样重要的是,结尾的场景必须和开篇的不同。如果故事的结局是一片麦田,是改变地貌的奋斗的幸福结局,那么这个故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个地方先前的地貌在价值评判上必须是中立的或负面的。它必须是应该被改造的。

因此,并不意外,这些讲故事的人都是从一个几乎毫无可取之处的地貌开始叙述的。哈尔主教的达科他地区一开始被描述为“一片无人居住的荒野”,他的火车载着未来的定居者穿越了一片“荒地”。叙事就是这样通过把大自然转化为一处景色,而重估了大自然的价值,并且把几乎没有在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的印第安人推向边缘——或者,设计这个故事就是要淡化他们的角色。当路德·希尔的俄克拉荷马仍被印第安人控制的时候,它一直是“一潭死水”;而约瑟芬·米德尔考夫将尚未开垦的堪萨斯草原主要看作“原材料”。在这个例子中即使看上去如此中性的词——“原材料”——也被赋予了叙事的意味。实际上,它内里包含了进步发展的整个故事,其间环境从“原材料”转化为“成品”。正是这样,在我们努力理解大平原的环境和历史时,故事和场景纠缠在了一起——既互相纠缠在一起,又和侵入的政治以及文明进步牵扯在一起。

现如今,实际上,这些关于定居大平原的乐观主义的故事无论如何不是 20 世纪典型的历史写法。在边疆故事里,在一个半干旱的环境里定居下来而没有很多挫折和危机是不可能的。即使那些更喜欢以上升的情节线来写关于地区环境变化的故事的叙述者,也必须讲述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一个在即便不说是险恶也至少充满阻力的环境里所遇到的失败、奋斗和安居的故事。

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伯和詹姆斯·马林是采用这种叙事策略的最重要的两位作者,他们是 20 世纪上半叶描写大平原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历史学家。韦伯的经典之作《大平原》半个世纪之前出版,直至今日仍在印行。〔17〕它讲述了一个极大地改写了特纳式的边疆的故事。对于韦伯而言,大平原和英裔美洲

〔16〕 Kenneth Burke,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1969, pp. 6-7.

〔17〕 Walter Prescott Webb, *The Great Plains*, New York, 1931.

定居者在东部遇到的更为仁慈的环境有很大的区别。没有树,极度缺水,这个地区对文明的西进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以这种方式描述这个场景之后,韦伯用了一段揭示性的文字开讲他的故事:

在这块新的地方——平坦无垠,缺少木材,半干旱的地方——(定居者们)被“必要性之母”(Mother Necessity)^[18]扔进了一个新的环境里。人们是这样来陈述他们的困境的:密西西比河东边的文明由三条腿支着——土地,水源和木材;密西西比河西边的文明不是被抽走了一条而是两条腿——水源和木材,文明只能依靠一条腿——土地。所以它在暂时的失败中跌倒是不足为奇的。^[19]

我们很容易就能预见到,将会从这样的开头接下去的叙事:韦伯将会告诉我们这个文明是怎样摔倒然后又重新站立起来继续胜利的攀登。人类的创造是解决这些问题而推动故事前行的核心动力。和相对朴素的边疆叙事不同的是,韦伯的历史著作追踪了一个在充满阻力的环境与最后成功改变环境的技术创新之间的辩证法。尽管他的书篇幅超过五百页,而且在阐述论点时也出奇地细致入微,然而某些特定的重大发明标记了韦伯书中情节的转折点。因为缺水,人们只能从唯一可靠的水源,即地下含水层中取水,所以他们发明了简陋但是具有革命意义的风车。因为没有足够的木材来建栅栏阻止牛群进入玉米地,人们在1874年发明了带刺铁丝网,这一发明很快传遍了草原。这些发明以及其他发明——铁路、灌溉工具、分配水权的新的法律体系,甚至六发式左轮手枪——最终摧毁了野牛群,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畜牧王国,并毁坏了大平原的草皮而从事农业生产。

韦伯在结束故事时将大平原描述为“一片求生之地,大自然在这里以最倔强的方式阻碍人的努力。正是大自然的顽固驱使人做出了这些发明创造”^[20]。出于韦伯的叙事场景的需要,他的大平原风景看上去必须和以前那些边疆叙事者的有所不同。对于韦伯来说,这个半干旱的环境既不是无人荒野也不是荒地,其自身是文明的一个劲敌。这片土地身上的种种阻力是激发人类创造力的必不可少的刺激物。所以韦伯花费了比以前的作者更多的时间来描述大平原的气候、地形和生态,来称颂这些使得这个地区在美国历史中变得独特的特征。

[18] 可能源于美国谚语“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必要性是发明之母)——译注

[19] Webb, *The Great Plains*, p. 9.

[20] *Ibid.*, p. 508.

虽然此书是以我们在以前的边疆叙事中也能找到的成功改造后的土地的光辉形象结束的,但他绝没有贬低之前的“未开化”的土地。恰恰相反,后者作为一个对手越是不可战胜,作为其对手的人类就越是英勇崇高。在建立自己家园的奋战中,大平原的人民不仅证明了他们的创造性,更建立了一个漂亮地适应了当地环境带来的挑战的地区文化。

韦伯关于在一个充满阻力的环境中的奋斗的故事,成为了之后大多数关于大平原的环境史的核心。我们已经在保罗·博尼菲尔德的《尘暴》一书中遇到了其中一个版本。我们也可以在詹姆斯·马林在生态学上更为复杂精致的研究中发现它,在那里,从“森林人”到“草原人”的演化成为了大平原历史的中心情节。^[21] 马林的文章从外表看起来比韦伯的少了很多的故事性,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险恶环境和人类创造力之间的故事。马林书中的人一开始是一群不知道如何在没有树木的地方生存的定居者;最后,他们成为了“草原人”,将他们的文化引向“符合保持环境平衡的要求而不是去扰乱环境平衡”。他们在适应环境上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可以“不屑地指出森林土地的不足之处:缺乏草地、潮湿,而且其土壤呈酸性,被水浸透又贫瘠”。^[22] 这里的人类居民生活在一个仅仅几十年前还差点要毁掉的环境里。

这些情节的美丽之处在于,它以这种方式呈现当地环境的险恶,使得人类的奋斗和以前边疆叙事里描绘的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情节比起来,还要更加积极和英勇。我们注意力的中心仍然相对狭小,尽管故事情节的地理和编年语境已经扩大了。现在这个故事更多地是一个地区性的故事,所以一个家庭或城镇的历史,甚至是堪萨斯或俄克拉荷马的历史和作为整体的更为广阔的草原环境比起来,就显得次要了。时间框架也推进了,因此大平原的技术进步历史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由于故事情节依然是在欧裔美国人开始占领草场时开始的,时间框架并没有明确的后退。接触前的印第安人的历史不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最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的人类主体比以前各州和当地的边疆史的范围有

[21] 这些术语出现在一些著作中,如马林的代表作(James C. Malin, *The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 Prolegomena to Its History*, Gloucester, Mass., 1967),但实际上这个基本概念出现在他所有关于草原的著作中。还可参看 James C. Malin, *Grassland Historical Studies: Natural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a Backgrou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rence, Kan., 1950); 以及论文集 James C. Malin, *History and Ecology: Studies of the Grassland*, ed. Robert p. Swierenga, Lincoln, 1984

[22] Malin,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 p. 154.

了极大的扩大。这些新的地区研究不再把拓荒者个体和他们的群体作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而将它们的故事中心放在“文明”和“男人”上。那些让人们适应了大平原上生活的发明被纳入了更为广阔的“男人”和“他”对自然界的长期征服的故事中。没有任何聚焦于如此单一中心角色的叙事能够不带政治色彩。存在更多的被抹去的角色:有印第安人,还有妇女、少数民族、下层人民,以及其他所有被男人和文明所代表的集体之外的团体。叙事给他们留下了很少的空间,而为一个可以逃脱技术征服的自然王国留下的空间就更少了。这是一种关于进步的故事,无论得到它是多么艰难,那也是命运的必然;被它征服是常理和大自然所能期待的唯一结局。对于韦伯和马林来说,大平原从它和囊括了整个人类历史潮流的达尔文式的世界历史情节的关系中获得了意义。我们在这些故事里发现的上升的线索,实际上是和一个有着同样上升特点的更长的情节线索联系在一起的。不论那个更长的情节被表述为美国民族的缔造、西方文明的兴起,还是人类的进步,它依然把它的宏大气象引入了外部形式看起来更为有限的大平原历史中。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能被一部整整五百页都是关于风车和带刺铁丝网的发明这类主题的书所深深吸引。

但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讲这段历史,它的情节最终是下降的而不是上升的。我们称之为“衰退论的”或“悲剧式的”大平原史学的最早一批例子,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尘暴灾难之际。当时罗斯福新政式的解释居于主导地位,它解释说,在大平原上发生的灾难,是定居者们被这种一会儿完全适宜农业生产但一会儿又是灾难性的气候所愚弄了。在雨水充足的“好”年份,定居者数量增加了,对于边疆的持久的乐观情绪,让人们不愿意承认,干旱是在大平原生活中一直持续的现实。在这个版本中,大平原的历史变成了一种自我欺骗的傲慢和拒不接受现实的故事。只有以具有先见之明的科学家们所规划的强有力的政府行动,来鼓励大平原农民之间的合作,才能阻止未来农业的膨胀和沙尘暴的卷土重来。

这样一种叙事的经典的早期陈述,是一份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派遣的调查尘暴成因的委员会在1936年所做的《大平原的未来》的报告。关于这个地区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它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美国社会中寻求的稳步前进已经开始倒过来了。大平原并没有变得更加多产,反而减产了。它没有提高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反倒使他们更加贫困了。这里的人民充满活力又勇敢无畏,而且深爱他们的土

地。但他们住在这里却越来越没有保障了。〔23〕

我们不用看得很远,就能找到让这个美国成功的故事意外逆转的原因。大平原上的定居者,恰恰是没有做到韦伯和马林宣称的农业上的适应。如若不想让尘暴的灾难卷土重来,就必须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规划人员在描述他们这种和过去的权威观点有争议的结论时,这样说道:“显然,除非大平原的农业模式有一个长远的改变,一旦有效降雨不够的时候,这里还得需要更多的救济。”〔24〕

且不管这个描述在科学上和政治上有什么优点,让我们来想一想它在叙事上的寓意。新政的规划者们实际上认为,我们之前的故事中的上升式情节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本身也是造成20世纪30年代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尘暴的出现是因为人们一再告诉自己一个错误的故事,还试图把这个故事——开拓边疆——印刻在一片不能够支撑它的土地上。〔25〕大平原生态系统的环境节奏是循环式的,好年成和坏年成交替出现,一如沙滩上的潮涨潮落。问题是在此移居的人们坚持把自己线性的进步观,强加在这个循环的模式上。他们多年的乐观主义导致他们总是相信,在最好的年成的降雨量是一种常态,所以他们的农业种类和规模在干旱的年份就肯定维持不下去了。事实上,讲述错误的故事已经导致了严重破坏自然界的平衡。

根据这个解释,大平原历史的上升是伴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开始的,但是它的向上运动由于农民数量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然限制而变得问题重重。从那一刻开始,整个故事朝着一个高潮发展,自欺的人们的灾难性错误最终导致了危机和倒退。虽然这个叙事的地理和时间框架基本上和先前的进步主义情节一致,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韦伯和马林来说,大平原的环境虽然具有挑战性,但还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奋斗和创造力最终使它屈服于人类的意志。而在这悲剧性的大平原历史的早期新政的版本里,环境不仅仅有抵抗性,在一些基本的方面甚至是不可改变的。它最主要的特点——循环出现的干旱

〔23〕 *The Future of the Great Plains; Report of the Great Plains Committee*, Washington, 1936, p. 1. 关于这个报告,可参看 Gilbert F. White, “The Future of the Great Plains Re-Visited”, *Great Plains Quarterly*, 6, Spring [1986], pp. 84-93。

〔24〕 *Future of the Great Plains*, p. 1.

〔25〕 这幅殖民侵略者追求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印刻”在异国土地上的画面,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专题研究:茨维坦·托多洛夫《美洲的征服》(Tzvetan 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New York, 1984) 的中心观点之一。

和贫瘠——人们无法运用科技来改变；人们只能去适应。如果这个故事仍然是关于人类如何学习在草原上生活，它最终传递的信息将是关于人类如何增长智慧去认识并且接受自然界的限制，而不是努力去克服这些限制。虽然新政的委员会的报告已经在1936年发布了，但故事的结语还是悬而未决，作者显然希望读者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唯一合理的结局就是让美国人为了环境的制约和良好的管理，而拒绝如韦伯和马林那样的乐观主义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政治潜台词并不难被发现。先前的大平原叙事的主人公是那些移居在这里的勇敢而有创造力的人民，然而新政的拥护者们创造这些故事是为了把他们自己放在舞台中心。大平原人要是没有外来帮助的话，就算用上他们所有的力量、勇气和对土地的热爱也难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环境弄得如此一团糟，唯有那些无私欲的、能提供明智的科学管理视角的局外人，才能把他们从自作孽中拯救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新政的叙事只是部分的悲剧性，因为实际上规划者还是希望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像韦伯和马林，他们把大平原上的人类故事看成是一个适应的故事，但他们的进步主义的现代化构想到头来就是区域合作和集中的国家计划。联邦规划者会帮助当地共同体发展新的合作组织以及与土地之间更持久的关系。这是佩尔·洛伦兹著名的新政宣传片《划开大平原的铁犁》(1936)的结尾。在这部电影里，一个看似不可避免的环境崩溃最终由于政府干预而逆转了。技术，教育，合作和国家的力量——而非个人主义——将会让大平原社会重新和大平原的自然环境保持有机平衡，从而避免悲剧，走向圆满结局。

这样看来，詹姆斯·马林的故事有了新的含义。马林是在新政之后写的这篇文章，而且坚决反对它代表的一切事物。他关于地区适应的叙事，通过几乎在每个转折点对新政故事的抵制，表达了他自己对集体主义的恐惧。他说，那些规划者为了自己的国家主义目的而过分强调了尘暴的严重性，忽略了沙尘暴从始至终都是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大平原环境的天然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对于生态学的唯科学主义信念含有严重的政治危险，因为生态学家们本身也陷入了迷途，而将大平原环境视作一个稳定而自我保持平衡的有机体，其中人类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扰乱了自然的平衡。^[26] 生态系统是动态的，人类的技术进步史也是如此：假如断言自然界为人类的创造力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限制，就否

[26] 关于尘暴在重塑生态科学本身上的角色，参见 Ronald C. Tobey, *Saving the Prairies: The Life Cycle of the Founding School of American Plant Ecology, 1895-1955*, Berkeley, 1981。

认了整个文明历史的上升潮流。新政拥护者们对那些把自然和社会比喻为有机体的故事的偏爱,只能表明他们自己对个人主义的仇视,以及对共产主义国家概念的卖弄。“唯科学主义和国家主义已经成为了威胁自由的主要社会神话”,马林说。^[27]

如果说新政拥护者笔下的大平原是一个强制居住者接受其自然制约的压抑的环境,马林的大平原就是一片充满机遇的热土和人类自由的舞台。一个故事是在平衡中开始,接着陷入混乱,最后回到一个科学规划的更加明智的平衡中。另一个故事没有这样预示回归到一个有机整体,但表达了一种连续的重新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组成了人类进步的漫长征程,这就是马林的历史的中心情节。在这两个案例中,土地的形貌顺应了设在其中的人类叙事,从而变成了一个不同政治理念交锋的地方。马林对于个人自由的坚持,使得他比以前的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更加深入地探索草原的生态,但经常是为了努力发现人类的可能性而不是自然的制约。他为自己的故事构建的场景是一个能很好回应人类需求的环境,除非误入歧途的官僚干扰了人们使自己适应这片土地的努力。

正是詹姆斯·马林的反新政叙事,启发了保罗·博尼菲尔德的《尘暴》这部书。该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时期保守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批判,正逐渐成为美国政治话语的主要特点。博尼菲尔德的辩论没有马林那样急切和极端,但是他基本上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对于他说,大平原的确对移居那里的人们造成了特殊的困难,但是没有人比他们更成功地处理了这些问题。当遭到尘暴侵袭时,是那里居住的人民,而不是政府派来的科学家,创造了新的土地使用办法来解决之前的问题。新政的规划者对这个地区了解不多,而且沉溺在自己的意识形态里,以至于他们试图把自己对于一个规划良好的社会的观点强加其上而导致了问题的恶化。

博尼菲尔德说,规划者没有允许居民自己想出解决方法,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将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解决大平原的环境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全国性的小麦生产过剩的问题。为了让这种欺骗看起来正当合理,他们在诸如《划开大平原的铁犁》和农场安全管理局的各种画册这样的宣传品中,以其有关环境破坏和社会绝望的微叙事,将大平原居民刻画成“受到挫败的、丧失希望的一贫如洗的人”。^[28]实际上,博尼菲尔德认为大平原上有世界上

[27] Malin,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 p. 168.

[28] Bonnifield, *The Dust Bowl*, p. 202.

最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壤。这片土地一开始有点险恶,但是对于那些学会了如何靠它生存的人总归是仁慈的。他们主要的麻烦不是敌对的大自然而是一个敌对的政府。这种叙事重复了马林眼中的土地景观,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它产生的历史时期——在罗纳德·里根成功当选总统之前的卡特政府风雨飘摇之际——它就会获得一种别样的意识形态力量。博尼菲尔德的书是一个关于普通老百姓最大的需要就是摆脱政府控制的故事。

如果说博尼菲尔德详细阐述了一个批判新政的保守主义者关于尘暴的乐观主义叙事,那么唐纳德·沃斯特就是回归到了新政的情节而且加深了其悲剧的可能性。沃斯特和韦伯一样是这些作家里最有影响力的叙述者,他接受罗斯福的规划者们最基本的框架——习惯直线思维的美国人拒绝认识和接受循环的环境制约因素——但是除去了其国家主义的偏见,而且极大地扩充了它的文化边界。新政故事的一个结果就是把大平原在长时段文明上升中的角色挪走;相反,这个地区变成了一个不幸的反常地区,把非同寻常的制约因素强加在本应该是“稳步前进”的典型美国生活上。沃斯特抛弃了这种对大平原历史的解读,而认为大平原是一个更大的故事的范例,这个故事就叫做“资本主义的兴衰”。

对沃斯特来说,拒绝承认自然的局限性是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的典型特征。所以他就写了这样一种叙事——同样的事实在韦伯和马林看来预示着进步,在他看来却是衰退以及资本主义扩张导致的复杂矛盾的信号。这个故事的场景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只有这一回,故事情节最终指向大灾难:

30年代是美国的更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面临重大危机的时代,这早就是明显的事实。我相信,尘暴也同样是那场危机的一部分。它的发生是因为美国不断膨胀的能量最终遇到了一个不稳定的边缘化的地带,摧毁了那里脆弱的生态平衡。我们谈了大平原上的农民和铁犁以及他们造成的破坏,但仅仅这些语言是不够的。把他们带到这个地区来的是一个社会体系,一整套的价值观和经济秩序。没有什么词比“资本主义”更完全地包括了这些元素……我的观点是,资本主义是这个国家利用自然的决定性因素。^[29]

通过这种解读,这个故事的主角不再是“拓荒者”“文明”或者“人类”,而是资本主义。故事情节从那一经济体系起源开始,历经一系列的危机,走向未来

[29] Worster, *Dust Bowl*, p. 5.

的环境灾难,而那一经济体系也终将崩溃。沃斯特讲述的尘暴故事涉及一个预示着其他危机即将到来的中间危机;在这里,它宣告了一种启示录式的预言,把先前的边疆叙事中进步的预言颠倒了过来。沃斯特对边疆故事的颠覆是深刻的反讽,因为它意味着,韦伯和马林眼中的人类创造力所表征的那种日益增长的技术“控制”,只能导致呈螺旋上升的灾难结果。沃斯特也在这里与新政拥护者们分道扬镳,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在解决尘暴问题上的努力无法触及资本主义自身的基本矛盾。对沃斯特来说,规划者们“支撑起了一个业已证明其自身在社会上和生态上都是腐蚀性的农业经济”^[30]

既然沃斯特在故事的基本情节上就与韦伯和马林的大不相同,那么沃斯特为他的叙事所构建的场景肯定也与他们的截然不同了。因为沃斯特的故事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所以这个故事必须在边疆故事开始的地方结束:在一片荒地上。他的情节必须向下运动,指向一场被称为尘暴的生态灾难。不像边疆叙事从一片价值评判为负面的土地上开始,而在一个正面的评价中结束;沃斯特的故事开始的地方在叙事的评价上完全是好的。他的草地是“一个古老而独特的生态复合体”,是大自然奋斗了上百万年才达到的,是“通过不断的试错摸索来决定什么东西最适合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长”^[31]。大平原脆弱而美丽,它是一个总处于干旱边缘的生态系统,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一个精微的动植物网,而资本主义除了市场的标准之外就毫无能够进行估价的标准了。从这里开始,这个故事就开始走下坡路,最终以沙尘暴结束,而它的叙事角色成为了人类异化于自然的最为生动的可能的表征。

进步主义和衰退主义的叙述者选择作为大平原历史背景的截然不同的场景,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关键的对于叙事本身的审视:一个人选择在哪里开始和结束一个故事,会深刻地影响它的形貌和意义。沃斯特的情节毕竟不是唯一一个可以把大平原的历史编成一个关于危机和衰退的故事情节。因为他的元叙述和资本主义的过去和未来有关,和边疆故事讲述者一样,他的时间框架一直和白人移民的开端紧密相连——美国进步和衰退的历史开始它的上升或下降运动的时刻。虽然他承认印第安人早先就在这个地区存在,但只花了几页来写他们。显然他们处于他的叙事的边缘。我们迄今考察过的所有故事都是这个样子的,这和叙事修辞以及历史分析都有很大关系。历史学家们努力达到一

[30] Worster, *Dust Bowl*, p. 163.

[31] *Ibid.*, p. 5.

个所谓的讲得好的故事的要求——有机统一,清晰的关注点,以及只保留“有关的”细节——因此这些历史学家对该地区更早的人类住民没什么可说。所以他们忽略了我那份原始编年史中大平原历史“关键事件”的整个前半部分。如果我们变动时间框架,把印第安人的过去包含进来,就会骤然遇到一组新的叙事,在危机和衰退上具有同样的悲剧性,但在情节和场景方面的差异很大。这样,它就进一步印证了叙事的力量,即它能够重构过去以包含特定的事件和人群,排除其他,并且相应地重新定义景观的意义。

从前面提到的进步主义的边疆叙事者的文献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早先的、不那么令人开心的印第安人的故事所采取的包含和排斥的处理过程。有时候,这类文献的语调有一些哀婉和伤感,就像在一个“消逝的种族”的经典意象里那样;而有时候语调就纯粹是轻蔑的。像韦伯就这样说道,“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是原始状态的幸存者”,“当再也无法把他们赶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被允许在保留地定居下来”。^[32] 如果不断进步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印第安人的最终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他们的边缘化就是叙事的必要条件。最为明白地指示了这种场景的不可避免性的环境特征就是北美野牛,它们的灭绝是摧毁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生活基础的最关键步骤之一。即使一个人不能对印第安人产生同情,他还是可以悼念野牛的。还是如韦伯所说:“大平原提供了美洲最后的狩猎处女地,正是在那里美洲最具标志性的动物与白人文明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对决。”^[33]

对印第安人“史前史”的顺便提及,实际上是搭建框架的要件,其目的是为接下来即将发生的更为重要的戏剧搭建舞台。那些在叙事中将重点更多放在印第安人上的历史学家,几乎不可避免地构建了和我迄今为止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情节。在这些学者中,最著名的就是理查德·怀特。^[34] 虽然他的作品也可以被看成是关于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元情节,但是他构建的土地景观是由印第安人的故事主导的。例如,怀特关于波尼族^[35]历史的叙事,是以一群住在大平原东部边缘的混合草地中的人们开篇的,他们的活动随着季节的循环变动,分

[32] Webb, *The Great Plains*, p. 508.

[33] Ibid., p. 509. 对于把北美野牛历史当作一个某种程度上“消逝”于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里的早期印第安人世界的象征,这样一种类似的做法,参见 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1991), 213-218.

[34] Richard White, *The Roots of Dependency: Subsistenc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 among the Choctaws, Pawnees, and Navajos* (Lincoln, 1983), pp. 147-211.

[35] 波尼族人,印第安人的一支,曾活跃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马等州。——译注

为耕种、采集和野牛捕猎。正如我们所期待的衰退主义的情节，开篇的场景除了偶尔的严重干旱以外，基本上是一个仁慈而富饶的土地。在波尼族人刚开始他们和欧美文化的碰撞时——首先是马的到来，然后是皮毛交易——大平原的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生活条件。就叙事而论，大平原的意义就是一个人们热爱的家园。

怀特的叙事的下降线，记录了波尼族人的土地被逐渐侵蚀的过程。欧洲传来的疾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扩张的苏族部落让他们猎捕野牛和种植庄稼变得更加困难。随着捕猎变得越来越困难，波尼族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支柱开始瓦解。波尼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等到了19世纪70年代——当所有的野牛都被捕杀干净时——这个部落不得不放弃传统家园，迁移到印第安领地(Indian Territory)。故事是在被逐和绝望的经典悲剧中结束的。“当波尼族人决定离开卢普山谷的时候，他们憧憬着在南部印第安人地区里有一片他们可以猎杀野牛、种植玉米，让古老的生活方式可以在苏族人和美国定居者到达范围之外延续的地方。”^[36]不幸的是，波尼族人所期待的故事结局永远达不到了，因为故事要求的场景不再有了。就像怀特说的，“这样一片土地永远地消失了”^[37]

这个故事的框架和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它在很多其他情节开始的时候结束了。它追溯到了很久以前，那时候欧洲的动物和贸易货物开始改变大平原的景观，为波尼族人的生活提供了机会和改善。最终，下降的螺旋开始了，当波尼族人失去了对自己熟悉世界的控制时，故事的悲剧变得冷酷无情了。至于这个情节的场景，我们已经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况下遇到了。进步主义的边疆叙事者开始他们的故事的“荒野”，正是波尼族人家园被破坏之后的残骸。与其说这是一片荒地，还不如说这是一片被抛荒的土地。

这种类型的叙事绝不仅仅限于白人历史学家。普兰提·库普斯，一个克劳族印第安人的首领，在他1930年的自传里，讲述了他孩童时代的一个动物帮手——山雀——给他带来的幻觉。在梦里，四面八方大风形成的风暴摧毁了一大片森林，只留下了一棵孤零零的树，山雀——这个最小但最精明的动物——在这里安了家。部落的长者们将这个梦解读为，白人定居者不仅会杀死所有的野牛，而且最终会消灭所有抵抗美国人攻击的部落。基于这个预言性的梦，克

[36] White, *Roots of Dependency*, p. 211.

[37] Ibid.

劳部落决定和美国联合起来,所以最终他们设法保留下了一块自己的土地。但是,保留了土地并没有让他们摆脱野牛群被毁灭的厄运,他们和大平原的其他部族一样,丧失了原本与捕猎生活结为一体的生存的条件和精神上的共契。普兰提·库普斯在故事结尾处说道:“当野牛群离开了,我的人民的心也沉下去了,而且他们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在这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38〕

普兰提·库普斯最后的这句话,“在这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叙事之于历史的重要性。对于克劳部落以及其他大平原部落,整个宇宙就是围绕着野牛群转的,只有捕猎能够继续,生活才有意义。当场景变化了——当野牛群“离开了”——宇宙就崩塌了,历史也就终结了。虽然克劳部落依旧住在他们的保留地里,虽然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认同从来没有消失,但对于普兰提·库普斯来说,他们接下来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39〕他热爱的故事随着野牛而结束了。那以后发生的一切是另外的某种情节的一部分,讲述它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欢乐。

普兰提·库普斯故事结局的空白,揭示了叙事如何通过彻底地重新定义过去的事件和自然景观来适应情节的需要。在这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边疆的进步,没有在适应贫瘠土地时面临的挑战,没有尘暴。只有故事结尾以后的空白。正是这个空白将我带回了我开始的地方,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实践的中心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大部分环境历史学家在强调非人类世界对于任何一种对人类过去的理解的重要性时都会很惬意。大部分人都认为自然界的范围大于人类活动的范围,不完全是人类文化的创造,并且它以一种我们不能完全控制的方式冲击着我们的生活。自然是“实在的”,而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理解自然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影响自然的方式。乌云从堪萨斯的天空带来了尘土和黑暗,被掀开的草皮成为让外来谷物在即将死去的杂草根部生根发芽的温床,干燥的风中弥漫着腐烂的野牛肉的味道,狼和秃鹰在它们的饕餮大餐附近逡巡;这些远远不只是故事。

然而,它们也仍然是故事。作为故事,虽然我们尽力去保留它们的“自然

〔38〕 Frank Linderman, *Plenty-coups: Chief of the Crows*, 1930, Lincoln, 1962, p. 311.

〔39〕 在普兰提·库普斯和理查德·怀特结束他们的故事的方式中,存在着一种危险,即这些悲剧叙事的完结能够被人们极其容易地当作故事主角的文化历史的完结。那种印第安历史走向完结的观点是经典的帝国主义边疆史的神话之一,其中一个“行将消失的种族”在“文明”的行军面前“逐渐消散”。普兰提·库普斯宣称“在这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这话承载了老一代印第安人悲剧的巨大力量,却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那些继续生活在这个叙事的标点符号的阴影下的印第安人后代的事情

性”，它们依然是人类的发明。它们不仅属于生态环境和大自然，也属于修辞和人类话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我们努力去理解自然和人类的过去时，我们不能逃避面对许多相互竞争的叙事带来的挑战。我希望我对大平原的解读能够指出，叙事理论家有很多东西要教给我们。和环境历史学家的分析前提、即自然和文化在它们互相重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纠缠在一起不同的是，环境史的修辞学实践让我们承认，当我们以叙事的方式谈论自然时，自然绝不是“自然的”。如果我们无法反思那些支撑着我们历史的情节、场景和隐喻，我们就可能捕捉不到位于即便是最“自然的”叙事的中心的人为的造作。

那么到底什么是叙事呢？正如我的大平原编年史的证据表明的，它不仅是一个事件的序列。从编年史转向叙事，必须建立一个关于环境变化的故事，它的结构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有开头，中间部分和结尾。”^[40] 故事之所以和其他话语的形式不同，在于它描述了一个行动，它开始了，经过了一个规定好的时间段，最后指向一个确定的结局，最后的结果因其在叙事当中所处的位置而有意义。完成了的行动赋予故事以统一性，允许我们通过其结果来评估和判定它。一个故事的教益是由其结尾决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结尾在任何地方都是最主要的。”^[41]

叙事是一种人类编排实在的特定方式，这对于我们研究环境变化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指示意义。有些与人类无关的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一些符合亚里士多德式的开头—中间—结尾的故事要求的属性，就像一个有机体（或者是一个物种，一座山脉甚至是宇宙自身）的出生，存续和死亡。我们可以讲述关于这些事情的故事——这是地质学家和进化论生物学家经常做的——但是它们缺乏因为具有一个可以鉴别出来的主角而带来的引人注目的剧情。自然界里的事情经常“就是发生了”，不会引发关于道德选择的问题。很多自然界的事件甚至缺乏这种高度线性的结构，有一些是循环的：星球的运转、季节的变化，或者是生物成熟和生殖的周期；其他的就是随机的了：气候变化、地震、基因突变，以及其他发生原因我们还不得而知的事件。一个人不会自动地以叙事情节来描述这些事，然而旨在把人类过去放在自然背景里的环境史却都具备情节。自然和宇

[40] 亚里士多德：《诗学》，见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 Jonathan Barnes, 2 vols., Princeton, 1984, II, p. 2321

[41] 同上。关于一个故事的结尾在决定其编排的统一性上的重要性，参见克默德《结尾的意义》（Kermode, *Sense of an Ending*）；可参看爱德华·萨义德：《开始：意图与方法》（Edward W. Said,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New York, 1975）。

宙是不讲故事的,但是我们会,为什么呢?

两个可能的答案来自于哲学家和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对于叙事和历史之间关系的解读。其中一边,包括海登·怀特、过世的路易斯·明克以及很多解构主义者,认为叙事对于我们的文化信仰具有如此基础的意义,以至于我们会自动把它强加在一个和我们用来组织我们经验的情节很少关联的,或者是根本无关的实在之上。^[42] 明克断言“过去不是一个没有讲过的故事”,漂亮地总结了立场。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大自然身上:我们将自己的故事强加在一个和它们格格不入的世界上。^[43] 历史学家要“真实地”甚至是“公平地”还原过去的实在的规划,如此一来就不过是一场幻想。我们被我们的叙事话语羁绊着,无论如何努力,既不能对自然也不能对过去给予公平的对待——当然,前提是那个“自然”或者“过去”真的存在。

另外一边的立场,最近得到了戴维·卡尔的捍卫,但最早是由马丁·海德格尔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尽管叙事也许并不是物质宇宙中的事件所固有的,然而它对于我们人类组织自己的经验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不论宇宙对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采取什么视角,我们的视角是人类住在一个故事无止境的世界里。我们讲述着我们过去的成功和失败。我们通过讲述故事来试探各种可能的选择,那将导向或令人恐惧或让人期待的将来。我们把时间之流分为具有指示意义的开始、中间和结尾的“事件”的习惯,正说明了叙事结构在我们对世界的体验里是多么根深蒂固。正如卡尔所说,“叙事不仅仅是一个可能成功描述事件的方式;它的结构根植于事件本身。一个叙事的表述,绝不是对它所讲述的事件的变形,而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延续。”^[44]

毫无疑问,卡尔的立场对大部分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认为我们的叙事并不随意,而是反映了人类意识最基本的属性之一。它也给了我们一种在并未感到丧失了和外在实在的一切联系的情况下吸收叙事理论的

[42] 参见怀特:《话语的转义》;怀特:《元史学》;明克:《作为认知工具的叙事形式》。持一个不那么极端的立场但最终导向近似的结论,见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I。一个有用然而可能不够中立的立场,参见 Hayden White, “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y and Theory*, 23, no. 1 [1984], pp. 1-33。还有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见 Martin,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43] Mink, “Narrative Form as Cognitive Instrument”, p. 148。还可参见 Richard T. Vann, “Louis Mink’s Linguistic Turn”, *History and Theory*, 26, 1 [1987], p. 14。

[44] David Carr, “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 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 *History and Theory*, 25, 2 [1986], p. 117。

方法。就人们把他们的意志投射到未来、组织他们的生活来让当下的行为产生未来可以预测的结果而论——仅仅就此而论，他们的生活就好像是在讲故事一样。我们都在不停地给我们自己讲故事，来提醒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怎样成为那个人的，以及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不仅对个体来说是这样，对共同体和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运用历史来记住自己，就像我们把自己的预想当作工具，来探索我们想成为什么或者不想成为什么。^[45] 正如普兰提·库普斯的故事所昭示的，还原人们给自己讲述的有关他们生活意义的叙事，就会更多地了解过去的行动以及他们理解这些行动的方式。离开故事，我们就无缘于理解本身。

人类经验的实在被纳入故事，说明了为什么环境史如此执着于在自然里寻找情节以及为什么这些情节总是以人类为中心。环境史给了自己一个比大多数其他历史要包含更广阔的非人类世界的任务，但是人类仍然是其叙事的主体。沙尘暴在大平原上已经肆虐了上千年，但我们真正关注的——我们在“尘暴”这个标题下所叙述的——是我们可以最轻易不过地把它们改编成故事的那些，在这些故事里人类变成了其中的英雄、受害者或是反派角色。在这里，历史学家始终和生态学家是不一样的，后者往往把人类当作可以勉强纳入这一学科理论模型的外部变量。历史学家的取向恰恰相反。我们故事的正反角几乎永远都是人，这是由我们创作叙事的最根本的动机决定的。

我们关于大平原环境的历史，主要的关注点在人类，因为我们对自然界关注最多的是它对于人类的意义。我们关心沙尘暴，是因为它是人类在面临自然困境时坚忍不拔的表征——或者是人类在脆弱的自然面前不负责任的表征。人类的利益和冲突在自然界里创造了价值，这反过来又为故事提供了道德基点。我们想知道环境变化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参照我们自身对是非对错的理解来回答。自然界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无论我们对非人类世界的关注热情有多么高，无论我们是多么相信它的内在价值，我们的历史叙事，即便是那些关于非人类世界的，其关注点都在人类对价值的争斗之上。如果这些价值实际上是我们附加在可以评判的人类行为上的意义——通常来说我们无法

[45] 参见 Robert Cover, "Nomos and Narrative", *Harvard Law Review*, 97, Nov. [1983], pp. 3-68。卡尔的观点，即一切人类经验都是被叙事的，并没有发出一个走得更远的相对主义者的宣言：在人们自己生活中讲述的故事和历史学家为了重建他们的生活而讲述的故事之间毫无必然的联系。关于这个话题，参见诺埃尔·卡罗尔的书评 (Noel Carroll, review of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y David Carr, *History and Theory*, 27, 3 [1988], pp. 297-306)。

评判人类之外的行为——那么我们故事的中心就会聚焦在人类的思想、行为和价值上。

正因为我们关注行为的结果,因此叙事——与大多数自然过程不一样——会有开头、中间和结尾。故事归根结底会采取目的论的形式,其中的某个事件从发生在它之前的事件或者导向它的各种原因而得到解释。这解释了所有大平原历史共有的一个特征:一切都被设计好了,使得情节及其不断变化的场景——它的环境——朝着故事的最终结局来发展。在最极端的情形下,如果这是一个进步的故事,最终结尾的场景一定是一个花园;如果这是一个关于危机和衰退的故事,结尾的场景(不论是定位在过去还是未来)将会是一片荒地。作为这个叙事要求的一个明显但是非常重要的结果,开篇的场景必须与结尾不同,好让情节运作起来。无人荒野必须变成草原文明。或者,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必须变成一场尘暴。开头和结尾的差别给了我们一个从修辞的景观获取教益的机会。我们的叙事把土地的变化放置在故事里,这些故事的结尾变成了我们希望从这些变化里获取的教训。

无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认识论问题,对目的论和叙事的执着,赋予了环境史——所有的历史——以道德基点。因为故事关注那些当事人、叙事者以及受众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来珍爱的行动的后果,我们在写作这些东西时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地客观。也许历史学家会尽量做到公平,但是就像这些有关大平原的例证所呈现的,同样的证据依旧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叙述。在叙事的领域里我们——作为叙述者——也是道德行为人和政治行动者。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我们致力于评判人类行为的结果,努力去理解在我们故事里的那些人面临的选择,从而领会他们世界里的喧嚣万事。在他们面临的困境里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困境,在两者的交叉路口我们定位了故事的教益。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讲述那些让过去变得有意义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摆脱不了界定何为意义的价值争斗。

把历史视作在互相竞争的叙事和价值之间的无尽挣扎的看法,看似不那么令人信服。例如,我们怎样在不同价值观可能产生的无穷无尽的故事里做选择?这是潜伏在我们遇到的关于大平原的不同历史的交叉路口上的莫大隐患。自然和过去在我们讲述关于它们故事的能力面前是否可以无休无止地听凭我们摆布?很多历史学家在面对后现代主义挑战时产生的不安,聚焦到了一个基本的关注点,即它看起来有可能动摇我们事业的基础。如果我们对叙事的选择,只是反映了我们这种把自己偏好的关于实在的版本强加在一个不能抵制我

们的过去之上的能力,那么历史还剩下什么呢?[46]

当然,很多实践历史学家不相信所有关于过去的故事都是同样好的,即便我们也不能非常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一个故事比另外一个更好或是更差。我们通常只是宣称,只要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历史,我们就能认出它来。如果有压力的话,我们或许也会提供一些经验原则来定义我们要追求的东西。有些人可能会追求深度,认为那些解释得更多,有更丰富的关于过去的原因、意义和模糊性的解说的叙事是更好的历史。其他人可能会追求广度,偏好那些包含最多的相关细节并且和任何相关史实都不矛盾的历史叙事。[47] 然而,少的可能会变成多的:一个讲述得很好的简单故事,可能会比一个没有中心的复杂文本揭示更多的过去。包容性是另外一项美德:当一部历史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和事件来反映过去人类经历的多样性时,显然会变得更好。而融贯性也许更加重要:我们也许会要求一部更好的历史,它的各个部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包括不必要的部分或者外在的细节,不然我们就要称它为恋古癖了。我们可能会要求一部好的历史,不仅反映它背后的全部史学传统,而且同时还能推进那个传统的边界。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个对基本史料的精妙又具原创性的解读,其新颖的视角和阐释会让我们称奇。我们更希望它明晰透彻且引人入胜。诸如此类的要求还有很多。

所有这些标准都看似合理,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它在帮助我们识别一部好的历史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问题是,它们自己显然很容易会成为分歧和争斗的目标。的确,它们当中的很多,都反映了当我们遇到任何不论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叙事时,所做出来的同一类审美判断。我们不知道,它们能否在决定韦伯、沃斯特、博尼菲尔德和普兰提·库普斯之间谁是大平原历史更好的叙述者上,帮我们大忙。如果我们用以评定历史叙事的相对优点的标准,也和叙事本身一样要接受同样的价值评判,那么我们就无法逃脱后现代主义理论给我们制造的困境。我们在无边无际的故事海洋里依然没有方向。

[46] 以某种不同的形式,这个问题也是彼得·诺维克《那高贵的梦想》(1988)的首要主题。

[47] 对大部分此类标准而言,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要说历史叙事必须包括所有相关细节并且不否认任何有关事实的话,就规避了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用来定义相关性的工具就是叙事本身。这个特定的事实属于这个特定的故事吗?只有故事才能告诉我们答案。通过叙事包含事实的能力来检测一个叙事——而事实的相关性是被叙事本身的情节所定义的——这将迅速滑向语义重复。

在继续深入讨论之前,我也许应该承认,关于怎样从这里驶入一个安全的港湾——不论这个港湾在哪里——我并无确信。五年前我最初写这篇论文时,是为了承认后现代主义给了我们关于叙事话语的复杂性的丰富洞见。我搜集了一些关于大平原的故事,想看看在这些故事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于一方土地和居于其上的人民的理解方面,叙事理论能够告诉我什么。这样做的结果使我相信,情节、场景和人物,开头、中间和结尾,讲述故事的修辞术,叙述者和读者的不同议程表等等,全都渗透于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的活动里。否定这个见解的价值,也就意味着对自我认知的抹杀,以及对从叙事话语中流淌出来的力量和矛盾的拒不承认。

且不论我在写这篇文章当中学到了什么,这个努力仍然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和很多实践历史学家一样,迄今为止我只想追随后现代主义者。这篇论文经历了四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每个都有不同的标题,都试图与这些大平原历史学家制造的困境达成一种不一样的和解。从头到尾我的目标一直都是——一边承认叙事的巨大力量,一边仍然坚持过去(以及大自然)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必须多少与之相吻合的实在之物,不然它就完全不是历史了。唉,我和不同的读者及批评者分享文章的每一个新版本,每一次他们都会让我觉得,我试图找到安全港湾的努力失败了。这篇文章的每一个新版本以及每一份批评它的书信和谈话,都把我送回我开始的地方:都变成了关于故事意义的另一个不同的故事,另一个关于叙事是如何让自己在自然和过去之中站住脚或站不住脚的不同的论证。换句话说,这篇文章重现了它本身所试图去解决的问题。

但也许在这个看起来令人沮丧的事实下面,隐藏着对于叙事困境的部分的解决办法(看:我在这场修辞风暴里又一次试图寻找避难所)。形成这篇文章不同版本的批评过程,典型地展现了所有历史文本的生产和消费。我们讲述的关于过去的故事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我们讲故事的实践至少受缚于三种限制其力量的方式。第一,我们的故事不能否认已知的关于过去的事实。这是传统历史方法中的老生常谈了,我们无须赘言,但如果我们希望否认所有的叙事在表现过去方面都做得一样好的话,它是至关重要的。在最基础的层面,如果一篇作品和我们认为已经是准确而真实的证据相矛盾,那么它就是坏的历史作品。好的历史作品不会公然撒谎。一部关于大平原的历史,如果一直讲述持续进步而从未提及尘暴的话,立刻就会遭到质疑,就像一部关于纳粹如何对待犹太人的历史中没有提及集中营一样。历史叙事在任何一点上都要受制于它们可以用来或者无法用来支持自己的证据。

环境史家受到的第二种对叙事的限制是：既然我们相信自然世界终究会超越我们的叙事的力量，我们的故事就必须具有生态学意义。你不能把尘土放在空气里——或者讲述关于把尘土放在空气里的故事——如果尘土不在那里的话。^[48] 虽然环境历史学家把生态系统转换成了人类叙事的场景，然而地球的生物学过程和地质学过程对于什么能够构成合理的叙事，设置了基础性的限制。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不只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事实：它们反映了整个生态系统——它的土壤、植物、动物、气候——对于人类活动的复杂反应。就我们能够知道的而论，排除或将这些自然“事实”模糊处理，可能是另一种错误的沉默，另一种谎言。

在选择把叙事意义赋予这类“自然”事件时，我们面临着一个特别的问题，因为自然界没能告诉我们沙尘暴是好事还是坏事；只有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自然和其他大多数历史主体不一样，它缺乏一个自己的清晰的声音。大平原历史学家可以赋予相同的景观以如此不同的意义，就是它缺乏自己声音的后果之一。但自然并不是沉默的。无论人们做什么，他们的行为都对自然界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后果，就如同自然界里发生的事情会对人类产生实实在在的后果一样。在叙述这些结果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人类的价值观来解读它们的意义——但这些结果同样地既是自然的选择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和我们一同书写了故事。像博尼菲尔德或者沃斯特这样的人可能会从尘暴中得到截然不同的教训，但没有人能否认沙尘暴本身。叙事的力量无法延伸到这么远。

最后，历史叙事也受到第三种重要方式的限制。历史学家不是自己讲故事。我们是作为共同体的一份子在讲故事，当我们在做研究会情不自禁地考虑到这些共同体。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位男性，一个白人，一个社会中上层的学者，一个环保主义者，我以一种不是完全由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在写作，我的偏见也反映在了我的书里。但作为一个学者，我也在为共同体的其他学者写书——有些人在其背景和偏见上与我差异很大——他们对我研究主题的了解几乎和我一样多。在我由于自己的偏见、自欺以及不够勤勉而不愿去承认那些被自己排斥了的事实和错误的解释时，他们马上就会让我警醒。

换句话说，我们写的故事被认为不仅仅是叙事，也是非虚构作品。我们在构建它们时，就知道学者们将会评估它们的准确性，也知道很多其他的人和共

[48] 我从帕特里夏·利默里克(Patricia Limerick)的评论里借用了这句可爱的格言。

同体——那些与描述过去的方式有着当下的利害关系的人——也会评判我们所说事情的公平性和真实性。因为我们的读者有能力知道,当有些东西出现在文本中时,又有哪些东西不在文本中,我们不能任意地决定一个事实属于或者不属于我们的故事。我们读者当中有的人——一位困惑的同行,一个恼怒的派系分子,一位被伤害了的人——最终将会告知我们的失败。自然当然不会费心来构建这样一个批评,但很多其他人会向前迈上一步代表自然说话,就像我们自己已经做了的那样。所以我们会努力地去预想将要受到的批评,吸收对立的陈述,使我们的叙事和我们已知的研究主题相符。批评有时候是弊大于利的——逐渐耗尽故事的生命,把强有力的论点掩埋在吹毛求疵的警告下,以牺牲新的激进的洞见为代价来强化传统的智慧,以及扼杀激情——但是它可以通过强制我们面对矛盾的证据和相反的叙事来让我们保持诚实。我们和其他人一起讲故事,相互反驳对方的故事,为的是相互交流。简而言之,我们的读者在塑造我们所讲的故事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这篇文章通过四个各自独立的版本达到了现在的样子,每一个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批评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实际上帮助作者创作了它们。无论这个修改过程是多么令人沮丧,在这桩事情上最终的文本结果无疑是更好的。^[49]

那么我自己的故事是怎样的呢?我讲述了怎样一个关于大平原历史的故事呢?我最明显的叙事当然是一个关于表达了其自身时代和政治观点的故事讲述者们的故事。每个人讲的故事都蕴涵了一个特定共同体的价值观。每个人都努力忠实于在彼时展现出来的“事实”。每个人都会回望之前的讲故事者,有可能的话都会去适应他们,并且在对于新故事的成功必不可少的情形下证明它们的不足。结果是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故事,从各种边疆进步的故事到新政的悲剧,到马林和博尼菲尔德关于当地人民在面对险恶的环境和官僚体制时的反抗的故事,再到沃斯特的环境危机和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悲剧。

但我关于这诸多故事的故事,其意义也反映出了别的更个人化的叙事,这是关于我在不向相对主义妥协的情况下努力汲取批判理论的教益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以一个问题开头的。倘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即认为叙事工具深植于即便是在环境史这样一个将最少人味而又最不具故事性的世

[49] 我这个关于批评在限定历史叙事中的角色的论点,得益于理查德·怀特关于这篇论文一个早期版本的评论。他的帮助,及其重塑你现在读到的这个文本的方式,准确地阐释了我关于学术团体的批评的实践的观点。

界——大自然——作为研究主题的领域中；我们是否就一定得承认，过去是可以无止境地受人摆布的，从而让整个历史研究遭受严重的动摇？出于我的偏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只能是否定的，我的故事逐步走向一个结果，在共同体、过去的实在和自然本身之中得出历史学最终的正当性。对于我来说，没有能够将自己建基在历史、共同体、政治以及最终生活与地球的道德问题之上的一场无休止的后现代主义的文本解构，其中总有某些东西是根本上不能令人满意，最终也是自欺欺人的。与之相反，我坚持认为叙事的优点在于，它是在一个充满斗争和矛盾的世界里找出意义的最好、最有力的工具。

后现代主义尽管在激烈竞争的叙事话语的领域内提供了丰富的洞见卓识，它的危险性，在于它未能觉察到令叙事成为历史和人类意识这两者中如此紧要的一部分的东西。毕竟，编年史和叙事之间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一个好的故事能让我们以一种编年史做不到的方式来关心它的主题。^[50] 我的“大平原重要事件”年表当然对任何人的情感或道德观念都没有影响，然而我怀疑是否有人可以在阅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时不被其以某种方式打动。更加强有力的是，普兰提·库普斯故事结尾处的空白，意味着即使是沉默——叙事为了服务于它的意义而截断时间之流的能力——也以其雄辩深深地触动了我们。如果一个叙述者能够诚实地让一个读者关心故事里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故事就以同时给予过去和现在更深意义的方式表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个过程，和历史中的其他一切一样，是可以供人们批评的，因为让观众在意的修辞手法都可以变得极为容易操控且多愁善感。然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讲述历史故事可以通过向我们展示如何以我们之前从未尝试的方法来关心这个世界和它的起源，从而让我们在道德上与世界有个约定。

倘若这是真的，那么环境史的特殊任务就是认定，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如果在其他事项同等的情况下，提升了我们对于自然和其中的人类地位的关注，那它就是更好的故事。如果它让我们以新的方式来观察草地和人民，故事就成功了。这不是说，历史学家应该把读者变成环保主义者或者是让每个人相信一个特定的政治观点。好的历史很少这样做。但是如果环境史的筹划是成功的，那么不同的人是如何居住和利用自然界的的故事将会成为所有历史中最根本最基础的叙事，没有它，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就不完整。尽管自然和叙事话语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紧张，但如果我们希望让读者了解我们主题的重要性，我们

[50] 吉姆·奥布莱恩(Jim O'Brien)为我指出了这个洞见的重要性。

就必须讲故事。就像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提醒我们的,叙事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评判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以及学习关注世界上的很多意义的最强有力的方法之一。

因为我对自然和讲述故事都是如此地关心,我希望环境史学家们不仅仅要讲关于自然的故事,还要讲关于自然的故事的故事。^[51]我这样做是因为,叙事一直是我们在世界上最主要的道德指针。因为我们用它来激励和解释我们的行为,我们讲述的故事会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行为。它们不只是消极的描述:在一个完全字面的意义上,边疆故事促进了尘暴的产生,就像新政故事促成了政府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发现了历史和预言,这意味着它们是我们通往一个有约定的道德生活的最好途径。在把生态变化组织为开始、中间和结尾时——这从宇宙的观点来看是虚构的、纯粹的和简单的——我们把人类放在了事件的中心,而他们自己可能不完全理解,但他们经常通过行为来影响这些事件。这些人类故事的结局创造了它们的统一性,即终极目的,我们依据它来评判人类行动的功效、智慧和道德。

历史学家和预言家都致力于发现结局的意义。不论我们对一个生态系统超出单纯人类范围的地方理解多少,我们都无法避免定义我们和它的关系的价值评估过程。为了看看在多大程度上是这样,我们只要考虑自1800年以来美国人给大平原贴上的众多标签:野牛之地、美国大沙漠、大平原、小麦带、尘暴区、世界的面包篮、天空开始的地方^[52],这些不仅仅是名字或是描述性的短语,每一个对于当地的环境历史都意味着一个可能的不同结局。这样一来,叙事就不可避免地束缚在了我们给予这个名字上。与其逃避它——这在任何一件事里都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如学习有意识地、负责任地、自我批判地运用它。试图回避与故事讲述相伴的价值判断,就错过了历史本身的要义,因为我们讲的故事,就像我们问的问题一样,最终都是关于价值的。因此,我将会以问题的形式结尾:

人们对自己居住的这个世界最关心的是什么?

[51] 这种故事的故事的一个极端例子,在大平原东部一个单独的堪萨斯郡的边界上,见 William Least Heat-Moon, *Prairie Earth (A Deep Map)*, Boston, 1991.

[52] 大平原作为“美国大沙漠”的流变的含义在下文中有所探讨: Martyn J. Bowden, “The Great American Desert in the American Mi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 Geographical Notion”, in *Geographies of the Mind: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ed. David Lowenthal and Martyn J. Bowden, New York, 1976, pp. 119-47. 还可参见 William E. Riebsame, “The Dust Bowl: Historical Image, Psychological Anchor, and Ecological Taboo”, *Great Plains Quarterly*, 6, Spring [1986], pp. 127-36.

他们如何运用以及分派给这个世界以意义？
大地是如何回应他们的行为和欲望的？
人类、植物和动物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共同体？
人们如何互相竞争来争夺对大地、生物及其意义的控制？
还有一个最宏大的问题：人类和地球共同的命运是什么？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多故事的起点……

【本文原载 William Cronon ,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92, March.】

耶尔恩·吕森 著

彭 刚 译

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性与客观性

叙事性与客观性通常似乎是对历史研究特性的彼此矛盾的描述，吕森由此回顾了叙事性与客观性在现代西方史学思想脉络中所呈现出来的蕴涵。在当代史学话语中，“虚构性”一词表明了客观性从历史研究领域的后撤。在吕森看来，如若重新定义一种新的客观性概念，一方面历史解释不能逾越经验的边界，另一方面要求历史解释在主体间的有效性，历史的客观性与叙事性就并非不能相容。吕森此文代表的是一种既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又力图容纳叙事主义某些元素的思路。

耶尔恩·吕森(Jörn Rüsen),德国史学理论家,曾任波鸿大学和比尔菲尔德大学教授,现为埃森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历史理论基础》(*Grundzüge einer Historik*)、《历史主义的历史导论》(*Geschichte de Historismus: Ein Einführung*)、《历史学:叙事、解释、定向》(*History: Narration, Interpretation, Orientation*)等。

科学真理就是对于所有寻求真理者都有效的东西。

——马克斯·韦伯〔1〕

问 题

似乎“叙事性”与“客观性”是对于历史研究的特性的彼此矛盾的描述。叙事性范畴让历史研究靠拢文学,它揭示了历史编纂的文学特性,以及那些语言学程式和原则,它们使得“历史”成其为历史记忆的文化实践中对于过去有意义而合情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客观性范畴则展现了某种历史知识,它来自严格依循方法的研究程式,并且因而在各种武断任意的意义之域之上获得了一个坚实的有效性的支点。

诸如客观性和叙事性这样的事关历史思想和历史编纂中的原则的元史学话语〔2〕,可以按照下面的排列方式将其历史地编排起来:(1)在前现代的修辞传统中,人们讨论历史学家的工作时,将其当作是由真理诉求所指引的叙事的文学实践;(2)在使得历史学成其为—门学科的理性化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些真理诉求被提炼成为—套使得历史研究能够确保客观性的规则。“客观性”意味着历史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其基础在于它与过去经验的关系以及对于这一经验的认知的合理性。后现代话语批判了这种态度,将它视为—种虚假意识,掩盖了叙事的语言学程式,而正是后者,成就了历史学作为出于当下生活的文化目的而表现过去的精神建构的特性。

前现代话语强调了历史学家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它关注于使得过去具有对于当下的重要性的道德原则,并将对于过去的表现塑造成为—种道德启示,让受众能够领会并且掌握实际人类生活的种种准则。有关历史学的现代话语批判这种道德态度,强调历史学家与来自史料的有关过去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的专业才能就在于以方法的合理性来揭示历史经验。兰克的名言就暗示着,兴趣点转移到了历史研究的自我意识:“人们曾经赋予历史学判断过去、为着将来的利益而指引人们的功能。如今人们已不再怀有

〔1〕 Max Weber, *Sociological Writings*, ed. Wolf Heydebrand, New York, pp. 994, 259.

〔2〕 我所谓的“元史学的”和“元史学”的意涵,在“Loosening the Order of History: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Memory”一文中有过说明。

如此崇高的抱负。我们想要做的只不过是展现出事情实质上乃是如何发生的 (to show how, essentially, things happened)。”〔3〕

随着历史研究被确立为一门学术性的学科,以及它主张历史知识需要满足科学的标准,元史学就具备了双重的功能:它要强调通过研究而获得的历史知识具备“科学”性,以此来论证历史学家这个行当的学术性,与此同时,它又要强调使得这一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主要是各门自然科学)的特性。尽管有过多种多样的努力,包括企图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来改造历史研究,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是养成了某种作为学者的自我定位,以及某种强调历史思想的特殊性的学科意识。叙事性原则在元史学中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成其为这一特色和特殊性的标识。叙事性原则清晰地表明,历史思想遵循着一种不同的解释策略,有别于将逻辑重心放在合规律性(Gesetzmässigkeit)上的思想模式。

由其形式上的叙事性出发而对历史思想进行的这种新的反思的结果,导致有关历史研究的传统的现代客观主义的态度急速流失。正是出于这一缘故,职业历史学家们面对对于他们的认知性表现(cognitive representation)的元史学反思时,总是有些忐忑不安。尽管他们无法以另一种也能够同时论证研究历史的科学路径以及历史思想和历史认识在方法上的特殊性的原则,来取代叙事性原则,他们也无法认可,由元史学对于历史叙事的探究出发,就可以充分估价他们的学术研究在认识上的进展。

因此,历史研究的当下处境就可以从这样一种不清不白的关系中看出:一方面,作为历史思想的一个原则,叙事性在元史学上的严格性,从逻辑上就排除了在将过去表现为历史时的科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职业历史学家又依然坚持着谨严的学术态度和程式,那使得他们在高度信守方法合理性的前提下来从事他们的研究和历史编纂工作。正是此种方法合理性,让那些经由研究得来而又体现为历史编纂的知识,可以提出客观性的诉求。

我将试图在本文中调和这两种态度。在这样做的时候,我首先要追索那种强调历史知识的叙事结构的论证,并利用这一点来批判对于历史客观性的不恰当看法的论点。我要做的第二步,是要表明存在着历史客观性这么一回事,而且这一点可以在有关历史研究的叙事主义理论的框架中得以说明和论证。

〔3〕 Ranke, *Theory and Practice*, p. 137.

客观性是什么？

客观性^[4]是让历史思想和历史编纂能够站得住脚的有效性标准；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真理诉求的形式，与历史思想及其学术性（且不说是科学性）和合理化紧密相关。真理是历史编纂所一直要信守的。在前现代的、修辞学的元史学传统中，对历史学家而言，真理被概念化和规定为历史编纂者的一种道德态度以及他们在历史编纂中的一种修辞学原则。与真理相对的，是历史视角的偏见和畸变，那源于对在当下呈现出来的过去之中的某一方或某一当事人的偏私；与真理相对的，还有在呈现过去之时运用了虚构的元素。讲述关于过去的真理，被视为主要是历史编纂者的纯朴用心。道德准则作为历史编纂工作的指南，以及理解过去并将关于过去的知识运用于当下人类生活事务及其将来前景的指南，就给解释设定了界限。萨摩萨塔的卢基安（Lukian of Samosata）在其著作《如何撰述历史》中说道，历史学只有一项任务和一个目标，那就是要有用，而历史学家只有写作真相才能实现这一目标。^[5] 由信守真理而得到的历史学的“有用性”，乃是道德意义上的：*historia vitae magistra* [历史是人生的指南]。通过积累超越单个人生界域的经验，历史就教给人们生活的准则。历史表现要带来审慎（prudential），也即，依据从累积而来的经验得出的普遍规则来安顿实际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运用规则的能力 [rule competence]）。历史学要能够并且致力于产生这种实用的和道德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出现，要靠人们以叙事的形式来编排有关过去的经验，而启示就包含在那种人们所总结出来的有关人类行动的规则和原理的形式中。要实现与经验的这一关联，真理诉求就是必不可少的。

此种关系的范型就是老人的智慧：他们漫长的生命历程在他们的心灵中展现为大量的经验，他们有资格指引他们社群的当下生活，给他们确定方向。定向意味着以毕生经验中所积累的有关人事的知识来理解和处理实际问题。历史学就这样被视为人生中一种提供定向的力量，而历史学家就是在集体记忆档

[4] Cf. Rüsen, *Historische Vernunft*, pp. 85ff; idem *Studies in Metahistory*, pp. 49ff.; Allan Megill, ed., *Rethinking Objectivity*, Durham, 1994 (原载 *Annals of Scholarship*, vol. 8, no. 3-4, 1991, vol. 9, no. 1-2, 1992).

[5] Lukian, *Wie man Geschichte schreiben soll*, ed. H. Homeyer, Munich, 1965, § 9, p. 107.

案中所积累的经验的专家。因此,历史学就可以被(像维佩拉诺[Viperano]在人文主义话语中那样)定义为“*rerum gestarum ad docendum usum rerum syncera illustrisque narration*”(有关人类活动的真实而又开启人智的叙事,旨在教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6]

客观性则大为不同。它意味着历史表现与过去经验之间的某种关系。前面所引兰克的名言就清楚地表明,这一关系并非主要是由审慎的道德原则(运用规则的能力),而是由作为一种认知程式的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来设定。在将历史编纂基本的真理诉求概念化方面的这一根本差异,乃是在18世纪下半叶历史思想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的一部分。^[7]它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这一进程主要的导因是两个原则:(1)一种新的历史范畴,将历史理解为人类世界在时间中的无所不包的变迁,实际上还包含了现在和将来——这就由“历史”(history)或者(更加造作的)“历史”(the history)一词来表达^[8];(2)作为研究过去经验的认知策略的方法的合理性。新的“历史”范畴将历史思想和历史编纂的主题界定为现实世界一个特殊的领域:历史乃是时间维度中的现实人类世界。^[9]它不止于是一种叙事,它是一种对于世界的预描(prefiguration),那使得历史学家能够以叙事的形式来呈现过去。这么说吧,客观性意味着在前现代时期由历史学家的真实故事所告诫的审慎,如今变成了人类世界本身所预先给定的现实。

兰克那句表达了此种客观性诉求的名言,是以某种历史哲学为前提的:历史乃是人类世界一种时间中的现实,它是在经验模式中所预先给定的时间性变化与历史学家的内在关联。历史学家要在其历史编纂中表现这一预先给定的

[6] Eckhard Kessler, *Theoretiker humanisti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 Munich, 1971, p. 19, footnote 57; G. A. Viperano, *De poetica libri tres*. (Poetiken des Cinquecento 10) I, 7a; 13, pp. 10 sq. Munich, 1967. Cf. Kessler's excellent introduction; "Geschichte, menschliche Praxis oder kritische Wissenschaft? Zur Theorie Humanisti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op. cit., 7-47; idem, "Das rhetorische Modell der Historiographie", in *Das rhetorische Modell der Historiographie. Forme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eds., Reinhart Koselleck, Heinrich Lutz, Jörn Rüsen (Beiträge zur Historik, vol. 4), Munich, 1982, pp. 37-85.

[7] Cf. Rüsen, *Konfigurationen des Historismus*, pp. 45ff.; Koselleck,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p. 38; Horst Walter Blanke, *Historiographieggeschichte als Historik* (Fundamenta Historica, vol. 3),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1; Wolfgang Küttler; Jörn Rüsen; Ernst Schulz, eds., *Geschichtsdiskurs*, vol. 2, *Anfänge modernen historischen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1994.

[8] 出于逻辑的理由,我更愿意用"the history"一词,尽管在英语中很少会这么用。

[9] 根据德语中的"die Geschichte"一词,我更愿用"the history"一词。大写的"History"可能会遭人误解。

人类世界的历史性结构。它要“如实直书”。这一现实不止是史料中所报道的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变化的序列,它自身就是意义的体现。要以唯有职业历史学家能够实施的认知程式,才能揭示出这一“现实”的历史:研究就是对于史料的章法谨严的处理。

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变化的时间性序列,乃是人类世界历史性深层结构的显现。这一被称为“历史”的结构,是由所谓的“人类世界时间性变化的推动力”所造成的^[10];正是这些动力在本体论意义上构成了历史实在。而这一在历史经验中预先给定的那个实在,可以通过章法谨严的研究而在过去的遗物中被揭示出来。历史范畴和历史研究的合理性因而就彼此息息相关:前者是后者认知程式在本体论上的前提条件。历史学家们高调主张客观性,并且因此他们的职业仿佛成了国家的祭司^[11],这一点是基于一种准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信念,那就是,经由某些合理程式,人类心灵能够揭示历史——处于过去事件和变化的时间性过程之中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结构。^[12]

表达此种客观性诉求的一份著名文献,是威廉·冯·洪堡的论文《论历史学家的使命》(1821)。^[13]在这篇论文中,他以历史主义的概念化方式表达了此种客观性诉求,将其视为从事研究的人类心智与研究的对象这两者的“融合”(fusion)。^[14]“融合”意味着历史作为历史思想的全部主题(对象)——人类世界的时间性实在——在本体论上是由精神力量(理念)构成,而经由人类活动的意向性(Sinnbestimmtheit,意识的定向)来运作。然而,另一方面,就是这同一个精神力量以其认知兴趣驱动着人类心灵在认识过程中抵达过去的经验。因此,与经验相连的认知的心灵,就是由经验所预先给定的实在的心灵(译按:也可译

[10] 参见 Wilhelm von Humboldt,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bewegenden Ursachen der weltgeschichte”, in idem,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Geschichte* (Werke in fünf Bänden), ed. , Andreas Flitner, Klaus Giel, Darmstadt, 1960, pp. 578-584 (Akademieausgabe II, 360-366)。

[11] Wolfgang Weber, *Priester der Clio. Historisch-sozial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zur Herkunft und Karriere deutscher Historiker 1800-1970*. 2nd ed. ,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2] Cf. 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Methode und religiöser Sinn_Vorüberlegungen zu einer Dialektik der Rationalisierung des historischen Denkens in der Moderne”, in Küttler, Rüsen, Schulin, eds. *Geschichtsdiskurs*, vol. 2, pp. 344-380.

[13] 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 in idem *Werke in fünf Bänden*, eds. Andreas Flitner, Klaus Giel. Darmstadt, vol. 1;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Geschichte*, Darmstadt, 1960, pp. 585-606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 IV, pp. 35-56); English translat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7), pp. 57-71; furthermore in Ranke, *Theory and Practice*, pp. 5-23.

[14] Ranke, *Theory and Practice*, p. 8.

为精神)的一部分。认知的兴趣是将历史构成为认知主题的精神力量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历史本身是通过历史学家来说话的,历史编纂就表现了历史的内在实在,作为人类生活预先给定的完备形式。这就是客观性的蕴涵所在。它的认识论基础,用洪堡的话来说,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本原的先在一致性”(an original antecedent congruit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15〕作为一种认知程式的研究,以这种一致性为基础。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引领历史学家——他们要处理的是呈现在其遗物和史料中的过去的经验——使得他们能够揭示“历史的实在”。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此种历史客观性的哲学蕴涵。它为根据章法谨严的研究规则来处理史料设定了清晰的解释路线,并且与此同时又将历史概念视作由人类活动的精神力量所造成的人类世界的时间性运动。具备了此种客观性诉求的历史知识可以起到为实际生活——主要是政治生活——进行文化定向的功能。它顺着过去所发生的时间性变化的方向,带来了一种将来的视角〔16〕,并为它所眷顾的民族带来了一种基于人类历史的构成性动力的集体认同。

反对客观性的叙事性

即便是在对于历史认识的客观主义观点的语境之中,也总是存在着某种对于主观性构成要素的意识,与历史被简单地实体化的特性正好相反。许多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学术工作卷入了政治,而且他们甚至有意地介入政治。他们认识到,此种介入不是他们的学术志业的外在补充,而是他们的历史编纂本身的构成要素,是其内在认知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历史学学科的方法合理性无法分割开来。此种对于贫乏的客观性的反对意见在讨论时用了一个词,“偏向”(partiality)。德罗伊森极力反对历史研究中“被阉割的客观性”〔17〕,它试图让自己在关于集体认同(主要是民族认同)的政治斗争——在其中历史编纂是

〔15〕 Ranke, *Theory and Practice*, 15 (“eine vorhergängige ursprüngliche Übereinstimmung zwischen dem Subjekt und Objekt”), pp. 596ff.

〔16〕 历史客观性的此种实践功能的一份重要文献是兰克的就职演说, *Über die Verwandtschaft und den Unterschied der Historie und der Politik* (Sämtliche Werke, vol. 24), Leipzig, 1877, pp. 280-293.

〔17〕 Droysen, *Historik*, p. 236.

一个重要的论据——中保持中立。西贝尔、杰维努斯和其他人也是同样的情形。^[18] 他们不把历史学家在通过历史纪念塑造集体认同的政治斗争中的介入和偏向,看作是背离了客观性,而是正好相反,将其视作历史客观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正是历史学家在其时代的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开启了一片视野,使得在那里可以将历史构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类实在的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变得可见而又可及,并且因而就可以被某种认知方式揭示出来。

客观性由偏向构成,这一观点是步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后尘,后者将历史学家的历史兴趣中的精神动力,看作与将历史构成为人类生活的时间性实在的人类活动的精神力量并无二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偏向性构成客观性的观点,依循的也是类似的历史哲学和认识论。在阶级斗争中,偏向性是有关普遍而言的人类社会及其具体而言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客观知识的必要条件。在这两种客观性概念中,要点都在于,并非每一种偏向性都会导向客观性,而是只有历史学家以特定的方式来运用认识能力的那种反思的偏向性才能如此:他或者她要以某种方式来总结其立场,以使得政治背景下各种不同而又相互冲突的利益能够整合为一种全面的利益。相应地,来自不同立场的不同视角,也要被整合到一种全面的视角之中。在此视角中,人类世界在过去所发生的变化就显示出通往未来的方向。正是此种对于这一全面视角和发展方向的洞见,使得历史学家能够超越权力之争,而以一个共同的取向来安顿它。在经典的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研究的观点看来,此种全面的立场和视野要在或多或少被作为跨民族沟通原则的人类观念所缓和了的民族主义那里才能实现。

于是,历史认知可以被视为有着两个目的的精神程式:一个是**客观的**,与在其遗物也即史料中预先给定的过去的经验相关;另一个则是**主观的**,与实际生活中的定向问题相关。客观主义的保障是史料批判,而主观主义的保障则是历史学家在历史纪念领域为集体认同而介入政治斗争。两者都要经过历史解释在认知层面的运作这一中介。要通过解释,过去的经验证据的可靠信息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历史特性,并被整合到历史叙事的精神结构之中,在其中它可以作为文化定向的一个要素而发挥作用。解释作为一种方法程式,是站在客观性—

[18] Heinrich von Sybel, "Über den Stand der neueren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1856)", in idem, *Kleine historische Schriften*, Munich, 1863, pp. 343-359; Georg Gottfried Gervinus, "Grundzüge der Historik (1837)", in idem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ed. G. Erler, Berlin, 1962, pp. 49-103; cf. Jörn Rüsen, "Der Historiker als 'Parteimann des Schicksals' —Georg Gottfried Gervinus", in Rüsen, *Konfigurationen des Historismus*, pp. 157-225.

边的。在认识到一个历史视角内有关过去的证据与当下的定向问题发生关联之时,解释就将主观性作为认知工作的构成成分带入了这一叙事的塑造之中。这样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就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由于这一功能,作为历史研究中关键性的认知程式的历史解释,就依旧含混不清。在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如何消解此种含混,一直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客观主义的态度**,试图通过运用在其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他或她对于过去的兴趣)为某种历史概念所克服的知识形式,来建构历史解释。这一概念将过去人类世界的时间性变化和发展界定为某种预先给定物,可以被一种尽管具有某些实际利益、立场和偏向,但却真实的认识所揭示。历史学家常常是从社会科学那里借用这一“客观”历史的认知结构,因此就加入了那些社会科学的诉求,追随自然科学的逻辑并分享其文化声誉。他们相信,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坚实基础。这类策略的例证,有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试图超越历史主义而达到一种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新概念,以及早期年鉴学派的相关努力,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和将历史学提升到科学的地位(“Erhebung der Geschichte in den Rang einer Wissenschaft”)的各种实证主义企图。^[19]

第二种态度是接受历史解释对实践的介入和兴趣,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法回避的主观性成分,而从认识论上重建历史解释的各种模式;但与此同时,它又强调,方法准则和理论工具乃是历史知识主体间有效性的保障。这一策略最为人熟知的例证,就是马克斯·韦伯对客观性的揭示及其理想类型的方法论。^[20]

客观性的进路已然不复可信。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在各种实体化的历史观念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主观利益和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随着作为历史知识的一种构成形式和研究历史的精神程式的叙事性在元史学层面上的崛起,客观性——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历史研究的一种构成性观念——这最近的一次后退,人们看得很清楚。叙事性这一概念说明了历史思想与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的文化实践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它表明,历史认识经由

[19] 这是德罗伊森在其颇有影响的关于巴克爾(Thomas Buckle)《英国文明史》的书评中有名的说法。

[20] Max Weber, “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in idem,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3rd edn., ed. by Johanne Winckelmann, Tübingen, 1968, pp. 146-214. (English translation in,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And ed.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New York, 1949); partly in, Max Weber,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in idem, *Sociological Writings*, ed. Wolf Heydebrand, New York, 1994, pp. 248-259.

其叙事形式了解了它在实际生活中有条理地安顿各色事物的本领。历史解释从根本上信守这一形式；它得将有关过去的经验上明白可见的信息纳入到某个叙事之中。只有在这一形式中，有关过去的信息才真正是“历史的”，也只有在这一形式中，历史知识才能遂行其文化功能。

章法谨严的研究工作中的认知程式所产生的历史知识，因为叙事性而受到各种限制，而那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对客观性的强烈否定：也即，回溯性（retrospectivity），视角性（perspectivity），选择性（selectivity）和特殊性（particularity）。〔21〕“回溯性”说的是，对过去经验证据的研究，会受到将来的投影的影响，而后者往往会超出过去经验的界域。历史知识的回溯性可说是一扇敞开的门，非经验的成分、主观兴趣、规范和价值、愿望和威慑都穿过这扇门而进入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历史关系之中，而且甚至还对其以方法合理性为指南的认知结构产生了影响。“视角性”依存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它在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实践定向问题中开启了历史视角。它认识到，历史蕴涵和历史意义取决于历史学家在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中的立足点。“选择性”指的是回溯性和视角性对于历史知识的经验内容所产生的结果。史料中只会有某些信息变得与研究相关；那些可以满足给当前面临的定向问题提供过去的意义、蕴涵和重要性的主观想法的信息。选择标准是以历史意义、蕴涵和重要性来塑造过去的规范和价值。唯有过去的此种具有意义、蕴涵和重要性的方面，才可以被认作历史。特殊性反映了历史解释施之于过去的经验证据时所受到的限制。它实质上是将历史知识与通过历史记忆建构认同的目标联系在了一起。既然认同从逻辑上来说总是特殊的——它总是有别于其他人——历史知识作为创造性的塑造认同之镜就总是特殊的，并且因此就要求对过去采取多种多样的研究方式。由此它就对应于认同的多样性、认同的各种维度以及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关联利益和分化。

历史知识以其回溯性、视角性、选择性和特殊性，成为文化话语的一部分，差异和分别就因其而出现，是人类世界文化定向的根本产物。就社会关系和政治统治而论尤其如此。人们可以谈论某种“交流”（communicativity）原则，它将历史知识构成为此种文化话语的一个要素。它塑造了作为争夺权力的文化斗

〔21〕 Cf. Klaus, Füßmann, “Historische Formungen. Dimensionen der Geschichtsdarstellung”, in Klaus Füßmann, Hinrich Theodor Grütter, Jörn Rüsen, eds., *Historische Faszination. Geschichtskultur heute*, Köln, 1994, pp. 27-33, esp. 32-35.

争的一部分的学术话语。它研究权力,在历史记忆之镜中观察和解释人类世界时认识到了它的各项原则。在此种交流的背景下,历史作为被表现的过去,就获得了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栩栩如生的特性和权力。面对此种无可回避的将历史纳入生活的情形,历史客观性就显得像是它的反面,是在争夺文化象征力量的权力的政治斗争中的文化手段。每一部史学史就都是历史研究扮演此种角色的经验证据。^[22]

在当前的元史学话语中,有一个词表明了客观性从历史研究领域(至少从对其构成原则进行元史学反思的视角而言)的此种后撤:虚构性(fictionality)。虚构性在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语义学语境中乃是与客观性正相反的概念。客观性所力挺的,是通过史料批判的研究程式从史料中获得的信息的经验可靠性的认识论特质。此种信息是由所谓的“事实”构成的:它们陈述的是,在某时某地出于某些原因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某事。事实是对“何时/何地/何事/如何/为何”问题的回答。这样的事实本身并无具体的意义、蕴涵和重要性可言。它之所以获得此种历史蕴涵,只是因为与其他事实处于某种时间的而同时又是语义的关系之中。此种关系是由历史解释带来的。为着实现此种“历史化”(historization),历史解释要利用意义、蕴涵和重要性的原则,而它们与事实本身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地位。与从史料得来的信息的纯粹的事实性相比,叙事性时间关系中有着不止于是事实性的某种东西,它赋予了事实特定的“历史”性。为着说明此种差异,就用上了“虚构性”一词。既然解释将事实之间的历史关系带入了某种叙事形式,解释程式就与讲述一个故事的程式有了非常密切的关联。这同样由“虚构性”一词来表达。历史解释意义生成的过程,是在与文学和艺术的意义生成同类的“本质上乃是诗性行为”的这一范畴的支配下出现的。^[23]

虚构性就这样给历史知识和历史编纂中那些不具备源自史料的信息的那种纯粹事实性的成分,标示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地位。这个词在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未经质疑的前提之下自有其意义。再就是,它确证了有关历史方法的一种广为流传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它被狭隘地限制在史料批判的机制和技术的范围。将史料信息转化为某种蕴涵和有意义的叙事序列、转化为历史叙事的精神运作,如今被解说为叙事。追索其原理的元史学超越了集中精力于客观性的传

[22]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and Cambridge, 1988.

[23] White, *Metahistory*, p. x.

统的方法论,而成为关注主观性的历史编纂和历史表现的诗学和修辞学。这样一来,历史意义生成的构成性原则就具有了审美的和语言的特性。

与此种历史认识的“诗化”相对应的,乃是历史解释方法论的阙如。元史学消褪了,历史研究在将事实纳入承载意义的历史关系之时,运用的依然是或多或少作了理论说明的有关解释的概念框架。^[24]这种诗性行为至少包含了信守历史研究方法规则的认知程式。对于赋予历史意义的语言学策略的新的意识,让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写作历史的行为上来。在对于历史研究的元史学反思——此种反思强调它对于客观性的诉求以及它作为一门“科学”的自我理解和声誉——中,可从来就没有完全无视历史编纂。然而,它是与历史研究的方法合理性联系在一起并依赖于后者的,并且在涉及对于过去的经验时就丧失了它在意义生成中的构成性作用。如今又转到了另一条路上:合理的研究方法在将史料信息转化为承载意义的叙事时,似乎依赖于意义生成的基本语言学程式。我们要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摇摆呢?

朝向一种新的客观性概念

要想回到历史思想的真理诉求,首先需要厘清客观性的意涵。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这一意涵。首先,客观性意味着历史思想与经验的一种构成性关系:在被称为“历史”的叙事性建构中,有着某种不能被发明出来而是被预先给定并且为历史学家所承认的东西。历史研究的合理性程式,建基于历史思想与经验的某种特性——相对于历史解释而如同对象一样被预先给定的特性——的关系之上。经验是解释所受到的限制当中的一种:在试图陈述过去发生了什么,何时、何地、为何发生了某事或是何情形之时,历史解释不能逾越经验的边界。此种与经验的关系,完全不会妨碍历史学家将意义生成的构成性主观因素,纳入到他或者她对于过去的经验研究之中。在其第二种意涵中,客观性甚至涵盖了历史解释的这一主观的侧面:它意味着此种客观性本身的一种模式,也即,历史解释在主体间的有效性。简单地说,在涉及历史意义的那些主观成分——它将史料中的信息转换为一种意义和具有蕴涵的历史叙事,并将“历史”构成为过去与现在(那就与将来理所当然地彼此关联)之间承载这意义的关系——之时,

[24] Cf. Rüsen, *Rekonstruktion der Vergangenheit*.

此种作为主体间性的客观性指的是,历史解释根本就不是武断的或任意的。这一客观性的意涵涉及历史解释与文化话语及其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历史叙事都是在社会生活中被构成,每一种历史叙事都是为着社会生活而作,每一种历史叙事都在其中发挥了为实际生活定向的作用。客观性意味着历史经验可以从这三个视角以某种方式来加以解释,以使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来接受某一种而拒斥其他的历史叙事。“理由”一词表明了问题所在:存在着每一个历史学家都要信守的解释原则,只要他或者她想要完成一个历史叙事,而这一历史叙事的有效性超出了武断或完全任意的意义上的贫乏简陋的主观性之外。

与历史经验具有构成性关系这一意义上的客观性诉求,可以经由援引历史研究已然确立的研究程式而得到轻而易举的论证。必须承认,历史方法受到对于历史经验的启发式研究进路(heuristic approach)的影响,甚至还依赖于此种研究进路,它将过去与现在之间那种历史性关系中诸如意义、蕴涵和重要性这样的主观性构成要素包括在内。然而,不管怎么说,研究的方法合理性具有一种有效性,不能对它提出这样的质疑,使得来自史料的信息丧失了其作为对解释的限制的认知功能。^[25]

谈到主观性,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让出自史料的信息成其为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叙事的研究程式中,是否有着一种可资比较的、严格的、章法谨严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对于支撑着历史叙事一致性(consistency)的主体间性而言,至少还有着某些不容否认的合理性标准。必须就作为历史叙事的可靠性或“真实性”之必要条件的主体间性的各项原则,来探究此种一致性。

需要区分此种一致性的两个维度:理论的融贯性(coherence)和实践的融贯性。理论的融贯性关系到概念及其与出自史料的信息之间的关系。后现代元史学话语主要处理的是隐喻,并视其为将过去经验转换为对当下有意义的历史意义生成的基本要素。^[26] 历史研究的方法合理性已经完成了从隐喻向概念的

[25]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4; Mark Bevir, “Objectivity i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3 (1994), pp. 328-344; Lionel Gossman,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1990; Jürgen Kocka, *Sozialgeschichte. Begriff-Entwicklung-Problem*. 2nd edn., Göttingen, 1986, pp. 40-47, “Objectivitätskriteri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Reinhart Koselleck, Wolfgang Mommsen, Jörn Rüsen, eds., *Objectivität und Parteilichkeit* (Beiträge zur Historik, vol. 1) Munich, 1977; Jörn Rüsen, ed., *Historische Objectivität. Aufsätze zur Geschichtstheorie*, Göttingen, 1975.

[26] Cf. Frank R.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1994.

转化,或者也许更好的说法是,超越隐喻而成为概念。通过此种概念化,历史解释就具有了可以归之于其主体间有效性的某种特质:我想要称之为“可重构性”(reconstructability)的特质。我是从这一意义来考虑的:历史解释可以具有某种透明性和清晰性,使得它在原则上能够建构、确证和反驳它所导致的论点。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名言的意旨所在:“情形是而且一直是这样的,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种方法正确的论证即便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也得接受,倘若它想要达成自身的目标的话。”〔27〕此种透明性可以转换为一条历史解释的方法准则:它应该在一个明确的概念框架内得以完成。“明确的概念”指的是以程度不等的理论形式,历史解释具有某种反思性(reflexibility),它加强了在讲述过去故事之时的解释合理性的成分,由此就给予了故事意义以一种诉诸所有倾听者的理性能力的论证形式。历史叙事性的创造性精神过程获得了论证结构的特性,并将经验证据、逻辑融贯性和解释能力的理性力量引入了历史意义生成的游戏之中。

“实践的融贯性”是历史叙事的一种特质,由此它就获得了它在实际生活中进行文化定向的实践功能的可靠性。〔28〕即便是在生活的深渊之中——在那里,利益、冲突、权力意志和争取自尊与社会承认的强大动力,在为着当今的目标和将来的远景而塑造过去的形象之时,扮演了关键角色——也能找到并辨识出融贯性和主体间性(那是理性的一个表征)吗?答案简单而又明白:没有主体间性的话语要素,实际的人类生活就不可能。我想到的是使得人类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冲突的全部文化因素:与经验相调适,以论证而非强力彼此说服,提出并接受在活动的文化框架中给实际生活定向的种种理由。

这些要素可以参照历史思想最敏感而又最实际的功能——它在形成个人与社会认同时所发挥的作用——来加以阐明。与带来了历史叙事的理论融贯性的方法合理性相对应,在调节认同形成中的差异和张力时有着一种普遍的实践理性(reason)和合理性(rationality)。在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以及获取与历史认同相关的自尊和社会承认之间的动态平衡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策略中,它清晰

〔27〕 Max Weber, “Die ‘Objec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in idem,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3rd edn., ed. By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1968, p. 155.

〔28〕 洛伦兹(Chris Lorenz)从认识论角度讨论了客观性的这一维度,并以他所主张的“内在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将其与理论上的主体间性联系起来。Chris Lorenz,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Historical Reality: A Plea for ‘Internal Re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3 (1994), pp. 297-327.

可见。在个人和群体寻找他们与他人之间关系中的位置时,那是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工具。我认为,正是平等范畴以及相关的人类概念,成为其处理差异的文化准则。

这一范畴是意义生成的理论力量在实践上的对应物,它给历史叙事提供了前面提到的论证的透明性。再加上平等范畴,就可以在认同形成的实践领域也带来这样的透明性。整个现代的法律体系就立足于这一点。在涉及现实实践问题时,这听起来仿佛太具理论意味,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就表明,这一抽象论证如何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在历史认同形成过程中,缺少主体间性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缺少承认,边缘化,在共者(togetherness)与他者(otherness)之间不对称的道德关系。平等是克服此种主体间性欠缺的调节性观念。

然而,就通过历史记忆形成认同的目的而论,这一主体间性范畴根本而言是不足的。它陈说了一种置身于差异的多样性之外的抽象的普遍性,而文化正是在其中塑造了人的认同。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满足此种多样性的更加广阔而深入的原则。在调节性观念的理论层面上,人们可以轻易地就将平等的抽象普遍性转化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来应对分化——作为认同形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文化程式——的挑战。既然每一种认同都是特殊的,与各种特殊性之间的差异相关的主体间性,就是一个如何将此种特殊性内在关联起来的问题。它应该秉持这样的方法准则:人们必须接受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存在于自我之中的与他者的差异。在这里,主体间性的调节性观念就是相互的承认和认可。^[29]

这一调节性观念可以用之于历史解释:它与每一种历史叙事的视角性相关。它令历史解释秉持一种视角,这种视角要么包容了与不同认同相关的各种立场之间的差异,要么将其他视角作为自己的补充而与其他立场相关。立场和视角的多样性不应被视作对客观性的反驳,而应视作客观性在面对实践融贯性的必然要求时实现了自身。然而,认识多样性可以有两种方式:在逻辑上它可以基于对客观性的严厉否定,将其贬斥为一个“崇高的梦想”,但是这样一来,在面对不同视角之间的冲突和限制时,就不复再有调节性原则,有的只会是以叙

[29] Cf. Charles Taylor, *Multikulturalismus und die Politik der Anerkenn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3; Jörn Rüsen, "Vom Umgang mit den Anderen-Zum Stand der Menschenrechte heute",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 15 (1993), pp. 167-178; idem, "Human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Universal History", in Wolfgang Schmale, ed.,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Europe—Arabic-islamic World—Africa—China*, Frankfurt am Main, 1993, pp. 28-46.

事性武器来战斗的“a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或者“文明的冲突”。另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多元论的观念,以在透明而合理的论证以及相互认可和承认的模式内互为补充、相互批评的原则为指导。在我看来,何种多元论应该得到青睐,是一个并无疑义的问题。

这样一种有关实践融贯性的调节性观念,对于历史经验的启发式研究进路产生了影响。此种进路一直以来由对于构成历史意义的规范和价值的追求所推动。实践的主体间性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而且在过去的经验本身当中就有其余响和回声,因为可以将历史概念化为一个力图在人类生活形式、宪制、法律体系、社会行为等等当中实现这一原则的过程。

历史经验的回声,给作为历史叙事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融贯性的主体间性,提供了额外的客观性的特质,那是在与经验的关系中具有承载真理的意义的客观性。历史作为经验并不外在于我们自己。历史经验并不是简单地在过去的遗迹中预先给定,作为史料而让历史学家们来与它们打交道。历史已然在我们自身之中预先给定,尤其是就我们自己乃是漫长时间内发展过程的结果而论。在我们想到历史之前,在我们进行纪念之前,我们就已经成为历史。在我们把过去当作过去之前——而这是在文化上将“历史”建构为文化定向的一个成分的必要条件——过去就是当下。在过去的此种当下性中,主体间性和客观性在经验意义上就是同一回事。在此种预先给定之中,过去尚未成为历史;它甚至也还没有成为过去;作为历史和过去——我们可以说——它是看不见的。要让它变得可以看见,我们就必须在三个不同的时间维度之间作出区分,并且追索历史意识的精神程式。这些程式的工作结果就是对于过去的历史表现。只有在它没有丢失掉我们自己不可见的历史时,它才能履行其定向功能。唯有将历史带到我们心中的对于过去的历史表现,才会具有客观性的品质,那种品质综合了经验的层面和主体间性的层面,以及在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中生成历史意义的理论的层面和实践的层面。

在历史认识的学术程式中得以实现的客观性诉求,往往被人们认为带着某种“死亡的气息”。很多职业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当他们对过去的表现中立于他们时代的生活斗争之时,才能实现他们对真理的效劳。这样的中立性是骗人的把戏。没有某种视角和相关的历史意义的标准,就不可能有历史叙事。这些标准来自实际生活的文化定向。它们或许具有某种概念形式,其中的生命力已经大量丧失,但它们依旧保持了生命的特征。因此,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妨碍历史表现中实际生活的多姿多彩的特征的出现;相反,它是赖以编排这些特征的原

则。情感、想象、权力和意志是历史意义生成必不可少的要素。客观性诉求并没有将它们身上的生命力夺走。客观性可以视作是它们生机的一种形式,在其中历史叙事给文化定向带来了经验和主体间性,并且这样一来就或许有助于在轻微的程度上的生命的重负变得更加可以承受。

【本文原载 Jörn Rüsen, “Narrativity and O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Studies”, in *History: Narration-Interpretation-Orientation*, New York/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5。】

彼得·伯克 著

李 恒 译

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

西方最初的历史意识蕴涵于古希腊神话之中,经过漫长的生长,假希罗多德之手发展为追求客观真实的历史,至兰克始成历史科学之气象。因为历史与故事源出于同一个母体,加之历史在将自己塑造成有意义的叙事实体时,主动采用了故事的结构和形式,从而使得对历史的诘问和质疑从未停止过。早在古希腊时期,怀疑主义者已经就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局限性及其基础进行了讨论,17世纪的笛卡儿等人更是将这种对历史的质疑深化为切实的危机。历史学家经过一番努力,侥幸“复苏”了历史学,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今天的历史学正遭遇着另一场更为深刻的危机。如果说,第一次危机与现代性的兴起和笛卡儿哲学相联系,那么,第二次危机则与后现代性和对笛卡儿式假设的批判相关。它主要是由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学者所开启,他们以其对当代历史叙事基础的破坏再次开放了历史与故事之间的边界。在伯克看来,历史学家们也许会找到走出危机的途径,但他们将不得不修正方法、乃至关于实在的概念。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英国历史学家。曾执教苏塞克斯大学、剑桥大学,现为剑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及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研究员。研究专长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致力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理论的沟通,探索文化史写作的新领地,是当代最富盛名的新文化史学家之一。伯克著作宏富,包括《图像证史》《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什么是文化史》《文化史的多样性》《意大利文艺复兴》等数十种,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出版。

* 本文是在布达佩斯、剑桥、纽约、鹿特丹(1993年皮埃尔·培尔讲座)和圣保罗州所作演讲的修订版,我应该向当时在场的听众发表的评论和提出的问题表示感谢。

认识过去是可能的吗？讲述过去“确实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是可能的吗？或者说历史学家也像小说家一样，是虚构故事的创造者吗？这些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学科内外备受关注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却给出了大相径庭而又多种多样的答案。有些人可能会将当前的这种现状，描述为一种“认识论”危机。如果“危机”一词在更为严格的意义上使用，不是指某一时期的混乱，而是指导致巨大变化或者结构性变革造成的社会短期大动荡的话，那么断言我们是否正在经历一次大危机就为时尚早。我们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置身于一场危机之前，就已经脱离了危机。然而，混乱已经彰明较著，而且，就像危机通常所做的那样，它召唤着人们去“重思历史”。

本文旨在提出，脱离了历史学研究的历史哲学或者史学理论研究（在对历史写作的目的和方法进行反思的意义上）是不明智的，不管怎么说，上一段所列举的那些主题性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它们在17世纪晚期被讨论时引起了同等的焦虑、兴奋和意气。为了对20世纪末期的问题进行“透视”，就像历史学家们所喜欢说的那样，并且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不偏不倚，本文将会从描述和分析17世纪有关历史知识问题的争辩开始，第二部分则返回当下关于历史是事实还是虚构的探讨中。

一

与其他知识形式一样，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局限性及其基础至少古希腊之前就已经被质疑和讨论过了，虽然在某些时期或某些时刻会比之其他时期或时刻更加激烈一些。古希腊伊利斯的皮浪（Pyrrho of Elis，约公元前360—前270）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刻，公元2世纪的琉善（Lucian）时代又是一个这样的时刻，他的《真实故事》（*True Story*）一书既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样的史学家为样板，也效仿了旅行家们的见闻录。^{〔1〕}

另一个这样的时刻，是古典怀疑论者的文本被重新发现的16世纪。举例来说，西班牙著名的传教士和人性论者安东尼·德·格瓦拉（Antonio de Guevara）撰写了半虚构的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的传记。当他由于杜撰

〔1〕 Christopher Ligota, "This Story is not True: Fact and Fiction in Antiquit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45 [1982], pp. 1-13.

了历史细节而被批评时,格瓦拉自辩道,就世俗的历史和异教历史而言,“我们无法确信哪些历史学家比其他人讲述了更多的真实”。〔2〕同样,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家海因里希·科尼利厄斯·阿古利巴(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在其《科学的虚荣》(*Vanity of the Sciences*)一书中,弃历史如敝履,认为历史是不可信赖的,因为偏见总是蕴涵其中。在16世纪后期,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针对历史发起进攻,以此捍卫诗歌。他嘲笑历史学家“埋首于老鼠咬过的陈旧档案”,却“大半时候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权威”。〔3〕

17世纪中叶是一个重要时刻,此时有关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局限性和基础的辩论如火如荼地展开,虽然这样的争议并非只限于法国,却在法国最为激烈。60年前,保罗·哈扎德(Paul Hazard)生动地描述了17世纪后期的“意识危机”,其中就包含有“历史意识的危机”。〔4〕

在这场关于历史知识、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关于历史的“怀疑论”(Pyrrhonism)的辩论当中,三个法国哲学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在其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中,简明却毁灭性地摒弃了历史写作,认为它由于其宏大风格而令人误入歧途。〔5〕勒瓦耶(François La Mothe Le Vayer)写了一本书,探讨“历史的不确定性”问题(*Du peu de certitude qu'il y a dans l'histoire*)。这一争论在培尔(Pierre Bayle)的时代更为激烈,尽管它声势不减地持续到了18世纪伏尔泰的时代。〔6〕为了更好地概括这场辩论,我们最好密切关注论点,而不是那些开启了对历史知识的攻击的个人——先原告,后被告。

怀疑论者有两个主要论点,其一从偏见着眼,其二从作伪出发。“偏见”是一个体育运动的隐喻,源于滚球比赛,在17世纪英格兰普遍的学术追求中,这个词被用来指偏离了政治和宗教的正轨。这项隐喻的意思是,我们的激情和兴趣妨碍了我们从超出自身这方——无论是某个宗教、国家或某个党派——的角度

〔2〕 William Nelson, *Fact or Fiction: the Dilemma of the Renaissance Storyteller*, Cambridge, MA, 1973, pp. 35-36.

〔3〕 Philip Sidney, *Defence of Poetry*, ed. Jan van Dorsten, Oxford, 1973, p. 83.

〔4〕 Paul Hazard,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1680-1715*, Paris, 1935; 参看 Richard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Erasmus to Descartes*, Assen, 1960; Peter Reill,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Berkeley, 1975。

〔5〕 René Descartes, *Oeuvres*, Paris, 1963, p. 574; 参看 Krzysztof Pomian, “Le cartésianisme, les érudits et l'histoire”, *Archiwum Historii Filozofii i Myśli Społecznej* 12 [1966], pp. 175-204.

〔6〕 Meta Scheele, *Wissen und Glaube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Heidelberg, 1930; Carlo Borghero, *La certezza e la storia: cartesianesimo, pirronismo e conoscenza storica*, Milan, 1983.

来看问题。与此相似,法国学者加里布埃尔·劳德注意到,历史学家们,“除了那些非常勇敢的之外”,从不再现事物的本来面貌,而是根据他们自己希望表达的意象加以倾斜和掩饰。^[7]

勒瓦耶详细论述了偏见问题。他反问道,如果我们只能够看到从迦太基的观点来对布匿战争作出的陈述,就像我们只从罗马的立场来作的陈述那样,那么我们今天对于布匿战争的印象会是怎样的呢?如果撰写《高卢战记》的是韦辛格托里克斯(Versingetorix),而不是恺撒,那么恺撒的高卢战争又将呈现出怎样的面貌?^[8]常见的情形是,对于现代例证的关切,也会支持对古代例证的援用。比如,勒瓦耶就注意到西班牙历史学家在论述西班牙与法国战争中的偏见。

一代人之后,在讨论一位前耶稣会士路易斯·梅宝(Louis Maimbourg)所发表的一部加尔文教史所引发的偏见问题时,培尔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同样的事实可以写一部赞美诗,也可以写出一部讽刺作品;可以写成一篇颂辞,也可以写成一篇讽辞。因此,培尔宣称,他几乎从未通过阅读历史学家而知道过去发生过什么,而只是发现“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党派都说了些什么”。换句话说,某一位特定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会令他发生兴趣,恰恰是由于偏见的缘故。^[9]

因此,伏尔泰在他的随笔《历史怀疑论》中并没有讲述任何新颖的观点,他不过是对100多年前的辩论进行了总结。他甚至使用了勒瓦耶关于罗马和迦太基的例子。伏尔泰评论道:“为了判断的公平,我们有必要使用汉尼拔家族档案。”既然他是伏尔泰,他就忍不住期望还可以看到该亚法(Caiphaz)和彼拉多(Pontius Pilate)的回忆录。^[10]

怀疑论者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更为严肃。历史学家受到的指控不仅有偏见,还有轻信。他们被指控将其关于过去的论述置于伪造的文件之上,被指控接受了纯属臆造出来的人物和事件的存在。

披露伪造的文件在文艺复兴时期并不罕见。罗马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对所谓“君士坦丁的赠予”(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批判,只

[7] Gabriel Naudé, *Apologie*, Paris, 1625, p. 18.

[8] François La Mothe Le Vayer, *Du peu de certitude qu'il y a dans l'histoire*, Paris, 1668; 参看 Vittorio I. Comparato, "La Mothe dalla critica storica al pirronismo", in *Ricerche sulla letteratura libertina*, ed. Tullio Gregory, Florence, 1981, pp. 259-280.

[9] Pierre Bayle, *Critique générale de l'histoire du Calvinisme de M. de Maimbourg*, Villefranche, 1683, pp. 13-18, pp. 28-29; 参看 Gianfranco Cantelli, *Teologia e ateismo*, Florence, 1969.

[10] Voltaire, *Le pyrrhonisme de l'histoire*, Paris, 1769, pp. 17, 54.

是这一系列事件中最著名的案例。^[11]事实上,“批判的”一词在16世纪晚期开始被使用,它部分地指对这些伪造文件的揭露。但是,17世纪的批判朝着挑战越来越多的文本的可信性方面深入发展,包括古典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中一些最基本的文献。

比如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两个最著名而又相互冲突的论述被认为比荷马还要古老,它们分别被归于腓尼基人达雷斯(Dares)和克里特人迪克提斯(Dictys)的名下。二者都因为是后来者的伪造而被摒弃。所谓的埃及圣哲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吉塔斯(Hermes Trismegistus)的“秘传”作品,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希腊暴君法拉里斯(Phalaris)的书信、桑可尼雅顿(Sanchoniathon)编纂的迦太基历史、甚至是古罗马行政官和主教们的记录都是不可信的。人们使用的最强有力的论点中,就有对“时代错置”(anachronism,这是17世纪的一个新词)的论证,包括伪造的文件中使用了被冒名作者所不可能知晓的语言,或者提到了他所不可能知晓的事件。

在此种标准考量下,《圣经》部分内容的权威性受到挑战。某些原本被归于教父们名下的文献也遭到质疑。一些中世纪的文献也被怀疑,包括教皇的教谕、墨洛温王朝颁布的特许状和冰岛的英雄传奇。一位叫做让·阿杜恩(Jean Hardouin)的法国耶稣会士做的有点过头了,他宣称大部分的经典文本都是伪造的。今天阿杜恩可能会被诊断为精神偏执狂患者(毕竟,他对于存在一个伪造文本的阴谋深信不疑),可以是一个恰当的治疗对象。但是,阿杜恩只是普遍趋势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他将业已存在的对于许多这类文献的质疑与他本人所添加的一些怀疑混在了一起。^[12]

阿杜恩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些特殊的挑战所可能带来的累积效应。“批判”一词在17世纪晚期成为一个流行的图书标题用语,1700年一位学者将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批判的时代”就不足为奇了。举例来说,罗慕路斯(Romulus)缔造了古罗马,某些圣徒的生平,或法拉蒙(Pharamond)奠定了法国的君主制,越来越多的这类过去通常被认为是真实历史的事情,现在却被诋为杜撰、神话。法拉蒙真的存在吗?罗慕路斯实有其人吗?埃涅阿斯(Aeneas)是否曾经去过

[11] Anthony Grafton, *Forgers and Critics*, Princeton, 1990.

[12] Jean Hardouin, *Prolegomena*, Amsterdam, 1729; 参看 Nicholas Lenglet du Fresnoy, *L'histoire justifiée contre les romans*, Paris, 1735; 参看 Scheele, *Wissen und Glaube in der Greschicht Swissenschaft*, pp. 54-59; Jean Sgard, "Et si les anciens étaient modernes... le système du p. Hardouin", in *D'un siècle à l'autre: anciens et modernes*, ed. L. Godard, Marseille, 1987, pp. 209-20.

意大利? 异教徒的历史是可信的吗? 罗马历史头四个世纪的事情都是确凿的吗?^[13]

受笛卡儿及其系统怀疑的影响,一些学者至少在他们大脑里进行的思想实验中走得更远。他们质问:奥古斯都真的存在过吗? 查理大帝五世存在过吗? 对拉罗塞勒(La Rochelle)的围攻真的发生过吗? 历史难道仅仅只是一部小说吗?

鉴于上述疑惑,我们并不惊讶地发现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候被人们饶有兴味地加以审视。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将一位同行说成是“传奇”的作者,是对其工作的否认。因此,那个顽固地坚持常识的苏格兰人吉尔伯特·伯奈特(Gilbert Burnet)谴责法国历史学家瓦利亚斯(Varillas),因为“他的书有太多的传奇气息”,结果,他自己的作品也招致了同样的批评。^[14] 一位知名杂志的评论家摒弃了红衣主教雷斯(cardinal de Retz)的回忆录,斥之以“披着传奇外衣的历史故事”。^[15]

这种批判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更为有趣的事情是去留意少数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们毕竟从小说家那里学会了某些事情。因此,曾经因为其加尔文教史而遭到培尔批评的路易斯·梅宝(Louis Maimbourg)竭力保证,他写作历史的方式将会给读者带来“读传奇一样的快乐”,而莱布尼茨却希冀历史作品中有“一点传奇的味道”,特别是在讨论动机的时候。^[16]

在他们看来,虚构作品的作者们离历史更近。历史小说在17世纪晚期兴起了,此种小说不仅将背景设置在过去,而且对历史事件给出了自身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是由圣雷尔修道院院长在1672年所出版的《卡洛斯阁下》(*Dom Carlos*),写的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儿子之死。该书的副标题是“历史小说”,此后,这个新的词汇很快在法国流行开来。^[17]

附带说一下,皮埃尔·培尔对《卡洛斯阁下》和当时的其他历史小说持欣赏态度。另一方面,他对那些发表号称是“回忆录”而实际上却是胡编乱造的作者

[13] Michele Sartori, “L’incertitude dei primi secoli di Roma: il metodo storico nella prima metà del ‘700”, *Clio* 18 (1982), pp. 7-35.

[14] Gilbert Burnet, *Reflections on M. Varillas’s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s*, London, 1689, p. 6.

[15] Derek A. Watts, *Cardinal de Retz*, London, 1980, p. 55.

[16] G. W. Leibniz, *Opuscles*, Paris, 1903, pp. 225-226.

[17] César de Saint-Réal, *Dom Carlos, nouvelle historique*, Paris, 1672; G. Dulong, *L’abbé de St-Réal*, Paris, 1921, p. 337; Marie-Thérèse Hipp, *Mythes et réalités; enquête sur le roman et les mémoires, 1660-1700*, Paris, 1976, pp. 52-53.

们的“厚颜无耻”很是反感——诸如莫里哀回忆录(*Mémoires de la vie de Henriette-Sylvie de Molière*)、达尔达尼央(*Mémoires de M. d'Artagnan*; 译按:“d'Artagnan”,此人即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等小说的主人公)回忆录等等。^[18]碰巧,达尔达尼央的回忆录激发了大仲马的创作灵感。17世纪晚期的历史杜撰物包括曼西尼姐妹的回忆录,路易十四曾向她们中的一个大献殷勤。编造历史这一时尚在法国表现得尤为热烈,后经法国传播到其他国家,在英国的突出例子是丹尼尔·笛福的《武士回忆录》(*Daniel Defoe's Memoirs of a Cavalier*, 1720)和《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1722),后者是以官方档案和统计数据为材料完成的,并使该书产生了更为强烈的现代批评家所谓的“实在性效果”。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伪造能够成为时尚呢?这是历史批判这枚硬币的反面。就像从事批判的那些人一样,杜撰者表现出了对于时代错置的同样意识。为了以假乱真,这种新的文学体裁所要依赖的正是学者们用来揭露作伪的那些技巧。

但是为什么怀疑主义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得到发展呢?其解释可能有如下几点。历史怀疑论确定无疑地依赖于笛卡儿及其追随者的系统怀疑。但是让法国哲学家们对此运动负责,就像将法国大革命归咎于伏尔泰和卢梭。怀疑论的兴起是复杂的文化转变的一部分。

比如说,辨伪就依赖于语文学技巧的发展。17世纪后期报纸的勃兴可能对怀疑主义的兴起贡献颇多,因为报纸使读者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表述,甚至是对于最近刚发生的同一事件截然相对的表述。

至于对于偏见的意识,毫无疑问,它被当时的宗教冲突所激发,辩论的双方互相揭露对手历史作品中的偏见。比如,当时出版了一部加尔文教史的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证明路易十四迫害法国新教徒的合理性,培尔在回应这部著作时明确表达了他关于偏见的想法。既然詹森(Jansen)及其追随者要从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寻求支援,那么,即便是让·阿杜恩这样的病态的怀疑论者,也可能会论及宗教冲突:天主教徒反对新教徒,特别是耶稣会信徒反对詹森教派信徒。正如阿杜恩自己所说的,在他把自己的怀疑往后推到经典文本之前,他就“已经从奥古斯丁及其同辈人那里嗅到了欺诈的气息”。^[19]

那么,历史学家是如何在17世纪后期的危机中挺过来的呢?他们要么找到

[18] Hipp, *Mythes et réalités*.

[19] Jean Hardouin, *op. cit.*, pp. 10, 156, 159; Jean Sgard, *op. cit.*, pp. 211-212.

了对于怀疑论者的回答,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实际上他们确实找到了一个答案,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他们找到了一系列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共同促成了人们所谓的历史学的“复苏”。〔20〕

摆脱危机的其中一条路径到头来是一条死胡同。这是在17世纪晚期享有崇高声望的几何学的方法。它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首先是法国主教皮埃尔-丹尼尔·于爱(Pierre-Daniel Huet),他试图将基督教的真理建立在如下“原理”的基础之上:“一部历史著作,倘若它所讲述的事情与多本它同时代的著作或是所叙述的事件多少处于同一时代的著作中所讲述的一样,那它就是真实可信的。”〔21〕

第二个例子来自于苏格兰神学家约翰·克雷格(John Craig)的著作,他是艾萨克·牛顿的朋友和追随者,要以原理和定理的形式表达历史证据的原则。不幸的是,这些原理和公理像于爱的一样,被证明相当老套,不过是使用数学和物理学的语言重新讲述了一些老生常谈的事情。比如,其中的一个原则认为,史料的可靠性随着证人与被记录的事件之间的距离而变化。〔22〕

更富成果和更有用的是对文献的批判,那同时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耶稣会士派皮布洛奇(Papebroch)质疑了中世纪早期法国王室特许状的权威性。为了回应派皮布洛奇,伟大的本笃会学者让·马比昂(Jean Mabillon)撰写了一篇论文《论文献》(*De re diplomatica*),讨论了确定文献日期的方法。马比昂认为,通过研究文献的书写方法、格式、印章等等,就可能发现作伪的情形,而其他特许状的真实性也能够得到证实。〔23〕没有人像回应派皮布洛奇那样给予阿杜恩一个确定的回复,也许并不需要回复,但是让·克莱尔(Jean LeClerc)创作了一部有用的手册《校勘的技艺》(*Ars critica*),其中列出了文本批判的法则,包括经典文本和《圣经》文本。〔24〕

另一个对怀疑论者的回答是从物质文化,尤其是碑刻铭文、钱币和徽章来强调证据的相对可靠性。在这一研究领域,阿杜恩不再是个怀疑论者,而是个狂热者,他认为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古代史年表的唯一途径,是依赖于钱币而

〔20〕 Judith Shklar, “Jean D’Alembert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2 [1981], pp. 643-664.

〔21〕 Pierre-Daniel Huet, *Demonstratio evangelica*, Paris, 1679, p. 12.

〔22〕 John Craig, *Rules of Historical Evidence*, 1699, reprinted *History & Theory Beiheft* 4.

〔23〕 Jean Mabillon, *De re diplomatica*, Paris, 1681.

〔24〕 Jean Leclerc, *Ars critica*, Amsterdam, 1697.

不是古代作家们。当然,铭文、硬币和徽章也可能会是伪造的,但是,检测这些贗品的法则可以被推衍出来,正如18世纪意大利学者马费伊在其《宝石鉴定的技艺》中所做的那样。^[25]因此,同怀疑论者的争论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却是极端重要的结果——激励历史学家们不仅在古代史领域,而且也在中世纪史领域越来越多地使用非文字的史料。^[26]

就从偏见出发的论点而言,针对怀疑论者,有一种可称之为“常识性”的辩护。比如,皮埃尔·培尔用一只手归还了他另一只手取走的东西,他认为通过细心审查背景,有可能发现谎言。再有就是,吉尔伯特·伯奈特(Gilbert Burnet)将历史学家偏向于自己一方的“天然”偏见,与像瓦利亚斯(Varillas)那样的造谣者的非法伎俩区分开来。

另一个对怀疑论挑战作出的回应是所谓的“神话的复原”,那与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有着特别的联系。在18世纪早期,人们重新燃起兴趣,来讨论希腊神话和其他神话故事的意义。维柯是一位此种意义上的怀疑论者:他认为除了犹太人以外,其他所有关于民族起源的表述都是靠不住的。举例而言,关于罗马,我们不可能知道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维柯又是一个反怀疑论者,或者说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他认为有可能读出神话的言外之意,并且利用它们写出习俗或者思想的历史。维柯将神话解读为心态的证据,如同培尔将历史学家看作是偏见的证据一样。在维柯看来,这是“新的批判艺术”,是他在《新科学》中所阐释的七个方面之一。^[27]

根据这些具体的研究,大量针对历史怀疑论的一般驳斥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出现了,特别是在德国,同时也出现在法国,英国和荷兰(西班牙尽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驱,费诺[Feijóo]神父仍是唯一的贡献者)。^[28]

反驳怀疑论者的关键性论据是由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第四本书《人类理智研究》(*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中提出的关于“同意的程度”。在回应笛卡儿及其信徒时,洛克争辩道,一些历史陈述的可能性比另外一些更大,还有一些不能被合情合理地否定。“当任何特定的事实被若干不容

[25] Scipione Maffei, *Ars critica lapidaria*, Verona, 1765.

[26] Francis Haskell, *History and its Image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3.

[27] Giambattista Vico, *Scienza Nuova*, Naples, 1744, sections 28, p. 102 & p. 125; 参看 Peter Burke, *Vico*, Oxford, 1985, pp. 43-48; Joseph Mali, *The Rehabilitation of Myth*, Cambridge, 1992, pp. 136-211

[28] Scheele, *op. cit.* Borghero, *op. cit.*

置疑的目击者所不约而同地提供的证词所证实的时候,我们之间达成一致……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在意大利确实存在一座叫做罗马的城市;大约 1700 年前,一位名唤尤里乌斯·恺撒的人就住在这里;他是一个将军,在一场战斗中击败了另一个叫做庞培的将军。”

在针对怀疑论的众多反驳意见中最为有趣的一种,可能是莱布尼茨的一个熟人提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比尔林(Friedrich Wilhelm Bierling),是林特尔恩大学的教授。像洛克一样,比尔林将历史的确定性或可能性区分为三个层次,从最高层(尤里乌斯·恺撒确实存在),经由中间层(查理五世退位的原因),到达最底层(关于苏格兰女王玛丽谋害了自己的丈夫的问题,或是华伦斯坦在他被暗杀几个月前的计划)。比尔林将现代的例子引入论证,使得他的讨论更加生动。

比尔林对于达到历史真实的障碍的讨论切中要害,这在他那个时代非同寻常。他认为,档案和文献史料可能渗入了偏见,就像 17 世纪审判女巫的审讯记录的情形那样。但他认为,无论如何,历史学家可以使用文献而不必相信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内容。^[29]

至迟在 18 世纪中期,人们可以说,历史意识的危机在以历史实在论的标准方面的某些变化为代价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伏尔泰加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为时过晚,贡献甚微。在随后的大约两个世纪里,许多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们将对于特定史料的“局部怀疑论”与对于他们有能力抵达英国学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所谓的“真相的避难所”的普遍信心,结合在了一起。即使是哲学家大卫·休谟,当他从哲学转移到历史后,也将怀疑主义搁置在一旁。历史与虚构之间的边界一度开放,而后又逐步关闭了。利奥波德·冯·兰克投身于某种书写过去的活动中,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则是用另一种方式在书写过去。

二

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着另一场历史意识的危机。这并非同样的危机;在思想史上没有循环旅行。如果说,第一次危机与现代性的兴起和笛卡儿

[29] Friedrich G. Bierling, *De pyrrhonismo historico*, Leipzig, 1724.

哲学相联系,那么,第二次危机则与后现代性和对笛卡儿式假设的批判相关。^[30] 后兰克史学不可能与前兰克史学一模一样。

然而,第二次危机确实出之以与第一次危机相同的很多形式,但是论辩的领军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相似之处。新一代的法国哲学家,比如著名的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破坏了当代历史叙事的基础,就像笛卡儿曾经削弱了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宏大叙事一样。^[31] 学者们一直在辩论,那些关键性的文件,比如希特勒的日记是真实的呢还是伪造的? 一些人——当然他们并非全都是新纳粹分子——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否认了像大屠杀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存在。^[32] 让图书管理员(而且不仅仅是图书管理员)不安的是,历史与虚构之间的边界再度开放了。

回想一些最近发生的跨越边界的著名事例是值得的,那一边界是按过去通常的方式来划定的。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在他号称是从一份中世纪编年改写而来的小说《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 1980)中,隐藏了真实的中世纪文本。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的《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c*, 1982),现在广为人知的是其电影版《辛德勒的名单》,主张“采用一部小说的结构和手法来讲述一段真实的历史”(肯尼利毫不怀疑大屠杀的实在性)。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曾经想象,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一个自诩的历史学家正在研究托洛茨基派游击队员亚历山德罗·马艾塔(Alejandro Mayta)的生活,不料得到的结论却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实际上”就是一部小说。^[33] 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霍克斯默》(*Hawksmoor*, 1985)模仿丹尼尔·笛福,杜撰了仿佛是历史档案的东西。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著作《死亡的确定性》(*Dead Certainties*, 1990)似乎模仿了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他编撰了一份18世纪有关乌尔夫将军死亡的记录。沙玛将他的著作描述为“对历史事件进行编年的想象之作”(将此断言与肯尼利的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在这两者当中,把自己看得更接近传统的历史学家的,乃是那位小说家)。古代史家卢西亚诺·坎弗拉(Luciano Canfora)的著作《消失的图书馆》(*Vanishing Library*, 1987),显然受到了艾柯和博尔赫斯的启发,他在书中描述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

[30]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Oxford, 1980.

[31] Jean-François Lyotard,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Paris, 1979.

[32] Deborah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Glencoe, 1993.

[33] Mario Vargas Llosa, *Historia de Mayta*, Barcelona, 1984.

馆及其毁灭。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古老墙垒正在坍塌。

随着对于实在的话语建构的问题以及研究者在创造研究主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偏见的问题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又回来了。谁是我们时代的勒瓦耶或者皮埃尔·培尔呢?对于这个头衔,(除了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之外)一个明显的候选者可能是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就一直致力于讨论他所谓的“事实表现的虚构”(the fictions of factual representation)。^[34]

重新回到瓦利亚斯先生(Monsieur Varillas)、圣-瑞尔先生(Monsieur de Saint-Réal)和莱蒂先生(Signore Leti),有人可能很想说,今天所有的事情都被宽恕了,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这确实是一些历史学家所提供的当前状态的症状,例如,格特鲁德·海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1992年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和逃离事实》的文章中,海默尔法布批判了海登·怀特和其他一些被视为他和德里达的追随者的历史学家,指控他们为了快乐原则而放弃了真实原则,“否认了过去的稳固性,否定了过去的实在性,除却历史学家选择去造就的那一部分之外”。十年或者更早之前,已故的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以类似的方式声称,海登·怀特“取消了作为历史学家主要使命的对于真相的寻求”。^[35]近年来此种辩论为数甚多,在这些辩论中,传统史学的代表们拒斥整个新的趋势。

这些对近来思想发展的极其普遍的批评,令人回想起17世纪对怀疑论毒药的谴责,那更是将勒内·笛卡儿、皮埃尔·培尔,和让·阿杜恩等人拉在一起,而不是区分他们的不同立场。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差别,注意到传统历史学家与其批评者之间的至少三个不同之处是有益的。

(1)首先,历史学家们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诸如“封建主义”“风格主义”和“绝对主义”等等,它们不再像曾经的那样牢固可靠。它们正在消解,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它们日益清晰地呈现出它们被创造出来的时代、而非人们指望它们所指涉的那些时代的特征。巴洛克艺术,就像美一样,同样地既在观者眼中,也在被审视的艺术作品之中。伟大的法制史家梅特兰(F. W. Maitland)曾开玩笑或者半开玩笑地评论说,封建制度不是由征服者威廉、而是由法制史家

[34] Hayden V. White, *Metahistory*, Baltimore, 1973; Hayden V.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1976.

[35] Arnaldo Momigliano, *The Rhetoric of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Comparative Criticism* 3 [1981], pp. 259-268.

亨利·斯佩尔曼爵士(Sir Henry Spelman)引进英国的。今天,这样的评论几乎不能引发一丝微笑。“封建主义”这样的术语就常常像是“建构”或者“表象”一样被人讨论。将这一论点再往前推一点,有时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们毋宁说是发明而非发现了他们的研究对象。

当代的范畴和历史学家们的范畴似乎越来越脆弱多变。自从霍布斯鲍姆几年前将“传统”描述为一桩“发明”之后,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一观念身上都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36]从阿根廷到苏格兰,许多国族都被说成是“发明”的。^[37]社会阶级,像印度的种姓制度和非洲的部落,越来越被视为“话语的建构”,换言之,它们被视为更其是语言的而非社会的事实,更其是塑造了而非反映了社会实在。^[38]

(2)其次,有这样一种说法:历史学家们即便不是在书桌前发明他们的范畴,也无法以未曾遭受偏见污染的眼睛把过去看作它本来的样子,因为他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是他们自身立场——换言之,就是他们自身时代、地域和社会群体(当然还有他们的性别)的陈规、预设或心态——的“囚徒”。自下而上的历史和妇女史的兴起让人们对立场问题的意识更加明晰了。这一争论类似于17世纪关于偏见的辩论,但是将它极大地向前推进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沿着相同的方向,对于可以方便地称之为“种族中心论”的那种东西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更加激进的是,经验本身看起来也越来越像是一种建构。司汤达和托尔斯泰这样的小说家,用破碎和混沌的形式描述滑铁卢和博罗季诺战役,一度使读者们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在电视的时代,我们倾向于理所当然地将那些只是在事后才被媒体赋予了融贯性和持久性的东西,当成就是我们对于事件如何发生的经历。

(3)这将我们带到了第三点,即所谓的“表现危机”。批评者指责传统的历史学家未能意识到文学形式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它还包含着自身的内容。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的,海登·怀特通过论证历史著作也是一种“文学制成品”,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了轰动。

即使是像乔治·华盛顿和路易十四这样的人,就其强有力的公众形象是被

[36]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1983.

[37] Nicholas Shumway, *The Invention of Argentina*, Berkeley, 1991; Murray Pittock,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London, 1991.

[38] Patrick Joyce, *Visions of the People*, Cambridge, 1991; Ronald Inden, *Imagining India*, Chicago, 1992.

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助手们筹划的结果而论,也被说成是被“发明”或“打造”出来的。^[39]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胡塞尔的哲学,历史学家正日益倾向于将实在放到括号之中而专注于表现。^[40] 这也会使人想到福柯,他们将他们关于实在之物的观念扩展到将想象之物也囊括在内了。无论如何,他们越来越陶醉于感知的历史,尤其沉醉于“他者”的意象——如欧洲人是如何感知美国人的,西方人又是如何看待东方人的,有钱人如何看待贫困者,男人如何看待女人,等等。^[41]

结果就是,书写的历史更加接近于虚构。作为一个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说过了,“历史编纂学已经成为一门偏离正道和暧昧不清的学科,因为我们认可其方法在不容置疑的程度上依赖于神话和虚构”。^[42]

处于同一时代的人们就他们的时代会写些什么,也是由文学形式塑造的。文学批评家在他们对自传的分析中,就已经一代一代地提出此种看法。^[43] 就像自传会追随更早的自传的样板一样,旅行者对域外事物的描述,在同样的程度上,既可归之于他们自身的观察,也可归之于更早的游记作品。^[44] 就像娜塔莉·戴维斯所指出来的那样,即使是在档案中,我们也能找到“虚构”,它们不是(或者说并非必定是)采用谎言的形式,而是出之以“雕琢叙事”的形式,正如16世纪法国那些暴力故事所展示的,它们被犯人重新演绎,并被律师记录在案,希冀得到王室的宽宥。^[45] 换句话说,“神话”不仅仅是给糟糕的历史的冠名,或者是原始民族给自己讲述的故事。神话构建了每一个人的经验。^[46]

一度处于历史研究边缘的史学史在最近这几年内日渐成为中心,这并不让人觉得意外。同样的潮流也发生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它们正在经历自己的

[39] Paul K. Longmore, *The Inven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 Berkeley, 1988;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2.

[40] Edmund Husserl,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1913; English trans., London, 1931, 107ff.

[41] Michel De Certeau,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Paris, 1975;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1978.

[42] 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New York, 1967, p. 36.

[43] William Y. Tindall, *John Bunyan, Mechanick Preacher*, New York, 1934; Roy Pascal, *Design and Truth in Autobiography*, London, 1960; Hipp, op. cit.

[44]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London, 1992.

[45] Natalie Z.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Cambridge, 1987, p. 3.

[46] Raphael Samuel and Paul Thompson, *The Myths We Live By*, London, 1990.

危机,形式问题、文本问题,以及“表现的透明度”问题,也成为争辩的论题。^[47]与这些历史学上的辩论相似的,是哲学上有关知识的本质、实在的本质的争论,这场争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自然之镜”已经破碎,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实在”的,结果不过是表现而已。^[48]这样一来,历史学家的著作就必定是对于表现的表现。

诸多这样的观点以前就已经被提出来过。在17世纪的时候,一些特定的局部性疑惑就出现了,即使它们很温和,但是加起来,它们会有一个累积效应。倘若说,我们是在今天而不是在一代人之前就谈论“历史意识的危机”,那是因为这些疑惑正在影响更大的思想疆域(当然,也影响到了更多的人)。这口锅一直被文火慢慢地炖着,现在它沸腾了。

今天是否也存在着17世纪那种帮助我们走出危机的路径呢?有人可能这样开始回答问题:指出大部分的挑战存在着若干温和的与极端的的不同版本(从“历史学家比过去所常常认为的要更接近于小说家”到“历史就是虚构”等等),温和的版本显然要有说服力得多。认为历史学家不能讲述全部的真相是一回事,贬斥他们只讲述真相的理想又是另外一回事;将实在放入括弧是一回事,否认实在又是另外一回事。宣称历史学家创造了封建制度是一回事,说他们编造出了征服者威廉又是另外一回事。批评家们有时候采用一项策略,它被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称为“爬竿取物”,即在极端的主张与只会支持更加温和的立场的观点之间滑动。它们有时候会相互矛盾,正如爱德华·萨义德的例子所表现的,他竭力论证“伊斯兰教在西方被从根本上错误地表现了”,与此同时,他又怀疑“究竟对任何事物能否有一种真实的表现”。^[49]

总而言之,很可能像17世纪一样,为了有效地应对哲学家和批评家们所提出的挑战,历史学家将不得不修正他们的方法,以及甚至是他们关于实在的概念。任何声称“真理处于两端之间”的解决危机的尝试,都失之于模糊不清和武断教条。走出危机的道路终究不大可能被概括为任何简单的公式。就像将几何学方法应用到历史学一样,这只能是死路一条。事实上,提出一张各种差别的清单的全部意义,就是提示我们,不同的危机需要不同的解决途径。

就涉及概念而言,历史学家无疑鲜有选择,而只能接受批评。他们不必全盘

[47]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1986, p. 2; 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New York, 1988.

[48] Rorty, *op. cit.*

[49] Said, *op. cit.*, p. 272.

放弃诸如“文艺复兴”或“社会阶级”之类的一般性概念,但是他们不仅需要书写它们,而且还需要在引号内思考它们,换句话说,把它们当作建构来加以思考。

而涉及表现的问题,就需要谈到差别了。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表现的威力,想象之物的力量,但是它有时候忽视了受众拒绝向他们提供的某些表现的方式。尽管“实在”概念在哲学上引发了一些问题,但它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笔者近来关于“打造”路易十四的研究,试图论证或者至少是表明表现的实在性,换句话说,该研究企图表明,诗歌、节日庆典、版画、雕像和挂毯艺术等等加起来,共同影响了这位国王在法国和其他地方被认知的方式。但是,这一研究取径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超出表现之物,或者是我们可以接近它。相反,史料足以清楚地表明,同时代的很多人意识到了那位英雄国王的官方形象与日常生活中的路易·波旁之间的不谐。比如,他们知道路易穿高跟鞋是为了看起来更有王者气象,而小道消息却传闻这位国王更喜好恋爱而不是战争。^[50] 即便未曾被中介过的实在对我们而言是无法达到的,但至少还有可能表明,某些表现比之其他的距离实在要更远。

对传统历史学的第二个批判涉及立场问题,这对历史写作产生了最直接的现实影响。在这一领域,当我们置身这样一个时代,当普通人、妇女、殖民地人民和大量的少数群体更被关注而又能更多地发出声音的时候,从多样的立场来表现的需要就会至关重要。配对的言辞或“正反语”在古典历史学家和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的作品中都能发现,这些作者比如修昔底德、李维、波吉奥(Poggio)和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过去常常采用这一功能,呈现出支持或反对一项决策的论点,或者是战争中敌对双方的目标。一些20世纪的小说,比如赫胥黎的《加沙盲人》(Aldous Huxley, *Eyeless in Gaza*),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and the Fury*),劳伦斯·德雷尔的《亚历山大四重奏》(Lawrence Durrell, *Alexandria Quartet*),用它们的不同声部,提供给历史学家此种表现可能的模型。即使是在“文体混淆”的年代,出于正反语和其他言辞在17世纪受到拒斥的同样理由,大部分历史学家面对这一做法仍然退缩不前;换句话说,这种做法制造了过往的将军或政治家们确实说了这些话的虚假印象,而实际上那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替他们写出来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致力于发现这一技巧的替代品,以便向读者们

[50] Peter Burke, *op. cit.*

展示,在重大的冲突中——比如说西班牙内战——不同的各方在有所举措时对于时局有着不同的界定。这一点并没有在比如休·托马斯(Hugh Thomas)令人钦佩的持平而不偏不倚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史书中呈现出来。人们甚至可以批评这本书太过于不偏不倚、太过于超然。作者关于这场战争的立场的结论就是,倘若我们想要理解(比如说)反正统派或正统派是如何看待这场冲突的,就需要或者去看看“更多偏见”的历史书,或者一边是诸如安德烈·马尔罗《海边的祈祷》(André Malraux, *L'Espoir*)、另一边是德里厄·拉罗歇尔的《丑角吉尔》(Drieu de la Rochelle, *Gilles*)这样的小说。在描绘了对立双方的立场之后保持平衡,真的是不可能的吗?

这样一个假设成为近来研究文化相遇的基础;哥伦布与加勒比人,科尔特斯与阿兹特克人,等等,它们试图在重建胜利者的眼光的同时,也重建“被征服者的视界”。这些研究中最精细的作品之一,是由历史人类学家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所写的一本书,他认为观点的多样性是与生俱来的,其著作即是围绕着此种多样性而展开。他的著作《阿拉比的世界》(*Alabi's World*)通过分析荷兰殖民管理者和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所留下的记录,再辅之以萨拉马卡人的口述史以发现他们的看法,重构了18世纪的苏里南。他的书用四种字体进行印刷,使读者能更清晰地看到,任何他写下的段落是出自谁的视角——官方的、传教士的、萨拉马卡人的和普莱斯自己的。^[51]

回顾历史学家们在过去五百年中如此频繁使用的法律隐喻,我们走出目前这场历史意识危机的道路,或许是针对某些对于历史确定性的指控承认“有罪”,而对别的一些指控则辩护“无辜”。^[52] 我们可以通过采用小说家的某些技巧来丰富我们的历史写作,与此同时坚持历史依然是有别于虚构的一种(或者更好的说法是一组)文体。^[53] 虽然不可能回避某一种特定的立场——没有人能够在这场战斗中超然事外,包括当前的笔者在内——但历史学家还是应该花费更多的心血来表现与他们自己不同的见解。

【本文原载 Peter Burke, “Two Crise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33, 1998。】

[51] Richard Price, *Alabi's World*, Baltimore, 1990.

[52] 参看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4.

[53] 参看 Mark S. Phillips, “Historiography and Genre: a more Modest Proposal”,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24 (1993), pp. 119-132.

进一步阅读书目

一、读本和访谈录

- Domanska, Ew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Fay, Brian. Philip Pomper, Richard T. Vann eds.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 Jenkins, Keith. Alun Munslow eds.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 Jenkins, Keith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Keith Jenkins, London, Routledge, 1997.
- Pallares-Burke, Maria Lúcia. *The New History, 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Roberts, Geoffrey ed. *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 Tucker, Aviezer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1.

二、重要理论家的代表作及相关研究

- Ankersmit, F. R.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 Ankersmit, Frank. Ewa Domanska, Hans Kellner eds. , *Re-Figuring Hayden Whi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Ankersmit, Frank.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Ankersmit, Frank.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
- Ankersmit, Frank. *Meaning, 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 Ankersmit, Frank.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
- Berkhofer, Robert F. J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罗伯特·伯克霍甫:《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邢立军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Breisach, Ernst. *On the Future of History, The Postmodernist Challenge and Its Aftermath*,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allinicos, Alex. *Theories and Narratives,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arrard, Philippe. *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Evans, Richard.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 Jenkins, Keith. *At the Limits of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9.
- Jenkins, Keith.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
- Jenkins, Keith. *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1999.
- Kellner, Hans.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汉斯·凯尔纳:《语言和历

史描写:曲解故事》,韩震等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

LaCapra, Dominick.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Megill, Allan.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Munslow, Alun.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Icke, Peter.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 A Journey from Language to Experience*, London, Routledge, 2012.

Paul, Herman. *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tran.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1, 1984.

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tran.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3, 1988.

Rigney, Ann. *The Rhetoric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hree Narrative Histori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White, Hayde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

White, Hayde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

White, Hayden.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2007*, Robert Doran 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White, Hayde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

三、重要期刊

History and Theory
Rethinking History

1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问世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学界产生强烈冲击，无论史学理论还是史学实践均深受影响，发生巨大变革。本书精选海登·怀特、卡洛·金兹堡等名家最具代表性的十五篇文章，就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中的诸多议题展开讨论，不仅是对该领域数十年发展的总结，也对历史哲学与历史实践本身进行了深刻反思。

本书作者

海登·怀特

卡洛·金兹堡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佩雷斯·扎格林

基思·詹金斯

阿兰·梅吉尔

威廉·克罗农

耶尔恩·吕森

彼得·伯克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上架建议：人文

ISBN 978-7-301-27333-3



9 787301 273333 >

定价：49.00元